

延安交际处 回忆录



金城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金城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唐伟杰

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金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1/32 16印张 4插页 218千字

1955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2.05元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們！我志願將我所有之資產及一切權利歸於國民革命軍及國民政府以資進行此後國民革命軍及國民政府之成功即我之成功也此囑

革命尚未成功

金樹
廣東材料很好。以後多收
這些材料去我店外買人
左後收買各地方材料
好！

同志仍須努力

毛主席致本书作者的一封信的手迹。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时的合影。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机场迎接六参政员。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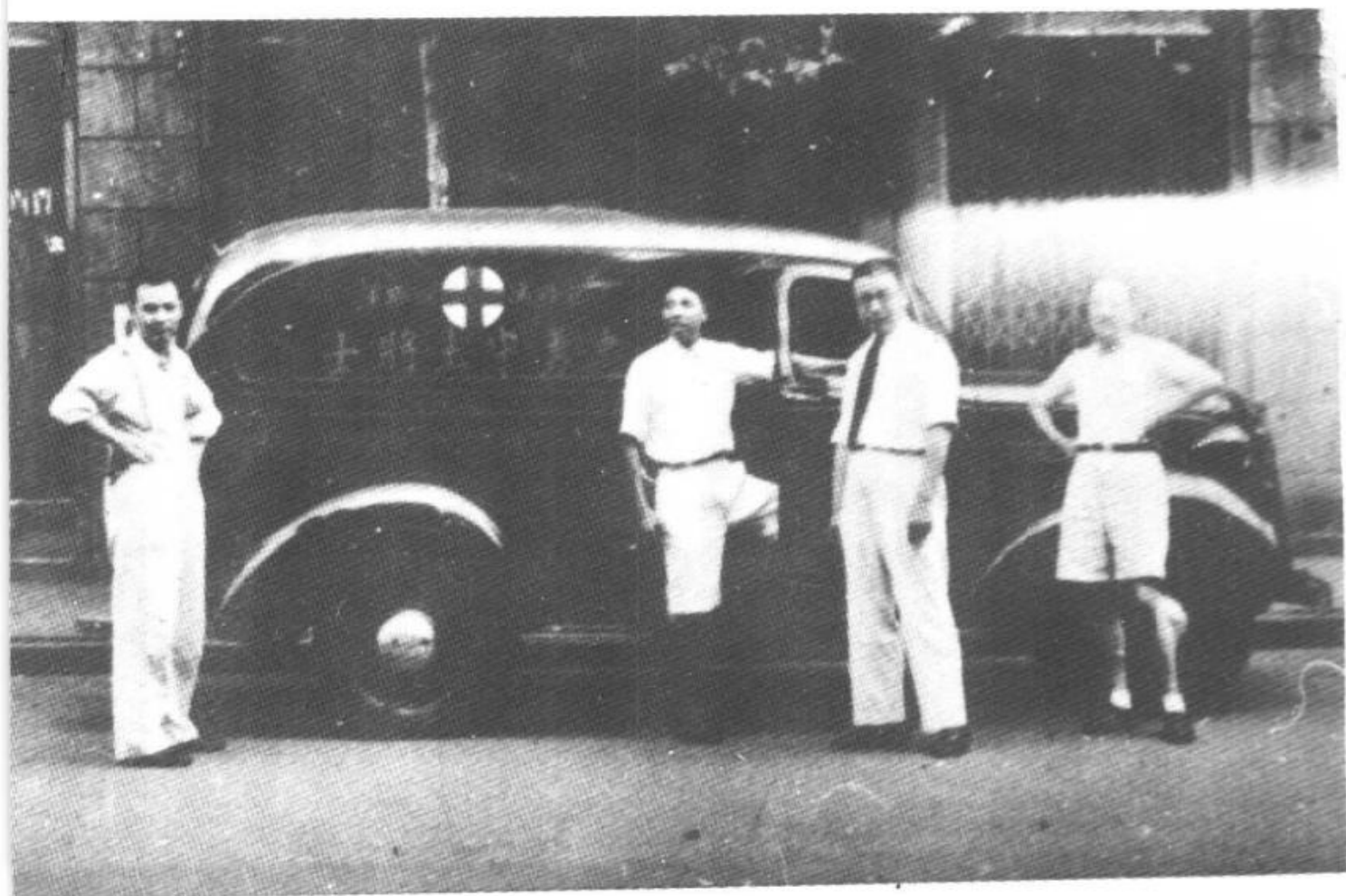
周恩来、
叶剑英、杨尚
昆、马海德及本
书作者(左一)
同美军观察组
第一批来延安
人员合影。



1938年春，朱总司令与卫立煌(左一)在山西中条山谈判。



1936年6月上旬，续范亭与李公朴离开延安去晋绥前线时，与作者合影留念。右二立者为续范亭，左二为本书作者，左三为李公朴。



华侨捐献给八路军的救护车。车身上写的是：“献给第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

目 次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起步	1
广交朋友的表率	9
记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	13
卫立煌将军的转折点	27
接待世界青年的使者	40
爱国华侨的激情	47
对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工作	50
正面宣传 求同存异	74
点验委员的“轻松任务”	78
“一点忠心”	
——记续范亭同志	80
毛主席三次教育我们抓重点	104
迎送成吉思汗灵车	111
“北路慰劳团”	117
绅士参观团及青年食堂事件	128
著名侨领陈嘉庚	136
对顽固分子何绍南的斗争	149

“来去自由”政策	157
康生的“抢救运动”与钱来苏一家	174
我党外交工作的开端	190
中外记者参观团	198
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	219
邯郸起义的范龙章将军	233
张冲同志入党前后	257
毛主席教子务农	270
我党对邓宝珊将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273
难忘的战友	301
后记	317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起步

一九三七年冬，我在延安抗大和党校学习结束，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在场的还有中组部的乐少华同志。李富春同志让我坐下，对我说：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对外工作需要加强，你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你去干对外工作的秘书怎样？”

我回答说：“我听从党的分配。但我政治、文化水平都很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做农民、工人基本群众的工作，参加上层统战工作的时间很短，做起来会有困难，可能干不好。”

富春同志说：“困难总是会有有的，你可以大胆地去工作。”

富春同志进一步对我说，要加强对外工作，是因为陈云同志从苏联回国后，看到我们原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已取消，只留下了一个招待科，它的主要任务只管对外来宾客的生活招待，而对外联络宣传工作却削弱了，他提议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因此中组部决定调你来做这一工作。就这样，我带了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到。在报到时，见到当时的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因主席林伯渠同志在西安），张正与毛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周小舟同志商量如何接待即将来延的梁漱溟先生，张即让我参加。谈毕，张国焘向我说：“小舟同志是毛主席的联络秘书，你就给我当联络秘书吧。”我同意了。

由此开始,前后职务名称虽然有所变化,由联络秘书、交际科长到交际处长,但工作性质却是“十年一贯制”,我作了整整十年这方面的工作。记得在一九四五年,林伯渠和我谈话时对我说:“你长期以来搞的是看来平凡,实际繁重的专门业务,这几年你总算是搞过来了。但我总觉得你在工作中政治视野还不够开阔,希望你大胆放开手脚,做出更多成绩。”林老是一位对干部十分宽厚的领导人,他对干部总是鼓励多,批评少,批评也是很委婉的。他的这一席话,对我的工作既有鼓励,也包含着批评。

由于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决定我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接受中央和边区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同志的直接教诲。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叶剑英、李富春、林伯渠、以及习仲勋、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直接交给我很多任务,亲自教导我如何贯彻统战政策,使我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学习很多东西。因此,这十年是我受党的教育最多、最深的十年,也是我终身难忘的十年,许多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我走上新的岗位不久,就感到接待外来的宾客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正当我感到头绪纷繁、难于应付的时候,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我接到孙凯楚同志(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的通知,要我到毛主席那里去。一路上我又兴奋又忐忑不安,不知毛主席要亲自向我谈什么。我匆匆赶到座落在凤凰山下毛主席的住所。这是三孔向南的石砌窑洞,中窑是毛主席的会议室,西窑是主席自己的办公室,东窑是孙凯楚同志的办公室。我进门后,正想在会议室中等候,孙凯楚出来,他让我进毛主席办公室去。我走进去,见毛主席正在进餐,当时我以为毛主席已在用午餐,哪知毛主席有晚上工作的习惯,此时正在进早餐哩!这间办公室

也是主席的寝室，办公、吃饭都在这里。

主席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一面用餐，一面问我到新岗位工作的情况和过去的经历，我一一向他做了汇报。毛主席听着，时时笑着点点头。记得在谈话中我曾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主席问：“你的老家诸暨在浙江的哪一个方位？”我答：“在浙南。”主席笑着纠正说：“你们浙江习惯上不是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的吗？大概因为诸暨在杭州以南，你就说成浙南了吧！”我自己后来想想也觉得好笑。一九三〇年我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时，农民起义队伍的番号不是就叫“浙东农民革命军第一大队”吗？我这个浙东第一大队的政委，在毛主席面前竟把诸暨从浙东搬到浙南去了，很显然，这是由于我第一次坐在主席面前谈话，心情过于激动的缘故。过去我在白区对这样的日子向往了多久啊！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每次听完毛主席的报告，我都感到得益很深，感到十分幸福，而象现在这样面对面地坐在毛主席的身旁汇报工作，生平还是第一次。主席虽然如叙家常，但我的心怎能不激动紧张呢？

主席在谈话中说：“你们那里不是住着杨朔等几个文化人吗？他对你们一起工作的同志有些意见，我看需要讨论研究一次。”说着把杨朔等的信交我看了一遍。看毕，我向主席说明，我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要搞好这项任务存在着很大困难，主席指出：“困难一定会有的，只要自己努力学习，总可学会的，全国全面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开始，在新的形势下，大家不都在重新学习么。”

毛主席在谈话中问我，国民党地区省政府有无专门接待各方来宾的机构。我说有的，但情况不同，有的设交际处，有的设交际科，如山西、四川、两广等地方，地方实力派当权的省政府，这

类机构大一些。

主席问完各种情况，最后对我说：“最近我要富春同志召集一个讨论你们工作的会议，要请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参加，到时你和胡金魁同志同来。”

告别主席归来，我感触很深。我想不到主席对我们这项工作如此关心和重视，这使我更加认识到自己岗位的重要，为我安心长期坚持这一工作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几天后，富春同志通知边区政府的招待科长胡金魁和我同去主席会议室参加会议。当天到会的人有中央代理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边区政府秘书长伍修权，还有主席办公室主任李六如，联络秘书周小舟。

会议由富春同志主持。会上主要由毛主席讲话，其次，张国焘也发了言。毛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做了全面的极其重要的指示，详细地阐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对如何做好外来宾客的工作，做了许多具体指示。

毛主席首先指出，现在我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了，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下去，并要进一步发展、巩固。统战工作一开展，我们的大门就敞开了，来延安的中、外来宾一定会越来越多，你们的工作会越来越繁重。

统战工作是争取人、团结人的工作。人的阶级地位、政治立场、学术观点、社会影响，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因此，你们要做好统战工作，首先就要做好对外来宾客的调查研究。日本有个外相，曾说过一句名言：“不认清对象的外交，是盲目的外交。”所以，认清来宾，是你们做好工作的首要步骤。毛主席举了苏维埃政府时期我们的外交部曾闹过笑话的例子。一

次是，一个自称是代表某地方势力的政客来到苏区，我们不了解其真实情况，把他当作重要宾客，动员群众列队欢迎，还吹了三番号。后来查明，他是个政治骗子。另一次是由于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对一个真正地方实力派派来的代表态度很冷淡，把他撇在一边。这是两个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接着说：现在的抗日统一战线，是我党发起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又有其他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集团参加的统一战线。你们的工作对象，是以各方上层代表人物为主体的来宾，所以我们通常叫做“上层统战工作”，由于各类上层人士的阶级利益、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基本群众有根本区别，他们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与我合作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只有具体了解来宾，才能针对其特点，顺利地进行各项工作。

毛主席接着说：抗日统一战线是建立了，但是我们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而国民党是我们团结斗争的主要对手。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后，打了十年内战，他们建立了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国民政府，我们建立了代表工农兵的苏维埃工农革命政府，现在为了共同抗日，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两党合作，我们作了必要的让步，主动把中华工农苏维埃中央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受国民政府所直辖。但就其政权性质来说，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人民政府与地主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政府，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正因为如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我们与国民党之间的团结与斗争，是两者之间谁影响谁、谁吸引谁的斗争。你们的工作也将是如此。边区政府内部，国民党政府可能也派人来参加，也将

有统战对象，对此必须有清醒的精神准备。

毛主席着重指出，对待来宾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切不要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组织他们参观考察时，要尽力让他们对我们有全面的了解，要让他们看我们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也可让他们看看我们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弱点甚至错误。因为我们党的各种事业都是从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所以我们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种种困难取得成绩，取得胜利。这是为一党一派私利出发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绝对不可能办到的。要知道我们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革命前进中难于避免的，是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克服改正的。只要我们诚恳坦白地说清楚实际情况，是会取得人们的信任 and 理解的。

主席说：对待外来宾客，接待交往，要讲民主、讲礼貌。只有给人以充分的民主，让来宾自由交往、自由议论，才能做到在政治上、思想上以理服人。在与来宾交往时，我们既要宣传解释我党的政策、方针，又要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要以礼待人，不卑不亢，倾听各种不同意见，才能交成朋友。自己首先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许多干部来自工农，是在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同志之间真诚、热情，合作关系都是很好的。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发扬这种团结友爱的传统。可是在对外工作中，由于对外来宾客，对有文化、有修养的代表人物，或对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感情、工作作风、生活习惯都不了解；接触外来客人时总是不大自然，或说话生硬，有的同志甚至把社会交往的一般文明礼貌，看成是不必

要的客套。说到这里，毛主席对胡金魁同志说：金魁同志，你前几天不是同杨朔他们开了个玩笑吗？这样的玩笑在我们同志之间互相开开是没啥子关系的，但同外来的宾客开玩笑，就要引起人家的反感和误解了，所以在这些方面许多同志还需要很好地学习。这一点你们在接待工作中一定要更加重视。另外，有些老同志在十年内战时期搞苏维埃搞惯了，喜欢关起门来和自己的同志一起干，不愿意接触党外朋友，与党外合作。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也要纠正。

主席说：今后，外边来延安找我们党、政、军、民、学的中外来宾，都由你们统一接待。来宾的思想情况和他们的希望要求，由你们分别报告有关机关，并与他们联系，请他们出面解决，你们的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统一由边区政府管理，但政治上、业务上由富春同志领导。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蒋介石口头上已答应同意我们建立特区地方政府，实际上至今不承认，因而我们的对外工作，必须由边区政府出面，显示我边区政府独立存在的合法地位。

最后主席问胡金魁同志和我：“你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两人都表示：我们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你问到困难，只有一点，就是我们介绍外来宾客到各机关、学校参观访问时，有些单位首长总是推托自己业务工作繁忙，不太愿意接待。毛主席说：“难道做好统战工作不是他们自己的重要业务吗？”主席当即指示富春同志通知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向他们说清接待客人参观访问的重要意义，必须尽可能地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不应把接待外来宾客看成额外负担。毛主席并具体指示，象抗大、陕公、以及八路军留守处、军委后勤部等经常接待外来宾客的单位，或新参加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多

的单位，可以配备一个专职秘书，协助首长做好这一工作。

这是一次对我们交际处的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会议。毛主席的讲话，成为我们交际处工作的指导方针，在以后的十年中，交际处工作能做出一定的成绩，都是按照这一指导方针开展工作的结果。

广交朋友的表率

抗战爆发后不久，毛主席对我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领导中国革命的失败与成功、后退与前进、缩小与发展的深刻而丰富的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和总结，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

主席不仅用“三大法宝”的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他亲自出面，广交朋友，成为我们每一个统战工作者和党的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表率。

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科，起初只有三个招待所，都在延安城大街的南端。第二招待所是其中最好的，那儿有三间“特级”客房，是一个座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有一处丁字形的小平房。每个房间都有土火炕，室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凳子。向北的那间房里的桌子只有三条腿，必须把缺腿的那一面靠墙倚放，才能供客人写字或进餐使用。主席经常亲自来招待所会客，往往是在晚上八九点钟到客人的房间里来谈话。他来之前并不通知，我们常常是接到服务员报告，才知道主席已经来了。主席健谈是人所共知的，他经常和客人谈到深夜。招待科长胡金魁同志深知主席生活俭朴的习惯，每次只让服务员泡上一杯浓浓的绿茶和准备一包纸烟，有时还加上一盘酱油瓜子，就算是主席

与客人最丰盛的茶食了。即使彻夜长谈，也不必准备夜餐。

我初到边区政府当联络秘书时，看到毛主席很频繁地亲自会见来宾，如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国民参政员梁漱溟，广西李、白的代表刘仲容，国民党师长何基沣等，我对此有些惊异不解，毛主席那么忙，怎么什么客人都见呢？这反映出我当时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主席的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风很不理解。

主席对外来的宾客，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分进步、中间或落后，都很重视。对政治上落后与顽固的来宾，他尤其重视。他认为在和政治思想上与我党距离较远的朋友的谈话中，可以听到我们从左翼或中间分子中所听不到的不同意见，这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考虑问题，同时能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因此凡是我们认为需要他亲自接见的，只要把报告一打上去，他有求必应，或及时在自己的住处接见，或主动来交际处会见。考虑到毛主席为党为人民日夜操劳，时间十分宝贵，因此，在安排外来宾客在延工作、参观访问的日程时，我们总是把毛主席的接见，谈话或亲自临场的活动，尽量安排在最后阶段，并尽量压缩次数或时间。但是毛主席对我们的这种做法，曾经提出过批评。

记得在我工作不久，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派来了一个由十五、六个人组成的行政工作考察团。这是我接待的第一个较大型的代表团，团长是一东北人，名叫王德圃，团员以 CC 分子为主，有的是长期反共的顽固分子，也有少数是靠拢我们的进步分子。富春同志指示，这个考察团是孔祥熙自己派来的，对这个团的方针是：热情、诚恳、争取、团结。他们既然是来考察行政工作的，应由边区政府出面接待。边区政府主席和各厅局负责人，都应

亲自出面、向他们介绍情况。并且事先尽可能地搜集实际工作的文字材料，以便送给他们参考。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解答。富春同志还说：毛主席准备亲自接见他们一次，并出面主持一次欢迎宴会。我们根据富春同志的指示，按照考察团预定留延半个月的时间，拟定了一个让他们考察政府、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的计划，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考察团到延的第二天，我即与团长王德圃商谈日程。王德圃表示客随主便，并希望我为他们介绍延安的一般情况。我介绍完情况后，以我个人的名义谈了工作日程安排的初步设想。王听了表示基本同意，但同时提出要求：一、他本人要首先单独晋见毛主席表示敬意，并面陈孔院长致毛先生的亲笔信；二、全体团员见毛先生，领教毛先生对抗日救国和改进行政工作的意见；三、考察完毕时，要向毛先生辞行。我一听，如果按照王德圃的要求办，加上宴会，毛主席必须出面四次，超出我们预定计划的一倍，花费主席时间太多了，便婉言对他说：“毛主席是很欢迎您和诸位来延安的，也准备和各位见面。但因为你们留延时间有限，如按王先生意见办，会与考察计划有矛盾，你们主要目的是考察行政工作，我们希望你们能有更多时间到各方实地看看，多加指教，对我们更为有益。”但王德圃态度很坚决，他说，只要能满足他三次见到毛主席的希望，他们宁可减少向各方面考察请教的时间。当时我很踌躇，没敢立即肯定同意，很快写报告向中央请示。

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报告，立即亲自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同意王德圃的要求。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口气很肯定地说：“需要我出面四次就四次，你应当予以同意。”并且向我着重强调说：“今后来延安的客人，凡要求见我的，你尽可以答应他

们，并把他们的要求及时告诉我。我工作虽多，但是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只要需要，我一定会抽出时间来。”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不仅对我们做好接待王德圃率领的行政考察团的工作起了重大作用，而且为我们后来能放手地工作，做出了表率。同时，由于毛主席亲自出面参加统战活动，也带动了延安党政军民主要领导同志，使他们对统战工作甚为重视。

毛主席亲自做统战工作，亲自与各界人士交朋友的作风，一直持续到解放以后。他的表率使我们懂得了，领导同志亲自带头实践，是贯彻统战政策的重要保证。可惜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这种作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近年来正在逐步恢复。许多当年受到过主席接见的朋友，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念念不忘。那次王德圃回去以后，据后来我们从武汉办事处得知，最顽固的王德圃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书面报告中对毛主席能亲自接见他们数次很是满意。他的报告说，他们在延安的时间虽短，但是所得印象深刻。中共提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确是从拯救民族危亡出发，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中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是有诚意的，党政军民的关系很团结，贯彻政策法规的态度上下一致，因而行政效能较高。缺点是边区经济文化仍很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苦。许多工作尚未正规化，机关干部游击习气很深等等。

记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

翻开中国近代史的画卷，十九世纪末台湾人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慷慨悲壮的一幕，便展现在我们眼前……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清朝政府战败，屈辱求和。次年，卖国贼李鸿章赴日本，与日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将中国的宝岛台湾及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日本。

清政府这一可耻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反对，台湾人民更是悲愤交集，起义反抗。

就在台湾人民酝酿反抗之时，有一位台湾著名的绅士邱逢甲挺身而出，发表抗日宣言，布置全岛守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可是，由于腐败的清军素无严格训练，又不敢发动和依靠群众，很快就被日军击溃。日军攻陷基隆，逼进台北，邱逢甲逃到大陆。

然而台湾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抵抗，台南农民领袖徐骧以及各地方武装，统一在清军将领、抗法名将刘永福的领导下，坚持作战，与日军鏖战四个多月，重创敌军三万二千余人，最终因无后援，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十月，日寇占领了全岛。祖国的神圣领土最终做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牺牲品。

这个英勇悲壮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

人发愤报国。

这个故事同我要回忆的邱琮有密切的关联。

原来，就在清政府酝酿割让台湾的一八九四年，邱逢甲的夫人生了一个儿子。他为使儿子不忘报仇雪耻，收复台湾，特为儿子取号为“念台”，又名邱琮。我所要讲的，就是邱琮一九三八年来延安访问的一段事情。

(一)

一九三八年，邱琮四十出头了。他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来到延安。他一九二五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科。留日期间，曾参加反袁(世凯)、反段(祺瑞)运动，并且与旅日台籍青年组织“东宁学会”，开展学习祖国语言、回祖国工作、拥护祖国光复台湾等活动。归国后，曾在东北从事开发煤矿的实业，后又被陈铭枢邀请到广东参加地方建设工作。在此期间参加国民党，并曾随十九路军到江西“围剿”过红军。

“九一八”事变后，邱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多次到东北慰问义勇军。一九三二年六月，参与策划暗杀日本关东军头目本庄繁和伪满皇帝溥仪，后因败露未成。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反蒋抗日，邱一方面支持李济深等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又“婉劝”他们放弃反蒋。可见，邱琮虽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不满，但他又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使他看不清蒋的本质。

西安事变发生后，邱琮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至为钦佩；加上抗战爆发后，

八路军勇敢地开赴敌后战场，取得平型关大捷等重大胜利，更引起邱琮到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兴趣。一九三八年二月间，他从广东先到武汉，与周恩来同志取得联系后，又从武汉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再坐汽车来到延安。他不仅要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同时要考察一下陕北的矿藏资源。

邱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很朴质。他个子很高，穿一身长布大褂，脚穿布鞋，不修边幅。脸略显长，肤色带着地质工作者特有的黧黑。手里随时拿着一柄地质人员专用的小锤子。他的举止言谈和工作作风，处处体现着献身科学事业的人特有的扎实、严谨、深入、钻研的特点，同时他还具有地质人员不怕吃苦的精神。

他到延安后，不象某些访问者，走马观花式地转一圈，出席几个大会，发表几句演说，照几张像就算圆满成功，而是在我们交际科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深入调查研究。他观察问题很细，访问也不厌其详，并把所了解的情况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因为多次陪他外出访问，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并达到了能够推心置腹的亲密程度。

一次，我和邱琮聊起广东的抗日局势，他跟我谈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说，现在蒋介石很着急。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山东、上海、南京等地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八路军却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声威大振，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迅速提高。蒋介石深知他的嫡系将领中能打硬仗的实在数不上几个，因此想起用杂牌军将领来为他支撑抗战门面。在广东，蒋介石想恢复十九路军建制，起用原总指挥蒋光鼐，已给他七千支枪，要他在潮梅

汕直到东江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这样做一来可以利用蒋光鼐在广东的声望和他对日作战的经验，带领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为蒋介石捞回一点面子；二来可以限制、排斥共产党在广东的抗日武装。

邱琮又说，论打日本鬼子，蔡廷锴比蒋光鼐更坚决、更有办法。蒋介石为什么只起用蒋光鼐而不起用蔡廷锴呢？原来蒋介石认为蔡廷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最先公然违抗他的不抵抗命令，“桀骜不驯”，若将武装交给蔡，恐将更难以驾驭；而蒋光鼐比较温和，尚能控制。

我知道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动态十分注意，特别是有关蒋的抗战决心和军事力量部署方面，尤为重视。我就将邱琮所谈的情况整理成一个材料，上报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果然很高兴，很快就给我写了回信，内容如下：

金城同志：

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

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这封简短的信不但是对我收集材料及时上报的做法予以鼓励和肯定，而且是对整个交际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就是“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它体现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收集材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以后，毛主席又把邱琮请到他的住处，深入细致地与邱琮交谈。

(二)

邱琮不但是一个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父亲炽热的爱国感情，抱着中国传统的“尽忠尽孝”的封建道德观念。

他走在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就抑制不住热爱这块中华民族发祥之地的强烈情感；他看到老百姓的生产方式仍非常落后，生活十分贫苦，情不自禁地发出惋惜的感叹。

一次，他问我：“我们的祖先在这里休养生息至今已几千年，这里本是一块美丽富饶的沃土，何以现在贫困到如此地步呢？”

我说：“古代陕西确实曾是广阔、肥沃的富庶之地。我们的老祖宗炎帝、黄帝就活动在渭河上游及北部的黄土高原一带。然而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乱垦滥牧、乱砍滥伐和战争的摧残，陕西的森林草地、水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陕西地处我国西北的交通要冲，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经常发动民族之间的征战，致使这块土地上战争不断，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自汉唐以来，这里就开始走下坡路，富地渐渐变成了穷乡。到了清代，又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陕西更是穷得出了名。穷到什么地步呢？我来到这里以后，听说过两个清代的笑话，可以讲给你听听：清朝有个‘穷秀才’进京赶考，殿试中进士，被委派到陕北三边某县补县官的缺，这位进士很高兴，急欲带上老婆孩子去赴任。他的一个朋友劝阻说，你先不要带老婆孩子，自己先去看好情况，找好房子再来接老婆不迟。那

地方很穷，你要有精神准备。这个进士听从了朋友的劝告，把老婆孩子留在西安，只带一个公差，骑马出发了。果然越走越荒凉，到后来走一二十里路才看到一两户人家。到了他赴任的县城一看，哪有什么‘城’可言？只有几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和一排窑洞。‘城’里的人都下地劳动去了，只有一位骨瘦如柴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赤膊坐在房前晒太阳，掐着衣服上的虱子。进士走上前去探问：‘老乡，县衙门在哪里？’老头子看他不是本地人，反问道：‘你问县衙门做什么？’进士说：‘我是从西安来的，来做本县县官。’老头子一听很高兴，哈哈大笑，说：‘你来了很好，我就可以走了。我就是本县县官。从前一直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接替我。现在你总算来了，我的日子也熬到头了！’进士愕然，又问：‘县衙门有几个公差？’答：‘两个’。又问：‘两个人在哪里？’老头子一指：‘就在对面的窑洞里。’进士按照老头指的方向走过去，向一个老妇打听，听到的回答是，一个下地干活去了，一个出差未归。第二天，新老县官正式接交公务。老县官交出来的东西除一个官印和一套文房四宝外，什么也没有。老县官临行关切地嘱咐新县官说。太阳落山以后千万不要走出房门，睡觉前一定要用大石头把门顶好。否则狼就要来敲你的门。外面无论什么声响，都不要出来看。这一席话说得新县官毛骨悚然，犹如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心。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年，有一位主考官到陕北某县主持科举考试。十天以前遍贴告示，要童生们前来应试，谁知到考试那天，竟只有四个人前来应试，而上面分配给这个县的秀才名额是五人。主考官感到缺一人不好交差，就叫公差再去拉一个人来应试。公差走到街上，见城内壮丁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一个木匠在做木工活，公差走上前去问：‘考官老爷贴的告示

看到了吗?’木匠答:‘听说了。’公差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考试?’
‘我不会写文章呀!’‘你自己的名字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凑合可以写下来。’公差说:‘那好,你就去应试吧。’结果,连同那个木匠,参加考试的五个人全部中了秀才。”

邱琮听了这故事,辛酸地笑了。这两个旧时代官场中流传的故事,的确很辛辣地道出了陕北的贫困、落后、闭塞。使那些对陕北的实际情况不大了解的人,一下子就能懂得陕北贫困的历史根源。

然而邱琮并没有对陕北失望。当他看到解放区的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和边区政府的帮助,生活日益得到改善时,对共产党的政策赞口不绝。

邱琮特别告诉我们,陕西地处黄河流域,地质构造复杂,矿藏资源极为丰富。我们的祖先很早在这里采炼铜、铁、金、银、锡、铅等。将来赶走了日本鬼子,应该好好地开采这些宝藏。他专门跑到延长石油矿区旧址去勘察石油储藏量。

原来,早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就有英国人来此勘察过,并打了几眼油井,生产过一些石油。不久,英国人就宣布石油没有了,并说中国是贫油的国家。邱琮来到延长石油矿区,敲敲打打,反复观测,回来以后很高兴地告诉我说:“延长肯定有油源。我们中国贮有石油矿藏的地方,外国人即使勘探到了,也不会告诉我们的,他们故意说中国无油。千万不要相信外国人,不要再让外国人来勘测。我对你说一句心里话,就是苏联人,也不要让他们插手。”

(三)

邱琮在陕甘宁边区一住两个多月，从政治、经济、军队建设、文化教育、生产计划、行政领导……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介绍他与毛主席、张闻天、林伯渠、张国焘、康生等谈了话。总的说来，我党、我军、我边区给他一个十分良好的印象。

比如他在延安，看到城墙上画着一个巨大的中国人用刺刀把细小的日本鬼子扎在地下，高兴地说，我在国统区看到的是《日寇暴行录》那样令人悲伤的书刊，听到的是日本人如何厉害的恐惧议论，感到压抑得很，仿佛中国人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一群绵羊，软弱无能。而在陕甘宁边区，看到的都是藐视日本鬼子的标语和宣传画，听到的是昂扬的抗日歌声，使人感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力量。

他说，你们从上到下，各机关各部门，办事效率极高。我每次提出什么问题或要求，你们的答复总是又快又干脆，上级没有官僚架子，下级敢于负责办事，公务从未互相推诿，与国民党的腐朽的衙门作风真是迥然不同啊！

他看到我们交际处自己用旧报纸糊信封，写信也很简短明了，没有繁琐的客套，甚至给毛主席写信也用粗糙的毛边纸、报纸糊的信封，而决无“不恭敬”之虑。他感慨地说，你们真清廉，真民主，有你们这种精神，不愁打不败日本，不愁中国不富强。

五月间，邱琮带着对延安的良好印象，告别了我们，返回了西安。

(四)

五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要叶子龙同志通知我到他的住处去一趟。我急忙赶到凤凰山，当我走进毛主席住的窑洞时，见毛主席没有象平时见到我时那样高兴，而是面有愠色。我刚坐下，主席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迭信纸，对我说：“你知道吗？邱琮来信了。你看看！”说着把信递了过来。不待我细看，他又说：“你的报告对他反映很好，他对我们的印象也不错。你们辛辛苦苦地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本来给了人家一个很好的印象，结果在他离开延安走到七里铺时，被保安处的检查站搜了身，检查了行李，还扣留了他的笔记本，引起他很大的不满，对我们的好印象都给破坏了，你说这事影响多坏！”

我吃了一惊，说：“为什么要搜查他，我不知道。”想了想，我又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笔记本记了我们提供的有关边区建设的一些情况。”

“那有什么关系呢？”主席说，“他是一个爱国分子，这些材料给他带去，对他有用，对我们也是个宣传。即使是不愿与我们很好合作的人，带那样一些材料走，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人家无非是收集一点材料或情报。我们在武汉、西安、兰州设办事处，不也同样在收集各种材料、情报，做调查研究吗？”

我问主席：“这事该怎样处理？”

主席说：“我已经要保安处立即把邱琮的笔记本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通知了八办的伍云甫同志，要他派人到西安旅社向邱琮道歉，让邱琮耐心等待我们送还。”

我为主席的果断措施而舒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会儿，主席

又问我：

“听说你们交际处搞了一种‘来宾证’，凡是来宾都发一张，出入城门必须向岗哨出示‘来宾证’，有没有这种事？”

“有。”我回答。

“你们搞‘来宾证’是优待人家呢，还是限制人家？你看来宾会不会暴动呀？有没有带枪支呀？”

“当然不会暴动，也不会带枪。”

“不会暴动，没有带枪，还怕什么呢？你们放开让他们到处跑好了。我们好的地方让他们看，不好的地方也让他们看，是非好坏由他们自己去辨别。你们快把‘来宾证’收掉，这样保安处派到各处的岗哨，就没法盘查他们了。”

从此交际处不再发“来宾证”了。

(五)

我回交际处后，细看邱琼的来信。只见信写得很长，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得很工整。字里行间还有毛主席阅读时所做的圈点勾划。可以看出，毛主席看得很认真，连错别字和错标点都一一在旁校正。主席看过后，在信上批示：

这是邱琼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因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毛泽东 六月六日

邱琼在来信中写道：这回北来两个多月，得了各位和各机关各团体的厚待同种种指教，得益很多。我一些也没有可以报答，实在抱歉！因为各位和各机关团体常常虚心坦怀地向我们请求批评，我们初来，实在因为外边太坏，所以只觉得这里的好处，

缺点一些也看不出。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渐渐稍微觉察些象是应改进补充的地方了。然而这也是很浅薄的。我今乘在西安候行李的时候，把它整理成《管窥谨献》一篇，送呈各位参考参考。我也知道必然很多隔靴搔痒的地方，不过聊表我对延安的爱好和感谢的微意罢了！另录我别延安的新诗一首，也藉博各位的一笑！

别了啊！延安！

延安啊！延安！你的岁月几千年？

延河水流在宝塔前！

小米窑洞还依然。

但是精神今变了，

纯是天真烂漫，忠诚勇毅一青年。

我和你相处了两个月，

知道你救世的心虔，

知道你抗日的心坚，

把我十多年的疲倦都化作了云烟。

沙漠中得了水草，暗室中得了明灯。

啊！延安！今要同你别了，

哪能不令我一步三回顾，一顾三流连！

只是鬼子的飞机大炮，

已轰遍了国土的四边，

鬼子的奸掠焚杀，

已剥尽了民族的威权。

若不南下负起重责，

哪算尽了人生的本能？

哪算对得起我这良朋？

别了啊！延安！

等扫净了腥膻，恢复了幅员。

再到黄陵边，握手话缠绵。

《管窥谨献》

延安诸公，谦恭下士。喜闻摘过，邦纳善言。彬彬有若古贤之理想境。殊出外界意表。琮促于良朋之谊，感于漓世之义，因不嫌琐碎，谨献管窥所得。因知羁旅期短，仅识皮毛。冀或旁观者清，偶有一得耳。倘有裨补国族，何幸如之！概列如下……

接着，邱琮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九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他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很尖锐中肯，又都是积极的、善意的。如在对检查行旅一事提意见时，他写道：

现在延安七里铺，所取对于出境旅客之检查法，余此次旅行历闽、粤、湘、鄂、豫、秦六省，严格殆以此为第一。以延安目下所处境遇，自应严格防奸；但察其检查法，勤笃有余，机警不足。小奸小探或偶可发觉；大奸大探非用旁敲侧击，长期窥伺，袭其不备，殊难于必受检之旅具中，得其物证也。且如此检法，或反得意外恶果。即旅客学生来延数周数月之良好印象，将有因临出国门而受翻检、搜身、扣留文件等等而变成仅留最后一个恶印象者。此将为扩张党势之大损失。……

其坦率和尖锐，可见一斑。在信的末尾，我机要部门按毛主席的指示注明了传阅的范围。

看过邱琮的信，我想到，凡是正直、诚实的爱国人士，到延安后都会对共产党产生信任，寄予希望。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我们共产党人多么需要虚心倾听广大党外人士的诤言啊！毛主席当时对邱琮其人、其事、其信，如此重视，如此认真严肃对待，对我教育实深，至今记忆犹新！

（六）

尽管邱琮对国民党的为私而腐败、共产党的为公而清廉看得十分清楚，可惜他毕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旧知识分子，他的带有封建色彩的世界观，使他分不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阶级本质，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他的爱国感情，是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他只知道富国强兵，振兴民族，而不懂得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在政治风浪特别是在历史大转折中，他很容易迷失方向，受骗上当。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任命陈仪将军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从这一天起，被日本侵夺五十年之久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正式宣告收复，重归中国的版图。

邱琮得此消息，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以为老父的愿望已经实现，他应该回到台湾去报效台湾人民。

一九四五年底，他任台湾省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全国解放前夕，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上海解放前夕，陈铭枢曾劝

他留在上海，他未允，逃到广州，叶剑英同志又派人到广州劝他留下，他又未允，匆匆离广州经香港逃往台湾。

由于其父邱逢甲在台湾的影响和邱琮本人在台各阶层人士中的声望，国民党对邱琮加以充分利用。一九五七年，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从事对日外交活动和台湾学术、文化事业，为国民党效力。

一九七六年一月，邱在日本活动期间，因脑溢血死于东京。终年七十三岁。他一生的理想是为台湾回归祖国及台湾人民的自由幸福奋斗，但终未能如愿以偿，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卫立煌将军的转折点

(一)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召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同志、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同志和我，一起研究接待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事项。

会上，滕代远同志传达了中央对卫立煌将军近况和来延目的的分析，以及接待他的方针。我们根据中央的精神，对如何接待卫将军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具体部署。

卫立煌是什么人呢？

卫立煌将军，安徽省合肥人，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先生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由一个普通士兵而逐渐被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一九三二年六月，在蒋介石发动的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中，卫曾率先进攻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我党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所率国民党十四军趁虚而入，八月间占

领我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这一反共“功劳”，得到蒋介石特别的奖赏。蒋特地把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来表彰卫的反共得力，并鼓励卫立煌及其他国民党将领进一步为蒋卖命。蒋介石以他的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原河南新集镇，今河南新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嫡系部队十四集团军开进山西。我们分析蒋这样做的目的有三：一、蒋在全国抗日形势的逼迫下不得不做出抗日的样子，就要把卫立煌这样的善打硬仗的将领调往华北抗日前线，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战的名声和地位。二、卫立煌本是反共出了名的，将他调进山西，可以起到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的作用，还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中国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三、蒋还有染指山西、抢占阎锡山地盘的意图。

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立煌将军本人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摸底，我们只知他抗战积极，与我八路军配合尚好，但不管怎么说，一、从抗战大局出发，争取卫将军这样的国民党重要将领，对整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将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尽量争取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二、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我第十八集团军的上级，从上下级关系考虑，若能争取其支持我军，则对我军的处境、对华北、西北抗日根据地都会有很大好处。三、卫是战区司令长官一级的高级将领中第一个来延安的。我们的欢迎一定要隆重、热情，招待

的规格一定要高。同时此人官气很重，生活很考究，我们亦应注意礼节和照顾好他的生活，使他感到我们的诚意。

方针既定，我们就分头进行准备。交际科主要负责卫立煌将军一行的住宿、膳食、欢迎晚会等事项。其他领导同志分别组织部队、机关、学校各界群众的欢迎队伍，以及张贴标语、布置会场等。

那时，来延安的客人一般都住在交际科招待所，而这次迎接卫立煌将军，就不能让他们住一般平房，而要找延安城里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那时延安城里只有十字交叉的两条街：从南门到北门，南北向一条；从东门到凤凰山麓，东西向一条。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我党政机关所在地，房屋结构和里面的设备比较简陋。唯一的一所好房子，就是座落在十字街口东北面的外国人所造的天主教堂。这个教堂坐北朝南、砖瓦结构、内有地板、设备考究。于是我们就将教堂辟为卫立煌将军的下榻之处。

我们又将延安最好的饭馆——机关合作社搬到教堂对面路南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以便将热菜热饭及时送进教堂里。

一番奔忙，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卫立煌将军一行的到来。

(二)

据我进一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卫立煌将军在来延安之前的思想变化过程及来延的原因，是这样的：

“七七”事变后，日寇继续扩大侵华战争。敌军之一路沿平绥铁路疾进，打开山西北部的大门天镇，占领大同，直向太原扑来。阎锡山眼看自己的独立王国快要破灭，不得不勉强抗战，

担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知道自己原有的晋绥军“恐日病”非常严重，战斗力薄弱，经不起一打，只好改变他不许国民党中央军和共产党军队进晋的一贯立场，同意蒋介石嫡系部队和我党的八路军进入山西抗战。而蒋介石多年想染指山西都未如愿，这次得一难得的机会，于是急忙派卫立煌将军所部中央军十四集团军，从河北开入山西。归卫将军所指挥的中央军及其他省的杂牌军，先后达二十万人，按蒋介石的意图，其作用有三：（一）和日寇打几下以装点北方抗战的门面；（二）在阎老西的地盘上插进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三）监视、钳制、乃至吃掉山西八路军，并相机配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

事实上，卫立煌将军是爱国的，对日作战也是坚决的。正是在艰苦的鏖战中，卫将军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个大胜仗，声威大震。

忻口战役中，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敌机二十四架，有力地配合了卫立煌将军组织的正面阵地战。同时，八路军一二〇师几度占领日寇后方的运输咽喉——雁门关，切断日军进攻部队的给养和弹药的供应。一一五师也连克察南冀西数城，截断了忻口敌军的另一条后路。

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术，灵活机动，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使卫将军佩服不已。

忻口战役前后，卫将军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同志，互相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卫将军受周恩来同志的影响很深，这可以说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离开山西回延安，而后去武汉。从此代表八路军与阎锡山、卫立煌联系的，就是朱总司

令。朱总司令作为辛亥革命以来的老将、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军队总司令，却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卫立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是以后引导卫立煌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的看法的第二个人。

太原失守后，卫将军所部退至晋南的临汾，朱总司令的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转移到晋南洪洞县的马牧村。一九三八年二月，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将军带了他的两个军长——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九军军长郭寄嶠，乘汽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给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以及总司令部的同志们贺年。总司令部就在马牧村外一所学校里开欢迎会。会上，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客人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卫将军对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和战斗力。

以后，他向八路军的西战团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同志，来做他的秘书，并要他在十四集团军中组织“战地服务团”。赵荣声同志是卫立煌将军的小同乡——安徽安庆人，参加八路军前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我党地下党员。卫将军并不知道赵的政治面目，只是以赵是同乡关系、政治进步、头脑清楚、文笔流畅而十分信任和器重他；而赵在卫将军身边，则起了帮助他政治上进步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纠集十余万兵力，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占山西南部，达到其占领整个山西省的目的。

卫立煌将军把他所率领的主力部队摆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进行折口战役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韩信岭战役进行了十来天，日寇正面攻不破卫将军所设的防线，就采取大迂回的办法，从冀南攻入晋东南，继而直扑风陵渡，形成南北包围卫立煌所指挥部队的态势。卫立煌将军所部，不得不在八路军的掩护和配合下突围。卫将军这次吸取了八路军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把十几个师分成好几路，分别冲出包围圈，到晋南中条山一带集结。

而卫将军本人和他的总指挥部却遭到日军的阻拦，没能随军突围出去，不得不转移到晋西黄河边上的永和县。这个时候，困于黄河之滨的卫将军面临着两个行军路线的选择：（一）冒着日本飞机的跟踪、轰炸和与日本步兵遭遇的危险，硬向晋南中条山区冲过去，靠上他的军队；（二）由晋西渡过黄河，假道陕北，乘汽车到西安，再由西安乘火车到河南省渑池县，从那里渡过黄河，到达晋南的垣曲县（这里就是中条山区了）再与所部会合。

事实上，走第一种行军路线不但风险很大，而且难以实现。第二种路线才稳妥、可靠。所以，卫立煌将军经过反复的考虑，加之他想去延安会见毛主席、了解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使他最终下决心走第二条行军路线。

这样，卫立煌将军和总指挥部的全体人员，于四月十六日从山西省的永和关渡过黄河，来到陕北的延水关。当晚就宿于延水关。第二天一早，总指挥部的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

（三）

延安方面得到卫立煌将军一行已经从延川开来的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了。延安城东门外，部队、机关、学校和各界群众

的队伍，浩浩荡荡，夹道排列。大小标语，处处可见。红旗猎猎，鼓乐喧天，俨然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

上午十一时左右，卫立煌将军的车队到来了。前面是两辆首脑人物坐的黑色小汽车，后面依次跟着十几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着总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警卫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卡车队没有停留，沿公路直接向南开去，往西安方向走了。两辆黑色小汽车停了下来。

第一辆车里，走出了卫立煌将军。只见他身材中等，显得轩昂、魁梧。脸庞由于连日奔波显得有些消瘦，上唇留一撮黑胡髭，两目炯炯，给人以果敢、干练的印象。随同他的有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嶠、副参谋长文朝籍、交际副官罗香山。从第二辆小车里走下来的是参谋杜凤翥，秘书赵荣声、随从副官张学诚以及卫兵。

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以及我们交际科工作人员一齐向前迎接。

这时欢迎队伍的情绪热烈，口号声、锣鼓声、唢呐声震耳欲聋。群众高呼：

“欢迎卫副司令长官！”

“国共两党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卫副司令长官在前方抗战有功！”

“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万岁！”

这真挚、热烈、隆重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卫将军及其随行。卫立煌将军虽然久居国民党军的高官，见到过不少大场面，但那

时毕竟是与人民为敌的统治者中的一员，所以从来没受到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欢迎。而这次的的确确置身于人民群众的真实感情中，这使他非常感动。

卫将军一行在城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去城西凤凰山麓毛主席的住处会见毛主席。毛主席走出窑洞，快步向前，热情迎接卫将军一行。在毛主席的窑洞里，两位领导人促膝长谈，十分倾心。

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客人。我交际科把所能寻到的最好的饭菜全部端上宴席。卫将军虽然高官厚禄，往日不乏山珍海味。但自入晋以来，连日同日寇苦战，已久不尝佳肴了。更何况近来被困于晋西，已经到了吃面糊糊充饥的地步，在这里一见这样好的饭菜，真是欣喜异常，放开肚皮饱饱美餐一顿。

下午，卫将军一行在住处休息，晚上由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有各单位代表数百人。当毛主席陪同卫立煌将军入场时，全场鼓掌历时数分钟之久。李富春同志主持了大会，毛主席致欢迎词。毛主席指出，卫立煌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

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将军讲了话，他说：“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他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继卫之后，参谋长郭寄嶠也讲了话。

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主席和卫立煌将军并排坐着，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晚会开到很晚才散。卫将军一行回到天主教堂，正要就寝，我交际科工作人员又送上夜餐。有白面馒头、大米稀饭，还有红色的广东香肠。这又使卫将军感动不已，感到延安对他的欢迎是真心实意的。

这天晚上，滕代远同志找到我，告诉我说，卫立煌将军原打算明天一早就走，现在又改变主意了，打算多停留一天，参观抗大和其他地方。你们得好好安排一下，提供各种方便。

第二天(四月十八日)上午，滕参谋长、肖劲光司令员、罗瑞卿副校长陪同卫立煌将军参观抗大。当卫将军看到抗大师生的宿舍兼自修室，内务十分整洁；看到抗大的课堂就是天地，桌椅就是学生自己的膝盖；看到抗大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看到抗大学员的成份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的知识分子，也有工农干部和工人、农民，甚至海外华侨，有些还是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或国民党高级将领、高级官员家庭的“少爷”、“小姐”，而今天都在这里同甘共苦、奋斗牺牲；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新鲜、敬佩。

最后，卫将军一行来到大操场，学生们已经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着卫副司令长官讲演。卫将军一上讲台，下面就不断地呼口号，“国共两党亲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妥协！”“欢迎劳苦功高的卫副司令长官！”……这一队的声音未落，那一队的声音又起，前面一队刚举起手来高呼，后面一队又起来高喊，热烈的气氛，使得卫立煌的情绪受到强烈

的感染。据说卫立煌将军本来是准备好讲演词的，这时候一激动，把讲演词全忘掉了。而以自己的朴素语言，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他以自己在山西的亲身作战经验，说明只有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战胜日寇，如果没有八路军，他是杀不了那么多日本鬼子的。他举了许多生动而具体的事例，讲明这个问题。最后他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

卫将军每讲一段，学生们即呼一阵口号。越呼口号，卫的劲头越足，讲的更加激昂。在热烈激昂的气氛中，卫将军一行圆满地结束了对抗大的参观访问。

因为卫将军在参观抗大时问起了校长林彪的情况，才知林彪在山西受伤后正在延安城东十五里处养伤。于是下午卫将军一行又去看望了抗大校长林彪。

第三天(四月十九日)一早，卫将军一行离延赴西安。滕代远、肖劲光、高自立同志和我送至三十里铺以外，才依依不舍而别。

(四)

卫立煌将军的延安之行，是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的转折点。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如果说卫将军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到了延安与毛主席倾谈并看到延安实际情况之后，最初的萌芽就大大发展了。

延安之行以后，卫立煌将军有以下不同寻常的表现：

(1)卫将军离延到西安后，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宣侠父同志曾拜访了他。卫立煌向宣侠父谈起在前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和参观陕甘宁边区的感想，又联系大后方政治落后、经济凋敝的现状，感叹地说，中国的现状是“政治赶不上军事，后方赶不上前方”。卫将军在西安还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上百万发子弹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给予我们有力的支援。

(2)卫将军更进一步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报刊，特别爱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还注意吸取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

(3)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的内战命令。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曾命令卫立煌进攻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卫与八路军默契，虚张声势，假作进攻，实际并未伤八路军一兵一卒。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卫将军在国民党内部对何应钦、顾祝同的作法表示反对意见。正如我党中央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二日的一个文件中指出的，蒋部下的政学派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卫立煌、张治中等，对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

(4)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卫立煌将军却在一九四六年出国远游欧美。一九四七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为了挽救东北败局，打电报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将军，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将军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打电报同我党中央商酌。

我记得刘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一次敌军工作会议上说到过此事。那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作为搞敌军工作的干部参加了此会。当我在会上汇报说：蒋介石的统治已

经摇摇欲坠了。现在有很多国民党军官看到了蒋政权就要垮台的趋势。将来必有更多的国民党官员起义，奔向我方。

少奇同志插话说：是的，现在蒋政权是“摇摇”，还没有“欲坠”。将来到“坠”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奔我们。最近卫立煌曾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告诉我们，蒋要派他到东北去，问我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只做了一个比较灵活的复电，让卫“相机行事”。我认为中央的答复既原则又灵活，是完全正确的。

（5）辽沈战役结束后，卫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才得以逃出南京，隐居香港。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我《人民日报》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卫立煌一个。但卫立煌将军并未因此失去对我党的统战政策的信任，这是由于他自抗战以来多次与我党领导人接触，深知党的统战政策的真诚和伟大。故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词，可以看出卫立煌将军的诚挚的心情。

（6）一九五五年三月，卫将军在我党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祖国，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词，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

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行，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归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标志着卫将军的思想转变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声明发表时，还有一段值得回味的插曲：卫立煌的声明写好后，曾征求过有关负责同志的意见。我们有的同志认为他对过去反共的历史没做自我批评，想让他加上自我批评的内容。周总理知道后立即出面制止，指出，卫立煌的声明不宜修改，一方面避免给卫本人不好的感觉，另一方面也免得造成卫是被迫声明的印象。所以，卫立煌的声明是按本来面目发表的。

从卫将军一九三八年四月访问延安，到他一九五五年三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十七年时间。这十七年间，卫将军经过反复的实践和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作为十七年前在延安接待过、争取过他的党的统战工作者，能在北京与他重逢，真是无比欣慰，更体会到党的统战政策的伟大和正确。卫将军初来北京时，我曾陪他游览周口店，并以统战部名义在北京饭店宴请，当年在延安请客的情景，就成了宴席上的话题……

卫立煌将军卒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从一九五五年他回归祖国，到一九六〇年去世，这五年间他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归根到底，卫立煌将军终究从爱国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荣誉，获得了光明的前途，成为一切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榜样。我深信，凡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经过自己多次反复的实践、认识，都会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接待世界青年的使者

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又名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或世界学生协会代表团），是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团长柯乐曼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女）。他们四位都是世界学联的著名领袖，进步分子。来到中国以后，曾在汉口、杭州、南昌、重庆等十多个地方访问。一九三八年六月，他们又到汉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要求到延安参观访问。周恩来同志为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电告延安党中央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请予以热情接待，并安排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黄薇和《南洋商报》记者胡守愚二人随行采访、报道。

国民党当局对这四位进步分子是很不放心的，从他们一入国境，就派出了特务分子盯梢。代表团走到哪里，特务就跟到哪里。在武汉，国民党派了特务分子宋如海，以汉口基督教总干事的身分陪同代表团活动。

代表团从汉口来到西安，一住进旅店，就被国民党控制起来。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主任冯慕鸽，在代表团住的旅店门口租了一间房，凡要见国际青联代表团的人必须先经过冯的允许，否则不准进去。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伍云南处长，带着八办处长的名片，前去与代表团联系，几次都被冯慕鸽等人阻拦，谎

称旅店没有这些人。后来还是宣侠父同志不顾一切闯了进去，质问特务分子：“外国人有没有见客的自由？”特务被质问得无言以对，只好放他进去了。

柯乐曼等人见到八路军办事处的人，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和宣侠父同志紧紧地握住手说：“我们总算把你们找着了！我们找你们八路军办事处找了很多天都没找到，真把我们急坏了！”侠父同志就把我们多次要求见他们而屡遭国民党接待人员拒绝的情况，告诉了代表团，并说，八路军办事处就在七贤庄，这是人所共知的。你们之所以找不到，是国民党特务故意蒙蔽你们。柯乐曼等人听后十分气愤，向冯慕鸽提出了抗议。当时，冯文彬同志在西安负责“西北青救会”的工作，也同柯乐曼等人联系上了。冯以延安“青救会”的名义，热忱欢迎他们去延安。以后，我八路军办事处多次和代表团接触，商定好了去延安的日期。而这时冯慕鸽又从中作梗，推说没有汽车，没有飞机，企图继续阻挠代表团。幸而八办的同志们早已料到他们会耍这样的花招，已先把汽车准备好了，冯慕鸽等人才不得不同意代表团启程。

启程的那一天，国民党特务突然又要出新花招，提出要派西安公安局的一名特务随行，声称这是为了保护代表团在路途上的安全。我办事处人员提出，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有公安局的正式公文。特务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回去开证明，他一离去，司机趁机把油门一踩，一阵风似地开走了。特务这时才知中了计，但也没办法了。

六月二十九日，代表团的汽车风尘仆仆，即将到达延安。我们交际科在延安南边的七里铺组织了欢迎队伍。中午十二点左右，代表团的汽车从远处开来了！我们立即迎上前去。柯乐曼

等走下车来和我们紧紧握手，高兴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们也以最热诚的词语向他们表达欢迎、慰问之意。双方愉快地交谈了片刻，柯乐曼等人又上了车，汽车开足最大马力向延安驶来。这时，延安南门外广场上挤满了万余群众。抗大、陕公、延安市自卫军、少先队、艺术学院、青救会、妇联及驻延各部队都到了，几百个小脚妇女也兴致勃勃地赶来参加。写着英文和中文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的旗帜在每一行列前飘扬。当柯乐曼他们到会场时，群众立即高呼口号：“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援助中国人民抗战！”“为和平、民主、自由而奋斗！”“欢迎世界学联指导边区青年运动！”八路军代表滕代远、肖劲光，党代表李富春，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毛齐华，青救会代表高朗山参加了欢迎会。边区青年领袖高朗山代表边区二十万青年致欢迎词，他热情地说：“今天，我们和我们最亲爱的国际弟兄们见面了，心里的喜悦是不能加以形容的。你们到中国，一定会看到中国千百万群众踊跃地走向斗争中来，也一定会看到残暴的日寇正肆意残害无数的中国青年和中国人民。希望能经过你们，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出来，推动他们来帮助中国青年。”之后，柯乐曼讲话，他说：“在抗战前，中国早已有了学生运动，后来听到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反日示威运动，就很希望看看中国青年的伟大精神。今天，希望完全实现了。我们看到中国许多青年都团结起来了，并英勇地参加了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全世界青年也团结起来了，募集了几十万几百万现金捐给中国，美、英、印学生领导抵制日货，三十多个国家学生要求国际来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胜利。”雅德女士代表美国学生也讲了话：“我来到中国，很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正在为中国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着，同时也为世界和平、民主奋斗着。抗战后，美

国学生就开始抵制日货。有的女学生把自己的丝织衣服撕碎，因为是日货。学生还用捐款等方法来援助中国。我们要扩大这一运动，推动政府参加，因为中国的胜利，就是美国人民的胜利。最后，我还要向中国妇女致敬。她们参加了各项抗战工作，表现了非常英勇的精神，是全世界妇女们的先锋队。”欢迎会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

第二天，假延安市政府俱乐部地址，主要接待单位——陕甘宁边区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召集座谈会，浦化人任翻译。除代表团全体四名代表外，总工会、文协等二十余群众团体出席。抗敌后援会主任毛齐华做了报告，介绍了后援会的性质、任务、组织和活动情况，特别强调了边区民众武装在抗战中的作用。最后毛齐华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问题，并设宴招待了他们。下午，他们参观了党校和陕北公学。

七月一日中午，中共中央按照西方的习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世界学联代表。为了适合青年的特点，会场安排在西山脚下中央组织部旁边的桃园里。到会代表有四、五百人，大家分别围坐在一棵棵桃树下。桃树那伞状的茂盛的枝叶为同志们搭起了天然的凉棚，夏季的风阵阵吹来，十分的舒适、惬意。毛主席首先致欢迎词：“世界学联对我国的忠心援助，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谢意！抗战虽然是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因为日本有侵略朋友，侵略者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世界上造成了灾难。我们也要与世界人民团结，战胜法西斯。”接着，青救会代表冯文彬，边区文协代表柯仲平也讲了话。代表团团长柯乐曼在讲话中说：“参观党校和陕公后，看到许多青年抛弃了过去舒适的生活，而来到这里艰苦地学习，这证明了中国青年抗战的热忱。我们这次来中国，沿途民众团体（如香港、新加坡等）还托我们慰问

你们。中国的抗战，鼓励了世界人民。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定能战胜日寇。”雷克南、雅德、傅路德也相继讲了话。大会结束后，中央设宴招待了他们。晚上，柯乐曼等又参加了延安各界群众庆祝中共成立十七周年大会。晚会上，由鲁艺及延安市艺术家表演了歌剧《农村曲》。

二日上午，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和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毛主席对他们讲明中国边区的作用和意义，边区的性质就是抗日民主的堡垒，而我们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作用就是要竭力坚持扩大统一战线。毛主席说：我们要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只有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日本人民的帮助，争取国际上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才有缩短的可能。在回答代表团提出的抗战后党的任务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在谈到青年运动的任务时指出：中国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的特殊责任是为争取本身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改革而斗争。而世界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方面的使命，就是要向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重要谈话感到十分满意。

七月三日，代表团参观了抗大。抗大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他们每人“游击博士”学位称号并赠送他们纪念章。会后，代表团的成员兴奋不已。团长柯乐曼说：“我活了二十四岁，今天是最光荣的一天。”雅德按西方人的习惯说：“我愿意把我的手给我们的首长去吻。”他们决定要为抗大募捐，并要我们提出数目，说提的大一点无妨，他们将随募随寄到延安来。

八路军送给他们一面锦旗，送给每人一套军装，一顶缀有红星的红军八角帽，一根皮带及一双草鞋，他们接到后，当场高兴

地穿了起来。

傅路德还曾告我：他的弟弟在他来中国的时候曾对他说：“你这次到中国，如果能得到一张毛泽东先生的照片，并且能请他亲笔签了字，我可以不要我的全部财产。”从他的这段话可看出，他们对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的感情，也可看出他们对延安的这次访问是十分成功的。可惜那时我们的条件太差，未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愿望，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十分遗憾。

这次代表团还参观了鲁艺、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对我边区各方面的情况有了较深的了解，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就连陪同代表团的国民党特务宋如海也不得不承认：“代表团这次来中国访问了十三个地方，印象最好的还是延安。”而宋如海本人在延安也不敢乱说乱动，但是他总是想缩小我们的影响。在鲁艺召开的一次各地青年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报告了全国各地青年运动的情况及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代表们为照顾大局，在介绍情况时还是比较谨慎的。但宋因害怕代表团了解全国青运的情况并暴露出国民党政府的弱点，在开会时坐立不安，精神萎靡，自这次报告后，他曾再三催促代表团及早离开延安，但是代表团对他根本不予理睬。

七月四日是代表团离开延安的日子。这天早晨天气阴暗，雷声不断，预示着一场雷雨就要到来了。才六点钟，抗大、陕公、自卫军及民众团体就已集合在南门外，举行了欢送会。冯文彬同志致欢送词，他代表边区青年和人民热忱感谢代表团不畏艰苦到延安考察，并希望代表团把我国团结抗战与青年积极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精神告诉世界朋友，希望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援助我国抗战，督促政府采取有效办法援华制日。冯文彬最后代表中国青年宣誓：我们要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奋斗，并在抗战中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冯文彬讲话后，各团体、各学校向代表团献旗，情绪十分热烈。接着，雷克南、傅路德讲了话。他们说：“到中国后，特别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忠实执行，看到延安人民抗战热忱的高涨，真出乎我们的意想。在此把各党派、各阶层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真使我们与世界青年兴奋极了。我们要把在延安看到的一切不隐瞒地向世界人民宣布，使你们的斗争取得比现在还要大几十倍几百倍的援助。”宋如海也说：“延安对代表团欢迎的热烈与忠诚，实出于我们所到的地方之上。”欢送会结束后，在热烈的口号声中，代表团坐上汽车离开了延安。

爱国华侨的激情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华侨司机回国服务团一行十一人来到延安。这批司机来自马来亚地区最南部的柔佛士乃州，那里居住的大多为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籍人和华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十分关心祖国的生死存亡，他们出钱出力尽一切可能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次来延安的司机回国服务团的领队是彭士馨，团员有翁亚东、郭嘉、陈全、李玉、郑荀、丘乾水、李荀、黄国光、余技、彭士钦。这个团在九月间从柔佛士乃区出发的时候，有十三个人。到香港后找到了廖承志同志，由廖介绍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伍云甫处长。他们亲自驾驶汽车，由香港经广州、长沙、武汉、襄阳到达西安，经历了许多困难和阻碍。汽车一部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交新四军使用，并有两人留下，所以到达延安的只有十一人。他们跋涉一万四千余里，历时约三个月。彭士馨一行来陕甘宁边区的目的，除翁亚东及彭士馨的弟弟彭士钦（年仅十二岁）是到延安来学习外，其余九人均为汽车工人，能驾驶、修理汽车、坦克。他们来时带来救护车两辆，大的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华侨捐赠的，小的是美国纽约旅馆联合会所捐献。他们来延的费用全靠柔佛士乃区筹赈会的捐助。据他们说，马来西亚华侨还准备捐给八路军飞机，香港的汽车工人已捐好一辆汽

车送给我们，尚未运到广州。

他们到后，我们即将他们安排住在当年最好的招待所——西北旅社，生活上予以优越照顾，陪他们到处参观。总政治部还举行了晚会、座谈会欢迎他们，他们也十分兴奋，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他们来后不久即急于上前方去参加游击队，有的人甚至很天真地说：“我们一定要上战场缴获一些战利品带回南洋去，让他们看到我们是真正抱着牺牲精神回国杀敌的。”他们要求八路军给柔佛士乃区筹赈会发一封信，证明他们已经到达八路军防区，并且已经参加了实际战斗生活，同时向筹赈会表示谢意。对他们的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我们都一一答应了。

由于他们言语不通，其中有的人甚至只能说英语，因此我们劝他们在延安学习一个时期再分配工作。但他们还是不十分同意。他们说：“我们如果不早日到前线去，华侨的资本家会看不起我们的。”他们解释说，抗战开始以来，华侨回国的已不少，但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作法都是让华侨把带来的捐款留下，让华侨回去，除飞机师外，其他侨胞都不用。许多侨胞在香港请缨无门，很是苦闷。在香港及新加坡有许多专门人材，他们都想回国服务，愿意来边区的人也很多。如果八路军能留下他们并且让他们投入战斗，不仅会鼓励更多人回国服务，并且会使侨胞的救国情绪更加昂扬。他们的谈话使我们十分感动，海内海外，真是爱国一家呀！

他们不仅要求去前方，而且希望不要把他们分开。我们把他们的要求向滕参谋长做了汇报，滕参谋长答应他们先去前方做宣传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过一段时期再回延安来工作。为了使他们能顺利工作，我们请政治部派一位较早参加革命的华侨同志或广东同志陪同他们一起去前方，便于他们开展工作，并且

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他们对我们的安排十分满意。

这些工人十分诚恳热情，对我们的优待及热烈欢迎深感不安。翁亚东甚至提出要把自己的一百元零用钱也捐给边区医院，后经我们向她解释，她初到北方，生活不便，一定会有些需要，她的情意我们领受了，但钱还是请她留下。这样她才勉强同意了。翁亚东是一女护士，原是朝鲜人。在马来亚时在一日本医院当看护。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她来时，廖承志同志曾有一信将她介绍到陈云同志处。

服务团来时还带来一大箱绷带和一桶凡士林，富春同志决定交傅连暉同志。在当时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能得到这样一点物资，傅连暉同志就十分高兴了。

不久，翁亚东经陈云同志介绍进了抗大，彭士钦进边区中学学习。其余的九人，由总政治部派的同志同行，于十一月二十日步行去前方。他们离延的这一天，正是日本飞机来轰炸延安城的日子。飞机来轰炸时，他们已启程一小时了。他们高高兴兴平安无恙地踏上了去前方的征途。

对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关系正式建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迎击日本侵略军。

八路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管辖，因此，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直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先后派遣多批联络参谋进驻八路军。

联络参谋的正当任务应该是：加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与我军的联系，了解我军民在前方艰苦奋斗、英勇抗击敌人的实际情况和战斗经验，并随时将之上报军令部，同时，如实地反映我军的实际消耗和困难，使我军能得到应有的物资补充。

如果他们能做到以上几点，则他们的工作就有利于国共长期合作、有利于消除可能发生的隔阂，增强团结战斗的力量。

事实上，在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国共之间发生重大分歧时，我党中央及军事领导同志确曾通过他们向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方针，希望联络参谋在沟通国共两党意见方面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联络参谋都是由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我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情报秘密上报重庆、西安。有的甚至搞阴谋诡计，收

买我方人员，或者企图打入我党，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无论是在前方或是在延安，我们一方面对他们以礼相待，政治上、生活上给以优待和方便，以期他们完成正当任务；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破坏活动或不正当行为，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照顾大局，我们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以利争取他们继续在我军工作。

几年中，先后调换来我军的联络参谋有陈宏谟、李克定、郭亚生、周励武、罗伯伦、郭仲容和徐佛观等。这些联络参谋各有不同的经历，对民族、对人民、对两党合作所持态度也不尽相同，因此表现各异。在我们区别对待的工作方针下，他们所起的作用、所得的结果，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批于一九三八年来延的有陈宏谟、郭亚生、李克定三人，皆为上校衔。陈宏谟驻一二〇师，郭亚生驻一二九师，李克定驻一一五师。陈宏谟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到延安的，不几日李克定、郭亚生也到了。三人中在政治上陈宏谟表现较好，郭亚生次之，李克定既反动又拙劣。

他们三人来后，我们即表示热情欢迎，让他们住在新开的西北旅社，予以优待。他们来时，皆着黄呢军服，佩戴武装带，在与我们正式接触时，服装整齐，言语谨慎，向我出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致我军总部证明文件，要求面交我军参谋长滕代远同志（那时朱总司令在前方），并请示何时能让他们去前方到任。还要求在去前方之前，能晋见毛主席。陈宏谟对我说明：“毛先生是贵党的领导人，也是我们（指郭李）所共同尊敬、久慕的人物，想请教他对团结抗日的意见。”

我们引他们见滕代远同志时，滕表示欢迎，并设宴招待，告诉他们当尽快安排他们去前方。

毛主席得到我们报告后，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亲予接见。见面时除对他们表示欢迎外，还向他们说明我党我军自“九一八”以来所奉行的联合全国各方军队，枪口一致向外，共同抗日，为争取在全国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的主张。毛主席指出：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抗战形势在全国蓬勃发展，但是要取得抗战完全胜利，我国必须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付出非常重大的代价，必须坚定采取持久战争的战略方针；只要国民党和全国人民能够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把已经发动起来的抗日战争发展为全面全民族的抗战，依靠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就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毛主席着重指出，“亡国论”或“速胜论”都是十分危险的、有害的。毛主席说，我们八路军除极少数留守后方维护河防和治安外，三个师都在前方，而且大部分都在敌后。在前方尤其在敌后，生活比大后方艰苦得多，想诸位来时对此已有精神准备。毛主席最后勉励他们要为抗日战争、为国共两党两军合作作出贡献。

陈、郭、李三人来延后，曾在西北旅社学习我们送的《论持久战》。这次能当面领教毛主席的见解，更对毛主席表示钦佩，陈宏谟表现得最为明显。

陈宏谟是四川人，小个子，能说会道，才思敏捷。他在大革命前曾在叶剑英同志所部任过连长，后去欧洲留学，回国后在顾祝同处做过事。他有较丰富的政治、军事方面的经验。当然，他的一切言行都是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的。他经常宣传蒋介石的“抗战远见”和军事战略上的“指导正确”等等。他遇事态度明朗，对我们有不同意见能当面提出，甚至还搞过“公开抗议”。如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各界声讨汪精卫投敌的群众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讲

话，当毛主席严正指出汪精卫与国民党党内顽固派内外勾结搞得乌烟瘴气，揭露蒋鼎文、胡宗南派兵进攻我边区，并且以西安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黑暗与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廉洁光明作了鲜明的对比时，陈宏谟中途退出了大会，以示“抗议”。而其他联络参谋却摆出一副阴沉的面孔，听完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听了其他各界代表对汪精卫的声讨和对顽固派的申诉。

又如陈宏谟在等候贺龙同志准备一起去前方期间，读了一个名叫《团圆》的剧本。为了掩盖一些国民党将领的黑暗可耻，他很坦率地对剧本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个剧本描写一个国民党的负责人在战争危急时尚与汉奸打牌，“这是过于夸大国民党的弱点”，“自新生活运动开展以来，蒋委员长已禁止党员打牌了”。另外陈还批评说，“这剧里面好事都是共产党干的，坏事都是国民党干的；而且表现共产党一贯是对的，而国民党都是一步一步进步的。”因此他的结论是：这样的剧本容易引起磨擦。我们向他解释说，这剧本里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对抗战以来国民党的进步有充分的肯定，如剧中人某国民党负责人的表现是不错的，他能顾全大局，并领导剧中所有的人物共同抗战，这就是表现国民党人有进步、有好的地方。当然对他的错误、弱点，也有所批评，这也是必要的。况且一个剧本只能表现出抗战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环，无法把蒋委员长领导海陆空军作战的全部情况一下子都描写出来，所以在你看来有缺点，这是难免的。对我们的这番解释，陈宏谟仍不服气。

记得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陈宏谟随贺龙同志到了华北前线。据贺龙同志告我，陈在前方表现不错，与我们合作尚好。

一九三九年三月，陈宏谟从前线（河北饶阳）返回延安，准备

赴重庆汇报工作。他在西北旅社向《新中华报》记者谈了自己在前线的观感。他说，（1）一二〇师抗战以后便转战华北，在艰苦环境中英勇奋斗。干部、战士对抗战的意义有深刻了解，忠勇地执行命令，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上级的任务，不愧为坚持抗战到底的国军，这是全国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2）一二〇师最忠实地执行政府和最高统帅的命令，秉承上级的意志，机动、灵活、艰苦地与日寇作战。（3）贺师长有三十年战斗经验，能采取新旧战术之长，善于指挥、掌握部队，下决心特别快而且坚决。下级干部战斗的勇敢、指挥的灵活，使人敬佩。（4）官兵一体可谓家庭化，首长对士兵真如父兄对子弟，下级对上级是心悦诚服，又敬又亲，可为全国效法。（5）他们对友军互助互让，因而并没有过磨擦。凡是同八路军相处过的国军，都认为能同八路军相处很好。（6）八路军所以如此，首先是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教育的深入；同时由于共产党员在部队中的模范作用与干部们丰富的创造力。（7）缺点是无重兵器及防毒面具。

陈宏谟在谈完观感后向记者表示：“我这次赴重庆，一方面是任务已告完成，同时准备请示上级能对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与困难有所接济、解决，附带要将八路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贡献给其他军队，这是对整个抗战都有很大益处的。”

陈宏谟回重庆后，果然为一二〇师补充了二十挺机关枪，运到前线。

李克定是个极其反动的职业特务，他的阴谋破坏活动，很快被我们发觉。他到一一五师师部不久，即收买我师部的一个译电员，窃取我党内部机密，被我破获。因人证物证确凿，李无法抵赖。我向国民党军令部提出抗议，李即被我驱逐回去。被李收买的机要员，按我军军法枪决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派周励武来，代替李克定在一一五师任联络参谋，周来时带有副官、勤务员各一名。周励武在第一次大革命时参加过我党（或团），后来叛党成了叛徒，曾在国民党军队之中特务执法大队参加屠杀我革命同志。此人诡计多端，卑鄙无耻。因为他专搞特务活动，甚得特务头子的赏识。因此他来延次数最多，时间也最长。他初次到延，曾向我申明，不做李克定那样的人，并认为李的行为是违犯军事委员会的纪律的，可是，他到后不久就搞特务活动，介绍我建华被服厂一职工去西安加入三青团，信被我边区保安处查出。

本来，国民党除派联络参谋外，还想往每个师派一名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想增派特务打进我军，被我拒绝了。由于前后来的联络参谋在我军内不断搞特务活动，我们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于是，从一九三九年冬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不许联络参谋再上前方，而只让他们留在延安。从此，联络参谋就成了我们交际处常驻“贵宾”。

抗战之初国民党虽迫于形势，曾与我党达成了合作协议，但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根本政策并未改变。蒋介石食言而肥，反而制造种种借口，进行反共磨擦。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终于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之后，为了掩人耳目，蒋介石以“消弥纷争，团结对敌”为幌子，指使白崇禧以中间派人物身份，向我党提出调解方案。七月十六日，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白崇禧炮制的调解方案，作为统帅部的“提示方案”，交给我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这个提示案的要点是：（1）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国民党陕西省政府领导；（2）八路军、新四军五十多万抗日武装缩编为十万人；（3）划定作战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赴黄河以

北,在第二战区阎锡山司令长官的指挥下作战。

对这个企图取消陕甘宁边区、编散抗日武装、达到反共目的的“提示方案”,我党一直不予答复。由于这个方案在一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我党政策方针不甚了解的中间派人士中起了一定的迷惑作用,蒋介石顽固派自以为得计,其军委会通过电台命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到我方领导人处催促。于是当时在延安的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即要求见我军领导人朱总司令,企图迫使我方对“提示方案”作出答复。当时叶剑英参谋长正有事回到延安,朱总司令决定由叶剑英同志出面接见。这次接见,是由我自己陪同陈宏谟等三人到王家坪见叶剑英同志的。一见面,他们即异口同声、开门见山地询问中共方面对“中央提示方案”是否已经答复。叶剑英同志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这个方案我们无法接受,已由周副部长(那时周恩来同志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向中央陈述大江南北我方军民的苦衷,请允许我大江南北各部队仍就地抗战。”陈宏谟却说:“中央这个提示方案很公正,为各方所赞成。各地将领、爱国志士、社会贤达同声称赞,多数盟国友邦也认为很好。总之,舆论上认为这个方案有利于两党避免磨擦、长期团结抗战。”

叶参谋长对陈宏谟等的谎言,用事实作了尖锐的批驳,指出:几年来国民党顽固派干了许多坏事,在华中、华北和西北向我军防地进攻,制造惨案,杀我办事处人员,甚至屠杀我抗日受伤的光荣伤员和无辜的军属。现在又要将我军与抗日群众共同奋斗、流血牺牲创建起来的敌后根据地让给敌伪和顽固派,还有什么“公正”、什么“以利抗战”可言。难道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教导,你们都忘记了?

陈宏谟等遭到叶参谋长义正词严的驳斥，无词以对，但还不甘心认输，又强辩说：“中央这个提案是由白副总长提出来的，白副总长总不是顽固派吧！”叶剑英同志深知其狡诈，即很风趣而又恰当地回答说：“白健生（崇禧）提出的‘方案’可能是个消除两党磨擦的药方，不知问题实质或不明事实真相的人，会有此认识。但是须知，这个药方开的药，是要经过何敬之（应钦）的手炮制，交给我们吃的，经过他的手，可能变成了毒药，我们就不敢吃啦！”

几句形象而深刻的妙语，把陈宏谟等人的话顶了回去。陈宏谟等人见无隙可钻，只好告辞。

这时蒋介石已经下决心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在蒋介石指使下，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项英，强迫八路军、新四军按照国民党七月十六日的“提示方案”办事，并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开赴黄河以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皓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十一月九日发出《佳电》，据理驳斥何、白的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答应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坚持抗战。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又发《齐电》，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皖南事变终于爆发。

对于顽固派的滔天罪行，我党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斗争的方针。中共中央和军委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新四军将领发出声讨通电。周恩来同志在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党中央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整个反共阴谋计划，驳斥了种种造谣和诬蔑，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要求，并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新四军编制扩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

旅，共九万余人。

我党在皖南事变中的严正立场与合理主张，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广大人民和社会舆论，海外华侨团体，纷纷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全国人民敬爱的孙夫人宋庆龄，首先起来斥责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都由过去对国共两党“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转为支持我党的立场。在国民党内部，不但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反对当局发动内战，就连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重要谋士、高级将领也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在国际上，苏联坚决反对国民党掀起内战，英美也不愿意国共分裂。蒋介石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不得不收敛反共气焰，由进攻转入防御。至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党挫败蒋介石企图诱骗我党参政员出席二届参政会的阴谋后，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粉碎了。

蒋介石为了粉饰裂痕、欺骗国内外舆论，以便摆脱孤立的处境，不得不做出一些“和解”的姿态。我们党为了争取其共同抗日，也在斗争方式上有所节制。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国民党行政院赈委会派郑延卓携三十万元赈款，到陕甘宁边区赈灾。郑是持友好团结使者态度与我们讲合作抗日的。他对大后方的官僚、政客、地主豪绅的贪污腐化表示不满。此人有政治斗争经验，社会、历史常识丰富，能说会道，喜欢讲笑话。说话视对象不同而不同，而且层次清楚。与我们个别谈话时，表现得进步、随便一些，在公开场合说话时，则分寸很严格了。

与此同时，军令部也派出联络参谋周励武同行，以便加强重庆与延安之间的联络。

这是周励武第二次来延安。这一次他还带上了新结婚的四

川老婆。来后不久，他老婆怀孕要生孩子，他又将她送回重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周励武却往返多次。

一九四三年初，一次毛主席接见周励武。当周向毛主席讨教中共对国内时局和动向的看法时，毛主席明确答复：“你在延安还不清楚么？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并说明我党的原则立场，指出：谁要不顾民族大义，破坏两党团结，硬要把政治分裂、军事磨擦强加在全国人民的头上，全国人民是会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敌人的。请转告重庆的那些反共顽固派先生们，坚持其对我党我军仇恨的反动政策是危险的。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军队中，也有人主张向南打出陕甘宁边区去。

毛主席最后风趣地说：“大米白面比小米好吃，这是娃娃也知道的么！”

一九四三年二月底，陈宏谟、郭亚生从延安撤回重庆，由徐佛观、郭仲容接替他们的工作。当时正在重庆办事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同志，在曾家岩招待了四位新旧联络参谋。

陈宏谟回四川后，在一个师管区当了司令，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公正、客观，国民党当局以后再没让他来过延安。

一九四三年五月，徐佛观、郭仲容来到延安。他们进我陕甘宁边区后，是雇用毛驴骑到延安的。

徐佛观是湖北人，四十多岁。曾任中央训练团二十一、二十三期党政训练队教官。他与陈诚关系密切。来延时的头衔是军令部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谋，在驻延的联络参谋中，他的地位是最高的。他在我面前，竭力表现为国民党内进步分子的面目，一方面骂孔祥熙贪污，骂国民党统治黑暗，另一方面又

表现出对共产党人敬佩、诚恳。

郭仲容是四川人，据说青少年时期曾与罗瑞卿、任白戈同志同过学，后来他们志向各异，分道扬镳。郭这次来延，本为军令部派驻一二〇师的联络参谋，但事实上我们一直没让他去前方，所以，他由始至终同徐佛观同住延安交际处。

交际处为徐、郭安顿好生活以后，他们两人即提出要求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当时毛主席很忙，就请朱总司令、叶参谋长先接见。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对他们表示热情欢迎，向他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的斗争情况和皖南事变后敌后战场的新形势。指出，我党我军以民族命运为重，坚持争取两党合作的根本方针。何应钦、顾祝同等在皖南做出了“仇者快、亲者痛”的罪恶勾当后，现在仍命少数不明大义的顽固分子在各地继续加紧磨擦。希望你们来延后与我们共同为两党继续合作作出贡献。叶参谋长向他们说明，我党愿与国民党合作，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根本政策是要坚持到底的，决不中途改变。叶参谋长并着重说明：“如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军队是古今中外没有的。他们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五十八，全部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的功劳这样大，你们重庆军政部对我军长期以来断绝一切物资供应，不发一枪一弹，不发一分钱，我们还是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抗战到底。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有奶便是娘’。我们现在是‘无奶也是娘’呀，希望诸位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今后对许多根本问题就不难取得一致的看法。”谈话后，叶参谋长在王家坪总司令部请他们共进午饭。

不几天毛主席又接见徐佛观、郭仲容，并请他们吃了便饭。毛主席与他们谈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现在西方战场和东方战场

越来越有利于我们，只要国共两党合作到底，一定能够彻底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此外，徐、郭还分别拜会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厅长柳湜、霍子奇、贺连城等，并考察了我们实现三三制政权的情况。徐、郭每会见一次领导人，回到交际处都向我们表示对这些领导人的尊敬，态度似很谦虚，但过后两人凑在一起详细研究领导人的谈话内容，并很快向重庆发电报汇报。

徐、郭来延之初，恰值我党的整风运动全面铺开之时。他们很谨慎，住在交际处很少出门，我们把整风文件送给他们看，他们就闭门读书，用心研究整风文献。

有一次，他们二人和我们谈话。我们问他们，看了整风文件有何感想？徐佛观说：刘少奇先生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很好的文章。刘先生通晓古今中外为人修身治国之道，有很多精辟之处！问题是中共的干部、党员能否将刘先生的真知灼见学到做到，恐怕还有些距离吧？拿我党（指国民党）来说，孙总理和蒋委员长也有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创见颇多，但是本党在执行贯彻中，总感成效不佳。

郭仲容也说，毛先生的《反对党八股》精辟、有力、切中要害。当年我在上海，曾看到过你们所说的“教条主义者”所写的文章和文件，那里面确有不少八股式的句子，什么“普罗列塔利亚与布尔乔亚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乔亚的狄克推多政治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什么“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需经过一个大的奥托哈变才能实现”……这些洋八股不但工农看不懂，就连知识分子读之也会感到头痛。郭仲容把我党三十年代出的报刊文章中的某些段落，长段背诵出来，以显示他深知教条主义者对我党的危害。

一次，徐佛观跟我聊天，他说他在离开重庆时，曾见过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周副部长要他到延安后与我们“以诚相见”。徐认为周恩来同志的这句话很对，说：“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都要本着这种精神工作。”徐还赞扬延安的精神面貌“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表示：“这种精神真令人敬佩！”

我们交际处自一九四二年以后，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对顽固分子的争取上。我们对联络参谋的工作也属于“重点”之列。我们既坚持原则，又要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安定地住在延安，了解我边区的真实情况，能够正确地对外宣传我们的政策。我们一面对他们做统战工作，一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我们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为此，我们经常找他们谈谈话，与他们一起吃吃饭。

由于蒋介石坚持其反共第一的反革命两面政策，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三次反共高潮接踵而起。

早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就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这部书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为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六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于六月十八日到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抽调防守黄河对付日军的三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计划分兵九路“闪击延安”。七月六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广播了西安特务头子冒充“文化团体”召开座谈会，要求解散共产党的消息，煽动舆论配合军事进攻。国民党反共军开始炮击边区，内战一触即发。

党中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各方条件都不允许国民党公开发动内战，因此第三次反共高潮也有被制止的可能，并沉

着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七月四日和六日，朱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挑衅活动。九日，延安各界群众三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敌后各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发通电，提抗议，声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并在军事上作好支援的准备。全党以团结战斗的决心，回答了反共分子的挑战。

在这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下，徐佛观、郭仲容在延安惶惶不安。七月九日延安三万群众召开紧急动员大会那一天，我们为国民党当局知道我们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决心，邀请徐佛观、郭仲容参加大会。徐佛观坚持其反动立场，中途退场。郭仲容听完了各界代表反击顽固派反共的声讨。会后徐郭急电向重庆报告。他们从此在延安更加坐立不安了。

他们多次要求回重庆，要我们报告叶参谋长。我们予以挽留，一再向他们解释，让他们不要怕。我们说：国民党顽固派虽然搞磨擦，想打内战，但是人民反对，民主党派反对，盟国也反对。顽固派想打内战有他们的困难。我们甚至说明“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你们是军令部正式派到我军的联络人员，是我们合作抗日的朋友，怕个什么？”但是他们不信，执意要走，并且向总司令写了信。为此，总司令亲自来挽留，关心他们的生活，稳定他们的情绪，但这一切仍不能奏效，最后闹到绝食，两个人几天都不吃饭，我只好将情况向叶总参谋长报告，那时叶总长几乎天天打电话来问：“怎么样了，说服了没有？”最后他们又要求见叶参谋长。叶总长在见到他们时也同样指出：胡宗南等反共，打内战，看来战争难免了，但我们不主张打内战，我们要抗日。我们相信在此抗击日本侵略军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国民党中大多数人也不想打内战，不想做民族罪人的，你们在延安的安全我们是

负责到底的。

徐、郭表面上虽不肯暴露怕内战、怕死的心理，甚至言不由衷地辩解说，“国民党和蒋委员长不会进攻边区或进攻延安的。”但仍要求他们两人之中先回去一个，并说明徐佛观家中有私事，必须回去一趟。叶参谋长为了缓和他们的恐惧怕死心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要我们通知兵站准备汽车。过了不几日徐佛观先回去了。

郭仲容勉强安静了几天，他深知蒋介石和顽固派抗日是假，反共是真，他们反共第一的反革命政策决不会改变。他仍一面向我们吵着要走，一面请求康泽调他回重庆。九月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何应钦提出的反共决议，董必武同志中途退出了参政会，向国民党表示了坚决的抗议。此时郭一个人在延更觉惶惶不可终日，甚至胡思乱想，误以为我们要将他扣押当人质，又一次要求见叶参谋长。在见到叶参谋长时，郭仲容竟无耻耍赖，说 he 自己是“无名小卒”，“猫也狗也”，留在延安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要求回重庆。叶参谋长除耐心说服教育，加以挽留外，又训斥郭“不要妄自菲薄”。郭被训得无言以对，只好诺诺而退。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郭仲容仍然在交际处住所独自徘徊，长吁短叹，以酒消愁，归心似箭。他为了达到回去的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无理地竟把总司令送给他的《抗日手册》当手纸用了。他虽想走，却仍未忘记收集材料准备回去报功，经常向我招待外国人的人员打听消息。那时，榆林的邓宝珊总司令路过延安，郭仲容与邓宝珊谈了三次，想搭邓的车去榆林转渝，未果。不久，康泽给郭仲容发来电报，说：“董必武仍能安心在重庆工作，我兄却不能留在延安？愧哉！”郭仲容受到特务头子的训斥，只好暂时

勉强留延了。

直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国民党军令部派周励武、罗伯伦来接替郭仲容，郭才得以回重庆。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实行了大反攻，不但收复了苏联本国国土，还越过国境，攻入德国法西斯盘踞的欧洲其他国家。

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便利了英、美军队，使他们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到太平洋方面来，发动对日本的越岛进攻。

美国在太平洋对日作战，迫切希望中国战场的有力支援。恰在这时，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出现了新的大溃败，使美国朝野对蒋介石的失望和责难越来越强烈，而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上。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先后到达延安，美军与我军开始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英美联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之后，德国法西斯的败局已定。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也日暮途穷，末日即将来临。在此国际背景下，国民党当局投降日寇、立即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已是很小了。另一方面，由于它得到美国的大力扶植，又狂妄自大起来，开始推行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

周励武、罗伯伦在这一时期住在延安，自然用不着担惊受怕，不再有徐佛观、郭仲容在延时的那种恐惧心理。相反，他们由于国民党的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表现出反动、狂妄、阴险和忘乎所以的丑态。

如周励武，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一个阴险、狡诈而又道德败坏的家伙。当时，我们交际处给他派了一个勤务员，叫王荣

棠。周看他年龄小，就想从他口中掏一点我党的情报，但每次都被小王巧妙地顶回去了。有一次，周故意把一枚金戒指扔在地上，指望小王打扫卫生时能捡走，他再胁迫收买或造谣。第一次王荣棠不明其意，将金戒指捡起放在桌子上。第二次周又故伎重演，王荣棠捡起后，醒悟到周的恶毒用意，将此事向领导汇报了。周励武的反动行径，不能不引起我交际处工作人员的警惕和戒备。

周励武大胆妄为，竟不顾体面，演出了一场因调戏女服务员而挨打的丑剧。那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的事，当时在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国民党进步人士、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教授、英国友人林迈可及其夫人李效黎，朝鲜人士金斗率等中外宾客。为了照顾好他们的生活，交际处调来一些思想好、懂政策的女同志，充当服务员。其中有一个原延安师范的女学生关淑珍，她年龄不过二十岁，红胖的脸蛋，为人忠诚、老实、勤恳，开始时专门给胡仁奎一家带孩子，后来兼照顾周励武、罗伯伦两联络参谋。周励武遂对她起了歹意，多次挑逗。关淑珍将此事向我和其他几位领导作了汇报。一天，关淑珍正在周励武的窑洞里收拾碗筷，周又兽性发作，企图调戏，关淑珍猛然抽出右臂，左右开弓，打了周两记响亮的耳光，跳出窑洞，大声哭叫起来。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客人们都在家，闻此哭喊声十分惊奇，纷纷出来询问，一下子围了很多。关淑珍当众说明缘由，周无法抵赖，垂头丧气。罗伯伦为了“声誉”，连忙出面向关道歉，但关不肯罢休。

我们交际处同志对此也很气愤，只作不闻不问。周励武下不了台，只好拉着罗伯伦到胡仁奎面前请胡出面说情。当天晚上胡仁奎带罗、周两人到我住的窑洞里，求情说：“金处长，请你

照顾照顾朋友关系吧！这么多外国人在这儿，闹出去不好听啊。”我见胡仁奎出面了，就找来关淑珍当面问明实情，对周励武训斥了一顿，指出：身为军令部派来的联络官员，为什么做出这种丑事，无聊！可耻！罗、周两人连连称“是”。我又转而劝慰关淑珍，要她照顾大局，息事宁人算了。关淑珍执意要周励武同去公安局审处，认为我只照顾客情，不让她弄清是非是不对的，还提出要找她的哥哥——延安县长帮助解决受辱的法律问题。经我与胡仁奎再三劝说，关最后提出要周励武三鞠躬道歉。周开始不愿意，后怕事情闹到公安局，名声更不好听，只好硬着头皮当我们的面向关淑珍鞠了三个躬。我见打击周励武的目的已达到，就对关淑珍说：“小关，既然你提的要求他办到了，就饶了周参谋吧！”这才让周下了台。事后胡仁奎对我说：“哎呀，金处长，你真够朋友，够处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兵我东三省。八月十日，日本政府被迫发出乞降照会。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记得那天晚上，住在延安交际处的英国友人林迈可，在耳机中听到路透社的消息，即要其夫人李效黎来我住的窑洞报喜。李效黎跑到我的窑洞门前大声说：“金处长，好消息，好消息，日本已宣布投降了。”交际处同志和来宾闻讯欢腾起来。我立即用电话告诉叶子龙同志，请他迅速报告毛主席。叶子龙同志说，主席也得到新华社李光绳同志的报告，但不知是否确实，既然林迈可也听到了，可见这个好消息是确切的了。不到一个小时，整个延安干部和群众都敲锣打鼓上了街。延安沸腾起来了。

抗战结束，蒋介石的头等大事当然是要打内战。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客观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解放区

空前壮大；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保存在大后方的数百万军队一时运不出去。他马上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蒋介石玩弄出“和谈”的阴谋。他先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二十三日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蒋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主席不去，他就可以嫁祸于人，把拒绝和谈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去了，他想趁机压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同时还可以利用谈判麻痹人民，掩盖内战准备。

我们党深知蒋介石并无和平建国诚意，而只是玩弄阴谋，因此，一开始不准备去重庆。

蒋介石在发出第一个电报的同时，就让中央社广播了电报内容，并电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主席的答复意见。

毛主席在八月十六日给蒋介石的复电中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同时，毛主席接见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时，也当面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的电报后，再作考虑。

蒋介石发出第二个邀请电后，毛主席又于八月二十二日复电蒋介石，告诉他“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同时，毛主席再次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诉他们，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断定毛主席不会去重庆。因为整个抗日战争中，毛主席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未到重庆去参加过参政会议。现在两党关系比那时更紧张，毛主席更不会去。因此，周、罗二人致电重庆，报告说毛主席不会来重庆谈判。

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得到周励武、罗伯伦直接见到毛主席

所得的第一手确实情报，自以为得计，决心“假戏真唱”唱到底，所以又有蒋的第三个邀请电，声称“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这样一来，越发表现出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反衬出共产党无合作、和平、建国的愿望。

这时不仅国内许多中间人士对蒋介石抱有幻想，美国一部分人也希望中国有个和平局面，甚至苏联领导人也怕中国再次发生内战，希望国共两党和谈。

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击破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用事实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决定毛主席偕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到达重庆。

毛主席到重庆，使蒋介石的和谈把戏被揭穿。蒋事先毫无谈判的准备，一时手忙脚乱，仓促应战。在谈判中，全部方案都是我党提出的，而国民党方面只能消极应付。经过四十三天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

在这场斗争中，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初在延安两次见毛主席后，给国民党当局发的报告，真正是帮了蒋一个倒忙。

重庆谈判之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即一面加紧全面内战的部署，并在局部地区进攻解放区，一面继续玩弄谈判把戏，欺骗舆论，我们党则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即一面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并坚决回击蒋军的一切挑衅，一面在谈判桌上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争取人民群众的同情。这一时期中国局面的特点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政治协商会议刚结束不久，一天，周励武、罗伯伦要求见毛主席，我陪同他们前去。毛主席跟他们谈了

很长时间的话，并请他们吃了午饭。在谈话中，主席苦口婆心地晓以大义，让他们转告国民党中央决策当局不要打内战。毛主席对他们说：“现在中国已打败了日寇，今后最重要的是靠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全国团结一致，坚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实现政协决议，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平民主建国的伟大目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是兄弟，为什么还要打内战呢？”毛主席以形象的比喻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象贫富悬殊的两个兄弟。哥哥富，有钱，吃得好，穿得好；弟弟穷，吃不饱穿不暖。按一般常情，总是穷弟弟向富哥哥去争吵，向哥哥要钱，要粮，哥哥也本该帮助弟弟。但是我们这个穷兄弟不但没有吵闹，反而经常遭到哥哥的打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现状不就是这样吗？国民党打了我们十年，打进一个日本鬼子来。我们两党合作抗战八年，打败了日本鬼子，这不是正反两方面的两个大教训吗？毛主席对周励武、罗伯伦义正词严地说：“请你们转告蒋主席，打内战不仅对民族不利，对人民不利，对国民党、对蒋主席本身更不利。”毛主席顿了顿又说：“当然，国民党一定要和我们大打，那也没什么，我们就奉陪到底吧！”说到这里，毛主席又以刚才的比喻笑着说：要打，我们国共两个兄弟就抱起来在地下滚嘛！我们一起滚到烂泥坑里去。我们做弟弟的反正穿的是布衣旧衫，滚脏了洗洗再穿。而做哥哥的穿的可是呢绒绸缎，滚到泥塘里去，到底是谁吃亏呢？我要告诉你们，只要这么一滚，不管最后谁胜谁败，内战一起，什么“四大强国”之一，“四大领袖”之一，就都没有了啊！周励武、罗伯伦只得连连称是。

在回交际处的车上，他们两人面面相觑，连表态性的议论都不敢发表。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下旬，国民党又一次派郭仲容来延安，接

替周励武、罗伯伦。与郭仲容同来的，还有电台队长李明亮、电台台长鲁之滨以及报务员王石汉。

郭仲容这次到延安后，别出心裁地想出一条打进我方内部的诡计。他唆使报务员王石汉伪装进步，靠拢我方人员。王石汉在郭的授意下，经常装出积极学习我方报刊书籍的样子，说一些进步的话。一次，他偷偷地向交际处联络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想参加共产党。为了表示“真诚”，他装着鬼鬼祟祟的样子把几份密电本送给我们。我们将电本拿来一看，是什么机密？原来是一本向重庆要电讯器材的电报本。这就证实了郭仲容派他打进我们队伍来的真实意图。我们没有上当，反而弄得他们下不了台。

郭仲容这次来延安，正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反对，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期。蒋介石自恃一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有其庞大的军队，三有其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各种反革命组织及反革命经验，认为三至六个月就可以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的副手陈诚则认为，国共两党继续和谈、共同建国是不可取的。这个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比较明智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认为国民党处于逆境，无法挽回，已无其它出路，只有一个“打”字。陈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打交道，要和垮、谈要谈垮、打要打垮；与其和垮、谈垮，不如打垮。

在这种形势下，郭仲容认为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是打定了的。而且一打，共产党必败，国民党必胜。因此他的反革命立场、观点，随着他洋洋得意的心理状态日益大胆暴露。

一次，郭仲容看到我们的报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黑暗，引起全国人民的怒潮时，他竟否认国民党的党棍、财阀、军人、官

僚，拉帮结派、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事实，说现在大后方存在的危险在“三害”：一是“青年从军”，二是“新闻记者”，三是“国大代表”，而不在上边。没有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中国不会有今日。

我对郭说，青年从军，本来是件好事，可是让你们高级军官把这批青年带坏了。新闻记者有好有坏。好的记者要揭露一些国民党官僚统治的毛病，对国民党蒋委员长是有好处的。至于国大代表，本来是由国民党圈选出来的，他们之中很多人是为了做官才出来捧场的。听说大后方的人民群众认为，最危险的是国民党监察院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又一次，在重庆发生“较场口事件”和昆明发生特务分子枪杀民盟西南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两教授后，延安各界群众集会声讨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这时，郭仲容竟对我说，什么民主党派？什么民主人士？这些人老百姓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之中的某某人原来是大贪污犯，现在只是政府不追究他就是了。我对他说，我们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看法，与你不同，他们一要爱国，二要民主，三要团结建国，我们认为是值得国共两党尊重和爱护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民主人士都走革命直线。至于他们之中个别的人可能历史上有点缺点，也不能厚非。至于象李公朴、闻一多那样忠心为国、刚正不阿的人，暗杀他们，只有特务分子干得出来，难道郭参谋也认为是应该的吗？

有一次，郭仲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啊，可惜呀，如果真的发生全面内战，中共多年积累下来的很多很好的文件、文选，都将毁于战火，无法保存下来了。”我当即回击他说：“你们是相信武器、依靠美国的；我们是相信真理、依靠群众的。如果内战再起，究竟应当由谁替谁做结论，不是你我两人谈得清的。”

历史很快地为我们的争论做了结论：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为起点，全面内战爆发了。同年冬，驻延安的联络参谋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全部撤回重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三年的较量，终于打败蒋军八百万军队，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

当年在延安与我们长期打交道的联络参谋们，由于他们的态度不同而得到了不同的结局。有的做了战俘，如陈宏谟、郭仲容。郭仲容回重庆后，当了绥靖总队长。重庆解放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关在战俘看守所。由于他在延安时顽固反共，还将朱总司令送他的《抗日手册》当手纸用，所以一旦被共产党俘虏，他内心自然十分恐惧，整日闷闷不乐。他还担心家里的妻子、孩子无法生活，担心两个成年的女儿会堕落。其实，他的两个女儿，在解放后都参加了工作。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并不相信。直到他的女儿去监狱探望，亲口告诉了他，他才消除了怀疑。郭仲容后来特赦回重庆工作，改造得不错。有的逃到了台湾（如徐佛观），有的至今下落不明。

正面宣传 求同存异

在交际处接待的外来宾客中，有政治态度先进的、中间的，也有落后顽固的。那些比较先进或中间的客人，态度友好，谦虚诚恳，容易看到我们的优点，接受我们的宣传。而那些落后顽固分子，往往抱着成见，甚至抱着敌意来到延安，他们之中有的含蓄，有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出言不逊、吹毛求疵。对这些落后顽固分子，我们并不急于与之辩论，更不当面争吵，而是采取以礼相待、正面宣传、求同存异，用事实进行反驳和教育的方针，最后达到分化、争取他们的目的。

一九三八年八月，我们对国民党赈济委员的接待，就是灵活运用这一方针，取得成功的典型。

一九三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下属的赈济委员会，派出以曹仲植为首的五名赈济委员，携十万元赈济款，前来我边区放赈。当时处于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真正承认我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但其主旨还是与我合作抗日。所以，不能不作出与我搞好关系的姿态，派些赈济委员出来，携款到边区来救济灾民。

这次来边区放赈的赈济委员，除带队的曹仲植外，成员还有郝瑞真、韩天耀、董承荫、李崇庭。另外随行的还有曹仲植的秘书李振鹏，曹的弟弟、《国民公报》记者曹觉民。

在这个团体中，对我态度比较友好的，有郝瑞真、韩天耀。郝瑞真是一位有爱国心的国民党进步人士，^⑤一贯主张国共团结，枪口对外。韩天耀是孔祥熙的外甥，当时还是一青年，政治上对我无成见，较为尊重事实。

表现落后顽固的，主要是曹仲植、曹觉民兄弟。曹仲植是行政院参事，CC分子，一贯做赈济工作。曹觉民也是个搞特务活动的人，内战时期曾在绥德师范和榆林中学当过教师，专门于破坏学生运动的坏事。

据郝瑞真告诉我，他们七人动身前，西安财政厅长王德圃跟他们谈过一次话。王德圃在一九三八年春天曾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行政工作考察团访问过延安。当时，我们对他的招待很优厚，为满足他的要求，我们曾安排他四次会见毛主席。在事实的教育下，他当时确有些转变，在该考察团内的国民党左派分子推动下，还说过一些好话。可是后来又受顽固派分子、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支配，态度逐渐倒退。他这次找曹仲植等谈话，是要以先入为主的手段，通过对我边区的歪曲，使曹等来延之前就产生成见。他竟信口雌黄地说，毛主席在和他谈话时，并没有把土地问题解释清楚。还污蔑说，共产党只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国民党好，此外都不好。国共合作将来一定要破裂的，以后国内问题还要流血。其实这正是蒋鼎文等顽固分子的打算。

曹仲植等赈济委员们到延安后，我们当作重要团体，隆重接待，给予种种优待和方便，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亲自出面与他们商讨放款的实施方案。

高自立同志向他们提出：（一）为了避免他们采取当时绥德反共专员何绍南的办法，以把赈款直接发给“灾民”的名义，实际上把赈款主要发给地主富农分子，甚至发给内战时期已被农民

打倒的土豪劣绅，搞复辟活动，我们主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即以此数目不大的赈款开办难民工厂，吸收真正的灾民参加劳动，这样做既可解决灾民的生活困难，又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救济更多的灾民，保持固定的生活来源。（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紧急救灾，于赈济委员到来之前筹集过四万元，并发给了灾民，现在中央政府既出款赈济，则应另拨四万元归还边区政府银行，或从这次的十万元中扣除四万归还。

曹仲植等经过讨论提出：一、陕甘宁边区政府过去已发给难民的四万余元救济费，既然已由边区政府筹付，则只好由边区政府负责，不能在这十万元赈济款内扣还。二、他们五人拟与边区民政厅长、曹力如秘书长等设立一委员会来管理此款的使用。三、边区政府提出的放款计划要缩小，只能缩小到合于十万元的数目之内，行政院赈委会不能再给增加。

经过双方磋商后，最后决定将这笔赈款用于开办难民工厂，其中有纺纱厂等。

在办理放款工作之余，赈济委员们由交际处工作人员陪同，对延安和边区进行参观考察。在这些参观考察活动中，曹仲植抱着成见，到处挑毛病。他读了我们的报纸说：《新中华报》每五天才出一张，每一张还要把磨擦的问题写得这样多，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都写上了。”又说，西安方面的一切磨擦就是由《新中华报》的文人舞文弄墨搞出来的。他在参观时看到肮脏的地方，就大加歪曲诬蔑：“共产党就是住惯了这样的地方。”

我们曾请他们出席了一次延安各界欢迎从前线回来的朱总司令的大会。当朱总司令与滕参谋长下车后步入会场时，曹仲植等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故意坐在一边不动，结果朱总司令没看到他们，只和林老、肖劲光、徐向前等将领及边区政府各厅长

打招呼，没招呼曹等人，曹仲植就很不满意。参加鲁艺的晚会时，对没请他们到前面去坐，也口出不逊之言。

曹觉民更是肆无忌惮。在路上看到衣衫褴褛或面黄肌瘦的人，他就赶快打开照相机拍照下来。而我们好的地方，如鲁艺、大礼堂及群众欢迎朱总司令归来的热闹场面等等，他却视而不见，很少拍照。他刚到时就关照他不要拍宝塔山城廓地形，但他却偷偷地将嘉岭山的宝塔拍下来寄到外面去发表。他和曹仲植一样，把一般的信都交我们托人带去西安，而重要的电报、信件则都是加封盖印，亲自到电报局、邮局去发。

在一次下乡的途中，曹觉民看到墙上的一句用简化字写的标语：“拥护国民党抗战建国的纲领”，就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你们看，国民党的国字就剩了一个框子，国字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这个国还有什么用呢？”接着公开挑衅说：“这条标语倒是个好材料！”

然而不管他们多么出言不逊，态度蛮横，我们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为了使他们能经过参观访问后消除成见，对我们能有一公正的了解，我们仍然以礼相待。我们采取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正面宣传，用事实说明问题的方针，经过耐心的工作，终于使那几位态度不大友好的赈济委员在事实面前态度不得不有所改变。如曹觉民写的文章《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在内容方面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是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报道。后来曹氏兄弟还分别捐款给鲁艺及文协，虽然数目不大，总还是表达了他们有所转变的心意。在离延返西安时，曹觉民还向我们表示他以后还要来呢。

点验委员的“轻松任务”

国民党军政部下属的点验委员会是一个监督核实军队人员编制及枪支弹药情况的机构。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普遍存在着吃空额和冒领武器的现象。为了多捞“外快”，那些基层部队的长官们串通起来，当点验委员们下部队按花名册点名时，他们就利用各个连队互相调人顶替的办法去参加点名。有时，因为顶替的士兵忘掉自己的假名而闹出许多笑话。为此，点验委员们大伤脑筋，他们“核实”的人员数字总是水分很大，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相信。更何况有的点验委员还和部队的头头勾结在一起，填塞自己的腰包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军政部第二战区也派了几名点验委员到我方进行点验。领队是军委会点验委员会主任林大木将军。他是辽宁人，原是国民党中央军四十四师旅长。抗战后，自己的队伍打光了，就当了点验委员。林大木还是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团结抗战的，但为人处事比较圆滑。这次被派到延安来执行任务，十分高兴。其他委员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高级参谋段树筹，军政部的咨议李博融和赵士杰，军政部科员刘克刚。

他们来延安之前，先到绥德等黄河沿岸的几个县，对我驻军进行点验。点验时，他们对部队的人数和枪支数并不十分感兴趣，而对武器弹药的来源却十分注意。当他们看清我部队使用

的枪支都是国产的“汉阳造”和缴获日寇的“三八式”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用的不是苏联提供的武器。

他们来后，我们象招待所有重要客人一样举行了欢迎大会。林大木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对我们倍加赞扬，他说，“在前线点验结果说明，军民都能亲密合作，尤其是八路军的军民关系做得最好。在别的地方只有工作，还不见得做得好，而在延安，工作、学习和生产都在同时进行。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主要由于政治领导的正确。以这种精神干下去，收复失地一定不成问题。”

在延期间，肖劲光、莫文骅等同志会见了他们，对他们来点验表示欢迎，向他们介绍了我军情况，并指示有关部门积极协助其工作。林大木等对此很感谢，他们也清楚国民党统帅部给我们的编制只有四万五千人，而我们已发展到了八万人，根本不存在国民党军队吃空额的情况。因此，他们来后只留了两天，在我八路军留守处填了几张表格就满意地走了。他们称这是一次“轻松愉快”的任务。

“一点忠心”

——记续范亭同志

一 向毛主席紧急报告

一九三九年五月，延安城洋溢着春光。一天，我正在交际处和同志们讨论工作，忽然中央统战部的一位通讯员跑进来，交给我一份我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办事处发来的电报。

电报来自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在那里。我展开电报纸，只见一行清晰的字体：续范亭将军即日到延。

“啊，续范亭要来延安啦！”我兴奋得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这一声喊，顿时引起了在场的工作人员的热烈反响。同志们争相传看电文，窑洞里充满了喜悦欢快的气氛。

我知道大家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的热忱，是因为续将军在西北是以抗日坚决、思想进步、靠拢共产党而著称的。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而在我，却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记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正在香港做国民党内抗日反蒋人士李济深、陈铭枢等人的工作。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何等的黑暗和令人窒息啊！“九一八”事变，日寇将我富饶的东三省侵吞；“一二八”事变，日寇又将战火烧到我国的东大门——上海；一九三三年初，日本侵略军的魔爪

更进一步伸到我华北地区……眼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我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全国人民无不悲愤满腔，愿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拼死在抗战的疆场。中国共产党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代表，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而独夫民贼蒋介石，却一意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和不抵抗主义，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和抗日力量。我当时在广州和香港，深深地体验到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愤恨和压抑。突然，象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顿时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闷，报纸上传出了“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军总参议续范亭在中山陵剖腹自杀，希冀以一死惊起国人的抗日意志”的消息。这在当时的广州和香港，发生了巨大的震动。那一时期的报纸，不分左、中、右派的，每天以显著位置、大量的篇幅报道续范亭忧国自杀的经过，各种评论、病况报告和续范亭的《绝命诗》等。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从人们的脸上和言谈中可以看出，振奋、向上、决心抗战的情绪正在迅速上涨……当时我想，象续将军这样勇于为国捐躯的人，若能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就好了。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见续将军一面的渴念。没想到四年之后的今天，续将军真的来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尽管是路过），而我几年的渴念也将如愿以偿，这是共同抗日的“缘分”啊！

当天下午，我随同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等，到延安南门外大路上迎候。

续范亭带着他的几个随从人员骑马到了。我们迎上去，与续将军亲热地寒暄。只见他又黑又瘦的长脸上，闪动着一双坚毅敏锐的眼睛；垂直的鼻梁和宽厚的嘴唇，显示出他忠诚、刚毅、慷慨的性格；他身材修长，紧束着一身二战区军官的军装，外披一件“一口钟”（国民党军官骑马披的皮斗篷），显得英姿勃发。

他说一口带着山西口音的官话，用词十分文雅，确有些儒将的风度。

我们相互问候之后，就由我带续将军一行到交际处的窑洞里休息。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政府秘书长曹力如、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等在新市场机关合作社设宴，为续范亭洗尘。

我原以为续范亭一定会在宴会上即席演讲，报告前方抗日的种种战况、进入边区以来的观感或是表达抗日到底的决心。没想到他却一直沉默。从他的神态来看，似有严重的心事压在心头。这种忧虑、苦闷、沉重的情绪，影响了整个宴会的气氛，大家似乎也感到一种沉重的压力。

续范亭为什么如此忧心忡忡呢？我当时很纳闷，心里猜测着。我想起三个月前，即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战区准备在秋林镇召开一个“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当时很多晋绥军的高级官员都在西渡黄河后，绕道延安转赴秋林。如北路军总司令杨爱源、军长孙楚、师长郭宗汾等。我边区政府都予以热情地接待。毛主席亲自出面为他们设宴洗尘。还在陕公大礼堂开晚会欢迎他们。而作为第二战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的续范亭，却既不与杨爱源、孙楚、郭宗汾等人同行，也不按照他们的路线行走，而是独自过河后就直奔秋林。估计这次会议结束了，续范亭又是单独行动，这里面可以看出续范亭与旧军军官格格不入的端倪。

我又想起续范亭自回山西工作后，确实与我党十分接近。他曾任我党倡导成立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主任委员。共产党员南汉宸、程子华分别担任这个组织的组织部长和武装部长。“动委会”在党的领导下十分活跃地开展工作。续范亭全力与党合作，在晋西北二十

九个县建立了抗日武装，蓬勃发展的气势使阎锡山惊恐不安，竟下令解散“动委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阎、续之间的矛盾。

然而，续范亭对我党的认识究竟怎样？他此次来延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如此郁郁寡欢？对我来说都是个谜。

我一面在脑海中翻腾着种种疑问，一面频频举杯慰问着我们热忱欢迎的客人。

宴会很快就结束了。

晚上，我来到续范亭住的窑洞，征求他对留延期间活动安排的意见。他严肃、郑重地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单独拜会毛主席。”

我说：“我一定把您的要求向毛主席转达。除此之外，您还想参观哪些地方？”

续范亭想了一下说：“就参观参观抗大吧。”他见我脸上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急忙解释说：“虽然我对延安向往已久，希望多参观一些地方，无奈军务在身，不便久留，望贵政府能体察。”

第二天，续范亭在交际处联络科长石锋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抗大。罗瑞卿同志亲自接待和作介绍。续范亭仍心事重重，不多说话，也不多活动，匆匆地参观了一下，即返回交际处等候毛主席接见。

这天下午，毛主席的一个副官牵着马来到交际处，接续范亭去见毛主席。续范亭高兴地骑上马，随副官向杨家岭驰去。

这次会见的时间很长，直至晚饭后，续范亭才从杨家岭返回。这时他的神情大不一样了。脸上的阴云一扫而光，眉宇间露出如释重负的快慰。他对我说：“我的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了，现在我可以回前方了，请你尽快安排我的行期吧。”

当时李公朴先生正在延安，他在党的赞助下，组织抗大、陕

公、鲁艺等学校的十几名青年，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准备到晋察冀边区去活动。续范亭会见了李公朴，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续范亭邀请李公朴和抗战建国教学团先到晋西北前线去。李公朴欣然答应，于是两人约定结伴而行。

出发的头一天下午，我向八路军兵站要好了一部卡车，同时用电话通知了曹力如、曹里怀两同志。第二天拂晓，太阳还未露头，续范亭和随从人员即整好行装，走到新市场口的道路上等候。天亮时，兵站派来的卡车到了。住在西北旅社的李公朴也来了。准备走的人和送行的人差不多都来齐了，可就是不见曹力如和曹里怀来。我看看时辰已晚，就决定不再等下去了。我们分手告别时，立于车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我这段回忆的佐证。

续范亭、李公朴一行人乘坐着卡车开出延安，沿公路经延川、清涧、绥德，直到黄河岸边的碛口。

大约在六月下旬，我到边区政府开会时碰见曹力如，就问他：“续范亭走的那天早晨，你和曹里怀为什么一个也不出面送行？”

曹力如说：“我们是特意不出面的。这是为了保护续范亭，免得太张扬，引起阎锡山的注意。你知道吗？续范亭这次来延，向毛主席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情况——秋林会议情况。”

接着，他把秋林会议的大概情况向我介绍了一下：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布置投降反共的重要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指蒋介石）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又说：“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情势，我们要看得清楚。天快下大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他还提出

了“走上抗战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所谓“走上抗战最高峰”，意即抗战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以后就该往回走，即妥协投降了。所谓“无条件存在”，就是“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阎锡山的一系列反动言论和措施，自然引起与会的新军干部和进步组织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于是会上形成了以薄一波、续范亭等为中心的“决死队”、“牺盟会”和大部分专员、政工人员组成的抗日进步力量阵线，和以王靖国、邱仰浚、薄毓相为中心的旧军和一部分旧行政人员组成的追随阎锡山的顽固落后力量阵线，双方发生激烈争执。续范亭多次慷慨陈词，号召团结一致，抗战到底，严厉地驳斥了那些妥协投降派。并曾站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向大家朗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续范亭已经看出，阎锡山是下决心要反共投降了，于是他借口前方吃紧，脱身离开秋林，专程绕道延安，向毛主席报告。

曹力如告诉我，续范亭的报告对毛主席分析目前形势的特点和今后抗战的前途有着重要价值。就在续范亭走后不久，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投降提纲”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毛主席特别强调，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投降妥协的主要原因。主席还指出，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两种可能，第一种——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种——大部投降，小部抗战。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需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估计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应是：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

各种大小事变。并应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露和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继续坚持抗战到底。

听了曹力如传达毛主席的“反投降提纲”的精神，我才真正对当时形势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也明白为什么续范亭此次单独行动、来去匆匆又忧心忡忡。尽管秋林会议有我们党的同志参加，八路军驻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办事处也在收集秋林会议的情报，但毕竟因他们的政治面貌和所处地位的缘故，被阎锡山加以限制和封锁。而续范亭以“老国民党员”和“山西圈子”里面的人的面貌出现。尽管言论很倾向共产党，但阎锡山对他提防毕竟不同于共产党员，所以续范亭能得到更多、更机密的情报。他的行动也比较自由，阎锡山限制不住他。所以他能及时地把情报送到延安。从这点来说，续范亭向毛主席的报告作用是很大的。

因为这是一件绝密的事情，所以续范亭在同我的交谈中并未透露此事，反而故意说一些模糊的话。直到曹力如向我传达了事情的真相，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续范亭是我们的真朋友啊！

二 “愿得有人暗自慢点头”

续范亭回到晋西北以后，继续与阎锡山的反共投降阴谋作斗争。

当年十二月初，阎锡山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十二月政变”。其部署是先令其旧军在晋西、晋东南进攻新军，与此同时，又在晋西北令其骑兵司令赵承绶召集各地旧军，举行临县军事会议，策划消灭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彭绍辉部和晋西北的抗日武装。续范亭中途逃会，策马飞奔岚县向中共晋西北边区党委报告，并毅然率领暂一师阻击阎军。暂一师、三五八旅和决死四纵

队抢先占领临县、方山、岚县交界处的军事要地赤尖岭，并召开军事会议，商定了作战方案，成立了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临时总指挥。从一九四〇年元旦开始，在续范亭与各方协同指挥下，新军英勇作战，终于在一月十四日攻克赵承绶司令部所在地临县。这次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晋东南和中条山区八路军各部的战斗，取得了粉碎阎锡山“十二月政变”、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大胜利。

临县战役胜利后，一月十六日山西新军总指挥部正式宣告成立，续范亭连任总指挥。二月，晋西北边区行政公署在兴县成立，续范亭被推选为行署主任，并被延安总部任命为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在晋西北根据地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护了三五八旅和新军，无愧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续范亭本来就患有肺病，经中山陵剖腹后，身体更加羸弱。晋西北的紧张的战斗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他痼疾复发，病情沉重。党中央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指示他们尽快地将续范亭护送到延安医疗。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续范亭终于离开晋西北的战斗岗位，来到延安医疗休养。

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予他细致入微的关怀和照顾。他先后在延安柳树店国际和平医院和枣园就医和休养，得到医术高明的苏联医生阿洛夫、米洛夫和美籍医生马海德、中国肺病专家何穆、内科专家鲁之俊的精心治疗。数月之后，他的病情有了显著的好转，健康状况趋于稳定。为了使他得到一个安定、优越的养病环境，中央办公厅决定将他转到我们交际处来。

记得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冬之际，我接到枣园中办的通知后，

欣喜万分，为能与续范亭朝夕相处而感到荣幸。当时我们交际处只有几孔窑洞，一般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住在窑洞里，靠烧木炭取暖。在窑洞前面盖有两间朝南的平房和一个小院。这两间平房砌有地炕。在屋外东侧烧火，热气和烟经地炕道流出西侧的烟囱，使室内十分暖和。续范亭作为一个病人和重要客人，被我们安排在这两间平房里。

续范亭来后，对这个住处和周围环境非常满意。他住在东屋，警卫员住西屋。因他爱围火炉烤火，并有常烧一壶水的生活习惯，又在东屋给他添上一个火炉，这样屋子里就更暖和了。他在一首诗中形容这个环境说：

城南有茅屋，结构在西坡；
沽酒临北市，汲水下东河。
有时读马列，有时学静坐；
偶尔为诗赋，兴至亦高歌。
室雅何须大，好友不怕多；
我居近大道，远客亦时过。

.....

续范亭酷爱读书。他通晓中国历史，尤爱研读古代哲学。自来交际处后，他全力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革命领袖的传记和延安出版的报刊、书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逐步抛弃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武装自己的头脑。从他所写的诗《读列宁斯大林传有感》、《读马列主义辩证法有感》、《学习二十二文件有感》……就可以看出他思想变化的痕迹。同时，这一时期我党领

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贺龙师长、肖劲光主任以及延安五老中的四老——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经常来看望他，和他谈心，对他的思想变化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九四二年二月间，毛主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延安的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在高级干部中展开。那时交际处的从大后方来的客人比较少，我工作不算忙，就经常到续范亭那里去聊天。我们从古到今、天南海北地漫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从年龄和斗争经历来说，我们相差了一代，但由于共同的信念和志趣，我们又成了忘年的朋友。当然更多的时候，续范亭之于我是师长，我则常常以学生和晚辈的诚心向他学习。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四三决定”传达后，延安各机关投入了整风运动。掀起了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必读文件的热潮，续范亭积极地置身于整风运动之中，热情学习和赞颂二十二个文件。他写道：

革命二十二文件，党内党外齐学习，
今日先用紧火煮，今后常须慢火炙。

又写道：

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
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
厨师费匠心，消化全凭你；
本是百年粮，贪多怨自己。
出身小资产，遍体多油腻；
湖水涤难尽，延河洗不去。
二十二文件，是我新武器；

革命称至宝，应比匕首利。

这两首诗，他都托我转呈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他的诗后，很高兴，来交际处找他谈心。续范亭兴奋地对毛主席说：“这二十二个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我们党的作风一年之后一定会大变。”

主席却笑着说，我可没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的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象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这个比喻是说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运动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

毛主席的一席话，使续范亭思考了很长时间。几天以后，续范亭对我说：“上次毛主席的谈话，对我启发太大了，我真犹如茅塞顿开。这两天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联想很多。的确，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的阶级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同。就拿赵承绶来说吧，他是我的老乡，和我从小在一起长大，但由于我们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虽是二十多年老朋友，但世界观却大不一样。一九三八年我见到

赵承绶夫妇时，赵的老婆伤心地对我说：‘五台的老家里存的三百床崭新的被子，给日本人抢光了。价值一千多元的洋狗，也给日本人打死了。埋藏在地下的银钱财物，还不知道在不在了。’赵承绶也告诉我说：‘我的家产是完了，北平的也没有了，大同的也没有了，绥远、太原、五台的家都没有了。现在只留下现洋六十万元，俭省一点，可以过几年。’你看看，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想的是献出一切来进行抗战。中国大批土地失去了，人民流离失所，苦难深重，而象阎锡山、赵承绶这样的军阀、财主，却还在念念不忘他们剥削来的财产，思想感情是何等的不同啊！

“再说我们山西的老财吧，不知你听说过没有，简直叫你想不通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钱。他们同上海、天津的大资本家不一样。大资本家喜欢挥霍钱，或拿出去不断扩大再生产；山西老财可不行，爱财如命，平时省吃俭用，一毛不拔，把钱攒起来往地里埋。今年算算十万了，明年算算二十万了，心里就舒坦，象吸大烟一样有瘾，而且瘾越来越大，搞了钱舍不得花，还想一代一代传下去。假如我们跟他们讲，搞那么多钱没用，人活着要有爱国心、事业心，那无异于对牛弹琴，是根本不通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改变起来就很难。所以毛主席说思想建党最不容易，这是千真万确的啊！

“再拿我来说吧。我出身于中农家庭，在旧军队中过了大半辈子。我对旧社会的很多东西就习以为常。比如女人小脚，你们看了一定会感到反感，当然也怜悯。而我看着就很习惯，不觉得难看。我也知道天足好，裹小脚是不对的，但就是积习难改。这就是思想感情的差别嘛。中山先生说过：我们的敌人有比帝国主义还要厉害的东西，就是社会的旧思想。列宁也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

续范亭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他新作的一首诗，题为《积习难去——认识与改造》，诗曰：

革命大敌谁为最，人类积习最难去；
明知前面是光明，依然迷恋旧社会。
认识世界固不易，改造最难是积习，
社会多少罪恶事，大海沉浮不自觉。

续范亭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每次和毛主席谈话，他都感到受益很深，耳目为之一新。所以他很自然地把毛主席看作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发自内心地写诗歌颂他。

一九四二年春，我陪同他到毛主席的住处谈过话后，回到交际处，续范亭拿出了《赠毛主席》诗给我看，并一句一句地讲解给我听。诗是这样的：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续范亭解释说：“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最好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方针政策。他不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但是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是对干部、战士、勤务员，还是对普通老百姓，他都平等待人，推心置腹，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所以我说他‘领袖群伦不自高’。毛主席是知识分子，博大精深，满腹经纶。从外表看，他文质彬彬，完全是学者风度，但他实际上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只有毛主席那样大胆的政治、军事谋略家，

才能在双十二事变时力主释放蒋介石；才能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两个反共高潮中，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第二句是‘静如处子动英豪’。第三句‘先生品质难为喻’，的确，拿毛主席比喻历史上哪个人好呢？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历史上一切伟人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有句名言，当一名记者问斯大林，列宁同彼得大帝相比，谁更伟大时，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说列宁是大海的话，彼得大帝就是苍海之一粟。所以我说‘先生品质难为喻’。我曾想把毛主席比作刘邦的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但还觉得不够全面。所以这首诗的前面三句我早就想好了，可最后一句想了几天，最后才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是杜工部赞颂诸葛亮的，是《咏怀古迹》中的一句。原诗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这里面，‘万古’一句，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前而又甚高。用诸葛亮比喻毛主席，还是不够的，但想不出更恰当的比喻，只好这样了。”

续范亭歌颂毛主席的诗，不也正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吗？

一次，在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后，我向续范亭谈了党内的某些教条主义者的哗众取宠的学风的问题，我举了王明的例子。

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以“理论家”自居，演讲时把马恩列斯的话背得滚瓜烂熟，口若悬河。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象开了个中药铺。一次，他在延安女大作报告，这位校长竟对学生们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很低，今后还得靠你们这些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如你们高呢！

大家知道党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斯大林接见大会的代表团，当时我担任斯大林的翻译，有人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中国究竟得杀多少土豪劣绅，革命才能成功呀？”你看低到了什么程度！王明的讲演掠取了学生们的大鼓掌，甚至有某些青年学生很崇拜他，说他是中国的“理论家”。

续范亭听了我的叙述，十分气愤，说：“这恰恰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批评的‘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这就叫‘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我看毛主席说的那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送给他最合适，就是他这种人的深刻的刻画。”停了片刻，他又深沉地、意味深长地说：“一个人讲话、做事，不求群众当面大鼓掌，愿得有人暗自慢点头。”

过后，续范亭以此次谈话内容为题，写了一首寓意深刻的诗：

不求一时乱拍手，要使将来暗点头。

不求一时多鼓掌，要求将来少摇头。

这首诗曾由我转呈毛主席，后来收入了续范亭的《延水集》诗集。

续范亭初来交际处时，他的女儿续磊尚未从西安来。他十分想念女儿。有一次我去找他，他刚好看完延安平剧院演出的《打渔杀家》回来，他心情不平静地说：“这个戏编得很好。萧恩父女杀渔霸的一节特别感人，你看那萧桂英多爱她的爸爸，萧恩要去杀渔霸，女儿说我也要去。父亲说，儿啊，爹爹是去杀人的，你去没有用呀。女儿说，孩儿就是站在一旁为爹爹壮壮胆也是好的呀。父女两人走在路上，女儿突然想起家门尚未锁好，想

返回去锁门。父亲说：孩儿真不懂事，哪还用锁门呀……”

续范亭说到这里，眼睛湿润了。他又说，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还没有懂事，爸爸在前方打仗，干的是什么事，怎么干的，他们哪里会知道啊。

续范亭由于想女心切，竟把思念之情转移到我的小女儿金戈身上。那时交际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工作人员的子女不准到客人那里去。但续范亭却拉着金戈“交朋友”，每天给她三个板栗吃。渐渐成了习惯，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由金戈来看望他，他则预备好三个板栗，放在火炉上，让金戈拿走。一天，毛主席来找续范亭谈话，正谈话间，金戈推门进来了，续范亭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大家都忙，不能经常来看我，只有这个小孩子天天来一趟，我就每天给她三个板栗。”毛主席笑了，幽默地说：“这个孩子很懂党的策略方针，有‘礼’（理）、有‘栗’（利）。 ”

续范亭就是这样一个感情深沉、丰富的人。

三 “一点忠心”为人民

一九四二年五月，续范亭离开了交际处，先到枣园和杜甫川住了一段时间，又于七月中旬同朱总司令以及徐、吴、谢三老等一起到南泥湾休养。他在《南泥杂咏自序》中记述说，南泥湾“地沃林广，已成延安资源之区；山深气清，更宜休养，予拟作三月之居，养病亦养性，诚佳境也。”杜甫川和南泥湾固然空气新鲜、环境幽静，但又未免冷清和寂寞。而续范亭是个不甘寂寞的热心人，胸中沸腾着炽热的革命激情，不能忍耐“山静如初古，日长似小年”的生活。虽然，朱总司令、贺龙、林伯渠、吴玉章、南汉宸等

经常去看他，但比起他在交际处时却冷清得多了。过去他在交际处时，从晋西北前线来延开会、办事的人接连不断。他们带来前方反“扫荡”胜利的消息和熟人们的近况，还带来续范亭爱吃的豆面、油面、油梨，有时还有板栗。续范亭每每留他们一起吃饭，嘱咐交际处食堂多炒两个菜。他常常得意地向客人们说：“大生产运动，我也大丰收了，你们猜猜我的收获是什么？”客人们看到他的房间里养着一大盆大蒜，就猜着了。此时他那小屋里充满了朗朗笑声，十分活跃热闹。

而在南泥湾和杜甫川，因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人们来一趟不容易，来看他的人相对就少得多。他在诗中写道：

高峰勒马意徘徊，西望云霞斗五彩；

闻道延安多集会，良朋不至秋风来。

又在《桥头望王震同志与谢洛夫老友不至见一老牛负重而来》一诗中写道：

久候不见王旅长，同时不见谢洛夫；

老牛从容桥上过，不加鞭策奔前途。

可见他思念战友和渴望战斗生活的心情。

续范亭虽然是一个养病的人，但他一时一刻不忘抗战事业，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和变化，关心从前线传来的各种消息，并不顾自己衰弱的病体，积极为党作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十分关心交际处的工作。每当交际处有客人来，凡是他能说上话的，他都尽量出来帮助我们作争取工作。由于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特别是在晋、陕、甘的西北地方部队中威望很高，所以由他出来说话往往能起到我们起不到的作用。

如一九四三年六月和十一月，邓宝珊两次过延安，续范亭都特地住到交际处来，做邓宝珊的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春，续范亭已转移到绥德，还在病床上支撑着写了一封致邓宝珊的长信，告诫他“再不能对蒋介石有一点幻想了，如果再为他效力，不是罪恶也是愚人。”还附去《送邓宝珊将军》诗二首：

其 一

立场不定求真理，差以毫厘谬万里；
羞为权门称大将，原来穷汉是知己。

其 二

厨师不用夸，先看炒腰花；
将军不用夸，先看为谁打。

这些净言和殷切的规劝，对后来邓宝珊毅然放弃反共立场，为和平解放北平及绥远而奔走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起义，飞来延安，住在我交际处受到优待。一次，刘善本和同机起义的飞行员张受益、唐世耀向我表示，他们很敬佩续范亭，希望能见他一面。我就陪同他们三人到柳树店和平医院去会见续范亭。这一天天气很好，夏风习习，当我带着三位飞行员来到续范亭住的窑洞前时，续老早已等候在门外的平台上，于是我们就坐在大柳树下谈话。中午，续老请三位飞行员共进午餐，就在大柳树下摆上饭菜。当厨师端上一盘炒腰花时，续老即兴吟诗：“厨师不用夸，先看炒腰花……”这首诗他先是赠给刘善本的，后来又以之赠给邓宝珊。

续老为了鼓励刘善本，还曾写诗曰：

眼光远大，决心坚定，
方法巧妙，技术高明。

并在诗后写了一个注：“飞将军从天而降，增加了人民阵线的羽翼，打碎了魔头蒋介石的内战祸心，这是第一等的爱国行动，开辟了中国航空界的新纪元，书奉敬爱的英雄刘善本将军。”

一九四五年十月，老西北军将领高树勋在邯郸起义，成立民主建国军。第二年，高树勋先派聂志超、后派范龙章分别率领两个民主建国军参观学习团来延安参观学习。民主建国军参观团的军官们，大多数是西北军旧部，自然对老前辈续范亭十分景仰。他们在交际处的组织下，曾分批到柳树店晋见续范亭。续范亭都以西北军的革命传统和自己的亲身感受，谆谆开导他们。

一九四六年十月，榆林二十二军胡景铎将军，率五千余人在横山起义。续范亭闻讯格外兴奋与激动，因为胡景铎将军是他的老朋友、西北民主革命先烈胡景翼的六弟，而且这支起义部队又是老西北军的一部分。他当即在病床上给胡景铎和全体起义官兵写了一封贺信，并由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他在信中写道：

“欣闻将军等拒绝蒋、胡乱命，退出内战，举行起义，誓充人民公仆，不为蒋氏奴才，忠贞为国，曷胜兴奋。”“我西北军自辛亥革命以来，即以反专制争民主之革命传统精神著称，此次义举，更使其发扬光大。”“国内人心所向，独裁好战，必然失败；和平民主，终必实现……”

不久，胡景铎率部分起义部队干部来到延安，住在交际处。一天，胡景铎带着胡景翼之子胡希仲，在起义部队政治部主任范明和我的陪同下，到柳树店拜会续老。见到胡景铎和胡希仲，续

范亭就想起胡景翼，想起他们在艰险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所以续范亭慨然挥笔命诗：

忆胡老大

革命英雄关内胡，将军一怒失曹吴；
欢迎总理践前约，风雨八方集豫州。

赞胡老六

关中豪杰胡景铎，意志如钢最坚决；
革命诚无愧乃兄，义旗高揭横山缺。

续范亭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他对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本质和累累罪行了解得很透彻，因此他对蒋介石、阎锡山之流的揭露特别深刻，对他们的批判更是击中要害，入木三分。在延期间，他在伏枕咯血之中，忍着巨大的病痛，写了《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三年不言之言》、《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等许多文章和诗篇。这些诗文，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罪行，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给人们以鼓舞的信心，一时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所传诵。

正因为续范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所以深得边区人民的信任和爱戴。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五年，续范亭连续两次被晋绥边区参议会推选为行署主任，一九四五年他还被推为中国人民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然而可恨的病魔一直死死地缠着他，使他不能施展宏才大略，以酬壮志。

有一次，我同周子健、申伯纯一起到柳树店去看望他。他听说我要来，竟一夜没睡好觉。他住在村子后面一座新建的窑洞里。室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草书的题字：“土积而成阜，水积而

成河海，行积而成君子。”另外，还张贴着一些他随手剪裁下来的诗词。住室前面，靠窗户有一株柳树，树下有一个可以坐息的平台。续范亭告诉我说，医生常常把他抬到柳树下，让他呼吸新鲜空气和静养。续范亭感慨地说：“我是进了‘柳下学堂’，学的是‘不言科’。”他说他曾写信给关向应交流养病经验，还附去七言诗一首：

少年曾为拔剑歌，何期病肺卧山河？
于今才得养生术，柳下学堂不言科。

他由于肺病严重，经常咳嗽、咯血，说话时气喘得厉害，声音很微弱。他本不该多说话的，但此时老友相见，他兴奋不已，瘦削的面颊上现出红晕，竟开怀畅谈起来。

他动情地对我说：“你们浙江杭州真是人间天堂，那风景妙不可言。不但风景好，而且名胜多，象岳王坟、戚继光纪念塔、秋瑾墓，我一九三六年在杭州养病时都有诗作。西子湖风光，自古以来诗人们吟颂不已，但有些美妙处，却未见有人写出来。比如青年女子在湖畔洗菜淘米，当米浸到水里以后，洗米水扩散开，白条鱼立即围过来吃，真是情趣无穷啊！我曾以此为诗：‘湖滨二八女，洗菜复淘米。鱼水久相忘，群来争粒许。’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一定再到杭州去住一段。”

“好哇，到那时候我一定陪同你一道去，还要用我的家乡特产好好招待你。”我深情地说。

续范亭笑了笑说：“当然，我们山西也是个好地方。太原的晋祠就很有名嘛。我的家乡崞县，光水浇地就有十八处之多！我们那里生产的有名的崞县梨，很嫩，很甜，胜利以后，我先要回家乡去看看……”

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整个思绪都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对革命前途的信心、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四七年初，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夕，党中央派人将续范亭等人疏散到绥德，不久他们又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临县，先后住在后山村、甘泉村和都督村。当时，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诸位老人也来到晋绥解放区，住在甘泉后村。几位老人不断到前村来慰问续范亭。

一九四七年三月，我带领交际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四月间经绥德渡过黄河，辗转来到山西临县崔家坪。不久，我奉西北局的命令，去晋绥作处理西北军区所属部队俘获的敌军军官的工作。这一时期，我和续范亭虽然同在晋绥，但因我工作繁忙，顾不上看望他。然而我时时刻刻在惦念着他，尤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担忧。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我们“解放军官团”处理完一批俘虏，暂时得到一个工作的间歇。我决定回交际处看看情况，并顺路看望我思念已久的良师益友续范亭。大约在十月十天左右，我与周子健等人同行，我们骑马从兴县出发，一路快马催鞭。在路上，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亦称《双十宣言》）。《宣言》庄严地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宣言》顺应民心，发出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读着这振奋人心的文件，兴奋地打开了话匣，从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一直谈到自己熟知的革命烈士，多少年，多少代，多少先烈英勇牺牲，多少战士前仆后继，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大好局面！天，就要亮啦！我想到续范亭此刻一定也读到了这个文件，他的感

触也许会比我们更深，说不定这会儿正百感交集地挥笔赋诗呢！

越接近续范亭住的都督村，我的心情越发急切、激动，我焦躁地拼命挥鞭策马，直把马打得浑身流汗，四蹄生风，我自己也累得汗水湿透了衣衫。

终于到都督村啦。这是一个较大的村落，房屋、窑洞都较好，树木茂盛，庄稼茁壮，看来是个比较富庶的地方。

走进村里，正好看见续范亭的秘书金树望同志。我高兴地打招呼，向他说：“快去告诉续老，我们来啦！”看到金树望迟疑了一下，我又急切地问：“续老的病怎么样啦？好点没有？”

金树望低下头，半晌才说：“他……已经死了。”

“啊！”我惊叫了一声，汗淋淋的头上好象挨了闷棍，似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跟我来。”金树望说着，将我们领到续范亭所住的院子里，向灵柩告别。院子正面向南横着五孔窑洞，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平房，当时刘绍庭、胡希仲也住在这里。走进中间一孔窑洞，我看见了一副棺木。到这时我才明白过来，续范亭是千真万确地离开我们了！一股巨大悲痛攫住了我的心，我扑上前去，手扶棺材悲痛的热泪夺眶而出。

范亭同志，想当初你为报机密来延安，我与你宝塔山下初相见，你的英武气概，潇洒俊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初建友谊即分别。后你到延安养病，我们曾朝夕相处情同师生。围炉夜谈不知晓，胸襟敞开信无瞒。互相切磋交莫逆，共誓同力铲蒋贼，谁知胜利在即，相约同游西湖之声犹在耳，你竟一病不起遗憾九泉。可叹我一路上大汗淋漓、兴致勃勃来看望你，谁知见到的是素烛白帏伴灵前。真是生不能临别说几句，死不能亲为你入殓……

痛哭之后，我问金树望，续范亭临死有什么话没有，金树望说，续范亭自知不起之后，曾要求解决他的党籍问题，弥留之际，反复说四个字——“一点忠心”。金树望还告诉我，续范亭辞世于九月十二日。因一直等在黄河西岸开会的贺老总赶回来主持葬礼，所以迟迟没有发布消息。他接着告诉我，党中央已解决了他的党籍问题。

中秋节前三天，我接到由晋绥分局和党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转来的通知，说贺老总已回来，要林老、王维舟同志和我去参加追悼会和葬礼。

十月十八日，续范亭同志的葬礼在临县都督村前面的空地上隆重举行。贺龙、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王维舟等亲自主持。毛主席从陕北葭县发来了唁电，并派专人送来了花圈和挽联，挽词是：

范亭同志千古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云水襟怀”“松柏气节”正是续范亭高尚品德的生动写照。

范亭同志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一切有良心的爱国的国民党将领所应走的道路，也是一切旧知识分子所应走的道路。

永远纪念续范亭同志！

毛主席三次教育我们抓重点

一九四二年春节，我陪续范亭同志去向毛主席拜年，毛主席和续老谈国内外形势，同时谈到统战工作，谈得十分高兴，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我在叶子龙同志处聊天。中午，毛主席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席间主席问起我交际处客人的情况，我一一作了简要的报告。当时交际处客人中有一位名叫田昆山的，是CC特务组织派到晋察冀边区的国民党书记长，这次路过延安回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汇报工作。当主席问起田昆山这个人的政治表现如何时，我向主席汇报说，此人是国民党老右派，CC特务，一九二六年我党宣侠父同志在冯玉祥部做政治工作时，田昆山就是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负责人之一。那时他就是个只知当官发财的政客，事事处处与我党取对立态度，曾被宣侠父同志批评训斥过。由于田的态度顽固，一次触怒了兰州的一群革命青年，他们将田痛打了一顿。田在晋察冀边区是搞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毛主席和续老听我说到这里，不约而同地笑了。毛主席问我：田昆山在晋察冀边区，发现他有什么破坏活动？我支吾地回答说，没有听说。毛主席笑着说：搞特务的人，没有搞什么破坏活动，那就还算是个好特务了。听毛主席这话，起初我仅仅意识到是毛主席批评我对田昆山了解不深。田来延已近一个月了，我以为他在晋察冀的情况，地方党和聂荣臻司令员一定已向中央做

了详细报告。因而我对田未做进一步的了解。毛主席这么一问，我答不上来，心中感到很惭愧。毛主席继续问我，你看国民党有多少特务？是不是所有国民党人都完全一致地坚决反共？我才意识到毛主席提这些问题，是在耐心对我进行统战教育。因此我说：当然不是，多数国民党员是为了吃饭而入国民党的，有的还是被迫集体入党的。听到这里，毛主席点头对我说：这就对嘛！我们不是对国民党一个地方政府作过一次调查吗？这个地方政府一千三百多人中，真正反共顽固派只有四五十人，不到百分之四。田昆山确是特务，但是对顽固派和特务也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CC、复兴社总是顽固派了，你看他们有多少人？我答：我弄不清。主席接着说，我们估计CC、复兴社分子大约各有四十万吧，加起来大概也不过是八十万。这是蒋介石的本钱。但我看这八十万人也并不能都看成是坚决反共、或愿意投降日本的，更不能说他们都是亲日派或汉奸。

毛主席怕我对争取田昆山的指示不能全面理解，讲到这里停了片刻，接着对当时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被我党击退的形势作了分析。他着重指出，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我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情况下，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从他们一党一派私利出发，不顾民族利益，企图挑起全面内战，实现其“对日和、对内战”的反革命方针，是有很大困难的。去年一月他们阴谋制造了“皖南事变”，蒋介石自己从反共反人民的后台走上前台，借口整饬“军令”、“政令”，以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相威胁，企图压迫我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退到黄河以北。我们在政治上彻底揭露了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等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勾结日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面目，与他们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是要逼迫

他们继续合作抗日。但又要充分准备其全面分裂，争取其不敢全面分裂。因此我们的斗争策略，仍是坚持“磨而不裂”的方针。我们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的两面政策，虽然作了彻底批判揭露，但对蒋介石本人仍留有余地。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空前的孤立。我们已使广大革命人民和中间阶级、民主党派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动阴谋，提高了觉悟与认识；国民党内部也有了分化。陈诚、张治中、卫立煌与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等的态度就大有区别。这就证明我们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使英美自食其玩弄“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恶果，对于我们争取蒋介石及国民党顽固派继续与我们合作抗日，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接着毛主席指出，当然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方针，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何应钦等亲日反共派，仍寄希望于日德意法西斯阵线的力量，他们必然要勾结日伪。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斗争仍将是尖锐复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国民党顽固派，“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仍是适用的。反磨擦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也必须坚持下去。当前，我们打击对象主要是何应钦等最顽固的反共亲日派，对国民党顽固派中的多数人仍要争取联合抗日，至少迫使他们在反共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只有这样才不会把国民党顽固派和国民党特务集团看成“漆黑一团”，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束手无策”。

这是毛主席首次向我指出争取顽固派合作抗日到底的重要性，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毛主席和我们边吃边谈，这顿午餐一直吃到下午近二时，续老和我才与毛主席告辞而归。

过了几天，毛主席为满足田昆山的求见，同时为了进一步对我进行教育，要叶子龙同志打电话给我，约定接见田昆山的时间，并指定要我陪同田前往。

毛主席见到田昆山，对他来延表示欢迎。坐定后，主席同往常一样平易近人，问田是哪里人，过去做什么工作。田答，我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起，长期在西北工作，最近又在晋察冀工作了一段时间，刚从前方回来，准备回重庆去。

毛主席说：“那你也是搞‘三北政策’的人啊！”三北政策，指的是当时蒋介石制订的反共特务活动的重点，即把特务破坏活动的矛头指向西北、华北、东北我抗日根据地。田昆山一听毛主席说这句话，显得十分局促不安。主席见田昆山神色紧张，立即用缓和的口吻说：“听说你在晋察冀与聂荣臻司令员合作得还不错嘛，只要不破坏两党团结抗日，你就是来搞‘三北政策’，我们也是欢迎的。”

田昆山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连忙表态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为了抗日，我也主张致力于国共两党合作。我在前方工作和生活环境虽然紧张艰苦，但心情却很舒畅。我亲身体会到晋察冀党政军领导人对我的很多照顾和帮助。”

毛主席抓紧时机向他宣传了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强调我们希望国共合作到底，指出，尽管重庆当局中有人对待我们很不公道，但我们仍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国民政府早已不发我们一弹一钱了，我们全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人民群众，坚持抗战。我们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你在我们根据地，这些实际情况你是能够亲眼目睹的。

田昆山连连点头称是。

毛主席又举了许多具体实例，指出国民党中有何应钦、顾祝

同等，阴谋袭击新四军，造成皖南事变；胡宗南集结他的主力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山东、河北等地早有鹿钟麟、张荫梧、秦启荣、朱怀冰、韩德勤等反共顽固派在军事上、政治上搞反共磨擦，使亲者痛、仇者快。特别是张荫梧等亲日反共派无耻倡导“曲线救国论”，已有柴恩波、李长江等投降了日寇，成为汉奸，实行联敌反共了。这些行为造成了分裂投降的危险，这种危险已严重摆在我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面前。

谈话中，毛主席把田昆山与何应钦、鹿钟麟、张荫梧以及柴恩波、李长江等区别开来，田的紧张情绪完全消失了，脸上露出了笑容。

毛主席最后着重指出，国民党中何应钦、顾祝同等亲日派制造皖南事变后，仍混在国民党最高军政机关任职，而且至今仍在叫嚣整饬政纪、政令、军纪、军令，表面上他们是拥护蒋委员长，或者说是为了“统一抗战力量”，实际上，他们与汪伪勾结，拉蒋委员长消灭八路军新四军，企图造成全面内战，实行投降日寇的大阴谋。一切爱国的国民党朋友，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应该高度警惕，切不要上当。有些国民党人、特别是黄埔系军人，幻想一面内战、一面抗日，这是不可能的。若国共再度分裂，全国内战再起，试问国民党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十年内战血的教训，对中华民族、对国共两党造成的惨痛灾难，谁也不应忘记！田昆山听至此，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毛主席进一步向田指出，现在，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已与英美宣战，美国和英国政府也与日本宣战。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实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实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明朗化了。苏联红军在冬季战役中严重地打击了德国侵略军。日本经我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其战争资

源已日益枯竭。在此日、德、意内部人心动摇的时候，我们坚持以国共两党团结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重要，谁破坏两党合作，谁将成为民族罪人。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的，希望一切爱国的、一切爱护蒋委员长的国民党朋友，和我们共同努力吧。

我在一旁听到毛主席这段严肃而又轻松的谈话，感到主席既宣传了我们的方针政策，对田昆山上了一堂生动的争取团结、争取抗战胜利的课，又是对我进行了一次如何争取顽固分子的教育。

辞别毛主席归来的路上，田昆山对我说，毛主席讲的道理很深，国共两党如再分裂，只会有利于日本，不利于抗战。他认为勾结日寇反共是可耻的。从田昆山的反映中，我认识到毛主席的谈话使田昆山对坚持抗战必须坚持两党团结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过了几天，因为另有个国民党军官要求见留守处肖劲光司令员，我到留守司令部去汇报情况，商谈对待方针及约定接见时间。事毕，肖劲光同志对我说：“前几天毛主席谈到你们交际处的工作重点，一定要放在争取团结顽固分子身上。”肖劲光同志继续说：“毛主席让我们再转告你，进步分子的思想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别的同志早已做了许多工作；中间分子虽然有程度不同的两面性，但争取团结他们的工作也比较容易；争取团结顽固分子的工作，则要复杂困难得多。要知道分化顽固派，争取多数顽固分子与我们合作，是我们争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继续合作的关键，你们必须下大力气、下大功夫去做。”听到肖劲光同志又一次转告的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深感毛主席已经洞察我自己政策指导思想错误、偏差的严重程度。我回到交际处，立即再

次在秘书、科长及直接参加络联工作的同志中进行传达讨论。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特点。它包括了抗日联盟中动摇于中华民族与日寇之间的最不坚定的同盟军——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从其本性出发，在统一战线的营垒中仍要坚持反革命两面政策，寻求一切机会破坏团结抗战，企图实行其独裁、内战和投降日本的政策，所以有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发生。然而，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破坏两党合作，公开投降日本，又是困难重重的。这是由于经过四年多的抗日战争，我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空前高涨，进步势力日益发展壮大，中间势力更加靠拢我们。在国际上，苏、美、英、法和中国组成的反法西斯阵营日益扩大，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美、英两国对日正式宣战，使顽固派内部的英美派日益得势，何应钦等亲日派的分裂投降阴谋受到抑制和打击。顽固派破坏团结、阴谋投降活动引起广大国民党员和干部的不满，特别是他们制造了罪恶滔天的皖南事变，不仅引起地方实力派的反对，而且也遭到了蒋介石亲信中的一部分爱国、明智之士如张治中、卫立煌等的抵制。因此，只要我们相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正确运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两个法宝，采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继续团结争取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数合作抗日到底不仅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们交际处的干部，特别是我自己，在皖南事变后，一度对来宾中的国民党顽固分子采取消极、冷淡态度是严重错误的。经过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纠正，才把我们的政策思想扭转过来，才使交际处的工作重点真正落到分化、争取顽固派上面。

迎送成吉思汗灵车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犯，蒙族的王公贵族发生了分化。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首的一批卖国求荣的王公，在日寇卵翼之下，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其势力随着日军的进犯，一直延伸到包头以西。

以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为首的抗日爱国的王公，聚集于伊克昭盟，以抗日政府“蒙政委员会”与日伪势力隔黄河而对峙。

我们党一贯重视少数民族工作。抗战以来，为了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更是尽量争取一切能够参加抗日阵线的少数民族上层。在西北，我陕甘宁边区始终同伊克昭盟的抗日的蒙族上层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我们曾派出干部到伊盟帮助开展抗日活动，并支援以粮食、枪支和钱财。沙王每次到重庆或西安开会，来回都要经过延安。他每到延安，都受到交际处的热情招待，并受到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的亲切接见。伊盟乌审旗的王爷齐国贤，忠于祖国，深知我党对兄弟民族的政策，与我们的关系尤其好。他经常赠送我们马匹、酥油等，我们也常给以政治上的帮助，并报以粮食、布匹和钱财。

在我们陕甘宁边区，蒙族同胞受到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一九四〇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了吴玉章、林伯渠、罗迈等三十几位同志提议的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决议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于三月三十一日举行了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蒙古文化陈列馆等提案，一致推举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为名誉理事，选举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罗迈等三十五位同志为理事。很多蒙族干部和青年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政府委员中，有蒙族委员那素滴勒盖。每年春季，延安都要举行盛大的公祭成吉思汗的典礼。这种典礼完全按照蒙族同胞的习俗举行。在祭堂中，柏叶苍翠，香烛高燃。祭堂中央端置成吉思汗石膏像，像前的香案上，堆放着供品——全羊和圣水。祭祀时，鼓铃齐鸣，喇嘛诵经，蒙古同胞以虔诚之心，为其英雄祖先敬香、敬酒、敬表，和献食品（全羊）、“哈达”等。喇嘛诵经后，继以蒙汉两种语言诵读成吉思汗祭文。党的领导干部吴玉章、乌兰夫等同志都主持过典礼。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蒙古文化促进会还编辑出版了《延安各界纪念成吉思汗专刊》。毛主席、朱总司令分别为专刊书写了“团结抗战”，“中华民族英雄”的题词。

成吉思汗，这位在十二世纪出身于蒙古草原而一时威震中外的蒙古族伟大首领，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是蒙古人民心中崇拜的祖先，他的灵柩，成为维系蒙族同胞人心的一面旗帜。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陵寝就成了德王与沙王的争夺对象。

成吉思汗陵寝座落在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传说这位东征西伐四十年，曾横扫欧亚两大洲的元太祖，于一二二七年病故于征讨西夏之后的回师途中，其灵柩就安放在伊盟伊金霍洛旗沙漠的一个平台之上。从此伊金霍洛就成为蒙族人民朝拜的圣地。

成陵的祭日，每月初一有月祭，每季有季祭，但最大的祭日为春祭，日期为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称为“三月会”。届时，各地蒙古牧民不远千里而来，顶礼朝拜，虔诚热烈。由于这时各地王公贵族汇集一堂，因此他们常借此机会召开会议，决定一些蒙族中的大事。

一九三九年一月，日伪军向伊盟发动进攻，并扬言要在三月二十一日前攻占伊金霍洛，夺取成陵。另外又有情报说，德王已密遣奸细赴伊金霍洛，企图盗劫成吉思汗遗骸，移葬于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为号召。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与沙王商定，将成吉思汗灵柩向内地迁移。我们党积极予以支持。

一九三九年六月九日，由伊盟盟长沙王、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为启灵致祭官，在成陵前举行了启灵典礼。而后由国民党政府派遣的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军事委员会科长唐井然（负责指挥护灵部队）、郡王旗西协理黄布扎布（负责与蒙民联络）三人为护送专员，率护卫人员五六十人，用驮车运载成吉思汗灵柩南下。六月十五日到达榆林。

延安是成陵内迁的必经之路。党中央对迎送灵车过延的工作非常重视，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早在六月初，就由边区政府出面，成立“迎灵办事处”。成员有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八路军留守处参谋长曹里怀、交际处的我，以及其它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还邀请了国民党肤施县党部书记高仲谦、县长马豫章参加。办事处设在延安城东约八里处的桥儿沟。交际处的接待科全部搬到了桥儿沟，在办事处的指导下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

从榆林到延安，应走米脂、绥德、清涧、延川。成吉思汗的灵柩在榆林改以汽车运载，十六日启程南下。沿途均受到当地官员和蒙民的隆重迎送。

六月二十一日清晨，延安的抗大、女大、鲁艺、工校、边府机关，边区各人民团体的抗日后援会等百余单位万余人，高举红旗、标语旗，列队前往桥儿沟。

在桥儿沟的公路旁，我们用布幔布置一座灵堂。灵堂中央挂着写有“世界巨人”四个大字的横额；两旁悬有写着“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继承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等巨幅标语。灵堂前，用翠草鲜花扎成高大牌楼一座，上面横悬“恭迎成吉思汗灵柩”的匾额。延安各单位的欢迎人员万余名，以及自发前来的当地群众，分列在公路两旁，绵延达三里许。

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八路军代表滕代远、总政联络部长王若飞、留守处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边区代主席高自立、秘书长曹力如、国民党肤施县党部高仲谦、县长马豫章、电报局长汪克毅等，在灵堂前等候着灵车队的到来。

上午十一时，就见公路远处尘土飞扬，接着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灵车队终于到来了！欢迎的队伍立刻沸腾起来，热烈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保卫中国！”“蒙汉联合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喊声震撼山野。

在庄严而热烈的口号声中，灵车队放慢速度，驶进欢迎队伍的夹道。只见灵车前后由军宪和蒙族护卫人员护卫。灵车上，以黄色缎幔蒙罩车顶，数名头戴纱帽、身着圆领蒙装的蒙族护卫人员（达尔哈特）侍候灵车两旁，中悬成吉思汗巨幅画像。画像上的蒙族伟大英雄身穿长衣，背披利剑，虽须发苍苍，但仍可见

其英武气概。

成吉思汗的灵柩是一个长方形的银棺，长约三尺余，宽约一尺五寸，高约一尺四寸，外面镂有蔷薇花纹，闪闪发光。汽车开到灵堂前停下，众人将银棺置于灵堂正中，供上祭品。案前香烛燃起，云烟袅袅腾升上空。安置停当后，由边区政府秘书陈行健司仪，一声“肃立”，群众垂手恭立，继则奏国乐，鸣炮。

主祭谢觉哉、陪祭滕代远、柯庆施、高自立、英文驊、王若飞各就各位。由谢老领导全体向灵柩行礼如仪后，党中央、八路军、八路军政治部、留守处、中央统战部、边区党委、边区政府、教育厅、肤施县国民党党部、县政府、抗大等单位的代表上前献花圈，接着由曹力如读祭文，祭文如下：

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生色。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仇。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艰难，携手努力。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当仁不让，大旱之霓，国人之望。清凉岳岳，延水汤汤，此物此志，寄在酒浆。

祭文诵毕，乐声重起，激荡空际。二十余名蒙族同胞跪伏灵前，闭目拱手，朗诵蒙经。群众列队绕行灵前，争相瞻仰灵柩。十二时许祭礼完成，由迎灵办事处招待移护人员进餐。翌日晨，延安各界代表和市民齐赴南门外大操场，列队瞻仰成吉思汗灵柩，然后排成十里长队送行。至此，我边区迎送成吉思汗灵柩过延的任务胜利完成。

成吉思汗灵柩离延后于六月二十四日到咸阳，二十五日到西安，二十九日到达预定的成灵奉安地点——甘肃榆中县境内的兴龙山（亦称兴隆山）。七月一日，当地国民党政府官员举行了奉安大典，将成吉思汗的银棺安放于山上的太白宫正殿。成

陵内迁的任务也就顺利完成。

成灵过延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国民党的电报局搞了一次乱。

当成吉思汗的灵车队刚到榆林不久，国民党特务就冒充绥德方面我方人员打电话给我们，谎说灵车队已到绥德了，三天后到延安。于是我们赶制了祭品——屠宰太牢和招待用的酒菜。从此我自己每天几次向绥德、清涧等我党政机关打电话查询到达的确切时间，电话总是被干扰不清。预定时间已到，灵车却未来，各机关团体的迎接队伍白等了半天，由于天热，做好的全牛、全羊都坏了，只得重新准备。

国民党电报局的特工人员，长期在延安搞阴谋破坏活动，但始终搞不出大名堂，只好用这种丑恶的鬼蜮伎俩，破坏两党团结，破坏有利于合作抗日的工作，而且多次作恶。如有一次我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经洛川来延安，事先打电报给延安说：滕参谋长××日出发，三天以后可到延。结果是滕到延后一个星期才收到电报。

又有一次，“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从西安回绥远，途经延安以南三十里的劳山时，看到许多野鸡，一时兴起，端枪射击，一扣板机，枪筒炸破了，伤了他的手指。他急忙赶到延安治疗。在延安治了几天，伤势好转，他急着要走，我们恳切挽留也没留住。结果他到榆林后，伤口又恶化，就打电报，请我们派医生去帮助治疗。然而我们一个月以后才收到电报，马占山不见我们去医生甚至连复电都没有，曾一时引起对我们的误解。

当然，国民党特务分子这些小动作是破坏不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的。

“北路慰劳团”

一九三九年九月，全国抗战已进行了两年多。国民党政府为了鼓励在前方的抗日将士，组织了全国慰劳总团，分南北两路到前线慰问。其中的北路慰劳团于九月九日经延安转赴榆林各地进行了慰问活动，又于九月二十一日经延南返，在他们往返两次滞留延安的短短几天里，我们进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同时还组织他们进行了一些参观访问。

慰劳团是九日下午到达延安的。毛主席、柯庆施、谭政、高自立、肖劲光等同志亲自出面迎接，同去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高岗、延安卫戍司令滕代远、边区保安处长周兴、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建设厅长刘景范、教育厅长周扬、银行行长曹菊如、延市市长高朗亭、公安局长王卓超、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鲁艺院长赵毅敏、边区文化协会代表艾思奇、西北青年校园联合会代表黄华、新中华报社的李初黎等。首长们陪同慰劳团穿过欢迎群众的行列，步入熙熙攘攘的新市场，到布置已妥的招待所下榻。那时交际处还没有自己招待客人的房子，而招待一般客人的西北旅社也在山坡，地势高陡，路不好走。考虑到总团长张继已六十多岁，上下山不方便，因此，就把该团安置在边区银行在新市场新开的十孔窑洞内住宿。代表团除总团长张继外，还有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秘书长陈希豪、三

青团代表梅公任、参政会代表潘秀仁、调查统计处代表胡详麟、文协总会代表老舍、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社的耿坚白、新民报社的张西洛、摄影师韩仲良、徐剑秋。

慰劳团总团长张继过去是有名的国民党右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就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邹鲁、谢持、居正、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他积极支持，签名表示参与，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重要成员，为此曾受到国民党“二大”的书面警告。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由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等口号，从此，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合流，一同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张继也就成为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元老”之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一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将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到对内，蒋介石由“溶共”政策发展到“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接着，连续秘密地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这些反动文件成为各地开始反革命磨擦的根源，企图以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的团结，来为他们投降日寇扫清道路。而张继率领的北路慰劳团来延之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刚开始阶段，顽固分子还只是偷偷摸摸地搞磨擦，还未完全表面化，所以就是张继这样一个代表北方大地主阶级的所谓“国民党元老”、反共老手，在华北沦陷、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由于人心所向，也不得不表面上放弃了自己原来的立场，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当然，秉承蒋介石

的旨意，一意孤行，要反共要分裂的，也大有人在。这次到延安的北路慰劳团团长贺衷寒就是一个。贺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他的正式身份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中将銜秘书长，是蒋介石的反共干将，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他带来的军委会政工部的黎琴南、侯志明、赵虚吾、吴兴干及扫荡报社记者耿坚白等，大都是职业特务。黎琴南和耿坚白，既是特务，又是在西北活动的托派，然而在当时第一次反共高潮尚未达到高峰，国共关系基本上还好的情况下，这几个人在延安的表现尚好，还未赤裸裸暴露其反共面貌。

九日晚上，边区政府在机关合作社食堂为慰劳团设宴洗尘。延安各界代表也纷纷来招待所看望他们。一时间，欢声笑语在窑洞内外回荡。大家互相致意、问候，打听老朋友的情况，又结识着新朋友。两党的同志在融洽和睦的气氛中相聚，这在“双十二”事变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十日下午，我陪同慰劳团到抗日军政大学参观，由抗大分校长许光达同志出面接待。他简单地介绍了我党办抗大的宗旨、进程及发展情况后，就引导大家去参观，当时抗大还没有专门的教室，学生们上课就在各队的“救亡室”（或俱乐部）里，各队联合上大课时就集中在广场上，平时学习和小组讨论都在各自的宿舍内。我陪同客人们走进一个班的宿舍，正在自修的学生们都起立向客人敬礼。张继等很高兴地向大家点头致意，一面拿过学生的课本翻看，一面和周围的人随便说话。看到寝室内朴素简单的布置，每人一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床单铺得平平展展，一眼望去十分整齐清洁，艰苦朴素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团员们都赞不绝口。张继问，“每个学生每月伙食费多少？”许光达同志告诉他：“每天每个学生斤半小米、六分菜金，每月每

人补助一元零用钱。”张继听后感动地说：“大家吃苦，全国人民吃苦，我们都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国的共同命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再也不要再用兵自己打自己了。”以他的慷慨之词表示了慰勉之意。

从抗大出来后，按照已定程序，我陪慰劳团观光了延安的风光景色和文物古迹。我们首先顺路参观了清凉山。在车上北望清凉山峰，有青松三株，苍劲迎风，大家为这黄土层层的山脊上能生长出如此雄姿挺立的松树而赞叹不已！不多时，汽车向右一拐弯，我们已来到清凉山西面北坡，沿斜径拾级而上，就见古人对此名山胜地树立的“清凉第一”的石坊。石坊左右有联曰：“二水绕座晨望嘉岭塔边烟，八景环山夜对凤凰楼上月。”原来清凉山在延安城东北角的延河之东，西面仰望即可见凤凰山，南面即是宝塔山，故谓“晨望嘉岭”“夜对凤凰”。至“天下奇观”处原有一联：“纵观二水三川，古今英雄功过。遥看西山一城，历代风流善恶。”此联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他所描绘的延安城所在地势，倒是很确切的。我曾多次陪同中外来宾参观清凉山景色或新中华报社、印刷厂。清凉山相传有十景：宛然云霞、水照延安、天下奇观、琵琶桥、仙人洞、桃花洞、尸毗岩、撒珠坡、月儿井、诗湾。十景中的“尸毗岩”，据传印度释迦牟尼三世尸毗王是在此涅槃升天的。当时尸毗王自知自己归天在即，就将自己身上的肌肤割下来喂饿鹰，以免这类贪吃的猛兽再去伤害其它的鸡雏或鸟类，以示慈悲为怀的佛家“舍身救生”之崇高信念。“肤施”的县名（即延安的另一名称）即自此而得来。

清凉山的万佛洞石雕，真是难得看到的古代文物，它以万佛洞为主体，与其它几处石窟组成。范仲淹曾作诗赞颂：“凿山成石宇，铸佛一万尊。人世亦稀有，神功岂无存。”万佛洞是清凉山

最大的石窟，宽约十七米，深十四米，高六点七米。主要工程是在北宋年间完成的，中央台基上原有三尊佛像，窟内四周及大屏石壁上布有神态各异的浮雕像一万余尊。慰劳团中有人想略视其实，而终叹甚难。这些佛像虽经长年的风化，大都模糊不清了，但其造型的千姿百态、优美自然，仍可欣赏。有的窈窕清逸，秀丽飘洒；有的姿态健美、宁静含蓄；有的身着甲冑，威武严肃。有一石窟中有立体观世音菩萨一座，神态端庄，依岩斜坐在莲台上；另一石窟中有弥勒佛像一尊，两耳垂肩，大腹便便，笑容可掬，情趣逗人喜爱。

慰劳团的朋友们听着我的介绍，都饶有兴趣，张继更是兴致勃勃。张继、贺衷寒等走到一处，看到一尊形态秀美、纤巧细致、袒胸露臂、曲线优雅而头颅已无的女像，便住步仔细端详，意欲判断是否系我党破坏。终因残迹已很陈旧，一望而知，非近期所毁，他们只得相视一笑而过。

从清凉山下来，客人们又兴致勃勃地来到宝塔山，向北仰望石壁，上凿有“嘉岭山”三个大字，这是宝塔山的原名，出于范仲淹手笔。再往东行，见石壁上凿有“先忧后乐”四个字，字体工整大方，落笔圆润流畅，是范仲淹自明立志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缩语。继续东行，又见“胸中自有十万甲兵”八个大字，笔锋苍劲有力。所有这些石刻都是历代名人歌颂范仲淹一生克己为民、文治武功的。范仲淹在世时被宋仁宗以龙图阁直学士下放边陲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骚扰中原，曾立下汗马功劳。谈起范仲淹、张继、贺衷寒与老舍及新闻记者等，不分左派、中间派与顽固派各类人物，似乎都找到了共同语言，各抒己见，赞颂古人，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区域习以为常的大官小官、上级下级以及官民之间的等级观念和互相之间

的政治戒备，而且形成整个慰劳团中不易多见的热闹场面。

嘉岭山上始建于唐代的宝塔，已有约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共分九层，高约四十五米，塔旁有大钟一口，是明崇祯皇帝时铸造的。宝塔山当时已成为我党的象征，是全国甚至全世界进步人士所向往、崇敬的地方，是指引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灯塔。慰劳团员中有些人想登上去看一看，但是，因为这座古塔已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所以张继借口年老体衰不愿上去，连平常有国民党军人“威仪”、精神抖擞、挺腰直背的贺衷寒也望而却步了。我看张、贺二人畏缩不前，也就不再勉为其难，借称时间已晚，还要顺道去看看延安城，让他们转道而行了。

车行至南门口，北望城门上，只见横额上有石凿“镇关”两字，大家疑而不解其意。我即解说：因延安城在三山（凤凰山、宝塔山、清凉山）二河之间。延河在此有南北两流，北流来自安塞等县，源长水多，是主流。南流来自劳山、杜甫川，源近水少，两流到延安汇合而成向东奔流的延河。陕北夏季雨量集中，常常暴雨成灾。当暴雨倾盆时，河流南北不分，有时自南而来的滚滚洪流也很凶猛，有危及城关之险，故铸此二字借以“镇压”。北流虽然常比南流更猛，但因城北地势开阔，且泄洪口大，不至危及城墙，故只有南门上刻有“镇关”二字。

延安本是一座背负凤凰山，面临延河的雄伟古城。它的地势如一个西高东低的玉盘，十分壮丽。但是经过敌机两年来的多次狂轰滥炸，城里已是一片瓦砾，只是在西南角较隐蔽的山沟里，还残存一些房子，为机关所用，而全城的居民、商店及其它机关、学校均已搬出城外。慰劳团看到此情此景，激起了对日寇的仇恨。

当晚，毛主席亲自到招待处拜访了张继、贺衷寒以及慰劳团其他团员，并设宴招待了他们，席间宾主畅谈甚欢，宴会结束后，毛主席陪同张继一行乘车前往中央大礼堂参加欢迎会。会场上歌声激荡，主席台布幔上张贴着“欢迎中央慰劳团”的标语，礼堂的窗口和门前都被赶来参加欢迎会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大会开始时，毛主席首先致欢迎词。毛主席说：团结抗战已经两年了，两年前没有抗战，没有团结，现在是团结抗战了，这是新现象、新气象，是堪以欣慰的。可是在两年的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有些小冲突、小磨擦，因此国共两党中间的同志，他们关切挂念着，在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也是非常关切着。抗战两年来，两党是以团结为中心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抗战两年后的问题了，但基本方针没有变化，这就是“团结”二字。现在两党中间，在部分地方，有部分人员，发生一些磨擦，这种现象是不好的，但大家知道，在大局上，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我们团结抗战是靠得住的。团结是总方针，除了团结没有别的方针，团结就是要团结在进步的基础上。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要处处与敌人对立。毛主席的整个讲话着重强调了“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分离的精神。”这时礼堂内群情振奋，“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的口号声震荡了大礼堂。

在请总团长张继讲话之前，毛主席十分客气地说：“今天我们欢迎革命前辈张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他是中国革命的老辈，又尽力于团结抗战的事业，功劳非常大，今天我们要他老先生给我们以指教。”这时礼堂里又响起了“欢迎中央慰劳团！”“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声。

于是，张继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了主席台。他立时用响亮的

声音说：“听到毛先生的欢迎词后，非常感动。本人同毛先生很久不见面了，今天一见真有无限感慨。回想起大概民国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本部在上海，那时每天在本部里执行本党职务的是谁？就是毛先生！过去在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今天情形改变了，国共两党正亲密团结着。今日国共两党间虽有小磨擦，但通通可用和平方法解决，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共同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他渐渐加重了语气，象要扫去伤痛的回忆似地挥动着右臂，接着说：“这里大家的吃苦精神使我非常佩服，参观抗大时我问校长，一个学生每月吃多少钱？他说每天每个学生斤半小米、六分菜钱，我听了非常感动。我的救国道理只要战、战、战！只要打、打、打！就够了。能打，国才能不亡，不打讲什么主义都是无用的。汪精卫是历史上没有的卖国贼、卑鄙无耻的民族败类。每个人提到他都有权将他处死刑。我敢告诉大家：全国无一人愿意自己打自己，中国也不会再走到内战的道路上去，我们吃苦，我们要同力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

接着团长贺衷寒讲话，就牺牲抗战、精诚团结、建设进步三点作了一些申述，在不断的掌声中，娓娓地继续了半小时之久。文学家老舍也被请上讲台讲话，他特别提到文化人在团结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作家们在“文章下乡”这个口号下所获得的成绩。他言词幽默风趣，感情真挚，时时博得大家的欢笑和掌声。

欢迎会后，游艺节目开始，鲁艺演出了《黄河大合唱》，民众剧团演出了秧歌剧《查路条》，直到夜深晚会才结束，人们尽兴而散。

贺衷寒担心团员们受我们的影响，授意国民党肤施县委书记

长高仲谦以邓宝珊的名义，催促他们早日到榆林去。于是十一日慰劳团离延转赴榆林各地进行慰劳工作。作家老舍到榆林后，还给周扬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详细介绍了文化协会总部的工作情况，殷切地希望延安文协分会今后与文协总部加强联系。周扬写了回信。

十天以后，慰劳团由榆林过延安南返。这时，随团的三名记者找到我，提出要求见毛主席。我知道，他们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摸摸我们的底，就让他们拟一个提问题的提纲。他们推刘尊棋、张西洛负责起草，很快就拿来了。问题分三部分：一、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二、关于两党的磨擦问题；三、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刘尊棋当时与我党有关系，张西洛是进步分子。这三个问题，正是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最迫切要求知道我党的态度和政策。我把提纲很快转送给毛主席，主席在第二天下午接见了他们。参加的还有柯庆施、肖劲光及新华社、新中华报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谈话，就是后来震动中外的毛主席《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毛主席首次公开、明确地宣布了我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军的军事进攻采取的原则立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还说，这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办法是退兵三舍，后发制人。

谈话后，耿坚白为了立功，立即把谈话内容电报重庆，本想只作为他们内部掌握的材料，但是不料我延安的《新中华报》在十月六日发表了全部谈话记录，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揭露了顽固派搞分裂、搞磨擦的罪行，表明了我党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坚决采取针锋相对斗争的决心。这样一来，把蒋介石一伙搞得十分狼狈。三记者回西安后，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把他们找

去训斥了一顿，责问他们这些问题是谁要他们提出的，为什么要提这些问题。这表现出谈话已使国民党顽固派处于被动境地。

在慰劳团留延期间，我们还安排他们参观了鲁艺、女大、边区工厂等单位。他们中多数人对我们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十分赞赏，认为共产党有决心，有办法，是能够克服各种困难的。

二十二日下午，边区文化界及各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著名人士和负责人，与慰劳团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广泛交换意见。国际友人斯诺，边区文化界的名流何思敬、艾思奇、赵毅敏、肖三、李初黎、曹若茗、张庚、柯仲平、马达等七十余人参加座谈。四时座谈会开始，艾思奇主持开会，何思敬致欢迎词，继请张继讲话，接着何思敬、赵毅敏等分别对国内团结及对中国文化发展等发表了意见，老舍对大后方文艺界情形作了详细报告。他讲完话后，又即兴唱了平剧《打渔杀家》片断，张西洛也趁兴唱了两首陕北民歌，会场的情绪异常热烈。座谈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毛主席陪同贺衷寒来到会场，这天正是毛主席个别接见贺衷寒。毛主席进场时，全场起立，大家热烈鼓掌，毛主席及贺衷寒在会上讲了话。座谈会开到晚上九点多，又举行了欢送宴会，毛主席往来席间，宾主擎樽高呼：“敬祝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直到十二点宴会才结束。二十三日早晨，慰劳团全体人员离开延安。

这次中央慰劳团两次过延，从我们的接待工作和他们的反映来看，总的来说都是比较成功的。比如著名作家老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回到重庆以后，向友人们热情宣传延安的新气象。在报纸上著文号召抗日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团体，以书刊支援西北（包括陕甘宁边区），并号召文化人到西北去参加战地的文化宣传，输送精神食粮。一九三九年底

到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老舍虽然不能在报刊上公开颂扬陕甘宁边区，但他以颂扬“新西北”的方式，隐晦地将陕甘宁边区歌颂一番。如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发表题为“归自西北”的文章说：“我所见到的军队，无论是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还是绥远，精神都非常的焕发。……不但是军队本身的纪律好，且因为军纪好而影响到民众，使民众也晓得了爱清洁、守秩序，种种美德。”“上述事实决定了前方的社会气象——安定、乐观、努力。军队和老百姓都不怕死，不怕敌人。”“……在抗战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西北。”等等。因为老舍同情和赞扬陕甘宁边区，所以国民党特务便找上门来与老舍纠缠不休。老舍急了，愤然斥责特务说，“我是‘文抗’负责人，有牌子。你不叫挂，我摘下来，挂到延安去。”从此斗争明朗化了。

当然，慰劳团的成员政治立场各不相同，表现不一，坚持顽固立场的如秘书长陈希豪，他实际是中统的头头之一，在初到延安参观时，他的表现就很傲慢，到处挑刺。而惯于随机应变的张继，虽然在各种场合侃侃而谈，对于他过去曾经反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往事，捶胸顿足地表示有悔悟之意，对延安各方面成就也时时流露欣赏与钦佩之情，而实际在他当时写的私人日记中，却写着：“我对延安甚为嫌恶。”我想这才是他的真情的发泄。他在抗战胜利后，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最后死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蒋家王朝覆灭的前夕。他大概没想到这本日记会在全国解放后落入人民手中，使人们看清一个被迫参加联共抗日的人是如何耍两面手法的。

绅士参观团及青年食堂事件

一九四一年初，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起草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纲领，并将之发布延安和边区各阶层人民，发动群众充分讨论。

当时，陕甘宁边区广大劳动人民对《施政纲领》是热烈拥护的。而各地、县的私营工商业者和开明绅士，则反应不一。他们之间多数人虽然对《纲领》表示欢迎，特别是对《纲领》中规定的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这一条很有兴趣，但由于其阶级地位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仍不免疑虑重重，徘徊观望。

当时，延安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无论在政权建设方面，还是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都先行一步，走在前面，是全国解放区的楷模。因此，陕甘宁边区各地的绅士们，都想先到延安看看。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清延安究竟是什么样子，再决定自己今后怎样干。于是，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支持下，一些有代表性的绅士们组成参观团，到延安来参观学习。这一时期，到延参观的绅士参观团相继而来，有绥米绅士参观团、三边绅士参观团、陇东绅士参观团，一九四二年还有来自晋绥解放区的晋西北绅士参观团。

对这些参观团，我们交际处都大力做宣传、教育和争取工作。我们安排他们充分地参观延安工农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情

况、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人民生活、学校教育、群众团体活动等各方面情况。使他们切实了解延安,进而了解党的方针、政策。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毛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等对绅士参观团的到来十分重视,每一批都亲自接见和设宴款待,耐心解答绅士们提出的问题,启发他们把眼光放远,积极参与和配合边区政府的工作,建设好三三制民主政权,争取抗战胜利,争取建立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新抗日根据地。

参观团的绅士们通过在延安的参观、访问、学习,思想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他们带着对延安的良好感受和学到的先进经验回到当地,发挥了良好作用。多数人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民主建设和生产建设,有的还参加了边区政府一级的三三制政权,推动了全国上层统战工作。

绥米绅士参观团来自我绥德专区所属的绥德、米脂、清涧、吴堡等县。在抗战前的土地革命中,这些绅士们多数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积极反对革命,因而或大或小地受到当地革命运动的“冲击”,在他们的心理上形成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双十二事变后,特别是绥德、米脂等县正式划归陕甘宁边区以后,我们在这一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保证交租交息的政策,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开展争取开明绅士、工商业者、中小地主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但在一九四〇年以前,由于以何绍南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和顽固派分子的破坏和挑拨,绥德一带的绅士们大都心有余悸,虽然表面上拥护我党的政策,实际上屁股仍坐在国民党方面。一九四〇年春,何绍南被我们赶跑以后,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有了大的转变。皖南事变发生时,他们明确地反对何应钦等的反共投降行径,说明他们的政治倾

向明朗化了。为了使他们更好地了解我党政策、了解延安的各方面成就，在我党警备区特委的支持和组织下，由十一名有代表性的绅士组成的参观团，于一九四一年五月成立，并于同月二十三日乘汽车来到延安。

参观团的十一名代表是：贺连成、马济川、常黎夫、艾斌卿、马新民、延焕亭、霍祝三、霍子乐、霍仲年、马子良、惠仁闻。

当时政治影响比较大的米脂开明绅士李鼎铭、绥德最大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安文钦，仍持观望态度，未参加此参观团。

带领并陪同参观团一起到延安参观的，还有中共警备区特委书记张秀山、专署教育科长张兆番、抗战报社记者殷三等。

参观团一到延安，即受到边区政府刘景范、曹力如等老朋友、老熟人的迎接。谈话间，他们都认为何绍南之逃跑，是便宜了他。对皖南事变后我党将新四军扩编为七个师、给予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以有力的回击，客人们表示拥护和钦佩。他们还颂扬贺龙同志说，绥德地区久旱，自贺龙将军的部队来后，才降了大雨。这场大雨是贺龙带来的，龙来了，老百姓就有饭吃了。

来延的绅士中，常黎夫是革命知识分子。霍祝三是一位革命烈士共产党员的父亲，一向进步。马济川也是革命知识分子，左派。贺连成等政治态度中间偏左，比较靠近我们。其余多数属于中间态度。马新民是米脂最大的地主，也是陕北仅有的所谓“懂六国英文”^①的“假洋鬼子”，曾留学日本。政治态度属于中间偏右。

绥米长期以来是陕北的封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是革命与反革命两极分化最明显的地区。来延参观的某些绅士，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对三国时期米脂出了貂蝉、绥德出了吕布而津津乐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而对米脂出过明末农民起义

领袖李自成，却闭口不提。大概是不愿提或不敢高攀这位伟大的乡亲吧。同时，对当时西北的大民主人士、米脂人杜斌丞和绥德中学出来的许多著名共产党人，谈起来也不那么起劲。

他们囿于几千年来农业、手工业小生产的落后经济观念，喜赞米脂的米如何好，曾进贡皇上，或赞“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而对现代化工业则知之甚少。

参观团到延安的第二天上午，由交际处的同志陪同，前往边区政府拜访林伯渠主席、谢觉哉秘书长（谢老当时对外是边府秘书长，实际上也是边府党组书记）。下午，朱总司令、南汉宸等，特来交际处会见参观团成员。晚上，边区政府在机关合作社设宴，为参观团洗尘，席间宾主谈笑甚欢。

在拜会边区领导人和延安亲朋之后，参观团就开始了参观、考察活动。

在边区政府建设厅及交际处派的干部陪同下，参观团首先前往安塞工业区参观。先后参观了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难民纺织厂、新华化工厂、农具工厂。各工厂职工，都予以热烈的欢迎和殷勤招待，并向参观团详细介绍了创建工厂的过程，及生产建设的现状、今后的规划等。参观团对这些工业建设成就和职工们的艰苦奋斗精神极为敬佩。比如，他们看到我们的造纸厂，用当地处处皆是的乌兰草做材料，造出来的纸虽然粗糙一点儿，但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报刊宣传和机关、学校的需要。再如兴华制革厂，用羊皮制作出来的夹克，分黑黄两种，光亮柔软，穿起来十分美观舒适。可供应边区高级干部，也可拿到重庆去作为礼品送人。还有我们的难民纺织厂，用羊毛纺线（陕西一带原来只能用来赶毡毯），以毛线织布，这种毛布虽然粗，但很保暖，若絮上羊毛做袄，足以抵御陕北的寒冷。这家工厂出的羊毛

毯子，更是质地优良，式样美观。我们曾将自制毛毯赠送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她甚为高兴，曾当作壁毯悬挂在客厅。我们的新华化工厂，主要产品是肥皂，工人们以羊油、牛油、植物油作为肥皂油脂的原料，配上土碱，制出的肥皂很好用。

工厂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也给参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难民纺织厂厂长吴生修同志，边区重工业的始祖沈鸿同志。

沈鸿同志原是上海的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工人。抗战前，他仗着自己技艺高超、精明强干，自己开办了一个小厂。抗战爆发后，他心向共产党，以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将他厂子的所有机器和一批技术工人，全部带到延安，奠定了我边区重工业的基础。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工人克服困难，土法上马，发展工业。他开创的兵工厂不但能修理各种枪械，而且能自己制造出牛头刨床，为建立其它工厂创造了条件。

总之，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我们党不但搞农业有办法，而且搞工业也有办法，那就是就地取材，土法上马，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建设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子，正在逐步地克服物资匮乏的困难，满足军民的需要。

某些满脑瓜子只有“米脂的米”、“清涧石板”、“瓦窑堡炭”的绅士们，至此才大开眼界、心悦诚服、自愧不如，纷纷表示要学习延安办工业的先进经验和工厂的先进技术。

参观团还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延安地区的讨论情况。延安的民主人士告诉他们，在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中，确定共产党员的人数只占三分之一，这说明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实行政治民主，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共同抗战与建设。

有一次，参观团同几位青年石匠拉话。一位绅士问他们：“现在《施政纲领》规定增强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你们有什么意见？”一位青年石匠回答说：“那增加的二小时是我们自己提出、工会讨论决定的。”另一位接上来说：“现在是国难时期，只有多干活，才能发展生产，支援前方抗战，才能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

绅士们处处得到真实的、满意的回答，感慨万分。有的说：“共产党的政治远见和伟大气魄，值得钦佩。”有的说：“共产党的企图，决不是历史上某些‘英雄豪杰’所追求的个人荣耀或个人功业，而是为子孙万世谋福利。他们所倡导的自由解放，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有的说：“治世之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如能象延安所倡导的一切秉理法行事，困难无不迎刃而解。”

参观团还考察了延安城区的建设。昔日城内市场和街道，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瓦砾，而英雄的延安人民，在这片瓦砾上昂首挺立起来，以惊人的速度在南门外建设了一个比旧城商业区更大的新市场。又在城内山腰上、山沟里，建造起一排排新窑洞和新平房，把延安城装点得更加壮丽。无怪有位绅士感叹地说：“延安穷地方，几年不见，大变了模样！”

更使参观团绅士们赞誉的，是学校里、街道上的青年人。参观团中几位办教育的先生赞扬说，这些年轻人虽然生活艰苦，却有健壮的身体和乐观、不倦怠的精神。延安好比新发的大户人家，一个个克勤克俭地创家立业——这是上升的气象。

将近一个月的逗留，参观团的绅士们大开眼界，收获丰富。在他们即将结束参观、离别延安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会见和宴请了他们。

说起这次宴会，还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哩。

毛主席准备宴请的前一天，我派交际处一位工作人员到青年食堂订菜。第二天上午，我自己又提前赶到青年食堂，检查酒席准备的情况。时近中午十一时半，毛主席先到了。

青年食堂座落在文化沟（原称大砭沟）口北侧的一块平地上，毛主席的车子由北而来向西转进平地。我在食堂里听到毛主席的车子声，就迎上去，主席下车后，我跟在毛主席的右后侧，边走边谈，走向食堂。保安处派来的干部和毛主席自己带来的两个警卫员落在我们的后面。

我陪毛主席正走向食堂，忽然，我们同时发现左侧前方闪出一个彪形大汉。此人看上去三十来岁，浓眉大眼，膀大腰圆，双手紧握一根大木棍，高举过头，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直向毛主席奔过来，企图加害毛主席。

说时迟，那时快，我急忙从毛主席的右后侧一步跃到毛主席的左前侧，将自己的身体护住毛主席，双目怒视那个暴徒。那时我正年壮力强，那暴徒见我已准备对付他，就放慢了脚步，行动迟缓起来。趁着他犹豫的一刹那，我保护着主席快步走进食堂。进了食堂，让毛主席坐定后，我转身出去，看到那个暴徒还在张牙舞爪，企图冲向食堂行凶，而三个警卫人员还站在那里，心里有些生气，就向三个警卫人员喝道：“快把他捉起来！你们为什么还不动手？”三个警卫人员听到我的命令，才冲上去夺下暴徒的大棍，将其扭住。保安处的干部在暴徒背后推着他离开现场。

看到暴徒就擒，我才松了一口气，嘱咐其他工作人员加强警卫，又返回食堂，毛主席问我：“怎么啦？”我报告毛主席说：“主席，那个暴徒已经被抓起来，送到保安处去了，你放心吧。”毛主席从容地点点头，只说了声：“好。”

一场骚乱很快就平静了。等绥米绅士参观团由交际处别的

同志陪同，鱼贯来食堂赴宴时，仿佛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当时，中央对“青年食堂事件”的发生甚为震惊，从此毛主席出行时，警戒加严了。保安处对那个暴徒审讯后，才弄清楚，原来那人是个疯子。

毛主席在接见绥米绅士参观团时，就绅士们关心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解答。他介绍了目前全国及华北的抗战形势，《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主旨，三三制政权建设以及边区的经济状况。最后，主席鼓励绅士们说，希望诸位先生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拼力渡过这一时期，好日子就会到来。希望诸位先生回去后，积极出来参加政府工作，帮助政府办事，共产党一定会尊重你们的意见，一切事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办，而且一定与你们合作到底的！

参观团绅士们纷纷表示，过去有句古话讲“耳闻不如目见”，通过这次参观，我们认为可以大大加重这句古话，应当说：“耳闻大大不如目见”啊！我等虽然不才，将力尽绵薄，为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出力。^②

〔注1〕所谓“六国英文”是陕北人说的笑话。旧时陕北文化落后，老百姓对世界知识知之甚少，或曰某人懂得外文，则说“某某懂得六国英文。”

〔注2〕文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后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先生，后为边区副议长；霍子乐先生，后为边区政府建设厅副厅长；贺连城先生，后为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常黎夫先生，后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著名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先生侨居南洋，是一代华侨领袖。他是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的教育家，数十年来始终站在爱国前列。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即在新加坡募捐帮助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华侨的民族民主运动。后来独资创办厦门大学 and 集美中、小学，为家乡普及教育不遗余力。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担任主席，领导各地华侨募捐。他从抗战开始，就成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拥护者。一九四九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副主席、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陈嘉庚先生由一个巨富侨商、热情的爱国主义者，逐步成为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华侨领袖，是广大爱国侨胞的光辉榜样。

一九四〇年二月，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在新加坡正式成立。该团成员五十人，都是南洋各地的“南侨总会”或“中华总商会”推举的代表。陈嘉庚先生作为南侨总会主席，亲率慰问团回国。

陈先生之所以决定组织慰问团回国，是由于蒋介石在一九

三九年冬，在水行营发出了一份关于陕甘宁边区国共发生磨擦经过情况的报告，引起了海外华侨的不安，各地筹赈分会纷纷向总会探询，有的提建议，请南侨总会派代表回国考察。陈先生对此事也很关心，最后决定成立慰问团回国考察。当时陈先生已届六十七岁高龄，年老畏寒，几年来腰骨时常疼痛，经不起久坐，且又不会普通话，本不想亲往。谁知在筹备回国的过程中，屡遭国民党阻挠破坏，使陈先生感到非他亲自出马不行。后又接到重庆来电，邀请他参加四月一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于是他于三月初从新加坡乘船到仰光，又于二十六日由仰光乘飞机抵达重庆。

陈嘉庚先生一下飞机，即向前来迎接的重庆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阐明了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使千万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考察行程，他郑重地表示：“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

陈先生的讲话使国民党当局十分不安。国民党当局赶紧出动其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党政官员和反共健将，实行“吹”、“拍”、“骗”的三诀。大吹大擂“蒋委员长是领导抗战的伟大领袖”，把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国民党说成是主张“精诚团结”的；又大力渲染国民党统治下的党、政、军、民如何“团结抗战”、“廉洁奉公”；对慰劳团则又捧又拉。国民党清楚地看到陈嘉庚既是每年可为祖国争取巨额侨胞捐献和侨汇的“财神爷”，又是在南洋声望最高的资产者，具有一呼百应的威望。所以，对慰劳团“关怀备至”，接见、参观、游览，一日数宴地款待陈先生一行，极力拉拢。当然，他们还忘不了进行欺骗宣传，诬蔑我党、我区

实行“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统一。国民党这一时期调动何应钦、鹿钟麟、蒋鼎文等破坏团结抗战的磨擦专家在华北、西北进攻我们解放区，蒋鼎文还猖狂地占了我们的六个县，但他们却倒打一耙，反诬我们“破坏团结抗战”，“实行封建割据”。为了使其欺骗不至被揭露，国民党还安排了戴笠、寿家骏等特务分子对慰劳团的行动进行监视，限制慰劳团和我们接触。国民党政府准备了八万元招待费，并为陈先生等人安排了两个住处，一为孔祥熙办的豪华的嘉陵宾馆，一处是嘉陵新村。陈先生为节省费用，决定住进新村，而这正中了一国民党当局“防共”的下怀。但是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仍然冲破了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几次见到了陈嘉庚先生，并邀请他去延安参观指导。国民党蒋介石为阻止陈先生到延安，绞尽了脑汁，制造了许多障碍，直至蒋介石亲自出马阻挡。关于这个斗争曾有这样一段故事：在成都蒋介石设宴招待陈先生时，蒋问他想往何处，陈先生答：“晋城、灌县。”蒋又问：“还欲他往？”陈先生复答：“兰州、西安。”蒋又三问：“尚有别处否？”陈先生已知其意，乃直言：“如延安有车可通，也要前往。”蒋听后即大骂共产党，并说：“周恩来不日可到，看此来有何结局。”言下有劝阻之意，陈先生乃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报告。”蒋无奈，仍警告陈先生：“到什么地方看看都可以，但是要防止有人会对你进行欺骗宣传，以免上当。”

五月三十一日，陈先生与筹赈会常委侯西反，总会秘书李铁民，在蒋鼎文派的陕西省府第一科科长特务分子寿家骏监视下，由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统战科长居进同志陪同，从西安经洛川到延安。他们的车到延安时已是下午五点多了。王明、吴玉

章、高自立、肖劲光等同志在交际处门口迎接了他们。陈先生一行略事休息后，就由我们陪同到南门外运动场出席欢迎大会。

大会有五千多群众参加，大家习惯地都坐在地上，闽南的同志都坐在前面，格外兴致勃勃，有说有笑。由于陈先生讲话时只能说闽南话，多数群众要经过李秘书翻译才能听懂，而闽南的同志一听就懂，所以每当陈先生讲一段落或讲出一些热忱爱国的语句时，首先由他们带头热烈鼓掌，使整个大会气氛十分活跃。

不料，欢迎会开始时，国民党肤施县党部的特务分子蓄意捣乱，收买了几个二流子，嚷着要见陈嘉庚，我们的公安人员当即把他们抓了起来。

欢迎会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主持，他代表边区政府致欢迎词。他说：“抗战以来，南洋侨胞尽了最大力量帮助祖国抗战，捐款总数在二万万以上。陈先生在二届参政会上还提出反对汪精卫投降妥协的议案，这些都表示了海外侨胞热烈拥护祖国抗战的精神。我们也恳切希望陈先生诸位对边区多多指教批评。”陈先生也讲了话，说明这次回国目的：一是慰劳前方将士和军民，二是考察后方生产建设情况，并强调说：“南洋一千一百万侨胞最关心的，就是国内团结问题，今后应消除一切磨擦，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侯西反、李铁民、寿家骏也应邀相继讲了话。特务分子寿家骏的讲话，竟别出心裁地多出一场戏。在他讲话结尾时，高喊了两句带有煽动挑拨性的口号：“蒋委员长万岁！”“陈嘉庚先生万岁！”“蒋委员长万岁！”本是蒋家王朝经典中不成文的法规，每会必须高呼，国民党大小官员就靠喊这个“万岁”吃饭或升官发财的；而高呼陈嘉庚先生万岁却是越出了蒋管区一切场合国民党官员行动的常规。原来这是寿家骏绞尽脑汁精心制作的一个阴谋。他以为陈嘉庚是个资本家，共产党

是决不会喊这个资本家万岁的，企图借此挑起陈对我党不满。但他却打错了算盘。当时在台上的我党负责同志洞察其奸，为争取尽可能多的爱国人士，维护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即带领群众高呼了“陈嘉庚先生万岁”的口号。可是蠢如笨猪的寿家骏还自以为得计，他根本不理解在我中国共产党的心中，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又有民族资产阶级和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张团结抗战到底的陈嘉庚，比“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准备投降日寇的蒋介石来，其“万岁”的资格要大得多了！

当天晚上，居进科长向我们汇报说：陈嘉庚这次来延，是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才成行的。陈到西安后，国民党特务就把他的住址对我进行封锁，当时幸有朱总司令正住在办事处，总司令亲自出面交涉，蒋鼎文、胡宗南不得不让陈与朱总见面。总司令曾两次邀陈来办事处，都被蒋、胡等借故阻止了。为此陈对国民党特务包围很不满，曾向总司令说明原由并表示歉意。居进同志还提到他经洛川的路上，接到了一份以诬蔑共产党为内容的向陈嘉庚告状的呈文。我们即要居科长翌日早晨立即交陈。陈先生看了居科长交给他的告状信后，说：“我们到洛川后一路已收到了四五份。这类文件虽分批由人递交，但我阅其内容与文笔皆出自一人之手。我们看后已即撕毁掷出车外。本不愿贵党知道有这类人所干的事。此件可能是误投给您了。”说着便把文件撕碎掷入纸篓。

六月一日，由我们陪同陈先生、侯西反、李秘书及寿家骏参观了女大。朱总亦到女大陪同参观。参观完毕正准备坐车回交际处，没想到李秘书在上车时碰破了头，在女大医务所略加包扎后，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由交际处同志陪陈先生先回交际处；由

我与寿家骏送李秘书到中央医院。当时医院条件很差。为了对李特加照顾，院长和医务人员把一间仓库腾出来，打扫干净，消了毒，糊上窗纸，一直忙到傍晚大约七点多钟，才布置出一间单人病房。等把李秘书安顿好，天已全黑下来，那天晚上正好有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欢迎陈嘉庚联合举办的晚会，我们见时辰已晚，急忙往回赶。真是“祸不单行”，愈急乱子愈多。车到离杨家岭不远的路上，开过一条小河上岸时，由于司机不慎，车子向左一歪，翻了个四轮朝天。幸而斜坡不大，且是草地，没有伤人。我和司机摇开车窗玻璃狼狈地爬出来。而那位寿科长却吓得魂魄出了窍，蜷卧在车内，我们叫他也从窗口爬出来，他不敢。司机同志徒步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叫了十来个同志帮忙，才把车翻过来。这时我向党校大礼堂那边一望，人们正四散走去，知道晚会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我才知道，六月一日下午，陈、侯两位已按预定计划去杨家岭见了毛主席。主席与他们谈话时，朱总、王明等参加作陪，两个女大的闽南学生作口头翻译。陈嘉庚对我党进行反磨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主席耐心地向他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被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毛主席还说：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

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谈话后，主席又请陈、侯吃了晚饭。晚上由主席、朱总、王明陪同参加文艺晚会，并由当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致欢迎词。

由于李秘书住院治疗，陈先生不得不在延安多留了几天，而我们正高兴他可以有机会对我们边区进行较深入的了解。

二日上午，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会见陈先生等三人，向他们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及实际状况，并说明现在准备实行“三三制”组成的政权。当陈先生知道我边区早已废除保甲制度，由村民直接选乡、村长，自己管理政权时，十分高兴。

翌日中午，女大 华 侨 和 闽南 同学去中央医院慰问了李秘书后，就来看陈嘉庚先生。大家正一起吃午饭，这时朱总也来了。陈先生一见朱总，急忙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在谈起两党间磨擦不断发生时，朱总气愤地说：“这都是那些不良分子搞的鬼。他们制造磨擦，反而归罪于我们。从军备上说，三年来政府没给八路军一支枪，一颗炮弹。从三九年秋开始，连子弹也不发一粒了。从作战方面看，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抵抗了与国民党正规部队几乎相等的敌人，作战十分英勇。就拿山西为例，山西前年遭到日寇进攻，阎锡山的军队顶不住，向重庆要求撤退，企图西渡黄河到陕西，被白副总长驳回。白副总长说：‘你们前面有三万共产军，他们处在第一线的能坚持，你们防守在后面的十万大军为什么反而要撤？’命令阎锡山死守，这样才顶住了日寇的长驱直入。可见，当时如果没有我军在第一线英勇奋战，阎的十万大军早就跑掉了。今天日寇不但要占领

山西，而且严重威胁着陕甘川。”听了朱总这番话，陈先生沉思良久、默然不语。吃过饭，朱总请陈先生一同去抗大三分校参加欢迎会并纪念该校成立四周年。陈欣然领诺。

朱总、陈、侯到三分校时，大会还没开始。篮球场上正进行着球赛，观阵的学生们的呐喊声响成一片。一个学生看到朱总来了，高兴地跑过来拉朱总去参加比赛。朱总笑着，爽快地把外衣一脱，顺手扔给我，让我陪陈先生他们去休息一下，自己就跑上场去了。我本想带陈、侯到房间里去休息，但他们都不想走了，瞪着两眼看朱总在场上和学生们你争我夺，玩得热火朝天。陈先生感叹地对我说：“如果不是今天亲眼看到，我是难以相信的。贵党上下平等，亲密无间能做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钦佩。”会后，举行了会餐和联欢晚会，陈先生等深夜才归。

陈先生在会上听第三分校校长许光达说：抗大已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几万军政干部，今后还要继续发展。许并援引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的话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我们已办了一个总校七个分校，将来还要继续发展。陈对此表现出忧心忡忡，认为这将引起国民党疑虑，增加两党的磨擦。

果然，第二天当八路军留守部队司令肖劲光来看他时，他就说：“昨天听校长讲话，说还要开办四五个分校。你们这样扩充军队，必使中央疑虑，磨擦怎么能停止？”肖司令就向他解释：“我们扩军都是在中央无法发展的敌后进行的。现在日寇加重了在敌后的力量，不断进行大规模扫荡。我军生活待遇微薄，军备条件更差，不扩军就无法抵抗强大的敌人。而且有一部分国军总从背后袭击我们，千方百计地要消灭我们，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还搞了一次反共“围剿”。这次“围剿”被我们打退后，又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真是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况且中央的扩军比

我们要快得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们扩军抗战，都在敌后，不是用来搞磨擦、打内战，只是为抵抗敌人，为自卫和破坏敌伪政权。我们不扩军，在这种前后夹击的处境中只能被消灭。”经过这番解释，陈先生表示谅解了。

这天，我们还安排陈先生和寿家骏与边区政府建设厅长刘景范同志会见。见面时我介绍刘厅长是著名红军将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创始者刘志丹同志的胞弟。陈先生很高兴，向刘详细询问了边区工农业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刘介绍说，陕甘宁边区是个老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已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也已实行减租减息，因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农业产量也有很大增长。地主也分得了一份土地，只要自己肯参加劳动，生活也能够过得很好。陕北荒地荒山很多，政府鼓励农民自由开垦，就是从河南或其他国民党地区逃荒来我区的难民，政府也负责安置。第一年给以必要救济补助，使他们能安居下来，有饭吃有窑洞住，逐步做到生产自给或自给有余。这些措施使当地农民或外来的难民生活普遍比以前有所改善，工商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原来延安的商店不到二十家，且长期受国民党掠夺剥削，一九三八年刚刚有所恢复，又被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旧城除少数居民的窑洞外，全城已变成一片瓦砾，现在的商业区新市场，比延安旧城兴旺发达得多了。陈先生有兴趣可到新市场去看看。公家还在延安、安塞开办了几个新工厂，这几个工厂虽小，但是能生产一些纺织品、皮革、被服、纸张、肥皂等，供给党、政、军部分需要。陈先生听后很赞赏。

这天上午，侯西反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这次会见。陈先生致电阎锡山，说明因侯、李二人需要休息几天，要延迟去山西克

难坡的时间。

陈先生是远住海外的资产者，受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和重重封锁，使他对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恶魔”，在共产党的地盘上，“不但资本家没有生存的余地，而且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谣言，信疑参半。在女大参观时，他碰到了几位华侨学生，就请她们到招待所来玩。一次两个女生到招待所来，陈先生详细问了学校的生活情况，听到学生们星期天还要去附近农村宣传抗日思想、宣讲卫生知识等很感兴趣，就问这种宣传有没有成绩。学生回答说：“效果可好了。过去外省总挖苦陕北人不讲卫生，一生只洗三次澡，如今每当暑天常见有老百姓与机关干部一起下河洗澡，还常洗衣服。老百姓对抗日思想也接受得很快，他们努力生产，积极支援前方，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我们听许多老干部说，他们刚到陕北时看到许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的，不少十几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现在生活好了，这种情况不多见了。”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陈先生就留她们在招待所吃饭，想到两个女孩要摸黑走十多里路回学校，又不免有些担心，就问她们自己徒步回学校怕不怕，需不需要派人送一送？我们在场的人都笑了。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有问题了。”陈先生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陈先生很喜欢和学生闲谈，我们这些人说的话他不一定相信，华侨或闽南的学生们说的话他就很相信。一次他们来看陈先生，谈到边区实行政治民主，老百姓自己选举村长、乡长和县长，陈嘉庚先生这时把他的疑问提了出来：“老百姓不识字的，多，不会写自己想选的候选人的名字，怎么选举呢？”他们告诉他：

“开选举大会时，候选人都背对着群众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每个人身后放一个碗，候选人看不见老百姓谁选了谁。监选人按应选出的名额给每个选民发几粒豆子，选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里。最后，谁碗里的豆子多谁就当选。这就是无记名投票。”陈先生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他风趣地称我们的选举是“豆子选举”，它体现了共产党办事公道，真正实行民主为老百姓办事的精神。陈还问：“我刚到那天开欢迎会，有几个人捣乱是怎么回事？这些人被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学生回答：“每次开会总少不了几个捣乱分子。我们把他们抓起来教育教育也就放了。”

有天午饭后，陈先生和侯西反到新市场去散步，见到路两边的大小商店，就问同行的招待科长金耐同志：“这些商店是政府开的吗？”金耐回答说：“除边区银行、新华书店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外，其它绝大多数都是私人的。”但他们仍不信，回招待所后又问南洋的女学生。几天后，边区财政厅长南汉宸同志和边区银行行长曹菊如同志（曹是龙岩人，与陈是老乡）来拜访他，他又问起这事。南汉宸同志是长期做统战工作的，知道陈必很关心此事，就详细地向他说明了我们的政策：“商店都是私人办的，与政府无关，我们财政厅只管银行。合作社是群众集体合资办的。”陈嘉庚又问：“这些办商店的每家能有多少资本？要抽多少税？”南汉宸厅长已听出他所顾虑的问题，就说：“资本有多有少，多的十万、二十万，少的数十元、上百元。我们支持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在边区做生意，对他们办的商店抽税很轻很少。我们废除封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能够得到发展。他们发展得愈大愈快，对我们愈有利，有利于城乡交流和自力更生。又因为国民党不但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封锁，经

济上也卡我们。而私商，特别是大的私商有能力向西安或三边其它国民党统治区做买卖。因此我们希望发展有利人民的私人商业。”陈又问：“对农民怎样抽税呢？”南说：“这要根据收成好坏来定。每季收入超过四百斤的每百斤抽几斤交税，不到四百斤的就免交。我们部队自己还种粮食、蔬菜，既保证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这样，陈先生才开始改变共产党有产必共的看法。

毛主席后来又和陈先生进行了多次交谈。六月四日下午，主席到交际处与陈嘉庚谈到晚上十时左右。刚告辞出了陈先生的门，又进了住在隔壁的寿家骏的房间。陈先生以为主席很快就会出来，想送别他。于是在门外等着，等了一阵不见主席出来，就回到屋内，过一段时间再出门看看，看了两三次，总只见主席的警卫站在寿科长的门前，他只得回屋睡觉了。第二天才知道主席与寿家骏谈到深夜才回去。共产党的主席与国民党的一个科长谈这样长的时间，这种诚恳谦虚的态度，使陈先生大为感慨。

六月七日，李秘书伤好出院，因阎锡山催得很紧，陈先生决定启程离延。晚上，在中央大礼堂召开了欢送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洛甫、肖劲光等首长出席了大会。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致了欢送词，他说：“今晚我们欢送我们的侨胞领袖陈先生一行，他们在延安曾给了我们很多指教，这是我们非常感谢的。我们坚持抗战已经三年了，经验证明只要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我们就一定能胜利。望陈先生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广大侨胞。”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都讲了话。他们赞扬了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从延安精神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抗战的光明前途。他们也了解了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决心，了解到延安真象，打破了

国民党对我们的造谣诬蔑。

六月八日，陈先生一行离开了延安。我和交际处的同志们把他们一直送到宜川，大家恋恋不舍地握手告别，我对陈嘉庚说：“希望陈先生以后能再到延安参观，我们还将热烈地欢迎你们。”陈先生很高兴地答应了，然后坐上阎锡山派来接他的汽车。汽车开远了，陈先生还频频回头向我们招手。

十年后我再次见到陈嘉庚先生，已是在解放后的北京了。陈先生已经担任了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务。这次见面使我们感慨万千。想当年他刚到延安参观时，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的宣传，对我们很不了解，还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但由于他为人正直，尊重事实，勇于接受真理，仅仅经过八天的参观访问，就使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我们由怀疑而转为同情信任。在那次考察回去以后，他热情地向国内外宣传延安真相。在国民党举行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把延安与重庆作了对比。他还常对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虽然国民党多次暗示，并对他施加压力，他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昧着良心说话。他走一路宣传一路，使蒋介石很恼火。蒋要派人“陪同”他一起访问，被他严词拒绝，终于遭到蒋的迫害，一九四二年国民党当局除去了他的参政员身份，特务分子不断骚扰他，使他不得不在爪哇隐姓埋名达十年之久。正是由于他这种始终不渝的爱国精神，使他走上了与我党合作共事的道路，活跃在统战工作的战线上，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力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鹰厦铁路，就是他提议修建的。陈先生的爱国行为，人们不会忘记，他的爱国精神的确是值得高呼“万岁”的。

对顽固分子何绍南的斗争

绥德是我八路军在陕甘宁边区的留守部队绥德警备区的所在地。它既是我们对抗日伪的黄河河防要地，又是延安和边区来往于华北、华东以至华南各解放区的交通要道，因此国民党和我们都很重视这个地区。一九三七年九月，原国民党八十六师一部分，奉命开赴绥德前线，所遗葭县、米脂、吴县、绥德、清涧等五县防务，移交我八路军接管，一九三八年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同志去接防。而国民党则早就派反共专家何绍南任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这是国民党安放在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防地的一个反革命钉子。

何绍南是保定陆军学校第五期的毕业生，在东北军任过军团参谋长、军长、伪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部高参等职。一九三六年假借国民党政府“放赈救灾”的名义，在我晋、陕苏区周围大肆收集情报，并亲拟反共方案“陕北施政建议书”，因反共有功，被蒋介石委为绥德专员。他利用国民党政府任命的所谓“正式官员”身份，在我解放区内部长期进行破坏活动，作恶多端，绥德军民对他恨之入骨。

这个骄横跋扈，专事破坏统一战线的反动分子，我曾与他打过两次交道，争锋相对，进行斗争。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九月间，他路经延安去西安，在启程

前，他竟狂妄自大地发了个电报给毛主席、边区党委书记高岗、边区政府代主席高自立，要他们亲自到飞机场去接他。党中央决定对他置之不理。国民党驻肤施县党部的书记长，CC分子高仲谦等原打算组织他的喽罗到机场搞盛大欢迎，遭到肤施县长马豫章的严词拒绝。高仲谦等感到何到延安必将受到冷落，遂临时改变方针，安排在延安东门口去少数人表示欢迎。如此才得到马豫章同志的同意，并报告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决定由我出面联络。

何到延安的时间，他自己故意安排在上午九时左右，我与马豫章及高仲谦等刚走出延安东门口，见何绍南一行已过了延河。见面时，高仲谦首先向他介绍说：“金先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我们与之寒暄握手，以示欢迎。谁知何一见面立即对我说：“金先生，我要见毛泽东先生，我要和他谈谈。”我见他出言不逊，心中十分愤慨，勉强抑制自己情绪，克制地说：“何专员来延安，我们是欢迎的，你要求见毛主席，我当代为报告。如果主席抽得出时间，可能会接见你的。”而他竟毫不自觉其所处地位和处境，仍蛮横无理地说：“我很忙，很快就要走，希望现在就能见到毛先生。”我一听火冒三丈，瞪大眼睛冷笑地说：“噢！何先生来延，我们本来很欢迎，并希望你能在我们政府招待所宽住几天。你要求见毛主席，我已说过可以代为请求，既然何先生急于赶路程，那就只好请何先生自便了。”何绍南未想到会碰到这样的钉子，弄得张口结舌。我与马豫章会意地看着这位用民脂民膏填得脑满肠肥的专员如何下台。高仲谦见势不妙，为了打破僵局，寻找退路，急忙转弯说：“何专员今天一定不走，不走了，就请何专员到我们县党部去小住几日吧！”此时，何绍南自知自己讨了没趣，只好顺着台阶，立即表示同意高的挽留，与我们

告别后，他就随高等向宝塔山南面国民党肤施县党部走去。

我回交际处后立即将详情电话报告了富春同志，我气愤地说：“何绍南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他竟狂妄自大到如此程度，要求今天就在延河边会见毛主席。”我并向富春同志建议说：“我看毛主席不必见他了。”然而何绍南在国民党内还任陕北党务工作督导团团长，负有指导绥德附近各县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使命，他到延安，见不到毛主席，不仅在喽罗面前失去光彩，对上也无法交待，到西安后，更无吹牛的资本。因此他一定要见到毛主席，就不得不在国民党县党部的窑洞里恭候数日。

三天后，我们接到富春同志的通知，说毛主席决定第二天接见他，并请他在机关合作社食堂吃午饭，同时邀请高仲谦参加。富春同志对我解释说：“何绍南这个人虽然很反动、蛮横，但是我们对何绍南的态度不是对他个人的问题。现在国共合作抗日正处在危急时期，为了争取国民党多数人团结抗日，我们对何那样的顽固分子也要做到‘仁至义尽’。”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曾派联络秘书周小舟同志与何谈了话，给何以严厉的批评，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毛主席才决定见他的。

何绍南到延安来的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准备投降日寇已经成为最大危险的时候，他们的反共活动，正是准备投降的步骤，而且何绍南本人就在不久前唆使他的保安队同驻守在瓦窑堡杨家园子的我部发生过冲突。因此毛主席在接见他时，首先讲了挽救民族危亡，必须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说明我党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合作的方针，明确向他提出了国民党正在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毛主席要何看清形势，不要再根据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搞磨擦，希望他和我军保持正常合作的关系，共同巩固河防。毛主席在与何的谈

话中，对何绍南一贯搞磨擦没有直接批评，但重述了不久前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精神，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抵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何绍南在我党领袖毛主席面前，只得点头称是，虽有狡辩，但始终不敢胡来。富春同志和我只是听主席的谈话，观看何绍南满面刁顽的表情，心里仍感到不甚痛快，终席一言未发。

同年冬，何绍南从西安返绥德，又路经延安。这次他吸取前次的教训，表面上有所收敛，未敢通知我们去迎接，自己悄悄地住进了国民党肤施县党部。其实，我们驻郃县和三十里铺的检查站早有报告，知其已到延安，我们只是故作不知，对其置之不理罢了。

他到延安的第二天晚上约十时许，我接到高仲谦的电话，说：何专员昨已到延，他要求见一见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请我代为报告联系一下。何绍南在电话旁听到高某的措词似有损于他“堂堂专员”的体面，他又想要一耍威风，竟将电话一把抢过去，自己对我报告说：“我是何绍南，今天晚上我要会见肖劲光主任。”我一听，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哪有来客或朋友指定时间立即会见主人的道理，但是我仍客气地回答他说：“噢！你是何专员，失迎了，你的要求我当代为报告，现在肖主任已经休息，无法联系了。”他在电话中竟大发雷霆，叫喊道：“一个堂堂的军事机关，晚上竟无人值班吗？成何体统！”我沉着讥讽地问他：“何先生你有什么紧急军事情况急于要向肖主任汇报呀？”他一听语塞，无以答对，只好把电话砰地放下了，又一次只得静候我们的答复。肖劲光同志为了做好统战工作，对这个死顽固分子，仍以

礼相待。第二天中午又接见了，并设宴予以招待，我们明知“口吐莲花，顽石是不会点头的”，但是仍对他做了许多宣传解释。

就这样，他两次过延安，两次搞哄骗吓诈，企图壮大他的声势，都被我们顶了回去。我们深知顽固派的装腔作势，实在是一种理亏心虚的表现。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即山西新军，解散了牺盟会，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胡宗南的军队袭击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枸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何绍南这时搞磨擦日趋猖狂，组织他的保安队攻打八路军。

在这之前，为了粉碎蒋介石、阎锡山挑起大规模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的阴谋，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军委在八月七日下午令将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由华北恒山地区调来绥德，由王震同志接任绥德警备司令员。

王震同志是我党最优秀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治路线、政策、方针理解很深，他既善于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朋友，做好统战工作，又敢于蔑视一切敌人，战胜一切敌人。在王震同志任绥德警备司令员期间，与二十二军邓宝珊、高双成等将军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王震同志对何绍南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因此对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部队到达绥德不久，就在飞机场召开了一次军民团结大会，会上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同志亲自讲了话，何绍南也以专员身份被邀参加，袁任远同志在讲话中坦率地警告何绍南，着

重指出，“我们三五九旅是前方抗日有功的部队。这次从前方回来，是为了搞好国共合作，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巩固河防的。一切主张抗日到底的人，应当真心欢迎，给予我们真正的支持。若有人企图搞公开的或秘密的破坏，势必受到人民的惩办。”何绍南见揭露了他的真面目，虽不敢公开申辩或答复，却对此怀恨在心，伺机捣乱。他深知蒋介石的“溶共”“限共”的反革命政策已发展成“灭共”的政策。因此他得意洋洋，气焰嚣张，反而加紧了反革命活动。

这一期间，何绍南的反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加紧了“点线工作”。所谓点线工作，就是以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安、甘泉、鄜县为一条线，以各县国民党县党部或秘密的特务组织为据点深入边区进行特务活动，破坏边区的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社会秩序，以达到里应外合消灭边区的目的。（2）我们准备在绥德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派女大工作团到绥德进行这项工作。何绍南视女大工作团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女大工作团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组织民主选举时，派特务盯梢、设置种种障碍，还欺负工作团女同志多，用打石头等卑鄙手段进行恫吓，企图破坏民主选举工作。（3）何绍南猖狂地把其保安队的机枪阵地设置在八路军绥德警备区司令部的对面，将机枪口正对着我司令部。王震同志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将迫击炮阵地设置在何绍南保安队司令部对面，炮口对着他们。

王震同志还在绥德人民群众和地方绅士中揭露何绍南搞磨擦的罪行，广大群众纷纷要求逮捕何绍南。何看到形势不妙，害怕王震真的逮捕他，就在一个夜晚带着保安队，如丧家之犬偷偷逃出绥德，窜向米脂。

何绍南逃跑，老百姓兴高采烈，绥德的士绅们不但进步分子

扬眉吐气，中间分子以及右翼分子也都很高兴。大家纷纷议论，众口一词地说：今天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八路军！

原来，绥米的开明士绅、地主、商人、高级知识分子的中间和右翼，抗战以来在国共两党之间，多数采取的是两面摇摆态度，但是屁股还是坐在蒋介石一边。他们对我们的减租政策有抵触，对交公粮的态度也不积极。表面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若即若离。那时他们最典型的做法是将女儿、孙女送到延安抗大，陕公学习，而把儿子、孙子送到西安去读书。但从王震同志到来并与何绍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后，形势大变，他们的态度也随之变了。这真是斗跑了一个，争取了一大片。

当然，国民党顽固分子又是另一种态度。肤施县党部的高仲谦在何绍南逃走后，就对我说：“中共统战工作本来做得很好，西安事变时，主持公道。把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但这次你们王旅长……”还没等高说完，我就严正地说：“这正是何绍南搞磨擦的必然结果。”把他顶了回去。

一九四〇年二月，林老、肖劲光又代表边区政府联合发电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犯官何绍南，给何列了七大罪状：（一）贪赃枉法，何本人贪赃十余万元。（二）侵吞赈济款。（三）冒充八路军私贩烟土。（四）纵兵为匪，在清涧，贺家湾一带抢劫。（五）组织暗杀队，杀害八路军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等。（六）密派爪牙潜入边区建立点线工作，加强他们的特务间谍活动，企图里应外合破坏边区。引诱收买地主分子和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成为破坏边区社会秩序的消极因素。（七）指挥保安队用机枪扫射八路军人员，致死伤官兵数十人。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党在榆林方面与邓宝珊、高双成的统战关系。何绍南逃至横山后，仍积极布置反共阴谋，强拉民夫，编作武装队伍，以备

进攻边区之用，等等。

何绍南得到的正是顽固分子的下场。听说解放后他有一个亲属在天津市工作，发现何绍南躲在天津市郊某农村，即向人民政府告发了。何被抓获后，解送绥德地区，在一九五四年，同反革命分子艾杰三一起公审处决了，成了众叛亲离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来去自由”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全国抗战的指导中心，象一座光芒万丈的灯塔，吸引着千百万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抗日志士。那时，大批爱国青年、仁人志士怀着景仰解放区的心情，从沦陷区、从大后方、从海外各地，冒着日寇的炮火和空袭，冲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阻挠，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奔赴延安，到这里探求真理，参加革命。

接待和安置这些投奔延安来的人员，就成了我们交际处的日常工作之一。

在这些投奔延安来的人员中，有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国民党军政人员、农民起义领袖、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各类学有专长的能工巧匠，真是人才荟萃、济济一堂。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增添了力量、生气和宝贵的知识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交际处在热情接待这些朋友的同时，还担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及时向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反映他们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

从那时到现在，时隔四十余年，当年带着各色各样的观点和思想感情投奔延安的同志，绝大多数人对党有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信心，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和实践，在党的培养下

成长进步，至今已是我国各条战线上得力的领导干部或专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然，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有时甚至需要反复多次。当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人们也不例外。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在来延安之前，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没有实际的感受，对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而是抱着很多不切合实际的美妙幻想，凭着一股热情和勇气而来的。及至走上工作岗位，在实际生活中一体验，感到现实同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特别是头脑中原有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与革命队伍中的集体主义、埋头苦干精神格格不入时，就感到失望，产生苦闷，灰心泄气。在革命阵营的大熔炉中，这些人中的多数人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逐渐克服自身的弱点，摒弃头脑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杂质，安心地在解放区工作下去，最终百炼成钢；也有个别人尽管对党对抗日根据地还是有好感的，但因各种原因，不能适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环境，在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向组织要求离开。

对个别来而复去的朋友，我们的统战工作应采取什么政策？这是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虽然这部分人数量不多，影响却不小，必须正确处理与对待。

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地定下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

记得这一重要政策确定下来后，往下贯彻时，党员干部中有许多人不理解，甚至个别人还抱有抵触情绪。毛主席针对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对“来去自由”政策作了深刻而明确的解释。他说：我们党长期以来实行争取一切可能与我们合作的人做朋友的方

针，争取他们来延安，来边区，来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这种革命的朋友越多越好，这点大家都没异议。但是争取朋友参加革命，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人参加革命，完全得凭他的自觉自愿，凭他自己的觉悟程度。有的朋友对我们党的宗旨、路线、方针政策不很理解，对我们的工作制度、工作方法或生活习惯感到不能适应，觉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某些东西更适合他的口味，因此来了以后又想出去，那么就让他出去嘛。强扭的瓜不甜，勉强留下的人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过去他对我根据地是慕名而来的，现在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将来他回国统区后，又会以亲身经历将我解放区和国统区再一次作比较，那时他的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了。他如果觉得还是我们根据地好，想再来，我们再欢迎他。他是经过反复认识、比较又一次确立参加革命的信念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欢迎他呢？我们的同志还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吃饭的，大家认定马克思、列宁是我们的好教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不但需要正面的教员，还需要反面教员。我们的反面教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我们是靠了正、反两种教员，才被教育成为革命者、共产党员的。对我们的某些朋友来说，恐怕反面教员的教育作用比正面教员还要大。……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个别人回国统区后，一去不复返了，甚至有个别人为了混口饭吃，替蒋介石帮腔骂我们几句。这又有什么可怕，我们要革命，就不怕人家骂，我们不就是被蒋介石骂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强大的吗？

毛主席的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作为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政党具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实践证明，我党的这一政策，在统一战线中发挥了更大的威力，收到了极好的效果。这里就我记忆中的几个最典型的事例，来加以证明。

(一)

一九三八年八月间，我们接待了一对生气勃勃的年轻夫妇，他们是从重庆来的。男的就是著名的肺结核病专家何穆同志，他是江苏金山县人，时年三十三岁，原是上海震旦大学学生，后赴法国留学，毕业于法国都鲁士医学院，来延安前是重庆一二一后方医院医师；女的是文学博士陈学昭，浙江海宁县人，时年三十二岁，留学法国时获文学博士学位，来延安前是中国文坛上颇有名气的作家。

他们由于不满于国统区的黑暗，向往延安和解放区的光明，又与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有来往，同情党，所以毅然抛弃了原来的职业，决心投奔中国抗日的模范区域——陕甘宁边区。他们带着孩子，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证明信之后，即乘汽车经成都、过秦岭、宝鸡、武功，到达西安，又在西安取得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乘上八办的交通车，到达了延安。一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盘查、刁难、跟踪，受了很多周折，总算平安到达了他们向往已久的目的地。

何穆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陈学昭身材瘦小，一副理想主义文人的风范。两个人热情很高，一到交际科就要求参观、访问、工作。我对他们说：“休息休息再工作，反正你们已经到了！”

我对他们的到来内心十分喜悦。因为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

很差，特别对肺结核病束手无策。这种病即便在中国大城市也是被视为绝症的，一个患者只要被确诊为“T.B.”，则无异于判处他极刑。我经常看到许多好好的干部和群众，包括被人们所敬爱的高级干部，就因为这种绝症而丧失了工作权利，甚至被夺去生命。如今能有何穆同志这样的肺结核病专家来，该能挽救多少党的宝贵财富，怎不值得庆幸呢？我把他们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介绍他们见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

在李富春同志的关怀下，何穆夫妇尽情地参观了延安各单位。那时我常亲自陪同他们出去访问。记得他们来时，正值日寇飞机轰炸延安，我白天就带他们到野外空旷处躲避空袭。

以后，何穆被分配到边区医院任肺科主任，陈学昭被分到边区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搞写作。开始，两个人的积极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何穆还将他带来的一部手提X光机拿出来供医院使用，陈学昭也动笔撰写《延安访问记》了。

但是，日子一久，各种问题便接踵而来。何穆参加筹备中央医院，与领导及同志间的纠葛越来越多。平心而论，何穆是有真才实学的，工作也很认真负责。但是，他的思想尚未适应战争条件下的因陋就简的边区医院制度，总认为游击习气太浓厚。而当他的正规化的建议因战争环境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时，他就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生了重回国统区去私人开业的念头。而这时陈学昭也因生活上的不适，愿意同何穆一起走。

中央接到了傅连暉同志关于何穆夫妇要求离去的报告，决定批准他们回国统区去，李富春同志代表中央同何穆谈了话。李富春同志嘱咐何穆回重庆后与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同志联系。并郑重表示，若愿意再来，我们一如既往地热情欢迎。

这样，何穆夫妇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离开延安，回到了重庆。

对于何穆夫妇的离去，我感到十分惋惜。一次毛主席来交际处会见客人时，我不由得在主席面前流露出遗憾的情绪。毛主席就对我说：“你说我们延安的窑洞好，冬暖夏凉，吃饭有食堂，穿衣不用愁，延安的空气也好。可他们说不好，不习惯，还是要回去吸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认为那里好，你留他也没有用。他们回去后，会以亲身经历来做比较，如果他们经过对比，又觉得我们解放区好，又要回来，我们再欢迎他们也不迟。决不要惋惜或看不起他们。因为经过再一次反复，他们与我们合作的信心会更足，决心会更大，也会在这里工作得更好！”

事情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何穆夫妇回重庆后刚开了私人诊所，黑暗势力的压迫即接踵而至。物价的昂贵、生计的艰难、特务的盯梢、找麻烦，……以至他们的男孩患病因经济拮据不能及时治疗而夭亡。这件事对何穆夫妇的打击很大，他们想：连一个医生的孩子都因无钱医治而死，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可取之处？

同时，他们在私人开业的过程中，经常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为同志们诊病。在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徐冰等同志的接触中，进一步受到很多教育和启发，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驱逐日寇出中国，还要推翻整个旧社会，建立自由、幸福、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何穆夫妇的生活，也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关心和照顾。一九四〇年秋，何穆生病住南岸一家私人医院。那时日寇飞机正疯狂施虐，疲劳轰炸，出门就会遇到风险，但周恩来同志还是派人打听到了何穆的住院地址，送礼物表示慰问。生活书店的中共地下党员也纷纷前去探视。这使何穆夫妇感到党的温暖，从

而产生了回延安去的愿望。

一九四〇年底，何穆收到傅连暉同志的信，说延安中央医院院长的职务还留着等他去当。这就更坚定了他们回延安的决心。他们将想法告诉了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周副主席嘱咐他们搬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住。

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何穆又动员了几个纯洁、热情、年轻的医务人员与他同行，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后来的夫人姚冷子。姚冷子千辛万苦地带了几只做试验用的荷兰白鼠，谁知到延安后，因窑洞太冷，一个个都冻死了，姚还为此哭了一场。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何穆一行十几个人，乘坐八路军办事处雇的一辆卡车，再次出秦岭、过宝鸡、过西安。一路上被国民党的关卡盘问、刁难自不待说，好不容易快到陕甘宁边区了，当车到同官（今铜川市）时，被国民党十六军的特务扣留。

这群特务整日整夜地折磨何穆一行，威逼利诱，要他们回西安去，并企图逼迫司机将汽车开到西安送何穆等人去集中营。然而何穆一行没有一个屈服的，表现很坚强。那个汽车司机是我党地下党员，他机智地对特务说，他是个雇工，只知道开车子、拿工钱，讲定了开到延安，就开到延安，别的他不管。特务对他无可奈何。他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好象在闲逛，其实他是在等候八路军的车子。终于有一天，他等到了八路军的一辆过路卡车，把被扣留的情况告诉车上的押车同志。押车的同志一到延安，马上报告中央，中央立即拍电报给重庆的周副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去向蒋介石交涉，蒋介石只得命令胡宗南放人。

经过这一次反复，何穆和陈学昭都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何穆于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中央医院院长、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院

长、北京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等职，至今还在为祖国的卫生事业贡献力量。一九七二年我因病住北大医院，打听到何穆、姚冷子两位老朋友尚健在，并还在工作，感到十分欣慰。一九八二年我和爱人陈复君同志去看他们，骤一相见，竟都不认识了。经过几度的时代变迁，特别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我和他都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我们在一起缅怀旧谊，畅谈今天和未来，真是感慨万端！姚冷子同志双目虽已失明，但她的天真、明快和爽朗，仍不减当年，她一听到我和何穆说话，就激动地说：“嘿！我一听就知道您是金城同志，您的口音和声调几十年了还一点没有变，你们来看我们，真是很高兴。”当我们共同回忆延安的一段生活时，她说：“我当时革命的道理真是懂得很少，记得那时我们一群青年同志一起闲谈时，互相询问各自的打算，我就说，抗战胜利我就回家。那时根本不知道党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参加革命久了，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小家忘了，而和这么多同志共同建立了大家。我们这个大家能够永远在一起，永远干革命！”她那和青年时期一样的精神面貌，实在可敬！

陈学昭第二次来延安以后，也于一九四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七年春，我在晋绥做敌军工作，她由于机关疏散，也来到晋绥边区，并帮助我们做了一段时间的解放军官团的工作。不久，她想去临县三交找党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我介绍她去找杨尚昆同志。

解放后她去浙江工作。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她作为人大代表来到北京，我们又得到交谈的机会。她向我详细介绍了浙江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大运动的巨大成就，也看出了不少的问题。我感到她的政治水平和分析问题能力提高很快。一九五七年她遭到一段曲折。一九六五年

我去杭州参加“四清”运动，在上海碰见陈学昭的老同学张琴秋同志，张对她很同情，特别关心她的长期在农村的女儿。我照张的嘱托也设法作了一点帮助。但很快“文革”运动来了，张和我的帮助自然也就没有下文了。

陈学昭参加革命后，写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春茶》，中篇小说《土地》，散文集《漫走解放区》等。至今她还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一九八一年浙江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她的文学回忆录《天涯归客》，受到读者欢迎。

(二)

一九四一年六月，甘肃省海原、固原和西吉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压迫的第三次武装暴动，即有名的“海固事变”。国民党反动派以六个师的兵力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大批参加起义的回民被国民党军惨无人道地抓走活埋了……起义归于失败。

在斗争的困难时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马思义，毅然率领暴动群众二百余骑，突破敌人的包围，投奔陕甘宁边区。在我党的领导下，起义群众成立了“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直属八路军留守司令部节制，驻防甘肃合水县。

同年七月，马思义带着骑兵团的几个领导干部来到延安，向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留守兵团司令部请示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工作方针，并汇报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回民的情况。他们一到延安就受到交际处的热情接待。为了做好马思义的工作，边区政府民政厅派杨静仁同志来交际处帮助工作。

马思义原是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带有回民特

有的豪爽、义气。由于涉世尚浅，不免天真、单纯，如初生牛犊，不知成事的艰难。他曾对我说过，如能把他的回民骑兵团扩大成一个师，他就可以很快地把多年盘踞宁夏、青海的马家军阀（马鸿逵、马步芳等）彻底消灭。

党中央及八路军留守司令部对马思义的到来非常重视。肖劲光司令员每隔几天就到交际处来看望他们一次。谢老、徐老、董老都以党中央的名义请他们吃饭。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也分别和马思义谈了话。

七月底的一天，杨静仁同志、姜明和我一道陪同马思义及国民党一个上校军官，还有国际友人艾黎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分别接见了他们三人。毛主席接见马思义时，亲切地打量了一下马思义，微笑着说：“你还这么年轻，很聪明。”马思义此时却反而腼腆地低下了头，他知道，毛主席所说的“很聪明”，是指他和回民群众找到了共产党领导这一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不过，你们回族人民革命了二百多年，都失败了。今后共产党一定帮助你们得到解放，把你们送回去，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主席接着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不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歧视和侮辱回民大众，而又横征暴敛，强迫抓壮丁，使人民生活困苦，所以才激起回民的暴动。从暴动一开始，国民党就采取了围歼屠杀政策，这更是令人痛心的事！但也是意料中的事。

毛主席阐述了我党的民族政策，并对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工作方针做了指示，说，我们党实行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坚决反对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主张各民族间的友好团结，共同

抗日。我们欢迎你们率领暴动群众来边区，我们边区是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窑洞大家住，有日（日本侵略军）大家抗。

最后，毛主席说，希望你们把回民抗日骑兵团办成一个学校，为革命多培养人才。

马思义告辞出门时，毛主席还嘱咐说：你回去代我向那两百多位战士问好！

马思义等人在延安参观访问了二十多天，自始至终受到我们的殷勤款待。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交际处单设了清真灶，还安排他们参观延安清真寺，并到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等团体座谈。住在民族学院的马国藩同志也常来帮助他了解边区的回民生活。

马思义等完成了来延安的使命，即将返回骑兵团驻地，这时我问杨静仁同志：“马思义同志快走了，我打算用回族最隆重的筵席欢送他，你说应当怎样摆法？”静仁同志回答：“按回民的风俗，最隆重的筵席是‘全羊席’。”

“什么是‘全羊席’？”我感到很有兴趣。

“‘全羊席’，就是把一只整羊杀倒剥皮后，放在清水里煮，煮熟了，将它整只搬上桌子，由客人们自己动手，撕下羊肉，蘸葱、蒜、酱油拌的调料吃。”静仁同志说。

“这好办，我们就在交际处摆它一桌‘全羊席’好了。”

“还有，”静仁同志补充说，“杀羊之前须请阿訇念经。”

我按照静仁同志说的，买来一只肥大的羊，又请来了一位阿訇。在杀羊的时候，阿訇只念了一句，就把羊杀倒了。我问静仁同志：“不是说阿訇要念经吗？”静仁同志说：“念过啦。”我说：“我没有听见呀。”静仁同志笑着解释说：“刚才杀羊前阿訇念的一句话就是念经，意思是让羊升天吧。”我这才明白过来。费了很长

时间，羊终于煮熟了。我们欢欢喜喜地将全羊摆上筵席。客人除马思义和骑兵团领导干部外，还有马国藩同志作陪。大家动手吃之前，先由最主要的客人——马思义，用刀子羊头上割下一块肉，向天上一掷，意思是将羊肉献给真主。我们还把羊内脏做成一碗一碗的菜端上筵席，马思义和骑兵团的同志都吃得很高兴。

八月间，马思义满载收获，偕同党派到骑兵团任政委的杨静仁同志，返回骑兵团驻地。

数月之后，我突然听到马思义的骑兵团已离开陕甘宁边区的消息，感到很意外，就去问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和政治部主任莫文骅。他们告诉我，马思义和骑兵团自己提出要走，毛主席亲自批准了。主席指示我们说，马思义要走，让他走，而且要好好欢送他。他来时我们如何欢迎，走时仍如何欢送，规格不要降低。他带来的一人一马一枪一弹全部让他带走，一样也不要少他的。在陇东的王维舟、杨静仁同志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了。据说还开了欢送大会，演了戏，临别时还会了餐。

我分析马思义和骑兵团离开边区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战士们乡土观念重，想杀回家乡去；二是马思义本人报仇心切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回民重感情，讲义气，离家乡久了，不免思念亲人。骑兵团战士们和马思义本人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不懂得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念，又使他们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因此迫不及待地要回乡报仇，终于导致了整个骑兵团的离去。

马思义和骑兵团一离开陕甘宁边区，立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再次遭受损失。马思义几乎落到“长板坡”中赵子龙的单枪匹马的地步。他经过前后对比，真正认识到了要求得

民族的解放，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道理，终于又一次率领部队投奔边区。

这支部队后来经过几次整训，成为党领导下的强劲的人民武装部队。在保卫边区的几次战斗中，在解放战争中，一面与敌军作战，一面做回民群众的工作，经受了锻炼，立下了战功，并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回民干部。马思义本人也锻炼成长，入了党，成为我军优秀的指挥员。解放后他曾任宁夏军分区司令员，为党忠心耿耿地工作。可惜的是，他在十年内乱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迫害，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三)

一九四三年春，专攻法学的知识分子谌厚慈，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同国民党进步人士胡仁奎一道来到延安，成为我交际处客人之一。

此人一望便知是河北人，带有典型的北方人特征——高个子、紫红的脸膛、厚嘴唇、粗线条。说话直来直去，性格耿直、倔强。

我交际处以较好的待遇照顾他的生活。他住下来以后，每天参观、学习，后来当上了延安高等法院的顾问。我知道此人曾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过，后来又去了大后方，至于他为什么来而复去，却不大清楚。天长日久，我从同他的交谈中渐渐了解到他的经历是这样的：

谌厚慈是河北省迁安县人，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后在上海法政大学肄业。

他从一九二二年起，即投身于政治斗争。于一九二二年参

加国民党，曾任上海学联执行委员兼交际部长，参加过上海“五卅”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谌厚慈反对蒋的背叛行为，因此获罪，被蒋通缉，不得已流亡海外。在南洋各地，他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海外革命同志会，被国民党新加坡海外总支部告发到南京，南京当局将其开除出党，再次通缉。他被当地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一九三〇年，他又在河南、山西、京津等地进行反蒋活动，一九三一年赴广州参加反南京国民党非常会议。一九三三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在港、粤、桂、闽等地继续进行反蒋活动。

这样一位不屈不挠的反蒋抗日人士，自然受到我党的重视。一九三八年，我晋冀鲁豫解放区领导同志聘请他到解放区来工作。谌厚慈艰难曲折地奋斗多年，终未施展他的抱负，如今有全国抗日的模范地区——解放区来邀请他，他自然是欣喜万分。来到解放区，先后任冀西游击司令部总参议、冀南抗战学院教育长、经济委员会代主任、冀南参议员、太行太岳冀南行政联合办事处常务行政委员兼司法处处长等职。

然而使他认为不愉快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九四一年，他因司法与行政、立法关系问题与我党发生意见分歧，他所坚持的“三权分立”思想受到批驳。他感到不能按照自己的观点行事，面子上也下不去，因而不辞而别，离开了解放区，投奔到当时还没投降日寇的国民党“杂牌军”孙殿英部。不久，在由孙殿英部转庞炳勋部的途中，被国民党四十军扣押，由林县解到洛阳，坐了一年监狱，经各界友人联合保释，才被救出。

这场灾祸使他醒悟，认清还是共产党讲道理，办事公正，作风清廉，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于是他决心再回解放区。

一九四二年，他辛苦辗转，来到重庆，再与八路军办事处取

得联系，终于在一九四三年春再进解放区，来到抗日中心延安。

谌厚慈在延安住了近两年，除了作高等法院顾问的工作外，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在延期间，恰好原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在延安，他们相互作了自我批评，虽然谌厚慈仍抱着他的“三权分立”的法学观念不放，但过去的不愉快的矛盾纠葛总算释然。

我们交际处对谌厚慈始终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在生活上优待他，把他当做好朋友看待。

一九四四年夏，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由于来的人突然增加很多，交际处不得不动员长住的客人暂时分散到延安其它机关住一下。谌厚慈被动员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暂住，生活上仍受照顾。但当时延安有些同志对党的“来去自由”政策不理解，目光不够远大，胸怀不够开阔。一位高等法院的负责同志骂谌是“逃兵”、“厚颜无耻”，使谌气愤至极，常来找我发牢骚，甚至仍想拂袖而去，我只好又请他搬回交际处住。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交际处向中央打了报告，对谌厚慈的问题提出了我们的意见：

“最好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给他以工作机会，从具体革命实践中去锻炼他较为妥当。行前希望中央负责同志（最好是尚昆同志）同他谈一下，作必要的解释，很重要。并优礼送之。”尚昆同志看了我们的报告后，找谌厚慈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进一步听了谌的意见，并作了解释、教育工作。不久，中央决定谌厚慈到晋察冀解放区去工作。十月间，谌厚慈从延安出发，先到张家口，继至冀察热辽，先后担任过冀东纸业公司经理、冀东行署交际处处长、冀东行署教育厅副厅长等职。解放后，他历任河北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人

大委员、参事室副主任等职，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作出了贡献。

(四)

当然，并不是所有要求离开解放区的人最终都又重返解放区，也有去而不返的。

比如，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原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上尉机长刘善本，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毅然驾驶 B-24 飞机起义，飞来延安，给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政策以沉重的打击。

与刘善本同机到达延安的，还有十个人。这十个人中，只有二名机组人员，其他都是搭乘飞机准备去昆明探亲、办私事或做生意的。如有一个国民党某无线电厂副厂长，叫陈泰楷的，就是以无线电材料做生意的，他身上带有许多黄金白银。这十个人并不知道刘善本要起义。甚至当刘善本驾驶着飞机在延安飞机场降落的时候，他们还蒙在鼓里，以为飞机落在了四川雅安。直到飞机场守卫人员和延安卫戍司令部指战员前来热烈欢迎和慰问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只得先在延安住下。

经过我们的努力争取，这十个人中，飞行员张受益、唐世耀转变较快，态度积极。何辉庭等四位飞行员也随遇而安，有很大的进步。唯有陈泰楷等原来打算做生意的三个人和一位领航员不愿意留在解放区，执意要回去。我们按照“来去自由”的政策，以礼相待，将他们护送出解放区。

这几个人回国统区不久，一天，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突然飞临延安上空，很准确地对准停在延安机场上的刘善本同志驾驶的飞机，投下几颗炸弹，就飞走了。刘善本的飞机被炸得粉碎。

对此刘善本十分痛心，他怀疑是那几个回国统区的飞行员告的密，甚至是他们领航，因而大骂他们。我们就对刘善本说，他们回到国统区，想保密也不行，那边敌人逼他说出飞机的位置，不由得他不说；即便是他们领航来炸的，也不要太怪罪他们，因为他们身不由己。其实，炸毁一架飞机又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的航空事业照样会发展的。

事实证明了我们的预言。今天我们不是已经有着一支强大的空军队伍吗？

一九八三年夏，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陈欣同志出面，宴请了当年参加刘善本驾机起义的部分飞行员及亲属。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刘善本同志的夫人周淑璜同志、张受益同志的夫人夏华同志、唐世耀夫妇、何辉庭夫妇及当年延安的老同志。我作为当年负责接待并做过一点工作的统战工作者，也偕爱人出席作陪。席间，大家畅谈起义人员自参加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绩，缅怀已故的刘善本、张受益同志，同时，也为当年离开解放区的那几位同机人员至今杳无音讯而感到惋惜。

从以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事例来看，我党的“来去自由”政策不仅在历史上是正确的、成功的，而且是我党一直坚持贯彻的。正是由于我们党有这种“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精神，才汇集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推动历史前进。在广泛开展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今天，这种精神不应该更好地发扬吗？

康生的“抢救运动”与钱来苏一家

一九四三年夏至一九四四年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掀起过一个“抢救失足者运动”。这是康生为破坏整风运动和审干运动搞的一个大阴谋。康生究竟是什么人，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混进共产党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凶恶的阶级敌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命两面派、政治骗子。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的败坏，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和间接的迫害，其数量之惊人，手段之残酷，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一个奸臣酷吏，居然能够爬得这样高、埋得这样深、时间这样长，主要是因为这个家伙是一条善辨风向、善换面孔、善变颜色的毒蛇和巨蝎。康生的反革命伎俩，就是利用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别人的尸首往上爬。他的最后的目标就是篡权，为此他使尽了地主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那一套手段。所谓“四维礼义廉，三诀吹拍骗”，正是康生政治品质的真实写照。一九三〇年“立三路线”统治我党时期，康生竭力逢迎李立三同志，将立三同志定为他跟、捧、靠的目标，并在江苏省委卖力地推行“立三路线”。以后王明取代了李立三同志的地位，康生转而投靠王明，

肉麻地向王明山呼“万岁”，不遗余力地推行王明路线。及至我党克服王明路线，树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康生又象扔敲门砖一样离弃了王明，变幻面孔，用极不正常的手段“拥护”毛主席。就这样，康生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岗位，特别是窃取了党中央治安保卫的大权。

从一九四二年上半年开始，逐步展开的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深入批判了王明路线的恶劣影响，教育和培养了大批不同出身的干部，使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一致，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并为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整风运动基础上的审干运动，也是一次意义重大、十分必要的清理组织的运动。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党的干部队伍发展很快。每天都有大批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爱国志士，从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追求真理、抗日救国而来的，但也有个别日特、汉奸、国特混杂其中，钻进抗日根据地刺探情报，进行破坏活动。

又由于我们党已经多年没审查干部了。老干部中有一些人的历史需要进一步审查，以便作出明确的结论。甚至也有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投降变节分子或特务分子（如康生、陈伯达与江青之类的人），需要通过审干运动加以清理。因此，一九四三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审干运动。审干一开始党中央就特别强调，这次审干运动一定要吸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一定要重调查研究，严

禁逼供信。

康生本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明路线的忠实追随者，恰恰正是整风和审干运动的清理对象。他当然不肯坐以待毙，束手被擒，他又一次使出了以攻为守、以假乱真的伎俩，把水搅混，以便在混乱中保护自己和江青一类的坏人过关。

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康生首先制造了张克勤冤案，接着先后在中组部、延川县银行、自然科学学院等单位制造了许遇之、杜征远、肖煌、彭尔宁等冤案。抓住这些假典型，康生开始大作文章了。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他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臭名昭著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这个报告就成了变审干运动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动员令，成为很多干部和一代延安青年至今记忆犹新的恐怖信号。

这个报告信口雌黄地说：“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

“……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一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为了镇压坚决特务，我们又有钢铁的意志，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正是这个充满着哄、骗、吓、诈伎俩，又富于煽动性的报告，把审干运动引上了歧路。

一时间，“抢救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突然被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红旗党”、“坏人”……被揭露出来，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竟成了“特务”“汉奸”成堆的地方！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竟和神话相差无几。

至一九四三年底和一九四四年初，“抢救运动”已取得“重大成果”——很多单位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成为“抢救对象”。荒谬的做法必然得到荒谬的报应，既然这么多人都是“特务”，大家反而感到无所谓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笑话也就随之而生。为了鼓励“坦白”，很多单位自行决定，凡坦白者给点心、饼干吃，并在大会上戴大红花予以表彰。这样一来，说假话去“坦白”的人，反而受到优待，而说真话不肯“坦白”的人，却受到打击，真真假假，混淆不清。如我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位总务处长，是个忠诚老实的老干部，平时工作勤勤恳恳，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干部、群众的爱戴，这时却因为他下面的人——一批工农出身、历史清

白的勤杂人员——无从“坦白”而苦恼，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下面的同志们看到老处长实在太苦恼了，很是同情，私下商量说，反正“坦白”了还有饼干吃，有大红花戴，不如去“坦白”算了，免得把老处长搞得太苦。于是同志们一齐“坦白”自己是“特务”，这样，坦白者皆吃到了点心、饼干，老处长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喜笑颜开，可称上上下下，皆大欢喜！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一九四四年初，绥德县向延安推荐来一个“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其成员都是“坦白”很好的“特务”。据说绥德县的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二千六百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绥德师范挖了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这次来延的“报告团”，主要是绥德师范的师生。他们到延安后住在交际处租用的旅店里，每天分头到延安各单位去做典型发言，讲他们如何坦白，坦白之后得到的好处……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学生，硬说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的“特务”，专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的。报告团成员们象英雄一样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洋洋自得，荣辱观念全然颠倒了。我们交际处还用大米白面和猪肉粉条豆腐白菜优待他们。当时负责招待他们的交际处招待科长金耐同志讽刺这一现象说：“谁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真是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不管真假如何，反正他们猪肉粉条豆腐白菜吃了个够！”我听到金耐同志说这话，内心虽有同感，但未表露出来。我知道金耐同志对抢救运动内心是有怨气的。他本是“三八式”的干部，革命烈士金子美同志的弟弟，一个忠诚的党员。只因他在中学时代，在一次集训中集体参加三青团，这个一般性的历史问题，他早已向组织交待清楚了，但仍在“抢救运动”的浪潮中被冲击。

当时，声势汹汹的抢救运动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到我们交际处。交际处被认为是对外接触的部门，因此在内部审干时，对从白区来的知识青年和曾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审查特别严格，差不多所有的外来干部都被送到行政学院学习。名为学习，实则受审查或调离。一九四三年四月，胡宗南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他要了个两面手法：一方面派他的高级参谋胡公冕（此人曾参加过共产党，对我态度友好）以友好使者的姿态，来与我方谈判，联络；另一方面，他又派特务分子、副师长侯声与胡公冕同行，让侯刺探我边区布防情况。胡、侯来延安时，交际处只剩下一个总务科了。西北局就派本地干部赵通儒来交际处当秘书，完成接待工作。实事求是地讲，在交际处工作的四十多个干部和工作人员中，真正的特务一个也没有。个别历史上有点问题的同志，有的早在参加革命时就已交待清楚，有的在运动一开始就主动向组织交待了，按理组织上的结论也不难作出。但在怕自己思想“右倾”和惟恐完不成任务的心理状态下，我们处内四十多个工作人员中，竟有两名同志遭到逮捕^①，五名同志（包括金耐同志）被送到行政学院。我作为交际处长，虽然当时是盲目追随或奉命行事，但对此应负主要责任。时隔四十余年，至今念及，殊为内疚！

当时住在交际处的客人，有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周励武等，有党外人士于蕴文、张宗麟、钱来苏，还有朝鲜朋友金斗奉（即金白渊）、金海燕、文周等。对交际处的客人，叶剑英同志有指示：一切遵照党的统战政策办，不要去触动他们。所以尽管外面抢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交际处的客人们都很平安。只是后来，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再加上钱的儿子彭尔宁已

经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并成为《抢救失足者》小册子中突出典型人物，所以，“抢救运动”终于波及到钱来苏一家。

彭尔宁究竟是怎样被打成特务的呢？

彭尔宁，原名钱家骥，当时只有二十八岁。他一九三九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在学校期间，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他随父亲——老同盟会员钱来苏化装潜离北平，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山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打算投身于抗日活动。但实际情况使他认清了阎锡山这个山西土皇帝假抗日真反共的面貌，他很失望，于是和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联系，于一九四〇年三月结伴五六人，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改学农业于自然科学学院。在整风运动中，他以把个人的一切交给党的感情，在学院墙报的报头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这样的比喻，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在群众的语言中都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葵花向阳，人心向党”，“我们都是向阳花”……而在蓄意陷害人的康生的眼里，这一美好的比喻却成了他整人的证据，康一口咬定“向日葵”就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彭尔宁又是从沦陷区和二战区来的，所以必然是日特兼国特。

为给彭尔宁定案，康生指使一些人采取逼供信的方法进行审讯，就是康生的“杰出创造”——车轮战术：审讯的人分为三批，轮流休息、吃饭，而被审讯的人不能喝水、吃饭、睡觉，甚至喘口气的时间也不给。提出的问题象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千方百计地要被审讯人作出肯定的回答。这样连续几个昼夜，被审讯人被弄得疲惫不堪，思维混乱，精神无法支持，就按照审讯人的指供，胡乱承认，随意编造，直到审讯人取得所需的口供为止。彭尔宁就是在车轮战术下被逼无奈，胡编乱造一通，而被戴

上“日特兼国特”的帽子的。以后这一冤案又株连到其父钱来苏的身上……

钱来苏，名拯，字来苏，来延安时年已六十岁。青年时期目睹清廷昏暗，列强入侵，产生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一九一〇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过辽阳立山屯起义。“九一八”事变时，在哈尔滨，任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秘密筹款援助抗日军队。东北沦陷后，避居北平。“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怀抗日报国之志，摆脱敌伪监视。突破重重难关，到达山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少将参议。又不满于阎锡山勾结蒋介石和敌伪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我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以去西安就医为名，秘密从去西安道上转入陕甘宁边区，投奔延安。与他同来延安的，还有他的女儿钱家楣、女婿孙静远。

钱老虽年已花甲，但面色白皙红润，留一缕花白的胡须，给人以清癯矍铄之感。他善诗文、喜读书，性情孤傲清高，不苟言笑。他的女儿钱家楣、女婿孙静远，也都是唇红齿白、文质彬彬的青年。他一家住在交际处，受到优待。

但不久，钱老的情绪低沉下来了。首先是因为他得知儿子在自然科学学院被打成了特务，他了解儿子，认为是一个冤案。接着，钱家楣、孙静远被送到延安大学参加整风，在抢救运动中相继被打成特务。一九四四年的元旦和春节，儿子、女儿、女婿都因受审查而不能与老人团聚，这使老人家很郁闷。加上当时延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住交际处的其他客人也不敢与他多交谈，更使他产生了被“软禁”之感，整天郁郁不乐，称病卧床不起。

在当时“抢救运动”的压力下，一天，王世英同志被迫找钱老谈话，要他“交待问题”，这下把钱老先生惹恼了，他那倔

脾气一发起来是什么也不顾忌的，他高声说：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是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走！从这以后钱老不吃饭了，以“绝食”表示抗议。我只好去劝他吃饭。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对康生的一套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但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和自己对中央审干方针的理解，我还是将钱老做为党的朋友，尽量加以解释，以利于团结、争取他。我对他说：“审干并非审你一个，党内党外干部都一样，人人都要受审查。审查的目的，是为弄清每个人的历史，以便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审查的方法是实事求是，我们是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不会冤枉好人的。王世英要你交待问题，你自己认为没问题，那就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抗战，朋友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经我这样一劝说，钱老脸上的怒气逐渐消了，不久就拿起筷子吃饭。

事后，我就这件事写了一份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很快就批给林伯渠、康生。林老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很高兴，因为他早就对“抢救运动”中怀疑一切外来干部的作法有怀疑，只是在那种气氛下也不好说话罢了。他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看毛主席的批示。我赶到林老的住处，看到毛主席在我的报告上的圈圈点点，显示出对我的做法表示支持。最后主席批道：请林老、康生一阅，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提出的疑问值得注意。

毛主席的这一批示康生肯定是看到的，但正为“抢救运动”的“伟大成果”而自吹自擂的康生，怎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呢？他仍然疯狂地干着打击大多数好人，保护一小撮坏人的勾当。一九四四年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钱老的女婿孙静远，神情慌张地突然来到交际处。交际处的同志问他带介绍信没有，他支支吾吾地说，没有带，是学校准许他请假出来的。（当时除负

责审干工作的机关负责人外，一般人出门走动都得带介绍信。）孙一进到钱老的屋内，就沮丧地说：“我和家楣两个被逼不过，已经‘坦白’了，他们还问起你是不是特务，我们已承认你也是特务……”钱老一听，勃然大怒，立即拉上孙静远，来到我的住处。

当时，我正和交际处秘书王力群同志谈话，只见钱老一脸怒气，拉着孙静远走进屋来，由于激动，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他说：“金处长，我有两点要问你：第一，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外边来的人皆不能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正确，善于运用马列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不是所有共产党员全是如此呢？是不是也有毛主席所说的搞自由主义的人呢？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愈大？第二，我是王世英叫我来的，王世英究竟是什么意思？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这个（指当特务）的？如这样，我不如在家当汉奸，我还冒风险跑出来干什么？……”

我赶紧劝慰他说：“钱老，请不要误会嘛，我们谁拿您当特务对待了？”王力群也解释了一番。钱老稍稍平静下来。接着，孙静远谈了他和家楣在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学校问我参加了什么特务组织，我就胡说是参加了学生革新会，是家楣的叔叔钱因超介绍的。学校说我是日本特务。又说一路能顺利地由北平出来，通过沦陷区、国统区，必定还是国民党特务。我就说我是复兴社特务。他们问我党徽是什么样子，党徽的号码。我说党徽上是党国旗，号码是118。118是我在北平学校的电话号码，到这时候只好编成党徽号码。学校又问我是哪一组织，我就胡说是北平第四支部……其实都是学校逼得我没有办法，都是我胡说的。有时我真想自杀。特别是家楣，她更是难受，常常发

疯、抽风……”孙静远难过、悔恨地擦擦眼泪，接着又说：“我被逼不过，又说我岳父也是特务。我怕他老人家没有精神准备，受不了，不得不趁天黑没人注意，翻墙逃出延大，来向他老人家通风报信……”

我问：“孙同志看过党中央对特务的方针的文件没有，是否看过什么文件？”

“没有看过。”孙答。

“大约因孙同志没有看过文件，这次逃出来是奇怪的。”我这样说，孙静远似乎得到一点安慰，情绪也平静了一点。他说：“我乱承认是不应该的，这是我的错误。”

我接着开导他说：“孙同志此来，可能有三问题没有搞清楚，第一是由于对宽大政策认识不够，认为现在宽大，将来是否会宽大？第二是爱面子，顾虑到自己的前途与钱老先生的关系；第三是以为看到钱老后，由钱老证明，可以把过去所承认的问题翻案。如是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你要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有光明而远大前途的党，他的一切政策是从实际出发的，我们决不放松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目的是为了大家一条心，把中国弄好。你怕钱老对你不好，我们也可以对钱老讲明白，例如彭尔宁早已坦白了，我们对钱老还是一样的尊敬。至于你希望钱老给你证明，如你认为由钱老证明后，可以不审查你的历史，那更是错误的。因为你与钱老有三四年没有见面，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证明你全部历史？……”

当晚谈得很晚，孙静远怕再回延大去，同学们要瞧不起他，请求留住交际处。经我和王力群等劝说后，第二天早晨由延大学委会主任魏坚同志接了回去。

但钱老对我们是不满意的，他哪里知道，为了他的事，我已

写了七份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毛主席也多次批示。而这话我怎能告诉钱老呢？所以他一直误以为我们存心整他。过了四五天，他又来找我，说：“我既不能证明家楣孙静远他们，他们怎能证明我，说我是特务呢？”又说：“过去是王世英要曹秘书派牲口送我来的，我‘头可断，志不可辱’，我要走，我是怎样来的，还怎样去。……我想我要是有错误的话，我有三个：一、我不应该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二、不应该抗日；三、不应该来延安求进步。假使我参加革命有错误的话，那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是错误的了。”接着，钱老讲了他革命的历史和来延安后如何受冤枉、受侮辱。最后他激昂地说：“今天我死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所遗憾者，没有见到毛、朱两位，只要我能见上他们一面，‘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听到这里，也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心情有些激动，一时许多话涌上心头，我用诚恳的语气，把党的政策，对钱老的期望，统统倒了出来，我说：“我们希望钱老到这里来，是希望钱老对革命有所贡献。因为你老先生在平、津、东北，有很多的关系，将来必能发生很大的力量。但你生气是不必的。我们共产党人有这样的气魄，一定要把中国历史搞到光明阶段上去，我们可以推进历史，也能改进人的思想和意志。我们可以把中国人大体上分成三类：一种是反对我们的；一种是无党无派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再一种是同情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改变观念；同情我们的人，我们希望能更了解我们；不闻不问的人，我们也需要同他们解释。我们倡导和实践的是真理，所以不管是哪一种人，我们都希望他们很彻底地了解我们的政策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朋友，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的反对者。钱老是为进步而来的，林主席也希望钱老能先休养身体，

再多看我们的实际情形。多读书，多研究些文件，对我们可以有一些指教；另方面对钱老也是有好处的。这次钱老也许有气，我们能够理解。因为事情的利害关系与每个人自己联系起来，总可能发生矛盾的。就是党员，对党的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还可能发生矛盾呢。审查干部，是党内外每个人都要审查的，是为了好，并不是为了造成敌意。我们审查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大家搞成一心一德。但是在审查过程中，可能发生误会而使人产生反感和敌意。这完全由于一时想不开的缘故，其实只要相信党，相信真理，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

我的一席话感动了钱老，钱老长舒一口气，说：“现在我明白了，应该为了大我，忘了小我，从今天起，彭尔宁、钱家楣、孙静远都和我没有关系，这三个人以后都贡献给党了！”

从这次谈话后，钱老的情绪稳定了很长时间。

这次谈话后，我交际处将钱来苏的情况写成一份很详细的报告，上报毛主席。报告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六日送上去的，到二月八日，毛主席就作了批示：

金城同志：

钱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毛泽东 二月八日

在交际处的这份报告上，毛主席用毛笔在需要引起重视的词句的下面，划上了粗杠杠。如“被逼不过已经坦白了”“材料全是胡说的”“其实都是学校逼得我没有办法，都是我胡说的”“我真想自杀”“在审查过程中可能发生误会而使人反感、敌意”……，说明毛主席对逼供信的问题十分注意。毛主席虽然没有用肯定口气指出钱来苏及子婿不是汉奸，但倾向性是非常明

显的，中心意思在最后一句话上——“应平反的”。

就在毛主席的这两次批示之后不久，毛主席亲自来到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出席由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局系统（包括边区系统及联防司令部系统）的干部大会，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并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说：审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查出了问题，但也搞得过火了，误伤了很多同志。我现在代表党向受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主席说着，摘下帽子向台下鞠躬敬礼。接着又说：弄错了怎么办呢？被审查的同志应当有个正确的认识。审查你一下，让你受了委屈，这是坏事，但另一面也是好事，一、经过审查证明你没有问题，党更加信任你了，你也可以放下包袱，放手干工作了；二、你们是干部，将来免不了会去审查别人，你们吃过“车轮战术”、逼供信的苦头，将来就不会用此法去对付别人，而会懂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无论是审查别人的人，还是被审查的人，都应从这次运动中得到有益的教训。

事实上，毛主席对康生的一套作法早有所察觉和批评。那时，毛主席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问运动的情况如何。一次，康生要枪决西北局的一个所谓“混进党内的特务”，并决定在枪决之前召开公审大会，党中央各机关的干部、群众必须参加，借以树立典型，推广到边区各机关。召开公审大会的那一天，毛主席得知要杀人了，立即下令制止。为避免这类事情再发生，毛主席在一份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一政策和中央的审干九条方针，成为扭转康生“抢救运动”错误方向的有力武器。

一九四四年春，延安和边区各机关、学校，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开始进行甄别，结果证明百分之九十

九搞错了。被诬陷受冤枉的同志，获得了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

但康生“钦定”的一批“特务”，却被康生压着不能平反。其中一部分案子较轻的，如彭尔宁等，虽然不再关押，但仍戴着沉重的“特务分子”的枷锁，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经常受到歧视和打击。一九四七年我交际处疏散到山西三交时，彭尔宁曾来交际处看望他父亲，我见他长鬓齐胸，神态十分忧郁，深知他苦闷的心情，但除了安慰他几句外，无能为力。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旧案又被翻出来，造反派重新给他戴上“特务”、“反革命”的帽子，使他备受折磨。直到一九八〇年康生的问题揭出来以后，他的三十八年的冤案才彻底得到平反。可惜人已进入古稀之年，大好青春全被耽搁了！

更令人痛恨的是，就在毛主席多次在延安各机关直到党的“七大”上，以诚恳、谦逊的态度，向被“抢救运动”伤害的同志检讨的时候，作为“抢救运动”的主要策划者的康生，却文过饰非，半句认错的话都没有。不仅如此，至二十三年之后，他又故伎重演。他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狗头军师，利用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把“抢救运动”的逼供信的一套又拿出来塞进“文革”运动中，而且比当年搞的更厉害千百倍！成千上万的党的优秀干部惨遭迫害；大批党的宝贵财富——老干部被摧残而死；几代人的青春被耽误、被扼杀；而在人的思想方面所造成的伤害，更是遗患长久，非短时期内可以消除……

我们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取这一沉痛的教训。

〔注1〕

关于当时错遭逮捕的两位同志，一个是交际处的秘书，他忠诚老实，工作积极，

对党的政策充满信心，运动一开始就如实地交待历史上的一个错误。另一个是交际处的炊事员，原来是个码头工人，只是因为他曾与青红帮合伙开过一个小饭馆，就被怀疑。解放初期，为了这两位同志的事，我曾与李维汉同志谈过，维汉同志即指出，“抢救运动”时我们政治上是错误的，策略上是愚蠢的。

我党外交工作的开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宣告了美国“远东慕尼黑政策”的彻底破产。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由对日侵华妥协姑息转为援华抗日。

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为国民党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美国政府出于其帝国主义的本质，自然是大力支援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开始时很不重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越来越显示出伟大力量，而国民党战场一再失利，越来越显得无能、腐败，两个战场对比鲜明。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得不考虑如何利用中国共产党这支强有力的抗日力量。到了一九四四年初，罗斯福不仅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而且想直接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罗斯福的战略构思是，把国共两党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既支持蒋介石，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又发挥共产党的抗日作用，防止共产党倒向苏联，以便美国在战后控制整个中国。

但是，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却不赞成罗斯福的政策，对罗斯福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前往陕北及华北的建议，千方百计地阻挠拖延。直到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战场出现惊人的大溃退以后，蒋介石再也无法拒绝美国的要求，不得不同

意美军派代表团去延安。但他非要降低代表团的规格，将“军事代表团”改名称为“军事视察组”。

在抗日战争中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我党，认为美军不是我军的上级领导，有何理由“视察”？不同意蒋介石想出来的名称，经三方磋商，才将名称定为“美军观察组”。古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从确定名称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我们党同国民党的截然不同的对待美帝的立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国家，在亚洲直接与日作战，与我党的抗日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争取美国盟军的联合行动，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但是，我们党的基点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一味地依赖外援，或投靠美帝，做附庸和奴才。

事实上，早在美军派观察组来延安之前，我们党驻重庆办事处的同志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已经向美国驻重庆外交人员、军事人员和记者，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为营救与日作战受了伤的美国飞行员，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出现过不少动人的事迹。一九四四年七月初，美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还专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屡次营救被迫降落的美飞行人员一事，致函朱德总司令，表示真诚的感谢。一九四四年六月，有美国记者参加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打破了国民党对我边区的消息封锁，将我党我军抗日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虽然这些接触不属于美国政府与我们的正式的外交往来，但它无疑起了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和加深友谊的作用，为后来建立直接的联系奠定了基础。

对美国政府派军事观察组来延安，我们党给予了高度重视

和热情欢迎。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央接到董必武同志来自重庆的电报，报告说：“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包瑞德武官率领医生卡斯伯格、二十航空队的多伦、美军司令部的谢伟思、十四航空队的斯特尔，及四名军事人员。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他们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人员包括有陆军、航空、电讯、医药等方面的人。希望每月通航一次。”为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中央做了一系列的具体布置。其中首先与美军人员打交道的，是我们交际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专门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

尚昆同志指出，第一，我们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在我们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外交原则。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是国民党那种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而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又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要搞得铺张浪费。第三，他们在延安要长住下去，因此必然会同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广泛接触，广交朋友，建立友谊。但是我们必需时时提醒他们：

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气节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任何外国人必须尊重我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更不能搬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教育自己的干部和群众，要维护国格、人格。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

我们根据尚昆同志的指示，做好了准备工作。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了。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代表我党我军领导人亲往机场迎接。交际处的卡车把包瑞德一行接到交际处休息。

包瑞德原是中缅印战区总参谋部的情报官员，军衔陆军上校。他自抗战以来，已在中国工作多年，能讲汉语。他的职责除领导全体观察组成员外，主要侧重于收集军事情报。

侧重于收集政治情报的，是原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思，他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出生于四川成都，从小在中国受教育，堪称“中国通”。

还有一位“中国通”是德木克，他曾在山西太谷孔祥熙办的贤铭学校当教员。抗战初他和万美德第一次来延安，由我交际处干部胡光同志陪同他们参观。后来德木克参加了美军驻华部队，这次又被派到美军观察组，第二次来到延安。

有他们这些“中国通”在，我们与观察组打交道几乎可以不用翻译了。

在为美军人员洗尘的宴席上，当我们端上自制的西餐：面包、果酱、牛奶、猪排、炸鸡蛋以及各种西点时，客人欢欣已极，他们难以想象在陕北穷山沟里还能制作出如此丰富的西菜。殊不知我们交际处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创造了“足食园”。这个

“足食园”不但能供应相当水平的中国酒席，还能摆出很象样的西餐。

观察组的成员们大都是年轻的中下级军官，热情、活跃、精力充沛、积极肯干。到延安的当天晚上，他们就向我提出要架设电台。我向杨尚昆同志、并向叶剑英参谋长请示，叶、杨指示我，可以让他们架设，第二天一早，我派几个工作人员，弄来一根木头，在早餐前就帮助观察组通讯人员把电台架好了。上午，观察组就同重庆中缅印战区总部通了电讯。包瑞德等人高兴地说：“你们的办事效率真高，这样的工作速度在重庆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在那里，为了请几个工人、架一根木头，不知要请示多少人，费多少周折，一星期也办不成。”

以后几天里，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中央和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接见或设宴招待，并开晚会表示欢迎。

八月七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到达延安。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指出：“我们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成功。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观察组两批成员汇合后，就着手正式办公。因交际处住房有限，无法供他们长期住宿和办公，所以，不久就由北门外联防司令部腾出几孔石窑洞，作为办公室，让他们搬了过去。

美军观察组曾提出，要在各解放区设置观察组。我们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叶剑英和杨尚昆同志对他们说：你们要到前

方了解我敌后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是欢迎的。但前方是战争环境，没有延安这样安定。你们认为需要去前方，可随时派人去，我们会给予积极的协助和热情的欢迎。但观察组应设在延安，暂时不必分散到各解放区去。

观察组在交际处的时间虽短，但在延安时间很长——大约两年多。由于招待工作的关系，我们交际处同他们的联系始终未断过。如引导他们参观游览，邀请他们参加交际处举办的舞会、文艺晚会。他们每月一趟从重庆飞来延安的班机，经常带来一些美国故事影片和纪录片，在观察组驻地或王家坪、杨家岭礼堂放映，也邀请我们参加。交际处的客人，也常有搭他们的班机来往于重庆、北平的。

美军观察组在延期间，大量听取了我党我军领导人关于敌后战场情况的介绍。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我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十五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并着重指示，正是这些敌后战场的存在，才使日寇无法灭亡中国。彭德怀副总司令向观察组连续做了三次报告，具体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陈毅和聂荣臻也分别介绍了新四军和晋察冀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还经常不拘形式地和他们会见、交谈。特别是毛主席，曾对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毛主席严正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得到它的直接的军援。

毛主席希望美国政府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让它实行民主，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

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派出人员分赴晋绥和晋察冀根

据地考察。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他们看到老百姓积极支援八路军、踊跃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令，我党有着广泛深刻的群众基础。他们注意到我军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三八式步枪，和中国自制的“汉阳造”，并没有苏联的装备。他们还对比地看出，我军一个师的防地，比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的防地要大得多……

在一件件事实面前，美军观察组中的多数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及我党的方针政策。

比如，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十月，雷伊·卢登在概括他与其他四名美军人员前往华北地区执行观察任务的艰苦行程时说：“……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显而易见，使人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样广泛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使民众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十一月，戴维斯的报告说：“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

总之，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以及他们自延安向美国政府发回的大量报告，增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了解，促使美国领导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坚持留在抗日阵营内；同时也有利于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有利于我们开展国际间的统一战线。其作用是积极的，意义是重要的。

当然，美军观察组多数成员并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为共产党说话。他们的根本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只不过他们身临共产党区域，又都是年轻的中下层军官，比较容易承认事实、接近真理，所以能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有政治远见的看法。

一九四六年冬，美军观察组全部撤离延安。

中外记者参观团

英、美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特别是为了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力与物力，不得不重视我党、我军、我敌后根据地强大的有生力量。英、美——尤其是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需要，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向我提出要求，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我解放区了解我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我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目的是为了使我能配合反攻日本。英美一方面在国统区亲眼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战不力，军心涣散，没有战斗力，对国民党能够调动多少力量配合他们反攻日本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从自己多方所得的情报中，特别是从我们重庆办事处、从来自敌后或其他解放区路过延安到大后方去的外国人及一些被我救出又送回的美国飞行人员那里，得知我各解放区的一些真实情况，知我八路军、新四军从西北、华北直到东南及长江南北的抗日实力越来越强，敌后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巩固。因此，他们想直接派人来延安及解放区，加以实地了解。

一九四三年初他们就提出这个要求，我党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

三月九日，周恩来同志曾亲自打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

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同志并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国民党顽固派深怕外国记者冲破他们的新闻封锁，揭穿他们对我党、我军、我解放区的种种造谣诬蔑，因而设置重重障碍，加以刁难拖延。但是这一要求主要出自美国、英国记者，并得到各国外交使节支持，因而国民党也不敢公然拒绝。在外国记者们一再追逼下，国民党最后只得表示同意。以 CC 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加强控制，想出一个办法，提出把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主要由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 CC 特务重要骨干加强“领导”，派他们的人担任团长、副团长，规定了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的纪律。

由于中外记者团是到延安并准备到前方去的大型团体。有国内外各大报著名记者参加，我们党中央对这次接待工作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我们交际处政治、业务上划归当时的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领导。

首先由周副主席召集延安党、政、军、民、学参加接待工作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干部，开了动员会，介绍了记者团的情况及其采访的目的，交待了我们接待的方针政策。指出，外国记者在重庆已经向我们透露他们希望了解：（1）各边区的施政纲领；（2）关于生产、物价、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计划；（3）日本俘虏情况；（4）参观人民代表机构；（5）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等。多数中国记者也有同样愿望。周副主席指示各有关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出面接待。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材料，主动介绍实际工作情况，又要准备解答他们临时提

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问题，要求答复。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也可能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以备解答或回击。周副主席指出：他们访问参观，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看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周副主席、尚昆同志并向各机关借调了一批优秀干部和翻译人员来帮助我们做好这一次接待工作。

在交际处，由杨尚昆同志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请周副主席再一次作了具体指示。在干部大会上，周副主席首先指出，交际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八个大字。就是要把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和我党、我军、我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各条战线在具体实践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成绩宣传出去。我们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诬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只有提出具体材料，说明具体事实，才能取信于人。周副主席再次着重指出：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中外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和中国记者中的中间分子，在重庆、在大后方对国民党宣传反感甚深，国民党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听到国民党的宣传，人人头痛。交朋友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以诚待人，在公开讲明我们自己观点的同时，也要听取别

人的观点，互相交流，才能澄清分歧，争取尽可能地取得一致。要善于求同存异，只求他们能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等重大问题上和我们取得一致，其它方面，不能以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样我们交的朋友就会更广泛，更深入。

周副主席指出：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也要有所不同，要明确工作的重点。一般集体访问参观，请客，宴会，欢迎晚会以及生活待遇方面，中外记者一律平等。至于记者中有人要求个别采访谈话，我们应当欢迎，以便我们打破国民党的控制，使我们能区别对象，分别对待，达到深入宣传争取的目的。

周副主席还指出，这次我们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外国记者身上，外国记者中又要更加重视对史坦因、福尔曼等人的工作。史坦因是位很有政治见解，有活动能力的记者，他在苏联多年，后被当作“托派分子”赶了出来。但是他在中国多年，我们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托派活动。福尔曼是美国人，为人比较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也无明显偏见。他们在外国或中国影响作用较大。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当然也有较大影响，但他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不必我们去多费精力争取了。至于带领中外记者来的国民党人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他们要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防止他们挑拨，并打破他们的控制。

周副主席最后指出：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在物质上我们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宴会也不用山珍海味。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刻苦耐劳的，在这次工作中更要发扬这些优秀品质。

记者到来以前，我们全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

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素洁净。周副主席在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后表示满意。他特别欣赏我们自制的土沙发。这种所谓“沙发”，有的只不过是在开窑窑洞时，在墙壁上按照沙发的样式挖凿而成的土靠椅，再加上棉垫子；有的是木板加棉垫的长木板椅，上面绷上蓝白两色土印花布，显得挺括漂亮。周副主席也很赞赏我们交际处对当时同盟国“四大领袖”画像的挂法。我们的挂法，既要从表面看无高低之分而实则有高低之分，使国民党不能挑剔，又要表达我们自己的立场和倾向。我们的挂法是：从左到右为斯大林、罗斯福、蒋介石、邱吉尔。按中国人的习俗是以中右为大，因此看起来是把蒋介石放在了首位，罗斯福第二，邱吉尔第三，斯大林放在最后。而照外国人习惯从左向右排列，第一位是斯大林，把蒋介石、邱吉尔放在后面了，对外国人也不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周副主席对这种安排很欣赏，他说这虽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体现了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后来延安其它单位挂像也都按这样的顺序。

记者团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到达延安，我们向正、副总领队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邓友德（新闻检查局副局长）索取了全团记者及工作人员的名单。

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他到过延安，认识贺龙同志），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及塔斯社的普金科。

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记者徐兆鏞、杨家勇（杨家勇是国民党中央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进来的），扫荡报采访主任谢爽秋，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事

新报记者赵炳煌，国民公报编辑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

成员中还有属于国民党中宣部的人员，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及他的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溯生，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他们还自带了电台，代表团路经西安时，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这个特务科长的真正任务是与国民党埋伏在延安的点线取得联系。一看国民党来人名单及其所带的电台就可知道，顽固派和特务在大后方控制中外记者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的人马全部出动了。他们企图把国民党在大后方压制人民民主，破坏国共合作，窒息新闻出版自由的反动办法，不折不扣地搬到延安和解放区来，而且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大施其特务破坏活动的手段。

记者团在到达延安之前，曾先到南泥湾访问了四天。

五月三十一日，记者团由山西平渡关西渡黄河，当晚住在陕北的凉水崖。六月一日晨，十八集团军三五九旅王震旅长自延安前来迎接他们，同来的还有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记者团即跟随王震同行，当日宿营于固临。第二天下雨，记者团滞留固临，由王震旅长召开茶话会，向记者们介绍开发南泥湾的经过。

六月三日到达延长，记者们参观了延长油田。六月四日准备启程时，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中央社的杨家勇和商务日报的金东平等，自进入边区后经常单独乱窜，企图找出一点可资攻击共产党的岔子来。王震看出他们的恶意，即当众宣布：“哪个中央日报记者要想搞什么名堂，就请他留下来！”说话时，瞪着眼睛，目光直逼着张文伯等人。他又说：“你们来采访新闻，我们很欢迎，若来干特务破坏，我们不

欢迎！”弄得张文伯很狼狈。

或许有人要问，王震同志这样做是不是太“厉害”了一点？其实不然。大家知道，王震同志是我们党内既善于打仗，又精通生产，还擅长做统战工作的全才。他对于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关注、爱护和重用，很早就在党内外出了名。他对于党的上层统战工作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方针十分谙练，表现得有方有圆。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立场、严肃斗争、寸步不让，表现为原则性的“方”；在非原则问题上，则求大同、存小异，妥协让步，表现为灵活性的“圆”。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王震同志理解很深、运用自如。他为民族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及热情好客的友爱精神，与直爽豪放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使党外人士感到共产党人的坦率、诚恳，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

记者团于六月六日到达南泥湾。当晚三五九旅旅部的指战员在金盆湾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王震首先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刚收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盟军已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与会者不分中外、不分党派，莫不欢欣鼓舞。

第二天，记者团参观了南泥湾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在国民党的封锁下，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也不知道时，十分不平，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当场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党政府运输药品到边区。部分中外记者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反映出去。

以后，记者团又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以及该旅在前方作战时缴获的日寇的兵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等，最后于六月九日满意地离南泥湾，到达延安。

记者团到来的当天，首先由我军总部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出面，与谢、邓及全体中外记者商定他们访问参观的概略日程安

排，确定先在延安参观访问，然后去前方。在延期间可边访问边参观，具体单位和时间由交际处负责与各方面联系安排，到时通知。中外记者完全赞成，谢、邓等人也表示同意。

下午五时，由叶剑英同志以我军参谋长名义设宴为他们洗尘，出席宴会的还有杨尚昆秘书长，边区政府刘景范厅长。

为了打破谢、邓对记者团的控制，在记者团到延的当晚我即用电话请示杨尚昆同志，说明我们不能让他们擅设电台，得到尚昆同志同意。为此我们与谢、邓等的第一次斗争开始了。

十日早餐前，住在交际处旁边客店的国民党电台人员，把他们带来的电台搬进交际处，预备架设发报。我们传达室的传达人员把他们挡住，发生了争执。邓友德亲自从住的窑洞直跑到交际处门口，气势汹汹地说，“电台是我叫报务人员进来架设的，有我的命令，不得阻挡。”硬要让我们的传达员放行。我见邓友德在交际处门口大声恶言争吵，也走去与邓讲明不准他们架设电台的理由，邓竟蛮横地责问我，“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们有什么道理不让我们工作？”我也不客气地告诉他，“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派来接待你们的工作人员。我只能按边区政府的法令办事。没有经过边区政府批准，谁也无权在边区境内架设电台。”邓友德一时语塞，但摆出一副凶狠架势，支支吾吾地还想讲什么。谢宝樵见势不妙，很快从山上跑下，忙知趣地插话说，“不要为此小事，有伤和气”，一面说着把邓友德拉走了，电台终于没有架成。

早餐时，中外记者见到一盆盆牛奶或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兴致勃勃，狼吞虎咽，饱餐一顿。这时正是我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已两年之后，在战争时期来说，延安已初步达到了丰衣足食。

这时，我们交际处在新市场南边向东的半山腰，已打了三十多孔冬暖夏凉的窑洞；在山脚下建造了二十来间客用平房和工作人员宿舍，还建造了可供七八十人使用的餐厅和会客厅。交际处的厨房能做中餐和西餐。为了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参加了边区政府组织的开荒、种菜、背柴等生产活动，而且自己办起了一个供应食品的商店“足食园”。自己用土产制作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除供应交际处本身所需外，还向市场销售。

国民党顽固派劝阻外国记者不要来延安的谎言之一就是“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中外记者们来到实地一看，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捏造就不揭自穿了。原来外国记者在重庆，早餐时也只是稀饭、馒头和咸菜，对牛奶已经“久违”了，有时偶尔买到一个鸡蛋，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早餐中间，我用勺子击盘起立向记者团报告当天的工作日程及注意事项：

（一）今天朱德总司令接见和宴会的时间是下午；邀请中外记者团先生们全体出席。下午四时在交际处院内集体上汽车前往。

（二）外国记者先生们发新闻稿，按战时各国惯例，需经过检查才能发出，为了做到方便迅速，我们委托翻译组组长浦化人负责，由他审阅签发。说到这里，我再度介绍浦化人同志，浦化人同志起立，说明他自己就住在外国记者团朋友们所住的一排平房里。这样魏景蒙、陶启湘两位负责新闻检查的先生，就可消闲自得地欣赏延安春夏之交的风光了。

（三）中国记者的新闻稿亦须经柯柏年同志检查。

十日下午五时，朱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

们。为了欢迎该团及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还特请延安大学文工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在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人士欢谈之际，高唱四国歌曲，会场洋溢着反法西斯的战斗友谊。

在欢迎会上首先由叶参谋长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叶参谋长说：“这次记者团来延，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叶参谋长请各位记者在参观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予以指教，并欢迎大家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参观。

叶参谋长讲话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首先开诚布公地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很愉快。”他说：“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这番话是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对我边区的封锁政策。他接着又诚恳地说：“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对你们的缺点是会批评的，对于你们的优点是会赞扬的。”最后，他对我国国内团结表示了热切的希望，他说：“只有团结，中国才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他的讲话，博得了会场的热烈掌声。

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他在略述了进入边区后沿途参观的情形以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导给全国。”

讲话之后举行的盛大音乐会以《同盟国进行曲》开始，然后演奏了各种民歌及《黄河大合唱》。

十一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及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上的座谈。

十二日下午四时，毛主席在中央大礼堂后面客厅接见了中

外记者参观团。毛主席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毛主席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毛主席也对代表团来延适逢第二战场开辟表示热烈庆祝。毛主席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着重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在致词之后，毛主席逐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点。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毛主席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着重指出：“远东决战快要到来，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会见后，毛主席宴请了记者团，很多领导同志出席作陪。晚间并请记者们看了平剧（即京剧）。

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主席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

几天后，记者团中有人在酝酿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先由史坦因私下向我们的翻译同志探问，说他想单独见一次毛主席。我们的翻译同志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可以，并答应代为报告，史坦因非常高兴。

一天，毛主席决定个别接见史坦因，因此史坦因未参加全团的集体活动。当全团人员出发参观上车后，邓友德在清查人数

时发现没有史坦因，他问我方人员，我们的翻译人员告他，史坦因已声明他今天不去了。邓友德立即大发雷霆，当众叫喊说，我们这个记者团，在重庆出发时，已宣布了纪律，所有成员必须统一行动。史坦因为什么不去？他转过脸来责问我，我对邓说：“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预，史坦因去不去我们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记者有新闻采访的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自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史坦因迅速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还是嚷嚷不休，但并不行动。他很清楚，即使他自己去请，也会在史坦因那里碰一鼻子灰。我示意司机等邓友德，但是许多中外记者却等得不耐烦了，急着要求开车。司机就把车开出门外向北转弯而去。只见邓友德久久仍悻悻然地带着他那副可憎的尊容，在车上摇晃着。

经过史坦因这么一冲破，又加上邓友德在上车时的一场吵闹，记者们敏感地觉察到以后他们可以不受邓友德的控制单独行动了。从此，所有外国记者都陆续要求单独见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继史坦因之后，接着福尔曼公开提出来，我们立即表示同意。接着几个中国记者也提出，我们也一视同仁地表示同意。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和下午，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应美报记者史坦因和英报记者福尔曼的要求，分别与他们各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朱总司令和叶参谋长向他们说明了几个问题：（1）从军事观点说明共产党军队在战时战后的潜在力量；（2）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关系、态度及与国民党、美国及英国武装力量合作能够采取或应该采取的形式；（3）战后共产党军队为保持远东和平，在军事方面能负何种任务等。

从十一日开始，中外记者团正式访问陕甘宁边区政府及自

然科学院、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和平医院、洛杉矶托儿所等单位，对我边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较全面的了解。

六月二十二日，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礼堂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作了报告。为了使外国记者正确地听清这个重要报告，我们分发了译成英文的小册子，其中附有说明我八路军、新四军七年来抗战的成绩、民兵的分布及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情况的图表。还特别列举了八路军、新四军中与我军共同抗日而牺牲了的国际友人的名单。

叶参谋长在报告开始开宗明义地说：“为使各位中外友人便于研究目前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具体情况，我向各位做一个关于敌后战场军事情况的一般介绍。”这里所指的敌后战场，就是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坚持抗战的战场。自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但是由于国民党采取压制言论的政策，不但外国人不了解此种情况，就连中国人也有很多不了解。叶参谋长说：“我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个敌后战场上，坚持了七年抗战的过程是极其残酷、紧张、并且是极其复杂、曲折的。”

叶参谋长在报告中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截至一九四四年三月前抗战七年来的基本情况：

在敌情方面，叶参谋长介绍说明，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日寇兵力共有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从国共两党抗敌的情况看，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国民党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其原因是由于“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日寇的主力是向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但在武汉失守以后，日寇改变了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

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移其主力于敌后战场，残酷地进攻共产党。”“而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望，袖手旁观。”

在伪情方面，叶参谋长介绍说：由于一部分国民党军卑鄙无耻地投降与作伪，使伪军在敌后战场，有七十八万之多，投敌将级军官有六十七人之多。在抗战以前，老伪军只有二万人，至一九三八年止也只有六万余人，到一九四二年春开始，伪军猛然增多，这些伪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特别坚决。国民党不但不对投敌伪军加以讨伐，反而暗中联络勾结，搞“曲线救国”，使他们不仅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准备在将来，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之时，好让这些伪军打起“国旗”，宣布反正，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反共战争。日本投降后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叶参谋长的预言。

叶参谋长说：“我们的友军在抗战初期，还能配合作战，但自一九三九年以后，即集中力量对中共搞磨擦。在正面战场上，却丧失战斗力。我党担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之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叶参谋长指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方针是厉行专制，压迫民主，抗日依赖别人（国际依赖英美、国内依赖共产党），自己保存实力，准备铲除异己。叶参谋长义正词严地对记者们指出：“假如这种方针不变，中国不但不能反攻，就连保存现状也是不可能的。”

最后在谈到“我情”时，叶参谋长指出：中共领导的一切部队，都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及中共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宣布的共赴国难宣言。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上团结各界人民，创立了十五个以上民主抗日

根据地，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余万，人口为八千六百万。在各根据地，都由人民选举抗日地方政府，执行“三三制”，减租减息，发展自卫军、民兵突击队，发展生产，肃清汉奸等项政策。由于我们密切地依靠群众，党政军民结合一体，我们能在七年当中毙伤敌军 351,113 人，毙伤伪军 239,952 人，使敌我伤亡比例总计为二比一。叶参谋长还专门宣读了在八路军、新四军中，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伟业而献出了生命的国际友人的名单，并对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的许多援助表示感激。

叶参谋长在揭露了国民党派遣军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攻击、包围、封锁，派遣成千特务进行破坏，断绝一切接济，并遮断国际朋友对我们的援助，封锁我党我军抗战与民主建设的消息，不使国内人民与国际友人明白真相等恶劣作法后，在报告结束时，诚恳地表示：“我们希望尽可能迅速地结束这种状况，改善国共关系，而开辟一个真正团结抗战的新环境来。”

这是一次全面介绍情况的报告，在中外记者中反映十分强烈。在回交际处的路上，在饭厅里，多数人喜形于色。外国记者饭后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埋头于打字发稿了，但也有的中国记者装成“不以为然”的样子，环顾左右而故意另找话题。更有的甚至故意乘机进行挑衅活动，如中央社记者徐兆镛，他在听完报告发电稿时，有意进行歪曲。叶参谋长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断言，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就能将国旗插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城头。”而徐在发稿中却有意去掉了“只要我们得到最高统帅部命令”这一至关重要的句子，而将这段话篡改成，“在战略反攻时，一旦时机成熟，八路军、新四军可开入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将插上国旗篡改为“悬挂我们的旗帜。”这完全是一种蓄意挑衅的行径，我们

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要他根据叶参谋长的报告进行更正。然而这个国民党顽固分子仍不老实，继续玩弄花招，他在更改时加上“据此间当局通知，”这样一句话，想造成是我们更改了原文，他不得不随之更改的假象。我们再次强烈驳斥了他的谎言，他才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根据原报告做了更正。

叶参谋长的报告通过中外记者的手传播到中国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以后，引起了中国人民和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美、英、法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需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就在中国记者团访延以后一个月，美军即派观察组长驻延安，以加强联络。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初来中国时也一再主张国共调解、发挥中共的抗战力量……总之，叶参谋长的报告在当时的形势下起了很重大的作用，意义十分深远。

除叶参谋长外，我们还组织了多次报告，如罗迈同志（即李维汉同志）的报告，谭政同志关于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及各厅局长的报告等等。

二十四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招待中外记者的集会。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哲学、文学等各种问题，以及边区的各种生活。会场上充满了轻快之感。在分散闲谈一阵之后，诗人柯仲平同志介绍了延安文艺协会的一些情况，随后由丁玲、吴伯箫、艾青几位作家向记者讲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丁玲同志说：“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需要什么手续？初听这句话，我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但是想起重庆的作家们

反对出版法，就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先生是习惯了重庆的不自由了。”吴伯箫同志在发言中告诉记者们，听说在西安有一批小人，扮做他的朋友，在今年（指一九四四年）三月份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听到这里，记者们都不由得捧腹大笑，但吴伯箫同志严肃地对记者们说：“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希望记者先生们把我的抗议带到西安去。”艾青同志在吴伯箫同志讲话之后也发表了一个抗议性的发言。他说，大后方有个名叫《良心话》的刊物，实际上是发表些没有良心人的话。他们在那里造谣说什么我要逃出边区，走到郧县被保安队捉回了。艾青同志愤慨地说，“这真是活见鬼。现今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更好的地方呢？我为什么要逃呢？”

记者中有正义感的人，对于西安、重庆这种追悼活人、说没有良心话的行为，也感到愤愤不平。但是被国民党派来控制记者的那些人听到这些话如坐针毡，低头不语。

座谈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到大众戏团去看秧歌，记者们和延安二千老百姓一起不断为精彩的节目鼓掌，笑声不断。有些记者十分喜爱秧歌这种形式，有的甚至提出希望能学会扭秧歌。

周副主席这段时间很忙，对外要集体或个别地接见记者，对内要审阅各单位的报告。我们交际处日常政治上由尚昆同志领导，有事除随时向中央领导同志作书面报告外，为节省周副主席的精力，总是向尚昆同志请示。但周副主席每隔一两天就到交际处来探望，并帮助记者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他还分别约记者谈话，对我们的工作及时给予指示。我因工作繁杂，一天电话不断，晚上更多。为了方便，我把内线电话，搬装在自己床边。一天早晨六点多钟，电话又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又是周副主席

的声音。他问我今天上午记者团访问日本工农学校，准备了几个日语翻译，我如实以答，他表示满意。他听我说话带着睡意，就问：“你还没有起床？”我只好承认自己尚躺在床上接电话。我早知周副主席随着毛主席的习惯，每晚睡得比我还迟，我常常在夜间和凌晨还接到他的指示，而我却比他起得迟，内心感到很惭愧。

中国记者离延前的那几天，正是连日大雨未霁。在记者团离延的前一天我接到尚昆同志的指示，说劳山公路可能被雨冲坏，要我们把交际处用的两部汽车去兵站检修好。还须准备四辆胶轮大车，以便汽车开过劳山时，如发生故障，可改乘胶轮大车送记者团过山去。翌日黎明，电话铃又响了。我很快起来接电话，一听又是周副主席，问我汽车检修得怎样，胶轮大车出发了没有。我答汽车已经检修好了，四辆胶轮大车，五点钟即将先行出发去劳山，在上山的路旁等着。看来天气不会下大雨，汽车过去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周副主席又问，你对带领胶轮大车的同志是怎样布置的？我答，我让他们在山下等着，看到汽车上了山，才可回来。周副主席又问，汽车上了劳山，你认为下山会不会出问题。我答：“大概不会。”周副主席对我这一回答很不满意，说：“你只知上山会有困难，就不想想下山也可能出问题吗？你真是齐桓公用兵，‘既想兴师动众，又怕劳民伤财’。……做统战工作是和打仗一样的，一切工作要预想到底，为什么只想其一不想其二呢？”听了周副主席的批评，我自知不对，很快回答说，我当立刻通知带队的同志，转告带领胶轮车的同志，即使汽车上了山，仍必须跟着汽车送下劳山，保证送汽车上平路。周副主席布置检查工作，细致、周密，不露孔隙，而我自己却是粗枝大叶，甚至凭想当然地办事，这样很可能既费了人力物力，仍不免漏洞

百出。

在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中，中国记者由于国民党的压力一般表现不很活跃，不太多言。唯有副领队邓友德到处挑毛病，如到医院参观，我负责人介绍我边区缺医少药的情况时，他极不耐烦地说：“你们老说没药没药，大后方也不是王道乐土。”一次在解放日报社看剪报时，他不仅随手乱翻，而且挑衅地说：“你们的报纸不报道中央社的消息，有也不全，而且还放在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对这种恶意挑衅，我有关单位负责人都毫不客气地予以回击。

谢宝樵、邓友德、杨西昆等看到中外记者们在我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和招待，特别是外国记者敢于报导的真实情况越来越深入，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越来越不利，他们到处钻空子，搞破坏，也毫无所得。于是他们改变了工作方针，最后甚至企图拉他们在延安的亲友回国统区，邓友德有个弟弟邓友信，是个革命青年，杨西昆有个女同学金鹤是个革命干部，在延安学习或工作，那几年经过整风学习，他们对我党的信念更加坚定，见面时，邓、杨用转弯抹角的方法，想从他们的口中套取一点可资他们作反共宣传的材料，可是结果也都落了空。邓友德直接苦劝硬拉，劝他弟弟离延去重庆，也遭邓友信的坚决拒绝。

访问参观到七月上旬，中外记者都想赴八路军前线访问，谢、邓等怕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竭力阻挠，最后采取了分裂中外记者团的办法，由中央日报和中央社记者从中活动，逼迫态度中间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出面，提出急回重庆的要求，要把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去。我们原想挽留中国记者在边区多参观一些时候，但中国记者们为了自己免于在重庆遭受迫害，经过协

商只得同意回渝。离延前，他们向总司令辞行，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们，并讲了话，七月六日周副主席为他们饯行，十一日离延前夕，朱总司令再次在交际处为中国记者饯行。他们于七月十二日离延返渝。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许多人在报上或私下仍是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我陕甘宁抗日模范根据地实际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在国民党特务统治下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重庆，也可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一九四五年三月，董必武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还提到：“一个外国新闻记者对我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他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

外国记者除夏南汉随中国记者返渝外，其余的都留在延安未走。经过我们的一番准备工作之后，他们于八月离开延安，赴晋绥抗日根据地参观。离延前，毛主席曾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外国记者在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林青的陪同下，东渡黄河，来到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防地。他们曾到离汾阳五里远的一个山头上，观看了我八路军拔日寇据点的一场战斗。据爱泼斯坦回忆，那是九月的一个晴朗的白天，在山头上看汾阳看得很清楚。战斗是罗贵波指挥的。我八路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以坑道为掩护，将炸药送到了敌碉堡底下，一声巨响，敌碉堡炸毁了，八路军指战员高喊着杀声冲向残破的碉堡，打死和俘虏了很多日本兵。指战员们将日本俘虏兵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外国记者还和日本兵进行了交谈，了解日本兵的思

想情绪。除了参观拔据点的战斗外，外国记者还参观了袭击日伪火柴厂的战斗。当堆满了火药和木料的火柴厂被我军点燃后，冲天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十分壮观，给外国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记者们沿途考察了我党政机关工作情况和人民群众努力生产、支援抗战的情况。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更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福尔曼一九四五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以后史坦因又写了一本比福尔曼更好更深刻的书——《红色中国的挑战》，于一九四六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影响很好。武道也写了《我从陕北回来》等文章，态度比较客观。特别突出的是爱泼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一九五一年在美国出版。以后他参加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总之，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政府对我们的重新认识和估价，起了一定的作用。

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

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包括全国各抗日党派领袖及无党派知名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我党方面的毛主席、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七人被国民党当局遴选为该会参政员。虽然国民参政会是个毫无权力附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咨询性质机构，但它多少还是一个可以说话和宣传政见的地方，所以除毛主席外，我党的参政员都出席过国民参政会议。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我党为表示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议，曾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二届一次大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参加的国事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改组失败主义的军事统帅部的政治主张。接着，十月十日，周恩来同志发表了《如何解决》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具体阐明我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实施步骤。十一月和一九四五年一月，周恩来专为建立联合政府一事，两次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

我党的主张，抓住了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症结，打中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害，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各阶层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重庆各界代表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邵力子、覃振等五百多人集会，愤怒批评国民党的误国政策，要求改组政府。

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追悼民主战士邹韬奋大会，向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展开了斗争。十月十日，民主政团同盟改名“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这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自一九四四年中，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又一次大溃败以后，美国朝野对蒋介石的失望和责难越来越强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胜利寄予希望。因此，这年六月，中外记者团访问了我抗日根据地及前方战场；八月，美军派观察组长驻延安联络；史迪威将军一再表示对八路军的支持。可是，当英美联军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定局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发生变化。它一方面明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而仍坚持扶持蒋介石，以便战后进进一步控制中国；另一方面又慑于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民主运动的高涨，不得不搞国共两党的调和。一九四四年九月赫尔利来华，曾以貌似公正的姿态，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分别会谈，表示支持我党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企图迫使蒋介石作出政治上的某些让步。

然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拒不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顽固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独裁政策。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用以抵制我党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断了国共两党的商谈，并积极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并坚决反对国民党“六大”决

定的、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准备内战的“国民大会”。

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一部分民主人士深深的忧虑。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希望我党作出不应有的让步，以求国共两党能通过商谈解决矛盾，团结抗战。而蒋介石也感到共产党人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他无法向美国，更无法向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交待，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催促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议。这时候，国民参政会中的七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于六月二日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申述了他们的愿望：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奠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毛主席、周副主席收到七参政员的电报后，为了进一步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于六月十八日复电褚辅成等七位参政员，邀请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电文说：“……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专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复电发出后，延安各有关部门特别是我们交际处，立即投入准备接待七参政员的工作。

根据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和我们掌握的资料，我们了

解到这七位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平均年龄高达六十岁；因此，对他们的迎接、招待，必须规格高、热情、周全。

我们交际处特地准备了适合老人清淡口味而又营养丰富的食品，如牛奶、鸡蛋、小米粥、白面馒头、白塔油等等。又考虑到陕北的气候，虽已至六月，早晚仍有些寒冷，就集中了许多厚棉被褥，每张床上都铺垫了厚厚几层。当时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先生正住在交际处。他热情积极地表示愿意帮助交际处做七位参政员的工作。

六月二十七日褚辅成等七位参政员晋见蒋介石，面陈他们的三条政治主张：（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蒋介石表示，对前两条无成见。于是，七位参政员决定立即去延安。

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得到王若飞同志的报告，说七参政员将于七月一日乘飞机来延。

七月一日这天中午，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林彪、叶剑英、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都到飞机场迎接。

下午一时，一架运输机在天空中出现了。它盘旋两圈之后，从远处迎着延河从东向西直线飞下，安稳地落在机场上。舱门打开，只见六位身穿长衫或西装的老人一边频频招手，一边依次走下飞机。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迎上前去与他们热烈握手，亲切问候。

原来说的七位参政员来延，怎么走下飞机的只有六个人呢？

原来，他们之中的王云五，在临启程的头天晚上忽然称病，未能成行，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到达延安。

褚辅成一行在毛主席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先乘车到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接着，就来到交际处休息。

黄炎培在他后来写的《延安五日记》中回忆说：“出延安城南门，到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地名瓦窑湾，每人一间卧房，凡是你所想到需要的，都替你预备着。”

我记得黄炎培那时面容圆而微胖，穿一身浅色中山装，虽然年已六十七岁，但神采飞扬，精力旺盛，象五十多岁的人。他是上海人，年轻时曾中秀才及举人。上海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学教育，曾由蔡元培介绍参加同盟会，并负责在上海活动。辛亥革命胜利，他曾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后又与张謇、马相伯等组织江苏省教育会，学生甚众。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二二年，北洋军阀政府的梁士诒、颜惠庆前后组阁时，曾聘请黄为教育总长，黄均拒绝，以示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

一九一七年，黄炎培赴美考察后，回国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办中华职业学校，为民族资产阶级培养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各种业务人才。该社团结了不少有自由主义色彩的金融、工商资本家及文化教育界人士，逐渐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职教派。该社创办的杂志《生活》周刊，由邹韬奋主编以后，影响很大。“九一八”事变以后，《生活》脱离了该社，独立出版。

抗战以后，黄炎培即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多次参加调停国共关系。一九四四年九月，黄联合张志让、褚辅成、王云五、冷遹及工业界等三十人签名，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主张实施宪政，首行约法等。一九四五年一月，又会同各界人士六十人，发

表《为转换当前局势献言》，对党派问题，主张政府应允许各党派公开，并与之切实合作。二月二十八日写了《致国民党诸友好的公开信》，认为入党与否及加入何党应有自由，将来中国国民党须与各党派合作，但仍由国民党居领导地位。结论是，要抗战建国成功，须有“三大合作”——各党派与国民党合作，各地方与中央合作，全国民众与政府合作。足见黄先生当时虽然不满国民党一党专政与强迫一切公务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的办法，但对独裁统治者的幻想仍很深。因而可以说他是典型的中间派。

黄炎培与黄齐生在大后方共过事，在国民党压迫黄齐生时，黄炎培帮助过黄齐生，所以黄炎培来到延安，就得到了黄齐生的热情帮助，黄齐生介绍他与延安各方面人士广泛接触，了解情况，在同来的几位参政员中，他是最活跃、最认真，所以也是收获最大的一个。

十分有趣的是，黄炎培在我们摆的丰盛的宴席上，对鸡鸭鱼肉从不着筷，只吃点素菜。却又不忌鸡蛋和肉汤。我感到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吃荤，黄先生笑笑回答说：“我不吃荤倒不是什么宗教信仰，主要是由于我的性格。我一九一七年夏天游新加坡海滨，亲眼看到捕鱼人出海归来，船上满载活鱼，渔夫一一将鱼破腹，挖掉内脏^①，投入另一空船，鱼儿跳跃几次才死去，人类为了果口腹，这样地残杀生物，使我感触很深，立下了素食的志愿。”——原来黄先生还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呢！

褚辅成是个瘦弱的老头，当时已七十四高龄。他身穿长衫，说话操着浓重的浙江嘉兴口音。他早年毕业于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参加过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后任国民党参议，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属于浙江陶成章派，反对陈其美。二次革命时，因反袁被捕入狱。袁死后恢复自由，参

加北京国会斗争，反对中央集权、军人跋扈。一九一七年七月，南下参加西南护法国会，任副议长，拥护孙中山，反对政学系。一九二一年，北京国会复活，他再来北京，当选众议院副议长。一九二三年曹錕贿选，褚首先与吕复南下反曹。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他是联省自治派，曾一度向右。一九二七年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兼民政厅长。蒋介石叛变革命，搞“清党”时，褚被诬有“共党”嫌疑，被捕入狱，旋即释放。此后一度消极，从事教育活动。抗战后，任历届国民参政员。

褚老先生是国民党元老中的正统派，为人正派刚直，比较开明，政治立场上可称中间派。所遗憾的是，他毕竟年纪大了，经过乘坐飞机和到达延安时紧张的应酬，他疲乏不堪，第二天就感觉不适，除参加几次正式会谈外，他个人没有怎么活动。

六位参政员中，唯一和我从前就认识的，就是章伯钧。章伯钧五十一岁，安徽桐城人。大革命前曾任安徽宣城中学校长，后留学德国，与朱德同志相识，遂加入共产党，与邓演达亦接近。大革命时回国参加武汉政府，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武汉“清共”后，参加南昌暴动，随叶挺贺龙军南下潮汕，失败回沪，此时他认为国民党是太右了，而共产党的政策是“超时代的政策”，于是脱离共产党，拥护邓演达，在柏林组织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邓死后，他在港粤一带活动，坚持反蒋。一九三三年，他参与发动福建事变，被推为人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失败后仍坚持抗战、联共、反蒋的主张。一九三五年首先响应我党“八一宣言”，将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组织反日阵线宣言。抗战后，坚持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一九四一年冬联合各抗战小党派，组织民主同盟，任组织委员会主委。数年来，为争取民主反对独

我，不屈不挠，可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分子。

我和章伯钧的第一次会面，是一九三六年“两广事变”的时候。那时，我从广东北海到广西梧州，向李济深先生报告重建的十九路军在北海的情况，及宣侠父同志和我的打算，在李济深的公馆“戎墟”碰上了章伯钧。章作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广西、香港、澳门等地活动。他与我讨论起中国时局的问题，章说：“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一要靠红军的胜利，二要靠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和你我这些有民族热血的青年人”。

这次他到延安，我们重又相逢。我俩在一起畅谈分别后的情况之后，章对我着重声明说：“我过去也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脱离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和党的关系。现在我虽然还不准备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但我要为党尽力的心愿从未改变，抗战开始，我在重庆就向周恩来先生正式表示，如果贵党对国事有何主张，需要各党派表态支持，则不必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尽管将我的名字签上。”

冷通又高又瘦，亦着长衫，时年六十四岁，江苏镇江人。他是安徽武备学堂毕业的，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运动，曾任大元帅府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两广参议厅厅长，广东政府内务次长等职。抗战后任历届参政会参政员，并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之一。他与黄炎培、江问渔朝夕相处，有江苏三老之称，在江苏绅士中有相当声望，是较为右倾保守的民主人士。他在延期间说话很谨慎，经常同黄炎培一道出去参观。

傅斯年是个矮胖子，穿西装，一副学者派头。他是山东聊城人，时年五十一岁。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德国柏林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科主任，北平图书馆馆

长，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抗战以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还被国民党聘为三青团中央评议员。

傅在中国学术界享有一定声望，他治学认真，重考证，但博而不专，持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在政治上，他与国民党接近，因而得到国民党的信任重用，但他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颇不满，一九四四年九月国民参政会开会时，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治有所揭发，并提出“贪污要绝对禁止，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他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可以改革，“要变不要乱”，主张“新自由主义”，反对“布尔塞维克的革命方法”。对国共两党的问题，他认为中共不应坚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可先参加国民党政府。足见傅是中间派中的右翼分子。

此人性格固执孤傲，在延期间活动也不太多。

最出我意料的是左舜生。我知道他是中国青年党领袖，而中国青年党被称“醒狮派”，是代表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党派，他们早年的口号是“内除国贼”，亦即反共；“外抗强权”，亦即反苏。这样一个名为“青年”实质老朽的老年党，其领导人必是封建遗老式人物，加上他的名字“舜生”，使我想象他必是近乎身穿长袍马褂，手拿水烟壶，满口迂腐之词的老头。谁知一见面令我吃了一惊，原来，左舜生的内容与形式很不一致，他竟是长衫革履，俨然一中年学者或教授。他当时五十二岁，湖南长沙人。早年曾留学法国，“五四”以后，是“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国家主义派”，一九二四年，“国家主义派”演变为中国青年党，出版《醒狮》杂志，继续宣传“国家主义”。大革命时期，该党曾与东北军阀勾结，残害进步力量。抗战爆发后，左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上，曾大肆攻击晋察冀边

区。一九三八年底，在所谓“和平空气”正浓时，他也曾有过和平妥协的言论。一九四〇年以后，政治态度渐转开明。一九四一年民主同盟成立时，左为负责人之一。一九四四年五月为民主同盟主编《民宪》半月刊，主张民主团结，来延前他的言论较为激进，表示国民党一党专政不打破，民主同盟决不参加国民党的“政务委员会”，并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国民大会。他来延安是以民盟代理主席的身分来的。

观其一贯的言行，可看出他是个善于“观风转舵”的政客。在当时，他的立场属于中间偏右。

六参政员在到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即与我党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举行正式的会谈。

会谈的气氛坦率、自然、诚恳。双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商国是，十分融洽。六参政员谈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对国共两党团结问题的建议……当他们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主席风趣地接过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关于国民大会，六参政员的看法倒是与我党十分接近。对其他重要问题的看法，他们六人间却各有差别。

第三天下午（七月三日），毛主席和我党的七位代表来到交际处，在山坡下向东的大会客室里与六参政员继续会谈。这次谈话的时间特别长，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双方仍是各抒己见，不涉辩论，尽大家所想自由发言。结果推定由我方把会谈意见综合成文写出来，明日共同审阅定稿。

七月四日下午，双方第三次聚会，在热烈和谐的气氛中，由毛主席拿出由我方整理的会谈的综合纪要，每人分送一份。

会谈纪要的主要内容如下：

来延六参政员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1) 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2) 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

(3) 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4) 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5) 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具体内容。

这个文件体现了我党的求同存异精神。它既包含了我党与六参政员的共同观点——反对国民党企图召开真独裁、假民主的国民大会，争取召集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又明确申述了我党的立场和五项不可缺少的具体建议。为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

国民主人士指明了以后共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与实现民主建国的正确方向和步骤。

毛主席逐条逐句地向六参政员解释了文件中我党的建议书，并郑重其事地交给六参政员，请他们带交给国民党当局。

正式的会谈就此结束。六参政员来延安要办的主要事情很圆满地办成了。

六参政员的“副目的”（黄炎培语）是要参观延安。

在交际处的安排下，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会见了三三制政权的李鼎铭副主席，柳湜、贺连成、霍子乐等正副厅长，分头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供应总店、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在文化、教育、卫生、社会风气方面，也都一一调查研究。延安的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特别是蒸蒸日上的各项事业的发展气势，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六位先生逗留延安的五日之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盛大的宴席招待和群众大会、文艺晚会慰问。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轮流出席作陪。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不知有多么可怕！但当六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谦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学识不浅。使他们感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如古人所说“如坐春风”了。

六位先生特别是黄炎培还与当时在延安的、从前有过共事关系或师生之谊、现已参加革命的老朋友，包括吴玉章、陈毅、陈

云、张仲实、张曙时、范文澜、丁玲、陈学昭等会了面，这些老朋友们畅谈解放区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他们参加革命后所发生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给六参政员很深的感触。

七月五日，六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了。中午，重庆来的飞机飞临延安机场，接褚辅成一行返渝。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参政员带着各自不同的感想和认识，告别延安，飞回重庆。

六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所产生的效果是十分良好的。这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很大成功。通过我党中央负责同志与六参政员的面谈，和延安各方人士对六参政员的接待，双方增强了相互了解，扩大了我党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并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六参政员回重庆后集体面见蒋介石，陈述了他们与我党的谈判情况，并将我党写的会议纪要交给了蒋。这无疑对蒋的独裁反共政策是一个打击，对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个鼓舞。

从六参政员访延后的表现来看，他们的政治思想及对我党的认识都有程度不同的进步。他们在抗战胜利后，都参加了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但在蒋介石凭借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时期，他们的政治立场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分化。黄炎培、章伯钧、冷遹三人后来响应我党的“五一”号召，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三人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或全国政协中任职。

褚辅成死于解放前，晚节尚好。只有左舜生、傅斯年转向了反革命，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延安之行对于黄炎培来说，又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行成为黄炎培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来

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只是抱着促进国共两党恢复商谈的心愿而来到延安。及至身临其境，才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他回重庆后，用很短的时间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以当头一棒。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当时黄炎培将《延安归来》寄给我十本，嘱我自己留一本外，分赠延安的中央领导，我照办了。）从这以后，黄任老模糊的思想逐渐澄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他与施复亮、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等联合，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另外成立了“民主建国会”。在一次又一次的事实教育下，终于找到与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

邯郸起义的范龙章将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一面伪装和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一面同日、伪合流，调动大军向解放区进犯。

一九四五年九月，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胡宗南、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等部八个军，连同日寇及伪军孙殿英、庞炳勋等残部，总计二十万人，以晋冀鲁豫解放区为进攻重点，由郑州、新乡沿平汉路北进，敌人的意图是打通平汉路、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割断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

我晋冀鲁豫军区第一、二、三纵队和地方武装六万余人，以一部兵力诱敌深入，主力隐蔽于邯郸以南平汉路两侧地区待机歼敌。从而揭开了邯郸战役的序幕。

十月二十四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新八军高树勋部、四十军马法五部、三十军鲁崇义部，共约四万五千余人，北越漳河，攻陷磁县县城，进至邯郸以南马头镇地区。此时，我晋冀鲁豫解放军以一部兵力在正面阻击，一部兵力控制漳河渡口，切断敌后续部队北上道路，主力从两侧突然出击，将敌包围。二十八日，我军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经激烈战斗，歼敌第四十军一部。在这决战的关头，我党的敌工人员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争取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一个纵队万余人战场起义。这一起义顿时改变了邯郸战场上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使敌三十军、四十军陷入孤立,缩短了解决敌人的时间,为邯郸战役的全胜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高树勋起义不但在军事上有以上所述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

高树勋起义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大规模的反内战起义。

高树勋起义向广大国民党官兵宣告,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战争,是不义的战争,替蒋介石打内战,实质就是替美帝国主义打亡国仗、汉奸仗,把中国拖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的深渊。一切爱国的军人要想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前途,就必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高树勋起义还宣告,反动派虽然可以依靠美国所供给的装备和运输条件暂时夺取一些城市,但是他们整个的军事力量却是愈战愈弱,而解放军则愈战愈强。替蒋介石卖命,打共产党的军队,只有死路一条。要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就必须起义。

高树勋起义同时向占国民党军队半数的“杂牌军”宣告,蒋介石企图利用发动内战的机会,吞并和消灭“杂牌军”。一切不愿做炮灰的“杂牌军”官兵应坚决拒绝蒋的内战乱命,举行战场起义。

在高树勋起义的影响下,从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队中先后发生了第六路军郝鹏举在台儿庄起义(后郝鹏举又叛变);三十八军五十五师孔从周在巩县起义;六十军一八四师潘朔端在海城起义;空军第八大队刘善本驾驶B—24型飞机起义;陕北保安队副总指挥胡景铎横山起义……以及

无数次小规模起义。起义军队达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二。这些起义，形成了一个潮流，我军称之为高树勋运动。

高树勋运动的重大的意义，正如朱总司令在《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一文中所指出的：“高树勋运动已经成为国民党陆海空军中一切有爱国心有良心的广大官兵的旗帜，成为人民在自卫战争中战胜反动派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平、民主的重要因素之一。”（见《朱德选集》）

高树勋同志的起义部队退出内战后，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休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成“民主建国军”。高树勋同志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同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同志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同志为第二军军长。

我这里要回忆的，是关于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范龙章同志的一些事情。

我和范龙章最初的接触，是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他率领民主建国军参观团来延安参观学习的时候。当时，民主建国军成立已近一年。这支部队虽然已经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官兵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但政治素质还是参差不齐。特别是干部，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欺骗，对共产党和解放区不但大不了解，甚至还有很多误解。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民主建国军曾于一九四六年三月派出首批干部参观团来延安参观学习。首批干部参观团由副师长聂志超带队，来延安住在我们交际处——这就是我交际处与民主建国军打交道的开端。交际处负责安排他们的全部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参观学习，聂志超等人的思想变化很大。聂志超本人提出申请参加共产党。经过我们的考察和帮助，组织上认为聂志超合乎入党条件，就在聂志超等人学习结束离开延安前，发展了聂志超入党。这批参观团干

部回民主建国军后，以自己的耳闻目睹到各部队宣传延安的新气象和共产党政策的伟大。这些报告深受民主建国军官兵的欢迎，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于是，民主建国军又派出第二批参观团赴延，这一批由范龙章同志带队，一行十八人，他们是：吴秉义、孟宪忠、郑伯庸、吴经略、马骏、刘树德、石馨肃、高继盛、李宏肇、王春明、赵国勋、马秀琴、张耀庭、刘青山、王昌文、马铭初、窦舆云。我党派到该军做政治工作的民建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演，也陪同他们一起来延。

我初次见到范龙章，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典型的旧军人。他身材高大健壮，脸庞削瘦，面色黝黑，眉眼鼻唇的条线有棱有角，透出久经沙场的武将那坚毅果敢的气度。他豪爽义气，颇有闯荡江湖的豪侠派头。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修养和理论学习显然是很不够的。

我们经过了解，知道范龙章的思想状况大致是这样的：

一、主流是好的。他一来到延安就表示：“一个人不论他对解放区如何缺乏认识，只要他看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就会改变自己的偏见。我听到革命这个词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我认为毛先生所领导的才是真正的革命。我自己做不做军长，都是应该参加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命运。”他希望来到革命阵营里能干一番事业，有所作为。

二、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旧军队中，很少接触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革命思想，因而世界观还是陈旧的。封建的江湖义气、结帮拉伙、迷信武力等观念十分严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根本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常识更缺少了解。

三、由于他长期生活在旧军队和旧社会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环境中，特别是身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排挤、吞并、欺压，养

成了他多疑的个性。因而对我党是不是信任他有些疑虑。他对我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团结、使用、教育、改造——也认识不足。在国民党军队中，他的部队是“杂牌军”，他总是对蒋介石嫡系部队怀有戒心。起义后，他又将自己看作是“杂牌军”，象戒备蒋嫡系那样，对我党怀有戒心。他认为党在民主建国军政治部工作的同志怀疑他、监视他，甚至他到了延安还有人盯着他。故而思想情绪时时波动。

四、与高树勋同志有误解和矛盾。我们知道，旧军队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一个军官要想升官、占地盘，必需结帮拉伙，抱成一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自己的“实力”来向上司讨价还价。所以军队内部分“你的人”，“他的人”，“自己人”等等。保存“实力”比什么都重要。范龙章长期厮混于这种环境中，所以总是放不下“保存实力”这种旧思想。他下面有两个最得力的团长，一个叫吴秉义，从土匪时期就跟上范龙章了，此人枪法很准，十分悍勇，另一位是孟宪忠。两人深得范的宠信。范龙章所带部队的老底子，也是从土匪时期过来的，所以被范视为命根子。

范龙章总认为，高树勋此人“不讲义气”，专门暗算别人，把别人的部队吃掉，因而在国民党军队中有“高猴”之称。范认为高对他的部队覬覦已久，所以处处防备高的“暗算”，感到不能与高共事。

而高树勋则认为范龙章原是汤恩伯介绍到新八军当师长的，“不可靠”，并且桀骜不驯、爱闹独立性，经常唆使他袖子里的两只“小老虎”——吴秉义、孟宪忠出去伤人。

以上就是范龙章初来延安时的基本思想状况。

可想而知，要向他和他的部下们灌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树

立革命的人生观，将他们改造成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人民军队的指挥员，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反复的过程。但是，我们深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是能够改造一切人的。当我和副处长周子健将民建军干部及范龙章的基本思想状况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时，尚昆同志指出，看来民主建国军范龙章等大批起义将领和军官，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缺乏认识，并且对我们团结、使用、改造起义人员的政策方针也不很理解，因而思想与我们距离比较大。交际处对他们应当进行大力的帮助、教育和争取工作。一方面要组织他们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及我党的任务、路线、方针、政策等根本问题；另一方面，要针对他们存在的许多认识问题和思想问题，组织他们参观访问，使他们理论联系实际，从而达到提高政治觉悟的目的，这是第一。第二，要及时向中央反映他们的思想情况，以便中央负责同志亲自出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第三，住在交际处的申伯纯在晋冀鲁豫工作时，曾做过高树勋及民建军的工作，现在可以让他帮助你们工作。第四，他们学习参观的时间，可以比聂志超他们安排得更长一些，以便更深入细致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随着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国民党起义部队和起义军官今后还会更多，所以做好民主建国军的工作非常重要。

我们根据尚昆同志的指示，在理论学习方面，安排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讲座。在参观访问方面，尽量使他们深入地看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组织他们会见在延安的党外代表人物。

首先，我们组织他们参观了解农村情况。

十月中旬，陕北农村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我陪同范龙章和参观团来到延安郊区的吴家枣园，会见当时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英雄。这个劳动英雄原是逃荒的赤贫，两手空空，讨饭来到陕甘宁边区。在边区的土地政策下，他通过自己艰苦的劳动，发家致富，成为富农。我们走进他的家里，只见窗明几净，床上红绿被子叠成一摞。他已有了三百一十亩土地、存粮一百石、四头牛、三匹驴、二十七只羊。不仅他一家，整个吴家枣园，以至整个边区，农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家丰衣足食，人人安居乐业。这都是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领导得好啊！

吴家枣园的事迹虽然对范龙章等人教育很大，但是我们交际处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够的。因为民主建国军中，很多军官都是地主出身，有些不是地主出身的，当官以后也已用搜刮来的军饷在家乡买了地，自己也成了地主，所以，虽然他们已经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但他们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党是怎样改造地主的。

第二、三天，我又陪同他们去延安郊区尹家沟参观一个改造好的陕北大地主家。

这家座落在延安郊外飞机场跑道半里外的一个山崖下。早晨，我们乘汽车来到这家的窑洞前。这个地主是六十七岁的老头子，满脸堆笑，迎接客人们进窑。在炕上的一方红漆小炕桌上，堆放着丰盛的葡萄、瓜子和点心。这都是他自己劳动的果实，我们在他的炕上、椅子上坐定，就同他拉起话来。

这家地主在一九二七年时已经拥有三千亩土地和成群的牛羊，并有三个大庄园。一九三五年陕北实行土地革命，把他的土地、牛羊、庄园都分掉了，只剩给他五十亩地，让他自食其力。他十分仇恨共产党。然而，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建立，各项政策

的实行，他的仇恨情绪渐渐消散了，还产生了对共产党、对边区政府的热爱。

他向我们举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有几件事使他感动，因此他消泯了旧日的怨恨：第一，毛主席领导生产，军队帮助老百姓生产；第二，开设医院，为老百姓免费医病；第三，民主政府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关于最后一点，他举例说：“过去国民党修飞机场时，命令一下，立刻就要你搬家。我那时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哀求说：‘请你们稍缓一下，等我收拾好一个住处再搬。’他们却说：‘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象你这一家，国家事情还能办吗？不行，非得马上搬不可！’于是，树木砍了，房子拆了，东西都从窑里扔了出去。前年延安修飞机场，边府、市政府都派人来委婉地解释，说拔了树木给钱，占了的土地所有权仍属我；后来占了我四亩半地，一口井，五十棵树，连搬家费给了我一百六十万元（边币）。最后工程处还请老百姓吃饭。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

“现在别人再把土地归还你，你愿意吗？”范龙章问。

他说：“不愿意，我现在自己劳动不缺吃穿，再要让我当一个富豪，放高利贷被穷人咒骂，我不愿意。再说。现在人人有土地，人人劳动，大家都过好光景，有啥不好呢？”

“听说您见过毛主席？”有人又问。

“是啊，以前我是不愿意见他的。”这个地主提起他去见毛主席的事，十分自豪，他叙述当时的情景：“今年八月十五，我带着孙儿去见毛主席。见了毛主席，我说：‘现在我觉得靠自己劳动过活，是最体面，最快乐的。象我在旧社会虽然有钱，但土匪骚扰得成天钻沟溜洼，现在却能过平安日子，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啦！’”

这些生动事例，对民主建国军参观团影响特别大。在过后

不久交际处组织的座谈会上，他们发言格外活跃。每个人都心悦诚服地赞扬党的土地政策。范龙章最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参观了两个家庭，这对我们来说确是个实际教育。邯郸起义已一年，我们大家有一个问题还想不通，这个问题是牵连到个人的，我们家里都有一些土地，参加革命不是把我们自己革掉了么？现在完全明白了。这两家的事实教育了我们。”

范龙章说到这里，全场纷纷附和，都说有同感。范笑着继续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过去我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之争，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之争，而这百分之二十的地主，中共是不会要的。”这糊涂可笑的认识，引起哄堂大笑。其实不少起义军官都是那样认为的。

继这次参观活动之后，交际处又组织参观团参观延安大学。参观的那天，延大校长李敷仁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和介绍情况。然而给参观团印象最深的，还是李敷仁本人的事迹。

李敷仁是陕西著名教育家、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负责人。是一位敢于替老百姓说话的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反动派对他十分仇恨，竟采用特务暗杀的卑劣手段来迫害他。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名特务分子将李敷仁绑架到咸阳郊外，朝他打了两枪。第一枪未打中，第二枪子弹从他背部射入，从咽喉处穿出。特务以为他被打死了，就仓皇开车逃跑。其实子弹未伤要害处，幸而有几个农民路过，见到受害人是他们平日尊重的李敷仁，急忙将奄奄一息的他抱回自家掩藏，并为他治伤。李敷仁在农民的看护下，秘密调养了两个多月，伤势稍好之后，就在农民的掩护下秘密奔赴解放区，七月下旬来到延安。受到我党的热情欢迎和边区医院的精心治疗。

现在，李敷仁身上的枪伤已被医治好了。他更加昂扬地投

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事业中。

当范龙章等人在延大参观时，李敷仁对他们说：“我现在仅存一副残余的生命，只有‘爱’与‘憎’二字。我憎恨这些禽兽的下流卑鄙，他们将会陷自己于绝境。而替人民说话喊冤的人是不会孤立的。他们打死一个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文化人，就可以唤醒一百个人来争取民主；他们杀死一个争民主的领袖，就可以唤醒千万个老百姓。我认为血一点也没有白流！国民党法西斯杀死的千百万人的血，就是争取全国民主的资本。特务分子能有多少？全国人民他们能杀尽斩绝吗？他们暗杀就等于自杀！”

这有力的揭露和控诉，使范龙章等人感慨很深。

以后，交际处又组织他们参观了一些工厂和机关。在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为民建军参观团开办了理论学习班。第一课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给他们做的辅导。接着，由艾思奇同志教授辩证唯物主义，其他在延的理论工作者，也按计划讲了政治经济学，还辅导他们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毛主席著作。

为了把学习搞得更加生动活泼，我们还组织了报告会、座谈会，尽量以活生生的事实，来帮助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朱总司令就亲自为学习班作过报告。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象四川人摆龙门阵那样畅谈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当时住在交际处的著名法学家陈瑾昆，也给学习班作了报告。陈老先生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大理院庭长、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部司长。在法学研究方面著述宏富。抗战胜利后，在北平各大学教授法学，名望极高。一九四六年四月，他应学生邀

请，到中山公园讲演。讲演内容无非是劝告国民党当局开放政权，澄清吏治，停止内战，收揽人心等等。然而就是这样的轻微批评，也为国民党所不容。在陈先生讲演时，特务分子一拥而上，将这位六十岁的老人打得头破血流。陈先生一气之下，辞去了各大学职务。这时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开始想到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能否救中国。六月间，陈先生只身来到延安，考察延安和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最后得出了“唯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九月间，他携全家老小一起到了解放区，并发表了《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的著名文章。

陈先生给民主建国军参观团作的报告，不但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说明国共之争的谁是谁非，还特别从法的角度，揭露了国民党借口“训政”实行专制独裁的实质。

西北军老前辈续范亭同志，是民建军这个老西北军部队官兵崇拜的对象。当时续范亭在柳树店养病。我陪同参观团的成员，分批前去柳树店，听续范亭给他们现身说法。续范亭从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到怎样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以致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幻想以一死惊醒蒋介石的“天良”。还研究过佛经，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最后只有服膺了马克思主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出路……

另外，陕北著名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也给学习班讲过抗战中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设问题。

这一时期，在交际处住过的一些国民党起义人员，如空军上尉刘善本、陕北保安队副总指挥胡景铎、云南抗日将领张冲……都和范龙章等人一起座谈过。对范等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些理论学习、政治教育、思想工作，参加学习班的民

建军干部们都程度不同地有了进步。其中以范龙章的变化最为突出。

一次，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之后，范龙章显得很是不平静，多次独自徘徊于窑洞外。后来，他找到我，诚恳而又有些沉痛地对我说：“金处长，我本来也是苦出身呀！可是，我过去一直引以为羞耻，讳莫如深，从不告诉别人，今天我才懂得，我出身贫困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啊！”接着，范龙章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的出身和经历。

范龙章，字卓云，河南省伊阳县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幼时家境极贫苦，父母及其兄弟二人共四口人，地不过两亩，父母终日劳碌，全家不得温饱。范龙章三四岁时，父亲因生活所迫，投井自尽，母亲不得不带他兄弟二人迁居舅家郭村，住于村外庙中。范兄弟二人稍长，以拾柴牧牛度日。到范龙章十六七岁时，为混口饭吃，他投入北洋军阀镇嵩军二路刘镇华部，在书记官邢润斋处当勤务兵。

一九二二年，范龙章的哥哥为饥饿所迫，到一家地主的地里偷豆苗吃，被守护人发现，一枪打死。噩耗传到范龙章那里，范悲愤已极，在邢润斋处取得手枪一支，请假返里。纠集年少友好为兄报仇，击毙仇家六口。范知闯下人命大祸，在家及军中均不能立足，乃结合三十余人，投入豫西的土匪姜廷璧部。从而开始了他土匪的生涯。

那时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豫西一带山高林密，因而土匪蜂起，各抱山头。山头有大有小，时而互相吞并，时而互相结合。范龙章所在的姜廷璧部，拥有三四百人枪，活动于伏牛山一带。

范龙章在谈起他的土匪生活时，常常很有兴致地说到各股土匪之间的明争暗斗。他说，那时当土匪不但要对付官军，还得

对付别股土匪，弄不好就会遭到别股土匪的暗算，被吞并掉。

各股土匪之间的勾心斗角，常常采用“请客”的形式。这种“请客”的凶险，不亚于项羽的“鸿门宴”。但土匪头领只要接到请柬，明知凶多吉少，也得硬着头皮去，否则，就会被对方视做胆怯和示弱，从而更难以立足。土匪首领在赴宴之前，先要做好周密的安排，以防万一。赴宴时带领卫队数十人。到对方山寨的山脚下，由卫队朝天猛烈放枪，枪声越激烈越好，有时持续半小时之久，耗费子弹十分厉害。对方听到枪声，自会列队下山，以隆重的礼节迎接。

“土匪的子弹不是很宝贵吗？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得这样厉害？”我曾问范龙章。范解释说：“这是为了壮声势。表示自己子弹多。实际上却是忍痛消耗掉的。”

宾主相见之后，就在酒席上把酒推杯，大吃大喝一番。若宾主是两股势均力敌的土匪头目，则当场换帖拜把，称兄道弟，互赠礼品。若客人是小股土匪头目，或来时未做好周全安排，则酒席翻作屠场，瞬时刀枪相见，血肉横飞，演出一幕幕自相残杀的悲剧……

听了范龙章这些令人惊心的叙述，我想，范的这段土匪生涯，无疑对他以后在旧军队中的“发迹”有着重要的影响。正是绿林中的艰难和险恶的环境，把他磨炼得机智、勇猛，培养了他的军事才干，使他以后能在旧军队中步步高升。当然同时也铸成了他不少坏思想和坏作风。如江湖义气、刚愎自用、容易猜疑等。

范龙章在一九二四年底结束了土匪生活。当时姜廷璧匪股已扩大到人枪五六百，被收编为镇嵩军独立第四旅辖下的一个团，姜任团长，范任副营长。从而范由土匪小头目转而成为旧军

队的下级军官。他的生活也由打家劫舍而转为军阀混战。

从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前，在近十三年的岁月里，范龙章在政治上是盲目的，只知升官发财。他不懂得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跟随自己的官长去拼搏沙场。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为主子们的争权夺利而卖命，同时又在生死搏斗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十几年中，范龙章由一个副营长，逐步上升。从营长、团长、旅长，直至师长。他以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方面对主子忠心耿耿、万死不辞，另一方面又拉帮结伙，扶植个人势力，以江湖义气维系自己的死党。这样，一个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终于演化成为有钱有势的国民党杂牌军的高级军官。

范龙章曾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随军进攻过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江西革命根据地，并在商城战役中为汤恩伯解围立下汗马功劳。但他的军事行动，并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同蒋介石集团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出发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动机，是有所区别的。总的来说，范不过是个武夫，只搞军事，不问政治。在他看来，只要能抢到地盘、升官发财，打谁都一样。

是抗日战争的炮声，震醒了范龙章的民族意识。在国土沦丧、人民涂炭的民族危亡面前，范龙章终于开始有了政治目标——守土抗战。在八年抗战中，他的表现是好的。

“八一三”上海开战以后，他随军赴上海参战，任八十六师补充旅旅长。接着参加台儿庄大战和江西瑞昌之战。武汉失守后，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邀请，从江西返原籍，组织豫西抗日武装。范龙章在豫西一带还是较有影响的。经他的筹划，成立了豫西人民自卫军。后该军调赴豫东。他被委以豫东游击司令职，在兰封、考城一带活动。一九三九年该部又被调往豫北，与

日寇频繁作战。同年因日寇“扫荡”残酷，不得不转入太行山，先由庞炳勋的四十军指挥。后庞、孙相继率部投敌，二十七军溃不成军，范龙章在此大节上，表现了抗日军人的坚定立场，他毅然与庞、孙决裂，带领残部仅二千余人渡河南下。回到河南后，被委任为新八军新六师师长，在军长高树勋的统帅下继续与日寇作斗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是严令限制杂牌军收复失地、扩大地盘，后又驱赶杂牌军上内战的火线，一来为他当炮灰，借杂牌军的手消灭共产党；二来又借共产党的手削弱以至消灭杂牌军，达到其一党专政和蒋家王朝私天下的目的。

范龙章对蒋的这一套还是有看法的。他作为多年的杂牌军将领，早已吃够了“中央军”歧视、排挤和吞并的亏。因此，在高树勋将军毅然举起义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反戈一击的重要关头，范龙章坚决跟随高树勋起义，因而得到了我党和高树勋将军的重用，被委任为民主建国军第一军中将军长。就范的个人生活道路来讲，经过几十年的曲折道路，至此才真正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

在起义之前，范龙章的生活目的有两个，一是为父兄报仇，报复欺压他的旧社会；二是想出人头地，洗刷他过去贫穷的“耻辱”。为这两个目的。他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押宝，在枪林弹雨中赌博命运。

来到延安以后，他才真正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和军队，过的是一种崭新的、合情合理的、真正的生活。他在谈感想时说：“解放区的人民，过着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在共产党的扶助下，贫苦的农民富裕了，而原来的地主也过着安乐的日子。……共产党不仅为穷人谋福利，同时还照顾富人的生活，使

得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做，的确，现在在解放区里，已经没有乞丐，也没有土匪了。

“解放区的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觉悟，老百姓把解放区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情。当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时候，许多地区的民兵自卫队，都自动地操练，军、政、民都团结起来了。我从邯郸到延安，经过四个解放区，一千七百里行程，没有听到老百姓对军队或政府发出怨言。

“解放区的政治是民主的，人民是自由的，这里没有帝国主义的军队横行霸道，也没有特务的威胁，延安市的面积并不小，然而只有几个警察，社会秩序却异常安定。

“解放区的工作人员，上自毛主席，下至伙马夫，都有一个精神，就是倾听人民的意见，为人民办事情，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我见过许多的中共要人，他们的态度异常和气，衣食异常朴素，他们真正是人民的公务员。

“解放区对待起义的军队是什么态度呢？以前我虽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却向来受着杂牌的待遇，不管有什么本领，反正杂牌的头衔是去不掉的。起义以后，共产党并没有把我们当杂牌军，并且生活上的待遇还超过八路军的供给水准，我们过去做了一二十年的杂牌军，现在居然成为正牌军了。

“……事实教育了我，打破了过去我对于共产党的怀疑，并且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过去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见所闻，尽是政治军事的黑暗，社会的风气腐败，自上而下贪污成风，人人都是升官发财的思想，谁管社会人民的福利？因此我悲观极了……解放区的事实，却给我很大的鼓励，我现在认为中国大有希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决心为人民服务，不要说是做军长，就是当一个兵也是光荣的！”

特别令范龙章感动的是，共产党的领袖对他的亲切关怀和耐心教育。范龙章率领参观团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就设宴招待全体成员。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出席宴会，亲切慰问范龙章等人。以后，毛主席三次与范长谈，和风细雨般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彭老总、贺老总、杨尚昆同志等，也多次与范谈心，使范感到如浴春风，茅塞顿开。

所有这一切，使这个劳动人民的儿子，终于苏醒了自己的阶级意识，萌生了回到自己阶级队伍的念头。他决心抛弃过去的旧生活，追随共产党走全新的道路。一九四六年底，他正式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这一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直接批准，入党手续是在交际处办的。由杨尚昆同志直接办理。介绍人是申伯纯、金城、周子健。申伯纯是晋冀鲁豫边区副议长，在党外有些影响，且在邯郸起义前夕，曾亲到新八军做工作，所以把申作为范龙章入党介绍人的头一名。

入党时，由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与范龙章谈了话。朱总司令说，我们共产党这个“大公司”，是搞五湖四海的。不论谁，只要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具备了入党条件，党的大门就会敞开，欢迎他进来。我们共产党同国民党那个“公司”不同，国民党那个“公司”，是为个人和小集团谋私利的，所以它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从这次伪“国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做事从“公”字出发，所以党内不论职务高低、不分入党先后，一律平等，决不允许因出身、经历的不同，而歧视、排挤甚至打击一个党员。你就放心吧。相信你在党的教育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能够成为好党员。

中央组织部饶漱石、安子文等，也同范龙章谈了话。范龙章就这样履行了入党手续，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

一年。

本来，一个人的入党，是他政治生命的新起点，他应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不断进步，日臻成熟。但是，对于范龙章来说，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他阅历毕竟太复杂，走过的弯路毕竟太多，且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殊非易事。加上我们党内有些负责同志对统战政策理解不深，总用“左”的眼光看待国民党起义人员，并施以一些“左”的错误做法，致使范龙章不能彻底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在他刚刚取得一些进步不久，又遭受了一些挫折。

首先是他与高树勋之间的矛盾。前面已经说过，他总以为高树勋要吃掉他的部队，所以，时时提防高的“暗算”，感到不能与高共事。

一九四六年底，范龙章收到高树勋一封电报，大意是：“卓云兄：调兄为副总司令，兄眷甚安。”范看了十分气愤，他认为高树勋是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将他的军长实权夺走了。我们闻知他升任副总司令，向他表示祝贺，他却面无表情。他私下对亲信吴秉义、孟宪忠等人说：“高猴算整个把我们都吃啦！人、枪我们不可惜，但这口气出不来！”从此，情绪又发生波动。

毛主席了解了这些情况，亲自作范的思想工作。一天，毛主席在王家坪请范龙章一个人吃饭，我在旁作陪，席间主席诚恳地对范说，高树勋起义是有功劳的。你们随同他一道起义，也是有功劳的，而且功劳是很大的。你觉得他这个人不好合作，我也听说国民党军队里叫他“高猴”。但我劝你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在革命军队里一切都听党的指挥，都是党的人，不分哪个山头，哪个派别。即使高树勋确实如你所说，有那种错误思想，那么他既然用来对付你，也会用之去对付别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认识他，那时候提出解决问题，就容易解决了。退一步想，

你们两人之间有矛盾，难道只是高一方面的问题吗？你也应该检查检查自己，是不是也有不当之处？

毛主席的涓涓细语，使范龙章颇有感触，他感谢毛主席对他的细致入微的关心和以诚相见的交谈。在和毛主席一起吃饭时，他动情地问毛主席：主席，听说你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甚至连你从前的夫人都被蒋介石杀害了，你真是舍己为国呀！你恨蒋介石，我也恨蒋介石，他在中国搞独裁统治，中国就好不了。现在，你家庭的损失，比我的家庭还要大，况且你的亲人都是被蒋介石直接杀害的，你一定比我更恨蒋啦。

主席风趣地说，是啊，蒋杀了我家人很多人，但他没能杀掉我，留我一个已足够了！

朱总司令也找范谈了话。总司令劝范不要留恋旧的东西，要往远处看。并建议他先不回民主建国军，留在延安多学习一段时间，将来另行安排工作。

领袖们的一番工作，使范的情绪稳定下来。

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的部队已经迫近延安。范龙章、我以及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于十四日撤离延安。离延前，彭德怀司令员来看望范龙章，跟他长谈。彭总十分信任地把我军撤离延安后的战略意图、作战计划都告诉了范，并征求范的意见。杨尚昆同志也做了周到的安排。他说，民主建国军参观团来时，团以上干部都有马，现在要走了，应该每人发给他们二百万元（边币），任他们买马或干别的。

我们交际处一行先到绥德，在那里滞留一个多月。四月初，胡宗南部又进犯到绥德南六十里的司家川。疏散在绥德的中央机关连夜向黄河东转移。我在转移途中，在绥德东六十里的义合镇遇到了周恩来同志，他指示我过河后，将张冲同志直接送到

兴县贺龙司令员那里去，将范龙章等客人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我们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从吴堡渡过黄河，转移至临县三交。不久我被调到西北军区做敌军俘虏军官的工作，范龙章也由申伯纯陪送，来到兴县，住在贺龙同志的晋绥军区司令部里。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根据在延安时林伯渠、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在岚县河口镇向解放军官团中负责管理敌军俘虏军官的党员干部作报告，提出了对俘虏军官“教育、瓦解、争取、使用”的方针。八月上旬，我再从岚县到兴县。这时，西北解放军官教导团的高级队（上校级以上的解放军官）驻在兴县千层村。晋绥军区司令部在蔡家崖。我就邀请范龙章到解放军官团高级队去，给蒋介石嫡系将领作报告。范痛快地答应了。他很认真地做了准备，给俘虏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段深刻的阐述。他说，过去，军人都以“投降”为耻辱，但在今天，对“投降”二字应该分析一下，究竟是向谁投降？如果你是替蒋介石做炮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那么今天你向人民投降、向共产党投降，这非但不是耻辱，而且还是光荣。因为你这样做才是顺应历史的潮流，符合人民的利益。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现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大家还看不清么？

范龙章的讲演，受到俘虏军官们多数人的欢迎。我记得当时听他讲演的俘虏军官中，有中将军长廖昂、少将旅长李纪云、麦宗禹、李昆岗、刘子奇、阎锡山的将领上将司令杨澄源、少将旅长陈成武、肖贵昌等。

这一时期，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完全明朗化了。

成为敌人进攻重点的山东与陕甘宁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在积极防御作战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在山东，从一九四七年

四月六日起，到七月十六日止，华东解放军经过了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及费县战役等，歼灭了蒋军六个整编旅，约计六万四千余人。特别是孟良崮战役，一举歼灭了蒋军嫡系部队六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并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使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一蹶不振。

在陕甘宁边区，我军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指挥下，取得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消灭敌人三万一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在西北的重点进攻。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渡黄河，揭开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的序幕。从此人民解放军从局部反攻转入全面反攻，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刘邓大军过河后，仅用二十一天时间，千里跃进中原，一直深入大别山山区，象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胸膛。

继刘邓大军之后，陈谢兵团又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蒋管区作战。经过前后十多天的胜利战斗，渡河部队歼灭敌人两万五千余人，解放了豫西十几座县城和广大乡村。其锋芒直指豫陕孔道潼关和豫南、鄂北广大地区，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作战。

胜利的曙光已经照亮了祖国大地。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在这成功在即的大好时刻，戎马一生的范龙章，怎肯坐待胜利到来、而不去显一显身手？这正是人人争先恐后、奋勇向前的火红年代啊！况且，此时正是他入党不久，政治热情正高，他常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只要回豫西，人、枪我都有办法。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地弄一摊，要搞得比民主建国军更好。”又说：“到时候我请你们来河南吃黄河大鲤鱼，看河南豫剧。”（他的夫人原是豫剧老旦）

九月初，当陈谢兵团进军到豫西以后，范龙章再也坐不住了。他急于回晋冀鲁豫军区赴豫西立功。晋绥军区的领导同志曾挽留他，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留下。晋绥军区司令部只好请示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杨尚昆同志批准了范龙章的请求。为了向晋冀鲁豫军区介绍范龙章等人一年来的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和变化，中央后工委指定申伯纯同志陪同他们前往。

于是，范龙章等人在申伯纯的陪同下，从兴县启程，南下河南。

他们走时，我正好不在兴县。我和周子健同志到岚县检查工作去了。我听说他们走时，晋绥军区李井泉政委、周士弟参谋长、陈漫远副参谋长以及军区副官长朱早观同志曾为他饯行。我还为没能送送他们感到惋惜呢。

一九四七年底，我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的敌军工作会议，在这里碰上了申伯纯同志。我关心地问起范龙章他们的情况。申伯纯叹了一口气说：“范龙章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谁抓的？为什么抓他？”申回答说：“我们还没走到邯郸，在路上，范龙章他们就被民主建国军政治部主任下令抓了起来。他们说范龙章与汤恩伯、刘茂恩暗中有来往，范还私藏电台。”

“据我对范的了解，他是一个‘阳性’的人，有话就讲，有思想就很容易暴露出来，不象是个反复无常、暗中通敌的人”我怀疑地说，“他们在延安和晋绥，经过参观学习，政治思想有很大进步。范龙章等人入党，是经中央逐个审查批准的。组织上对他们是充分信任的。这一点你向政治部的人解释没有？”

“解释啦。可是他们说这是军区的命令，他们是执行命令

的，不听我的，不由分说，就把人带走了。”申伯纯说。

我们对此都很惋惜。

一九四九年“七一”前，我在北京中央统战部工作，听到了范龙章的消息。说他已经得到平反释放，现住在华北局招待所。我和申伯纯、周子健、朱早观听此消息都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商量，范龙章受了点委屈，本是坏事，但坏事可以变好事。经过审查，他的历史问题都弄清楚了，以后可以放手大胆地工作了。我们应当安慰他，请他吃顿饭，和他谈谈心。

于是，我们四人出面，在当时以北京风味著名的饭馆“灶温”订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范龙章的客。老友相见，自然是高兴的。但范龙章已不似延安和兴县时期那样神采飞扬了。经过一年多的监禁审查，他似乎有些灰心。说起他被捕的原因，他说，是由于晋冀鲁豫军区弄错情报，误以为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要叛变，就把民主建国军团以上的干部全部集中起来，开办一个神泉训练班，实际上是审查问题。在训练班上有人乱说起来，结果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还没走到邯郸，在路上就被民建军政治部下令抓了起来。以后，经组织上认真调查研究，情况渐渐地搞清楚了。所谓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要叛变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受审查的干部们陆续得到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民建军则改编为十八兵团，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

我们劝慰范龙章说，你受审查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弄清，坏事变成好事，你就放下包袱大胆工作吧，希望你今后能为党继续工作。

范却说，“我不工作了，回家当老百姓去。”

我们再三挽留他，还让他参加党内的报告会，听胡乔木同志

辅导学习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可是范龙章去意已坚。人各有志，不便勉强，我们只好同意他回家。

以后，范龙章回到河南，在开封开了一个面粉厂，自任董事长。一九五一年，他又到西安找习仲勋同志，习仲勋把他安排在西安当参事。一九五三年，他调回河南，曾任河南省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然而一九五七年又被划为右派，撤销了省参事室和政协委员的职务，降职为省参事室研究员。

据他的亲属说，他在垂暮之年，唯一耿耿于怀的憾事，就是一九四七年丢掉了党籍的问题。他多次向组织上申请调查他的党籍问题。一九七二年二月他临终时，再一次嘱咐家属把他的党籍问题弄清楚，争取恢复。一九七九年六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一九八〇年，河南省政协为他开了追悼会。

范龙章是成千上万的国民党起义军官中起义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他跟着高树勋起义，是有功的。他到延安和晋绥学习参观后，政治思想发生了很大进步和变化。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积极提出入党要求，他的动机是真诚的，主观上是想为革命干一番事业的。但在一九四七年受审查后，经不起一点委屈，释放后，一气之下离开了党，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他有所悔悟，参加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向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总的说，他入党以后，走了几步坎坷不平的道路，在党的关怀帮助下，终于还是参加革命到底了。因此，他还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

张冲同志入党前后

(一)

一九四七年初，中国革命的形势面临着新的转折。在军事上，进攻我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四分之一以上，其官兵士气低落，战斗力日益减弱；而我人民解放军则在各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主动权。在政治上，蒋介石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以后，将自己置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全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结成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政策和法西斯独裁政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就在这年一月，一天，我们交际处忽然接到通知：著名抗日将领张冲将军，随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办事处的飞机到达延安了。大家得此消息，无不拍手叫好。张冲将军是远在西南边陲的著名滇军将领，在国民党军队和云南少数民族中有着很大影响，他能摆脱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毅然飞来延安，对

人民解放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胜利，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重大打击！我交际处当即派出专用的卡车，到飞机场接张冲将军一行。

我那天因为有别的事，没能亲自到飞机场去接他。当天晚上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换上了一身解放军军装。他中等身材，身板很结实魁梧；脸庞很大，略显扁平；双目炯炯，眼光坚定深沉；举止言谈，透着豪爽粗犷的军人气概。随同他一起到延安的，有他的夫人惠国芳以及他们的一儿一女。我向他们寒暄之后，又细问了他们在生活起居方面有什么要求。张冲将军表示希望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我们很快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满足了他的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彭德怀参谋长、杨尚昆秘书长等党政军首长不但分别接见了张冲，还相继到交际处来看望他。初到延安的几天，他忙于会见活动，以后活动不那么频繁了，我和他谈话的机会也就多起来。

首先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粗”人。虽然他出身行伍，以善打硬仗的猛将而闻名，却决非胸无点墨的一介武夫；而是有知识、有文化修养、很善于思考问题的人。对时局、对社会、历史等问题，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

其次，我发现他的思想感情同我们十分接近，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很容易交流和发生共鸣。表现在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烈、深刻的仇恨，对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由衷的向往、敬佩，对劳动人民自然而然的同情、热爱……

在交谈中，我们互相取得了信任，很快就成了能够推心置腹的亲密朋友。一天，他用试探的口气问我：“金城同志，你说象我这样的人能参加共产党吗？”

我心头一热，一阵欣喜的感情涌上胸间。没想到他这样快就提出入党的问题。然而象他这样的人入党，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只能原则地鼓励他说：“对每一个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来说，党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愿意把你的心愿向中央转达，但关键还要看你的觉悟和决心，好好争取吧，张冲同志！”

当天我就把与张冲谈话的内容，特别是他的入党要求，向杨尚昆同志作了汇报。尚昆同志指示我继续深入了解张冲的思想，启发他的觉悟，可以把培养他入党的工作提到日程上。

于是，我请当时住在交际处的申伯纯同志帮助我一道做张冲的工作。我们有意识地请张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思想变化的过程。

张冲很健谈，而且很坦率。我们有时聚在他住的客洞里，促膝倾谈；有时信步在延河边，边踱边聊。总结自己暴风雨般的前半生，对张冲来说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他常常默默地、呼噜呼噜地吸着他那从不离手的镶银水烟壶，陷入片刻的沉思。但他也常兴高采烈，说笑话，开玩笑，不掩饰他机智、幽默的天性。他声调缓慢、深沉、云南口音十分浓重，把他的全部生活毫不保留地向党吐诉……

(二)

张冲，云南省泸西县永宁乡人。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彝族的一个土官家庭。因其是少数民族，所以从小就受汉族地主、军阀的欺压；又因其父亲早死。使他饱尝本民族剥削阶级的欺侮和倾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他思想发生对黑暗

社会的强烈不满。他为人正直、机智勇猛，又出身于土官家庭，因而在当地一班彝族青年中很有威信，成为青年领袖。

一九一八年，他为了反抗封建统治，毅然率领一批彝族青年揭竿造反，上山当了“土匪”。

不过，他这支“土匪”队伍与别的土匪有所不同。他以“打富济贫、杀贪官污吏”为号召，专抢土豪劣绅。而且他的队伍纪律好，对老百姓从不乱来。所以发展很快，最多时聚集了几千人马。他们辗转于滇、川、黔、桂边境。随着形势变化，几经起伏，聚散无常，有时分散潜伏山林，艰苦图存；有时聚众打家劫寨，杀官夺城，抢银行，夺税款，开仓分粮，无所畏惧，使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张冲讲到他的“土匪”生活时，常常有声有色讲一些近乎“传奇”的故事。他说，那时法国帝国主义分子在云南十分嚣张，侵略掠夺，肆无忌惮，老百姓恨之入骨。一次，他带队伍袭击了滇越铁路（法国人造）上的宜良火车站（位于昆明东南六七十公里），同时抢了设在宜良的法国银行，还抓走了两个法国人，然后把队伍撤到了宜良北部边境的山里，扬言侵略云南的法国当局必须拿出四万大洋才能赎回被抓走的那两个法国人。云南地方军阀官僚统治集团，对此毫无办法，结果事情一直闹到了北京。法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既不敢得罪法国人，又对远在边陲的张冲无能为力，只好从国库中挖出四万大洋来赎那两个法国人。张冲看到北洋军阀政府对内如虎狼，对外如绵羊，如此丧失国家尊严，十分气愤，收下送来的四万大洋之后，干脆把两个法国人枪毙了。这一下引起强烈的震动。北京和云南地方当局为之惊慌失措；法帝国主义者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受尽欺侮的中国老百姓拍手称快。^①

统治阶级黔驴技穷，妄图以谣言杀人。于是，关于“张三爷”（张冲的称号）的“神话”就从统治者口中传出来了。张冲被描绘成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吃人魔王，不但要钱，还要杀人；不但杀中国人，还杀外国人。这种恶毒诬蔑，在穷苦百姓中，特别是张冲的绿林部队足迹所至之处的群众中，当然无人相信。但在军阀、政客、豪绅、地主中，则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谣言日走千里，甚至在昆明闹出这样的笑话：当夜晚小孩哭闹不肯睡觉时，做父母的只要说一声：“你再哭，张三爷就来了！”小孩就会吓得不出声。

不言而喻，张冲的这种自发、盲目、“土匪”式的反抗道路，若得不到革命的先进阶级的领导，前途必然会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不是被“围剿”灭亡，就是“受招安”被收编。张冲走了后一条路。一九二二年，他被卢汉的部队收编，任团长。

说起“受招安”这件事，张冲感叹地对我说：“我当土匪时期，实际上不是土匪，因为那时是取之于富豪；到了招安当官以后，才真正是土匪，因为那时是取之于贫苦的人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冲开始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增强了反抗封建军阀的自觉性。一九二七年，他参与了著名的云南“二六”政变^②。任滇军旅长、师长。

他虽然官做得不小了，但毕竟是绿林出身，思想感情同统治者格格不入，招致许多讽刺、轻蔑他的流言蜚语。由此激起他发奋学习的决心。他延请家庭教师，研读各种书籍报刊，与当时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来往，渐渐地对社会科学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开始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九三〇年，他利用出兵广西的机会，寻找过红七军。一九三五年，他对国民党阻击红军的命令，消极抵制，按兵不动。他

深为红军在长征中解救工农和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所感动，进一步倾向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了。这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张冲来说，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一九三七年九月，云南部队被蒋介石编为一个军，即陆军第六十军，出滇北上，开赴抗日战场。张冲任六十军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一、二月间，六十军途经武汉，张冲趁此机会终于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他多年渴望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叶剑英见了面。在周、叶的关怀下，张冲吸收了以薛子正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到一八四师工作。在湖北孝感地区，张冲又会见了赫赫有名的共产党将领、和他一样是云南彝族出身的罗炳辉将军。他们更是一见如故，互相崇敬。三月，六十军开赴徐州地区，参加著名的台儿庄会战。

张冲在台儿庄战役中打出了威名。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坚守禹王山近二十天，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大打击。战役胜利后，又是他最后收拾残局，掩护其它部队撤走。从此张冲就在中国军队中出了名。

但由于他与共产党人来往密切，被蒋介石、陈诚等疑忌，必欲寻机除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张冲任新三军军长，月初，会同五十八军、六十军等在湖北崇阳与日军激战。由于各种原因，该役失利。蒋介石趁机把责任推到张冲身上，下令将张冲革职枪决。是龙云、卢汉力保，才改为革职，调回云南。

解除兵权回云南后，张冲曾任弥勒水利督办。一九四二年日军侵入滇西时，他一度出任云南部队第二路军指挥官。他的处境虽然恶劣，仍积极同我地下党保持联系。第二路军指挥部的电

台报务员，就是共产党员，名叫杨才。此外，还有秘书张子斋、特务营长张士明等，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张冲的掩护，这些共产党员不但没有遭受迫害，还发展了很多新成员，为后来滇军在东北辽沈战役中的起义，打下了基础。在这期间，他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如兴修水利、土法制盐，被人们称为“盐王”。

在云南民主运动高涨的时期，张冲对闻一多、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正义斗争抱支持的态度。在精神上予以鼓励，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张和李公朴的关系尤为密切，二人经常促膝密谈。我们党同龙云的统一战线关系，也有他在中间起的桥梁作用。他还曾在家乡秘密储藏了一批枪支弹药，为一九四八年云南地下党发动武装斗争提供了条件。

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指挥中央军在云南发动政变，把龙云赶下台，使云南进一步“中央化”。从此，张冲的处境更加险恶，军统特务严密地监视着他，随时有暗杀他的可能。

为了麻痹敌人，也由于心情的苦闷，张冲不得不表现“消沉”、“灰色”——对时事漠不关心，只知道吃吃喝喝；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寻找机会逃出云南，到解放区去。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为表面的胜利冲昏头脑，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多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及各阶层群众的反对，悍然下令单方面召开伪“国大”。大概是张冲的“韬晦之计”起了作用吧，他被指派为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伪“国大”。张冲同志得此消息，曾向我地下党员征求意见，中共云南省工委同意他借参加伪“国大”的机会逃到解放区去。于是，张冲开始布置他周密的出走计划。

他首先让他的夫人惠国芳带着孩子秘密乘飞机飞到北平。他自己则在南京继续表现“消沉”，只知道吃喝玩乐。在南京玩

够了，又玩到上海。尽管有特务步步监视，他还是找机会在上海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让他设法到北平找叶剑英同志。

张冲从上海回到南京，忽然声称他老婆离家出走，跟他闹离婚，他要到北平去同老婆和解。由于他说得合情合理，不露破绽，竟得到当地的同意，让他去北平一行。在特务的“陪同”下，张冲来到北平。惠国芳先行到北平后，找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办事处，适遇薛子正同志的爱人黄常同志，从而接上头。张冲到后，通过薛子正的帮助，与叶剑英同志取得联系。在叶剑英同志的安排下，张冲一家化装成商人及家眷，蒙混过特务的监视和检查，坐上中共代表办事处的飞机，飞来延安。

这就是张冲同志来延安之前所走过的全部道路。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路。一个少数民族的子弟，在旧社会的压迫下，由自发盲目的反抗，走过曲折的弯路，终于在昏天黑地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光芒，从而百折不回地追求共产党和革命真理。经过无数痛苦的考验和磨难，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终身的理想——摆脱了旧的道路，走上了光辉灿烂的人间正道。

(三)

张冲同志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仿佛把我们带进历史的剧场，我们看到主人公的身世与整个中国、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兴衰变迁紧紧相连，我们的心情，随着主人公的遭遇和变化而起伏不平。最后，我和申伯纯一致认为，从张冲的阶级出身、痛苦经历来看，从目前他的觉悟水平、理论修养来看，只要再加以培养、教育，是完全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优秀

革命战士的。

我把同张冲交谈的情况，随时汇报给杨尚昆同志。尚昆同志又向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报告。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对张冲入党一事极为关怀，指示我们发展张冲入党。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张冲的迫切愿望终于实现了！组织上指定我和申伯纯同志做张冲的入党介绍人，发展他参加中国共产党。三月五日，张冲以给朱总司令写信的形式，写了书面的入党申请书。在这封信中，张冲饱含情感地叙述了他的家世、个人经历以及思想转变经过之后，以抑制不住的激情写道：

“以我的家世来说，是被压迫逃难的家世，以我的经历来说，是一个曲折的经历。当初我也想作一个爱国爱民的军人，也想为我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所有被压迫的群众谋求解放，原以为三民主义，即可达此目的，不料领导者恰恰违反了三民主义，成了反革命。如是，我不但不能达到真理的实现，反成了罪恶的追随者。后来才知道只有追随服膺马列主义、领导中国革命有经验的、毛泽东正确路线所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此目的。这就是我入党的动机。……”

张冲将入党申请书交给我以后，我和申伯纯在三月六日向中央写了报告。我们写道：“我们同意介绍张冲同志入党的理由：

“1、张冲同志自抗战以来，实际上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政治上同情我党并在他的军队中掩护我们的同志（薛子正同志等）工作，在云南地方掩护我们同志（如华岗、杨继干同志等）工作。

“2、张冲同志的历史叶参谋长与薛子正同志都很了解，可为证明。

“3、张冲同志在政治上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和必然没落，

对龙云地方军阀的本质有较明确的认识，对我党为人民服务和胜利前途，今天为新民主主义将来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任务，有一般的认识。

“4、张冲同志是少数民族，在云南地方特别是云南军队中颇具威信，他可能培养教育成为我党有力的干部。

“5、张冲同志的个性特点(优点与缺点)待我们帮助他去绥德乡下学习一个时期较有深刻的了解时，再详细的报告。”

与此同时，我又向杨尚昆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将张冲的入党申请书，我和申伯纯介绍张冲入党的意见，一并交尚昆同志，请他转中央。

很快，刘少奇、杨尚昆、安子文同志代表党中央做了重要批示，接受张冲入党。中组部长安子文同志指出：“接受入党，候补期一年，从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起算。”

张冲同志就这样光荣入党。

张冲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就同申伯纯疏散去绥德了。我在三月十三日带领交际处最后一批人撤离延安，也转移到了绥德。在绥德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曾陪同张冲考察学习农村的土改运动。这段时间我们的交谈更多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以后，气焰极为嚣张。继续疯狂北犯。四月初，敌人进犯到绥德南六十里的司家川。疏散在绥德的中央机关连夜向黄河东转移。我在转移途中，在绥德东六十里的义合镇遇到周恩来同志，他指示我说：

“你过河以后，可把张冲同志直接送到兴县贺龙司令员那里去，请他派人把张冲同志送到东北去，那里敌军中有云南的部队，需要张冲同志去做争取工作。”

我们交际处过黄河后，即在临县三交住下。我把周副主席

的意图告诉张冲以后，张冲欣然表示服从。

于是，张冲一家由申伯纯夫妇陪同，离开交际处转赴兴县。这次分别以后，直到全国解放，我们才在北京重逢。

(四)

张冲同志接受党中央的委派，辗转到达东北前线，先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高级参议，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对策动滇军潘朔端一八四师的海城起义和曾泽生六十军的长春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入关以后，他代表彝族参加筹备和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任中央民委委员。

云南解放后，张冲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四年以后，他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任云南省副省长、云南民委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委员。解放初期，张冲深入边疆和大小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解民族纠纷，疏通民族关系，团结教育少数民族爱国上层人士和国民党起义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促进当时全省安定和民族团结，胜利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一九五六年以后，张冲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主要精力倾注于考察和研究长江上游的水利建设。九次穿越险峻的虎跳峡，对开发金沙江水利提出了积极建议。

鉴于中国经常“北旱南涝”，张冲和一些水利专家提出了“南水北调”的设想。张冲特别设计了西线方案，即在长江上游海拔二千到四千米的山谷中，修建高坝，开凿隧洞或盘山渠道，把金

沙江等河流的水引到黄河上游，然后把水送到青海、甘肃等西北各地。对中线方案，即在长江中游的三峡引水，穿过荆山、经丹江口水库，然后经过南阳、郑州等地，把水送到华北，最终到达北京，也提出过不少合理化建议。虽然这两个调水方案，皆因投资过大，现在实施条件尚不成熟，但我们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子孙后代们会按照张冲的设想去付诸实践。至于南水北调的东线方案，即以大运河为基础，从长江下游引水直通天线的方案，已由国务院批准开始实施。这也是根据张冲和水利专家们的总体思想而设计的。

正当张冲满怀信心实现他一生最大的心愿——治好山水的时候，十年内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冲同志深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但他坚信党、坚信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壮心不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促进台湾归回祖国和少数民族自治，满怀信心，积极工作。由于日夜操劳，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八〇年十月三十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追悼会上，乌兰夫同志代表党中央对张冲同志的一生做了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张冲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彝族人民的好儿子。他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从二十年代开始就积极争取我党的领导，并从敌人营堡中冲杀出来，投身革命队伍。在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

“张冲同志为人光明磊落，器量宽宏，平易近人，他严于解剖

自己，不争功居功，对同志真诚坦率，充满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和活到老学到老的乐观精神。张冲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一生……。”

按照张冲同志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他生前为考察和研究长江上游水利建设而九次穿越过的金沙江虎跳峡中。他将与祖国的江河共存。

〔注1〕关于张冲同志袭击火车站，抓法国人一事，目前尚未找到文字记载的原始材料。张冲生前对我讲过两次，对他的亲属、朋友也讲过多次。现在大家回忆起来，却众说不一。比如有人回忆说张冲袭击的是小河口火车站（位于开远至昆明之间的盘溪附近），时间大约在一九二〇年以后，是役劫银圆不下十万云云。因难以考据，我只好凭自己的记忆来叙述，不再从他人的说法。

〔注2〕云南“二六”政变，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昆明镇守使龙云与滇系军阀唐继尧的部下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四镇守使，因不满唐继尧独裁专制、腐败堕落、任用亲信等，趁北伐战争胜利进展之机，发动了倒唐政变。政变后四镇守使成立了云南省务委员会，从而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

毛主席教子务农

抗战胜利后，一些在抗战初期被送到苏联学习的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陆陆续续回国来了。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志也回到了延安。

那时，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的，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

而那时的苏联，虽然经过卫国战争，生活水平下降不少，但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食物的构成与我国大不一样。在那里长期生活过的人，一下子回到延安，要适应边区的伙食，也确实需要一个过程。

考虑到这种情况，岸英同志回延以后，杨尚昆同志把他安排到我们交际处住。因为交际处是招待外来宾客的地方，客人们的伙食要比一般机关的大灶好得多。尽管交际处也经常住着少数党员干部，如某些高级知识分子，或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党员，但毛岸英住交际处这件事我们未告诉毛主席，怕毛主席不同意。

哪知事有凑巧。一天，毛主席来交际处看望他青年时代的老师、原长沙第一师范的校长符定一先生和国民党联络参谋等，

正好看到毛岸英在和交际处的其他客人谈话。事毕，我送主席下山上车时，主席问我：“岸英也住在这里？”

“是的。”我回答。

“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主席又问。

我回答说：“这是尚昆同志的意思。尚昆同志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不太习惯，让他在这里适应一段时间。反正马上就要分配他工作了，上班前让他在这里住几天吧。”

毛主席摇摇头，只“唔”了一声，当时没说什么。过后不久，主席就把毛岸英召回去了。

不几天，毛岸英穿着一身白色的中式衣服，肩扛一袋小米，来到了交际处。我见他这一身装束，感到疑惑不解，问他：“岸英，你要到哪儿去呀？”

“爸爸要我到吴家枣园去学农。”岸英同志那瘦长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情绪，他放下肩上的小米袋，歇了一口气后接着说：“我是特来向您和交际处的同志们、客人们告辞的。”

听到岸英同志的声音，几位住在交际处的客人和部分交际处工作人员走出窑洞或房间，围在岸英同志身旁，关切地询问他的打算。岸英说：“我爸爸对我说，你在苏联学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到中国。如果你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你就不懂得应该怎样革命。中国的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约占百分之八十，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要想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向农民学习。只有懂得了中国农村的现状，才能担当起革命的重担。”

“爸爸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也想到农村去，参加劳动，联系群众，锻炼锻炼……”

在场的人听到毛岸英的这席话，都为毛主席严格要求子女

的精神所感动。毛岸英与我们告别后，还特地到四八烈士黄齐生先生的夫人王守瑜老太太和符定一老先生的房间去告别。

毛主席指定岸英同志去的地方，离延安有好几十里路，但是毛主席只许岸英用毛驴驮行李，而不许他骑毛驴走。主席要他肩扛小米，带着“学费”诚诚恳恳地去向农民学习。这是何等认真的精神啊！

后来我听说岸英同志在农民那里学得很不错，主席对他的成绩很满意。

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主席又派岸英同志去抗美援朝前线。不久，岸英同志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消息传来了，我们听说后，都十分难过。后来又听说彭德怀见到毛主席时，曾难过地说，他没有把岸英保护好。毛主席却说，中国人民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都为保卫祖国而牺牲了，难道我的儿子就牺牲不得吗？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我随贺龙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当我们祭扫志愿军烈士墓时，我在群墓中看到了岸英烈士的墓。我伫立在岸英烈士的墓前，回想起在延安交际处与他相处的往事，他那朴实的笑容、高大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我肃穆地向烈士墓默哀敬礼。我想，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我们党、特别是毛主席本人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鼓励自己的亲人到斗争的第一线去，这也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毛主席不但积极倡导这些好作风、好传统，而且自己正是一丝不苟的身体力行者。他对毛岸英同志的培养、教育和严格要求，不仅使岸英同志成为无私无畏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战士，而且带好了我们党的作风，带好了一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最可爱的革命队伍。

我党对邓宝珊将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傍晚，我接到延安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及其随行人员已经到了延安，住在城里的骡马大店里。

听到这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问公安局的同志消息是否确实，他们说，起初他们也不知道，是在公安人员到骡马大店查询过往客人的情况时才发现的。我感到奇怪的是，象邓宝珊这样一位重要的国民党将领，到延安来何以如此秘密？我们交际处既没有得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通知，也没有听到新一军驻延安办事处的报告。邓将军为何出此不寻常的举动？

关于邓宝珊，我是久闻大名的。我们知道，邓将军是陕西、甘肃、宁夏地区特别是陕北榆林地区的一位威望很高的领导人物，也是一位开明的爱国将领。他是甘肃省天水市人，青年时期在新疆参加新军，加入同盟会组织。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一九一六年参加陕西同盟会员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组织的讨袁靖国军。一九二四年，胡景翼和冯玉祥、

孙岳结成同盟，发动“首都革命”，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直系军阀的统治。邓宝珊是这场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在胡景翼指挥下的国民二军先后任旅长、师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邓宝珊开始接触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及其主张有所了解。是年冬，冯玉祥、胡景翼的国民军开始吸收共产党人参加，进行政治工作，宣传革命思想。邓宝珊领导的国民二军第七师，是共产党人活动较多、苏联顾问到来较早的部队之一。一九二五年夏，邓宝珊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在河南省陕州办起了“军官传习所”，由共产党员胡重差任所长，共产党员张海如等任政治教官，并有三名苏联顾问。这个传习所的课程，政治课比重很大。由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革命军人。其中一些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成员。此外，在邓宝珊部队里任职的共产党员，还有秘书长葛霁云、副官长杜汉山，军需部长杨晓初，柴宗孔，以及邓鸿宾（其侄）、杨春亮、周逸山、杨子实、孙祖怀、王建中、黄展云等多人。

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汪精卫以“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的屠杀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在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邓宝珊不畏风险，掩护和援救了很多共产党员。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邓宝珊为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军失败后，邓宝珊一度居住上海，从事反蒋活动。一九三二年，他应杨虎城之邀，到兰州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兼新一军军长。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时，邓宝珊在兰州，他听到消息十分兴奋，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张学良被扣于南京

后，东北军一部分军官要求举兵营救，蒋介石又派三路大军准备进攻西安，杨虎城处境困难。在此危急之秋，邓宝珊应杨虎城的邀请去西安协助处理各种纠葛。邓宝珊以他的足智多谋，对贯彻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蒋介石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邓宝珊为保杨虎城的安全，多次斡旋于蒋介石及其周围的人士之间，最后亲自送杨虎城到上海，直到将杨虎城及随从人员送上轮船，才放心地返兰州。

总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段激烈动荡的时间里，邓宝珊在政治上长期保持着同共产党人的友谊，思想上追求进步。在错综复杂、变化莫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角逐中，他头脑清醒，思考周密，策略灵活，在艰险中逐步成长为使各方面都信服的大将之材。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军在日寇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丢城失地，引起全国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怨恨，蒋介石为了挽回面子，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不得不起用抗日比较坚决的“杂牌军”将领，令其到前线去打几个硬仗，以装点抗战的门面。因此，在西北和华北，蒋介石令傅作义为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张励生为察哈尔省主席兼骑兵军军长，马占山为热河省主席兼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高双成任二十二军军长。这样做既可让“杂牌军”顶住日寇以保存中央军的实力，又可惜日寇的手削弱以至消灭“杂牌军”势力，还可达到笼络“杂牌军”中的抗日将领的目的。可谓一箭数雕。邓宝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挤出甘肃，调到榆林担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表面上国民党中央给了邓宝珊很高的地位，实际上是蒋介石为了使其嫡系控制西北，以朱绍良取代邓宝珊把他从家乡排挤出去，让他到边

远、穷困、复杂的榆林去应付四面八方不同势力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榆林东临日寇、北连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西接宁夏马家部队、南靠陕甘宁边区)。

邓宝珊这样一位党的老朋友、有影响有地位的爱国将领,为什么到延安来不通报一声呢?当时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到晋陕绥一带“杂牌军”首领,都纷纷派人来延安联络、考察。其高级官员不论进步、中间还是落后、顽固的,只要来到延安,无不主动提出要求,想见我党政军负责同志,尤以能见到毛主席为荣耀。为什么独独邓宝珊与众不同,甚至企图悄悄通过。这种作法显然与邓宝珊的政治态度、所处的地位和他平时一贯的作风不相称。

对这些问题,当时我来不及多想,急忙打电话给毛主席和中央统战部请示。

毛主席在电话里指示我,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我放下电话,没敢多耽搁,在交际处(当时还是交际科)作了布置以后,当晚就来到邓宝珊住的那个旅店,地址在延安大街南头,与我交际处隔街相对。

我刚走进旅店院子里,就见一位年纪四十出头的军官迎面走过来,问我“有何贵干?”我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问对方的尊姓大名,才知道这人是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于是我对他说:

“邓军长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很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大店好一些,我们欢迎邓军长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并不向邓宝珊报告我的邀请,而自作主张,回绝我说:“邓军长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我又说了许多热忱欢迎、恳切挽留的话，但都被于浚都挡了驾。我只好回到交际处，再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早餐前，我又来到旅店。走到门口恰好又碰到于浚都，我上前要求面见邓军长，转告毛主席、边区政府要我再次前来挽留之意。于浚都还想挡驾，这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套间石窑里洗脸，听到外面我们的谈话声，感到于浚都的作法生硬不妥，已有损于他当时所处的境地和立场，就自己走出来了。

他身材高大而健壮，满面笑容，十分和气。他慢声地对我说：“这次过延，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说：“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了，答应当天不走，和我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上午，毛主席同肖劲光等来到了旅店，和邓宝珊见了面。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主席请邓宝珊及随行人员吃午饭。由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出席作陪。席间毛主席和邓宝珊更是谈笑风生。记得毛主席讲了，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邓宝珊也表示很有信心，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

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希望了。

谈话中，毛主席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主席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

以后邓宝珊在延安整整呆了一个星期，到毛主席住处拜访了毛主席，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在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 also 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当时在抗大读书，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去拜会邓宝珊，看见窑洞里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其中有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

这一次初交以后，邓宝珊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交际处的优厚款待，安排他参观、看戏，并与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林伯渠主席、贺龙司令员等亲切会面。毛主席和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很频繁。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邓宝珊第一次过延不肯出头露面。

据我后来分析，是他的副官长于浚都从中作梗，阻挠邓宝珊与我方领导人的会见。而于浚都又为什么要阻挠邓宝珊与我党领导人会面呢？解释这个问题，要先了解于浚都是什么人。

于浚都，山西定襄县人，一九二二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陈诚、罗卓英等是同学，曾结过盟。此人历史上一贯积极反共，曾于一九三五年参加陕北绥德、清涧的“剿共”战役，企图消灭陕北红军；又于一九三六年在山西西部参加阻止红军东渡

黄河、奔赴抗日前线的战役(当时任中校团副)。由于他反共卖力,同何绍南一样为蒋介石集团所赏识。抗战爆发后,他混到邓宝珊身边做了少将副官长,坚持反共立场,以很隐蔽的方式为顽固派效劳。他野心勃勃,狂妄自大,处处以邓宝珊的代表自居,对邓宝珊的思想亦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于浚都不愿意榆林同延安方面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处心积虑地从中加以破坏和阻挠。

然而以邓宝珊的威信和权位,何能被一个新来的副官长限制了行动呢?

我们知道,邓宝珊是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工作的。他得应付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军事力量。因此,他不得不运用平衡的权术,维持着与各方面的关系。于浚都代表着顽固派势力,邓宝珊既要利用他,又得应付他,因此常常故作倚重他、信赖他的姿态,采纳他的意见。为此,新一军的过延人员,从不在延安过夜。这次邓宝珊过延,若不是他听到我与于浚都的对话,自己走出来和我见面,恐怕就被于浚都挡过去,无声无息地秘密地经过延安了。

二

正是由于我党采取积极主动的争取的方针,使榆林国民党驻军在抗战时期与我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绥德警备区、晋西北一二〇师以及续范亭的新军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立了典范。

八年之中,双方友好往来、互相支援的事例,数不胜数。这里仅就在党的统战政策下,我交际处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略加记述如下:

(1) 热情接待所有过往边区的榆林部队官兵。

交际处对过往陕甘宁边区的榆林部队官兵，上至总司令、军、师长，下至普通的大车队长、士兵，无一例外地给予热情招待。如是高级官员，我们就安排他们会见延安党政军领导人，并安排参观、游览、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对下级军官和士兵，我们也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好，并组织文艺演出鼓舞他们的士气。

(2) 帮助榆林驻军购粮。

榆林地区土地贫瘠、灾荒连年，粮食十分困难。国民党当局对“杂牌军”的军粮、军饷十分苛刻。为了解决粮荒，榆林部队不得不到陕甘宁边区来购粮。我边区在胡宗南的经济封锁下，粮食也很困难，但为了统一战线、为了抗日大局，还是尽量节省出一部分粮食支援榆林部队。如由绥德警备区王震司令员出面，一次就支援榆林二千石粮食，帮助他们解决了很大的困难。又如一九四〇年，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派军需处副处长严佐民，来边区订购粮食，在延安交际处住了半年多。我们安排他会见了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肖劲光主任（八路军留守处）、南汉宸厅长（财政厅）、常黎夫局长（粮食局）等有关领导，帮他解决了许多有关购粮和新兵过境吃粮、住宿问题。

(3) 对其运输队免税免检。

榆林部队的运输队，每次从榆林去关中或西安，都要带出当地的土特产去做生意（这是因为国民党当局一贯歧视“杂牌军”，苛扣其军饷和军需品，迫使榆林部队不得不以做生意来补充给养），如羊毛、驼毛、酥油、蘑菇、毛线、地毯等。装满物品的大车队要从米脂进入陕甘宁边区，从鄜县茶坊出境。大车队从西安领取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购买布匹药品等，也同样要

从酃县茶坊进入陕甘宁边区 从米脂出境回榆林。在我边区的边境上,有税务所和检查站,按道理应对其大车队抽税和检查。但我边区政府为了同他们搞好关系,决定予以免税、免检。这样,榆林部队的大车队每次来回过境,都事先通知我交际处,再由交际处通知边区沿途检查站、税务所,予以免检、免税,畅通无阻。有时,不免有些国民党特务混在榆林部队的大车队里,经过我边区,往返西安与榆林。我交际处接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通知,明明知道谁是特务,但为了照顾同榆林部队的关系,在加强安全措施的同时,不给予公开揭露。

(4)帮助巩固和发展他们的队伍。

榆林部队从关中招募的新兵,每批从酃县茶坊进入边区,至米脂出境,沿途十一个兵站,每站都由我边区粮站提供粮食,最后在边区粮食局汇总按优惠价结算。

每批新兵过境,我边区留守司令部都给予优待,有时组织热烈的欢迎和欢送,使新兵认识到抗战的伟大意义,提高了他们的士气。

每次新兵过境,总有不少病员暂留在延安,边区政府都给予热情照顾,让轻者去卫生所门诊,重者送和平医院住院治疗。病愈出院者,由交际处开给证明,一路上边区粮站提供口粮,让他们自行赴榆林。

有些榆林部队的士兵,受不了该部军官的军阀作风和部队的艰苦生活,偷偷跑到陕甘宁边区来。我们为了顾全大局,还是做说服工作,将他们送回榆林部队。但二十二军有个驻米脂的团长十分反动,有一次,我们将他部下的两名逃兵送回以后,他竟当众把两个逃兵枪毙了。但不管遇到多少挫折,我们始终不渝地采取帮助他们巩固队伍的方针。

(5)及时通情报。

我方获得的关于日寇以及蒋介石顽固派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新动向情报,特别是关系到榆林的,我们都及时和榆林当局通气。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重大决策,也尽快地将主要精神告诉他们,以增强了解。八年之中,我方派往榆林的信使接连不断。主要有:周小舟、南汉宸、续范亭、肖劲光、王震、袁任远、曹力如、刘文蔚、范明、杨拯民、刘绍庭等。这里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毛主席写给邓宝珊将军的一封信为例,足见我党对榆林部队的开诚布公和通情报的及时:

毛主席致邓宝珊的信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凉蓐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囑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

戎绥

弟 毛 泽 东 上

十二月五日

榆林部队在邓宝珊、高双成两将军的指挥下,对边区八路军也是尽力支持的。抗战八年之中,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榆林部队都按兵不动,严守中立,拒不参加。蒋介石三令五申,让榆林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北角,榆林部队不但不执行命令,还和边区互通有无,对边区去榆林地区的贸易人员给予方便。榆林部队从西安领运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时,有时顺

便也为边区采购一些短缺物资,如棉花、布匹、药品、电池等,装上他们的汽车、马车,以二十二军军需品的名义运到延安。

通过这些大量的、细致的统战工作,我们成功地达到了四个目的:

一、打破了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获得了边区的北线的安全。陕甘宁边区的北线,主要是邓宝珊、高双成领导的新一军和二十二军。此外还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伊盟蒙古族的部队。西北面有宁夏、甘肃的马家部队,东北面有绥远的傅作义部队。由于邓宝珊对我边区的态度明朗、坚决,傅作义、马占山、蒙古族沙王、齐国贤都与我边区保持友好的关系,结成了一个地方实力派与我边区团结抗战的联盟,也使宁夏、甘肃的顽固而反动的马家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大大有利于我们打破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布置的封锁,粉碎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促进了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的巩固和发展。

二、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可靠的后方。榆林是陕北重镇,位于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背后。邓宝珊、高双成对我党我军的友好,解除了我晋绥边区军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他们全力对日作战。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抗战最困难的岁月里,陕甘宁边区将邻近榆林地区的神木、府谷两县划给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为其最可靠的后方。

三、使绥德的反共顽固派何绍南处于孤立的地位。

四、保证了党中央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联络的通道。位于陕北绥德县与山西临县交界处的军渡和碛口,为我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由于我们同榆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这两个通道畅通无阻。

总之，我陕甘宁边区与榆林地区的团结合作，为其它抗日根据地树立了一个边区与国统区、我党与国民党、我军与国民党军团结抗日的范例，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孤立我党我军、困死我边区的阴谋。

在延安与榆林的交往史中，值得一提的是邓宝珊的女儿邓幼梅。

邓幼梅同志虽然出身于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庭，但思想进步，富于反抗精神。她出生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三八年来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〇年，她不幸患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当时在我国是不治之症。党为了照顾她的治疗，让她住在交际处调养。我们想办法用中西医结合为她医治。她虽知自己已患绝症，但是对党对革命事业仍抱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热忱。她性格开朗，思想活跃。每逢星期日，她的房间里总是聚满了同学、亲友。她每谈起国内外形势、抗战前途、个人理想，总是表现为乐观、远大。她那种豪爽、大方的英姿，给人以极深的印象。她在病中还经常从物质上、精神上照顾别的同志。一次，一支新一军运送物资的大车队，从西安回榆林路过延安。当邓幼梅听到这消息时，大车队已由交际处代办完免税手续，向延河东走去。幼梅不顾虚弱的病体，一直追赶不舍，直到延安飞机场才追上。大车队长认识幼梅，所以幼梅毫不顾忌，自己动手从车上抽下一匹阴丹士林的蓝色棉布。飞机场的同志见她身体虚弱，满头大汗，就帮她送回女大。她把这匹好布全部分给了同学，而自己仍穿女大发给的衣服。

幼梅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冲破封建观念的束缚，不追求“门当户对”，只要求对方勤奋学习，积极工作，诚实、朴素。我知道当时有很多在延安工作的干部和同学追求她，她却选择了陕

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技师李世俊的儿子李立。

幼梅大约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病逝于榆林。她在榆林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对蒋介石派去的特务斗争非常坚决，对我方去榆林办事的同志给予各种方便和支援。那时，她身穿治疗肺病的石膏背心，不顾病体，经常护送我党到榆林办事的同志出入榆林城门，保护他们携带的机密信件。

一九四四年冬，毛主席托八路军留守部队司令部参议刘绍庭，专程去榆林面致邓宝珊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刘绍庭携此信刚到榆林，行装甫卸，还在洗脸，突然，邓幼梅闯进屋来，急切地问：“刘伯伯，毛主席有信给我爸爸吗？”刘绍庭答：“有。”幼梅说：“快拿来给我，不要让别人看见。”刘绍庭正打开箱子取信时，有人紧跟着闯了进来，见有信件，上来就夺。邓幼梅把信拿在手里不给他，两人在屋里争夺起来。那人说：“我是总司令的秘书，这封信是公事应先交给我。”幼梅说：“我是他女儿，我可以直接交给爸爸。”那人竟不把邓幼梅放在眼里，明目

张胆地从她手里把信抢走了。为此邓幼梅还哭了一顿。

一次，邓幼梅护送走同志，返回南城门时，被特务当胸打了一拳，致使她的肺病更加严重。幼梅病逝后，被安葬于榆林城外邓宝珊的住处桃林山庄附近。她的墓至今尚在。

总之，邓幼梅不愧为党的好女儿，为党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三

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初，蒋介石打电报给邓宝珊，要他绕道宁夏去重庆开会。邓宝珊看电报后说“不指定路线还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于是整顿行装，带已经由副官长提为副参谋长的于浚都、《大公报》驻榆林特派记者杨令德（实际上是邓宝珊的秘书）等及卫士十余人，于六月八日由榆林骑马启行，取道延安赴重庆。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闻讯后，特地派杨拯民到米脂迎接邓宝珊一行入境。六月十日，他们到达绥德，由杨拯民负责接待，我绥德地委和警备司令部开了欢迎大会，大会由习仲勋主持，徐向前和邓宝珊在会上讲了话。接着，邓宝珊一行于十七日到达延安，受到我们交际处的热情接待。

毛主席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为邓宝珊等接风洗尘。出席作陪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

宴会前，邓宝珊和毛主席一见面，邓宝珊先说：“毛主席发胖了！”毛主席回答说：“这是由于我们军民搞大生产，丰衣足食所致。”接着主席说：“你的身体也好得多了！”宴会后，还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会后演出了《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

第二、第三天，分别由朱总司令和贺龙设宴，款待邓宝珊一行。

第四天毛主席亲自作东道主，在交际处又一次设宴。宴会前大家围坐院内乘凉漫谈。毛主席平易近人，谈吐风趣，引得满座笑声不断。毛主席在谈到胡宗南时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邓宝珊笑着说：“其中可能有些石子。”毛主席也笑了。

邓宝珊在延安停留一周，和毛主席单独会谈数次，看望一些党政军老干部，并出席过数次文艺晚会，还参观了日本工农学校。

这次邓宝珊来延安，气氛最融洽，也是双方最高兴的一次。

四

邓宝珊将军对我党的态度，自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九月，他在重庆晋见蒋介石、列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开始起了变化。

一九四三年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反共顽固分子大肆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其反共投降做舆论准备。蒋介石集国民党总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等重要职务于一身，加强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邓宝珊是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到了重庆的。当时，美国政府有意提高蒋介石的国际地位，国民党趁机掀起捧蒋的声浪。他在重庆三个月，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让他列席国民党十一中全会。

九月下旬，邓宝珊乘飞机离渝抵西安。当时，正是胡宗南偷偷从其他战场上调集兵力，准备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时候。蒋介石、胡宗南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邓宝珊施加很大压力，迫使他反共。他不得不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于浚都、杨令德，由西安返榆林，再次经过延安（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延安）。时值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整个解放区反蒋情绪十分强烈。对邓宝珊的处境，我们是掌握一些情况的。但我们仍然坚持积极团结、争取、帮助他的方针。这一方针，是毛主席亲自确定的。

在邓宝珊来延安之前，我们把正在延安柳树店养病的续范亭接到了交际处，以便他做邓宝珊的思想工作。一次，毛主席来交际处看续范亭，我陪同在场。毛主席指示我们对邓宝珊应继续坚持大力争取的方针。主席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面联共、抗日的进步人士，我们对他的帮助团结方针不变。假如他有困难的话，我们应按照党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的精神，给他以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主席进一步举例说，对国民党里面的进步派和反动派，我们历来是区别对待的，不能等量齐观。对进步派，我们要真心实意地帮助。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我党是有过教训的。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这一行动不但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个打击，而且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作了一个彻底的揭露。那个时候事实已经证明，蔡廷锴等人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内的抗日人士。后来十九路军虽曾一度到福建打红军，但至一九三三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

命政府”，并派代表来中央苏区同我们谈判，双方签订了共同反蒋抗日的协定。这件事本来是我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为有利的时机，但是，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博古同志等人，却采取了“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他们不加区别地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凡是国民党军阀都是“一丘之貉”，李济深、蔡廷锴等人是要“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因而在实际行动上我们没有履行共同的协定，而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中立政策，在蒋介石将其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东调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我们却按兵不动，坐失有利的战机。这样，我们在军事上失去了依托的一翼，在政治上拆了联合抗日的台，使蒋介石得以从容地消灭福建人民政府，回过头来又大举“围剿”中央苏区，红军又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按照我（毛主席自称）当时的想法，趁蒋介石集中主力进攻福建的时机，我红军主力不惜离开革命根据地，首先以一部分兵力攻占浙江的江山、切断杭江铁路，以主力直捣蒋军的后方重地杭州，使蒋介石调至福建的主力陷于腹背受敌的绝境，立即与十九路军互相配合，歼灭蒋介石的主力。这样做既可解十九路军之围，又可打破蒋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甚至可能打垮南京政府，红军也能开到沿海抗日前线。然而我的意见不但没有被教条主义者采纳，反被讥笑为“不懂得蔡廷锴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第三势力比蒋介石更有欺骗性、更阴险”等等。结果，十九路军失败，红军也只剩下突围长征一条路。从这一历史教训看现在，我们对邓宝珊这样长期合作的朋友，还是要坚持争取、团结的方针，并尽可能予以支持和帮助。

毛主席谈的这段历史，使我们对接待邓宝珊的方针，更加明确。

续范亭和我送走毛主席后，一同回到续范亭的住室。他问我：听说邓宝珊在重庆、西安受了蒋介石、胡宗南的欺骗和拉拢，在榆林，他下面还有一些国民党特务和顽固派包围他。你知道都是谁吗？我回答说：据我们的情报，国民党特务在榆林地区建立了十一个据点，邓宝珊的左右也有他们的人，对他能起作用的是顽固分子于浚都等人。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确定了我们对邓宝珊应采取的方针。所以，在邓宝珊一行来到延安，下榻交际处以后，我们一如既往，给予了热情款待。安排他们参观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劳动英雄大会和文艺晚会。邓宝珊对我党政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赏。

一天晚上，我们专门为邓宝珊一行安排了一台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当时边区还处在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内部的审干运动尚未结束，所以在文艺舞台上表演的节目，大多是反映这两个运动的，比如，抗战剧团演的《血泪仇》，是反映河南蒋管区人民在水、旱、蝗、汤（恩伯）的灾害下，被迫逃往到解放区求生，得到我政府和人民热情帮助的实际情况；有的是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犯、坚决保卫边区的决心的，如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演的《保卫边区大活报》，还有反映边区军民反对国民党特务斗争的胜利，争取那些受国民党特务欺骗拉拢的“失足者”，向政府主动坦白取得宽大处理的，如鲁艺演的《赵富贵自新》。演出中，邓宝珊坐在下面显得很不自在，对每一个节目，他都不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鼓掌而表示赞许。杨令德看到活报剧中蒋介石从桌上倒栽下来时，说：“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事后，周副主席和林老批评了我们，说：你们为什么弄这些

节目给他们看？明天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我们组织了一台延安平剧院的演出，都是老戏，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戏演到金玉奴被其新考上官职的丈夫莫稽推下水后，就结束了。后面金玉奴被淮南转运使许公救起，又在许公的帮助下与莫稽再度团圆一节，统统删去了。邓宝珊看到这里，称赞说：“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邓宝珊经常向我们谈起他在重庆与国民党要人和各界名流交往的情况。其中尤以为炫耀的是于右任先生赠给他的“百寿字幅”。一九四三年恰是邓宝珊五十大寿（虚岁），于右任先生为给他祝寿，用不同的字体写了一百个“寿”字，百字百样，无一重复，确为珍品。邓宝珊在延安每每拿出来向来看望他的人夸耀。

邓宝珊因长期劳顿。偶感风寒，突然患病。毛主席对他的病况非常关心，除亲自慰问外，还请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诊脉、处方，并委托我把十张最好的狐狸皮，作为大衣料赠送给他，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

金城同志：

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请转交为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六日

邓宝珊在毛主席和我们的关心照料下，病很快就好了。

一天，毛主席派人到交际处接邓宝珊、续范亭二位将军到他的住处去谈心，我也一道去了。到了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里，看见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也在里面，于是大家一道坐下来谈心。

毛主席指出：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不仅我党反对，一切爱国民主党派、国际友

人反对，就是在国民党内部也很难通过，因而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方向，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种想法在国民党内部很有欺骗性，特别是黄埔系军人，总想一面反共，一面抗日，但客观上根本就不允许他们两面作战。只要内战一开，他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十年内战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条路行不通，现在何应钦等少数亲日派，正在阴谋以此诱迫蒋委员长走这条路。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实行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光明在前，只须我们国共两党共同继续努力了。

毛主席谈过以后，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续范亭将军也都围绕着毛主席的话题，向邓作宣传解释。邓宝珊表示赞同，也谈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谈话中心是侧重说明内战是全国民众所反对的，他认为内战打不起来。

邓宝珊在延期间，还单独同朱总司令、南汉宸同志会面谈了话。他在同南汉宸谈话时，南汉宸的夫人王友兰同志也在场。南汉宸提到，我们边区采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生活上困难最大的时期已经过去，你看过我们的大生产展览会，希望你有所指教。你们榆林的军队是否也可搞点工农业生产。邓宝珊说，工业生产，羊毛加工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农业生产因没有象南泥湾那样可垦的荒地，无法开展。榆林地区风沙严重，沙漠每年南侵，对百姓的生活威胁很大。南汉宸说，你们生产的毛线、毛毯确实比我们的质量好得多，我们现在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很难赶上你们。

最后，他们又把话题转到政治上。南汉宸说，蒋介石写《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并声言要使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实际上主要目的是想在国民党外消灭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消灭地方实力派。难道蒋介石会去消灭 CC 派、复兴派吗？蒋介石见到别人手里有军队，总是不放心、不甘心的。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经验教训，今后更需万分警惕！

邓宝珊一行在延安逗留了半个月，于十二月初离延返榆。

五

抗战后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尖锐。抗战胜利后，这一对矛盾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展开了两种命运、两条道路的大搏斗。

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的大搏斗中，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站在哪一边的选择，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邓宝珊对国共两党的分析比较，以及他自己的选择，内心是有着矛盾和斗争的。他对国民党内部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腐败无能，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消灭异己、为个人和嫡系谋私利等丑恶的历史与现实都看得很清楚，从内心是不满的、愤恨的。对共产党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和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内心十分钦佩，感情上也很同情。所以他曾多次抵制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宝珊在解放战争初期没能及时地站到人民阵线一边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加紧往榆林空运他的嫡系部队，于一九四六年秋提出扩建榆林飞机场。我们得知这一情报后，就派代表去榆林，劝阻邓宝珊不要上这个当。邓宝珊当面未置可否，但等代表走后，他还是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将飞机场修成功了。邓宝珊曾对人说，如果内战再起，中共若仍用游击战与国军对抗，则无异于以人肉碰钢铁，无论如何是拼不过的。毛主席得知榆林飞机场扩建了，忧虑地说：看来北边的朋友交不成了。

果不其然，胡宗南于当年十一月上旬就把中央军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空运至榆林，监督邓、左执行反共路线。

这时，邓宝珊的部下、新一军新编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和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胡景翼将军的六弟），由于不堪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的欺压、排斥，分别于一九四五年秋和一九四六年秋率部起义。邓宝珊却在胡景铎起义后说：“这些年轻人呀，不懂事嘛。这次内战据毛泽东自己估计要打五年至七年，就算打五年吧，我们等到三年半再去也不迟嘛！”

六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上旬至十二月上旬，平津战役揭开了序幕。傅作义在欲战无能、欲逃无路、又被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反内战运动推动的情况下，开始试探和平解决的道路。十二月中旬和下旬，他两次派代表出城向平山县方向寻找我党中央驻地，企图与我中央负责同志谈判。由于他们的地位低、代表资格不够，有的人信誉也不好，因而被我前线部队劝阻，让他们与我军前线指挥部谈判。两次谈判，俱未取得最后结果。

这期间，我军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三十五军军部和二个师，又攻克了张家口，全歼守敌第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和七个师。傅作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真使他恐慌万分。这时，他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邓宝珊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又与我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友好合作，唯他能够不辱使命。于是傅作义在十二月底打电报邀请正在包头的邓宝珊赴平共商大计，接着又用飞机将邓宝珊接到北平。

邓宝珊这时已经看清形势，愿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力。一月中旬，得到我党的同意，邓作为傅的代表到石家庄与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谈判。当时，和平解决的条件已经谈好，只等更高一级有代表资格的人最后拍板。邓在石家庄住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与邓进行了谈判。党中央这样做的结果有三：一是提高了谈判级别和地位，以示我方确有诚意尽快妥善解决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二是稳定了傅作义的情绪，给他一个定心丸，使其增加与我党合作的信心；三是扩大了影响，争取更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走傅、邓的道路。由于邓宝珊亲自作为和谈代表谈判，使协定很快就定下来了。

一月二十二日，傅部开始履行协议，至三十一日，傅部主力全部开出城外。同日下午我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入城接防——古都北平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了人民生命和文化古迹，以及避免两军流血牺牲；还在于为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为后来的绥远、新疆、湖南、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带了一个好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从平津战役的经验中总结出三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天津方式（武力解决）、北平方式（迫使敌军接受和平改编）、绥远方

式（暂时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以后再进行改编）。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国民党军队都是按这三种方式解决的。

记得邓宝珊以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代表傅作义来到石家庄的时候，周副主席知道和平解放已成定局，但是傅、邓尚有为自己及部属的前途感到疑虑、惶惑的情绪。因此，周副主席从西柏坡到石家庄，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欢迎邓来谈判。周副主席意味深长地对邓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好朋友呀，现在，你该回‘娘家’了。”

周副主席接着说：你与傅宜生在最后的时刻，终于决定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得到和平解放，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不仅避免了双方军队的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也保护了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从你个人来讲，你出身于劳动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抗战以前几个历史时期，你曾站在人民的一边，后来走了一段弯路，离开了人民。如今你又回到了人民的“娘家”，我们更为此而感到高兴！

周副主席继续阐明：国共两党本来也是一家嘛！当年孙中山先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的内容，提出了实现革命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借助共产党的新生力量，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成为两党合作的纲领。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那时两党同志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反动军阀，北伐战争迅速胜利发展到长江流域，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向全国人民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遗憾的是，“四一二”政变，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破坏了第一次两党合作，使中国陷入十年的内战，结果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民族危亡面前，张杨两位将军发动

双十二事变，扣押了蒋介石。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主和平解决。由于我党的努力，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过八年流血牺牲，最后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能接受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如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等及各民主党派的主张，遵照政协会议决议和双十协定，建立联合政府，则全国人民早已走上了民主建国的康庄大道了。不幸的是，蒋介石以美帝国主义为后台，又一次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从国共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历史来看，两党合作，则民族兴旺、生气勃勃；两党分裂，则民族遭殃，人民受害。这些历史是你我都亲自经历了的，知道得很清楚。现在南京政府已土崩瓦解，你和傅宜生先生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你是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朋友，我们早就盼望你回到“娘家”来了。

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说：我这次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

周副主席又关切地问起邓宝珊的家庭情况。知道邓一家在解放战争中都安好，周副主席很高兴。他又提起已经去世的邓幼梅，说：我听说幼梅同志临死时曾向你提过一个请求，说：“爸爸，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你这个女儿是有政治远见的好女儿，可惜前一段时间里，你对她临死的一句话都不愿意听呀……邓宝珊听到周副主席言念及此，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邓宝珊的影响下，国民党榆林部队的一部分在榆林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九月，国民党榆林部队另一部分，在绥远随同董其武将军起义。这样，这支抗战时期曾是我军的朋友、解放战争时期一度成为敌人

的榆林部队，全部弃暗投明，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七

全国解放以后，邓宝珊历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屆、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等职。当时全国只有两位党外人士做省长，另一位是湖南省省长程潜。

邓宝珊长期主持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尊重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关心甘肃地区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关心各族人民生活改善和提高，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不辞辛劳，多次下乡视察，广泛了解情况，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重视甘肃各民族的团结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作风民主，顾全大局，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和联系各方面人士，在干部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以来，邓宝珊每次来京开会，我总要首先抽出时间去招待所看望他。旧情新念，总嫌时间短促，话未尽吐。记得一九五八年邓宝珊来北京，我和爱人陈复君曾到铁狮子胡同西北局办事处去看望他，并陪同他和他的女儿邓团子参观密云水库。那天我们游玩得很尽兴。谈话中邓宝珊曾向我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希望能到北戴河休养一个时期（他说他没见过海）；二是希望有机会出国参观访问。他知道全国人大经常派

代表团去苏联、东欧、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参观访问，他也想去一次。我想他是甘肃省长，实现这两个愿望当不成问题，就满口答应了他。事后，我分别向部里和甘肃省委统战部反映了邓宝珊的要求，并商量的实现的办法。

后来他的第一点要求是实现了。记得一九六五年我陪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洁、程思远及夫人石泓到北戴河休养时，还遇上了邓宝珊和他的女儿邓惠霖。但第二点要求却始终未能实现。这是因为一九六〇年以后，我党和苏联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分歧逐渐公开化，国家关系也随之恶化，相互交往越来越少，致使邓宝珊终未获得一次出国机会。我答应老朋友的事情，未能全部办到，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个深深的遗憾！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正在病中的邓宝珊进行残酷迫害。周总理获悉后，立即指示将邓宝珊专程接来北京养病，加以保护和照顾。邓宝珊非常痛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对他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更是痛心疾首。即使在病中，他还深深地怀念遭受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他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不可战胜，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邓宝珊生前曾说过：我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现在，我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帝国主义的凌辱，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

他还说过：我是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途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走上了光明大道的。

这是邓宝珊饱经沧桑、积几十年生活经验而发出的肺腑之言，也是对他自己一生中肯的总结。

邓宝珊不愧为杰出的国民党爱国将领、知名的民主人士和我党多年的老朋友。

难忘的战友

每当我回忆交际处工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共同勤奋工作的战友。十年间，最初由五名干部、十多名勤杂人员，发展到后来的二十来名干部、五十名左右勤杂、警卫人员，不管调进调出多少人次，凡在交际处工作过的同志，不仅在交际处工作中为党为革命作出了成绩，绝大多数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受住了考验。

不了解交际处实际工作特点的人，总以为在交际处工作可以经常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可以陪客参观游览；还可以出席宴会，好处很多。诚然，这些好处是有的，政治上受到更好的教育，工作上受到更多的锻炼，生活上得到实际的考验。但不为外人所知的是，在这些好处的背后，交际处同志们需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啊！交际处的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坚强的战斗意志，饱满的革命精神，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每接受一项大的接待任务，就象迎接一场战斗，从处长到每一个联络人员、招待人员、总务人员和秘书、文书，都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等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完成任务以后，每个人都象生了一场大病，疲乏不堪。

十年间，交际处战友们正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

的。大家都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平凡工作的平凡的革命战士，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生活，不断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自己的一项一项光荣任务。现在回忆起那友爱互助，团结胜利的日子，使我永远难以忘怀。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古从军、胡光、刘力、李福瑞、金耐、华龙毅、杜维七位同志。他们之中有的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光荣牺牲，成为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有的至今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有的已经退居第二线或离休，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四化事业散发着余热。他们虽然都是普通的革命干部，但永远值得我纪念和学习。

（1）古从军同志。

古从军，广东人，中共党员。他出身于很有钱的南洋华侨爱国工商业者家庭。本人在香港上大学，毕业后曾做过新闻记者。有一未婚妻是香港人。古从军参加革命前，双方家庭都催促他们早日完婚。但此时抗日风云骤起，古从军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心先抗战后成家，他对未婚妻和父母说：“男儿以身许国，等打走了日本鬼子，再回来结婚吧。”从此出走，千里迢迢，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九三八年入抗日军政大学。他中文、英文都很好。一九三九年初在抗大毕业，与同期学员石锋同志一起分来交际处工作。当时交际处正在筹建联络科。我考虑到石锋同志是本省人，知北方的风俗人情，人熟地熟，便于活动；而古从军政治文化水平虽高，毕竟语言不很通，路头不熟，所以提名石锋为联络科长，古从军为科员。我原来担心古从军会闹情绪，因为他俩是同期学员，一个当了科长，一个却是科员，似不公平，在我公布上级批准的任命时，没想到古从军毫不计较，愉快而满面笑容地说：服从分配。在实际工作中，他

积极主动地帮助石锋同志，出色地完成任务。

他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被选为交际处党支部的教育干事。那时，我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的组织干事。

大约在六七月间，一天，机关党总支在曹力如同志办公室召集各支部的教育干事开会，事先通知下午七点开会，当时所有的同志都到了，可是等到八点多钟，党总支的教育干事马小云同志还未到。当时我很着急，说：“怎么搞的？老马怎么还没到？你们先等一下，我到教育厅去找他。”说着就要走。这时古从军拦住我，自告奋勇地说：“还是我去吧。”说着就向教育厅走去。那时边区政府机关刚挖了一排新窑洞，各厅的窑洞鳞次栉比。为了防空，各窑洞前的平地上留着土垛。古从军已经走到教育厅的窑洞前，由于天黑，加上他的眼睛近视，没看清路，一脚踩空，从土垛子边上跌下山坡，严重摔伤，昏死过去。

我们开会的同志左等右等，不见古从军回来，正准备自己去找他时，却听到有人来报信了，说教育厅窑洞下边摔伤人了，不知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赶紧赶到出事现场，见受伤者正是古从军，此时已经奄奄一息。我们急忙用担架把他抬起，往中央医院飞跑。谁想到行至北门外时，这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停止了呼吸。

交际处的同志们意外地顿时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个个失声痛哭。我们在交际处窑洞前院地上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王明、柯庆施、郁文、徐一新，边区政府高自立、曹力如等同志，也纷纷来悼念，特别是当时有位华侨陈子昆同志满面涕泪。我以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一副挽联：

相离三分钟、一心为党、遇事争先，显出献身精神，何意您失足竟成千古恨？

共事九十日、只念革命、知难而进，具有无私品格，堪使我埋头默念慕平生。

挽古从军同志

古从军同志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他那为国献身、不计名誉地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高贵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2)胡光同志。

胡光，山西太谷人，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前曾在山西有名的铭贤中学上过学。铭贤中学是孔祥熙在其家乡太谷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中还有美国人。校舍和设备不仅在教育落后的山西绝无仅有，即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

胡光同志在抗大毕业后于一九三八年夏秋被分配到交际处工作。当时他刚二十出头，中等身材，面如重枣，性情机灵、活泼，办事精明强干。有一次，交际处派他送客人到西安，边区政府委托他顺便采购大批文具纸张办公用品及其它东西。当时我认为他年纪很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对他能在政治上生活上很好完成交际工作是有信心的，但很为他能否圆满完成采购货物的任务而担心。直到他从西安回来，我才放下心来。我问他：“边区政府要你买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吗？”他说：“都买到了。”我一听心中暗喜，觉得他蛮会办事。我又说：“好，你先休息一天，明天叫杜维同志（交际处总务科长）帮你算帐。”他说：“我早就算好啦！”说着，拿出帐单递给我看。我打开帐单一看，嘿，帐目清清楚楚，十分精细。我心里意外地高兴，暗想：此人虽然年轻，倒是有山西人的特点——会经商管钱。

他的精明强干，很快被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同志发现了。曹秘书长要调他到边区政府机关当总务科副科长。胡光同志不

愿意去，为此他曾在我这里哭了一场。我劝慰他说：“我也舍不得你呀。可是作为一名党员，总要服从组织决定。再说你在我这里是科员，到那边去就是副科长。总管边区政府的总务工作，责任更大、管事更多，可以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嘛！”他无可奈何，只得服从调动。大约在一九三九年春，他离开交际处，到了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不久我听曹力如同志说，胡光这个小伙子样样都好，工作很出色，就是一样不好——“不安心”，三番五次打报告要到前方去。

不久，胡光来告我说他已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批准上前线了，我也为他高兴。他很快拿着介绍信去总政报到。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音信了。

一九四〇年夏，总政治部宣传科的赵品三同志从前线回延安，住在交际处。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向我谈起了胡光的情况。一提到胡光的名字，赵品三同志的表情立刻变得肃穆、沉痛。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胡光同志牺牲了。”接着，他向我讲述了他在前方碰到胡光同志的一段往事。他说：“一次，我有事到太岳区去，在洪洞县的一条公路上行走时，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年轻的肩挑小贩，走近一看，原来是胡光！他的样子一点也没变，就和我在交际处见到时一样，只是服装变了——军装变成了小贩打扮。穿着一身旧白衫裤，头上包一块白毛巾。他也认出了我，扭头看看四下无人，真是高兴极了！他放下担子，把担子上的香烟拿给我抽，糖果塞给我吃。还顽皮地问我：‘你看我象不象？’我开玩笑地说：‘地地道道的山沟老西！’他也笑了。后来我在军区政治部听说他是太岳区的很出色的侦察员，立过很多功劳。可是不久又听说他被敌人逮捕了，英勇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

壮哉，胡光同志！你不愧为党的好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我们交际处的同志听到了赵品三同志传来的噩耗，大家都为失去这位光荣战友而悲痛，又为我们曾与这样的光荣战友在一起工作而骄傲！

（3）刘力同志。

刘力同志，陕南人，民先队员，进步学生。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底毕业后，被分配到交际处工作。

她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身材瘦小，面容秀丽。喜穿一件紫红色毛衣。为人十分热情、大方。

她到交际处，被分配做联络工作。在完成一九三八年底接待印度援华医疗队和一九四〇年春迎接成吉思汗灵车过延这两项重要任务时，她不辞辛苦，干得很出色，显示了她的办事才能。特别得到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同志对她的信任和友谊。

当时国民党延安县党部书记长高仲谦，是个CC顽固派分子。他见刘力同志又年轻又大方，就派县党部的特务分子用老乡关系接近她、拉拢她，有时还请她吃饭，企图腐蚀她的斗志，妄图从她口中套一些我党和交际处内部情报。

一天，我和刘力同志一同去桥儿沟办事，路上，我对她说：“你和国民党县党部那些人来往，可要警惕，那些人来意不正啊。”她听后抿嘴一笑，说：“金处长，你还不了解我吗？他们是什么人，难道我心里不清楚？我早把他们所想的所说的话都汇报给保安处了。这些鬼孙子，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瞎了他们的眼睛！”这时我才知道，她还是个很有心机的同志，从此更加信任她了。

我认为她还年轻，应当继续深造，就送她到延安女子大学学

习。她很高兴，在女大学习劲头很高，挖窑洞、种地，也都走在前面。不幸的是，不久她的右腿出了毛病，不能弯曲，遂中途辍学，到柳树店疗养。当时我们的医疗条件很差，医药十分困难。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不见效果，不得不提出回家医治。她家在汉中，是开药店的，很有钱；她父亲是当地颇有影响的绅士。领导上考虑到她的病在延安确实难以治愈，而回家治疗较为有利；再者她回去后可争取她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有助于在当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于是就批准了她的请求。

离别我们的时候，她难过极了，象离群的孤雁，依依不舍。本来她说好回到家后就给我们写信，谁知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始终未得到她的片纸只字。我们担心出事了，就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多方打听。后来才知道，刘力同志到西安后，离开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卑鄙地绑架并杀害了。

我记得她和胡光同志都爱唱歌，特别爱唱《游击队歌》和《到敌人后方去》。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是不大唱歌的，但我很爱听他们唱，在歌声中感受勇敢、欢畅、向前的力量。直到今天，一听到这两支革命历史歌曲，我就想起了刘力和胡光的歌声，仿佛又看到他们复活在我的眼前，并把我的情绪拉回延安了！

（4）李福瑞同志。

李福瑞，山东人，中共党员。他出身贫农，从小受尽苦难，抗战爆发后，他怀着强烈的民族恨、阶级仇，毅然离家，参加了八路军，离家时已订婚，媳妇尚未过门。

在残酷的战争中，李福瑞随军转战华北，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是一名忠诚勇敢的战士。一九四四年，他被调来延安，到交际处当饲养员兼运输员。

那时，他只有二十三四岁，矮矮的个子，结实的身板。朴实、

憨厚，工作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也是觉悟很高的革命战士。

一九四五年夏天，他和几位同志执行运输任务，从延长回延安，过延河时，上游发了大水。眼看洪水就要下来，李福瑞等人急忙催赶牲口过河。当大部分牲口已经过河上岸，只剩下最后一匹马时，洪水到了，这匹马一下子被冲下去好远，眼看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险，在这危急之际，李福瑞不顾生命危险，向那匹马游去，抓住马尾，用肩膀用力一扛，将马推上滩岸，避免了损失。

一九四七年三月，交际处撤离延安时，李福瑞当了我的警卫员。我们从延安到绥德，又从绥德东渡黄河到山西三交。一路上，他既是勤务员，又是饲养员，找乡政府或兵站，找招待所，烧水，做饭，喂马……日夜忙碌，十分勤快，办事麻利、周到。

同年十二月，我奉命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央军委总政召开的敌军工作会议，李福瑞与我同行。我们从兴县出发，沿雁北的公路东行，一路上我发现他有惊人的认路本领。原来他从前线去延安时，曾走过这条路，只走这一趟，他就把路上的标记全部记在脑子里。这次东行，他几乎不用问路，凭着他记忆，就十分顺当地到达了目的地。

敌军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和李福瑞一起西返。二月底的一天傍晚，我们行至山西朔县以南的某个村庄投宿。李福瑞安顿好住处后，大概是出去喂马或干别的什么，无意中发现一个全身裸体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在刺骨的寒风中，被冻饿折磨得不象样子。李福瑞同情地问起他的身世。原来这孩子的父亲在旧时代挖煤窑时被流沙压死了，母亲为生活所迫，改嫁了，扔下他一个孤儿，到处流浪，无人照顾，挣扎在生死线上。李福瑞默默地把孩子领到他住的屋里，给孩子吃东

西，当晚抱着这孩子，在热炕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李福瑞来到我住的房间，把那孩子的情况向我作了汇报。我听后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怎么办呢？又不可能带他走。我只好想了个办法，说：“咱们的木箱里不是有包收音机的旧棉胎吗？把棉胎给他吧。”李福瑞打开箱子，取出二块棉胎，一块裹在孩子的腰际，一块裹在胸际，再用绳子绑上。小孩子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温暖，感动得流下眼泪。

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在想：为什么李福瑞能细心地发现这个孩子，并给他巨大的温暖？这是因为李福瑞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有着对穷苦劳动人民深厚的同情心。他关心群众，关心别人，一事当前，总先为别人打算，先为公家打算，心中唯独没有他自己啊。

一九四八年三月，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出淳化，取邠州，直捣胡宗南匪军的总兵站基地——宝鸡。我为传达军委敌军工作会议精神，随后赶到宝鸡找一野政治部。李福瑞跟随我，一起到了前线。

一到前方战斗部队中，那激励人心的军号声、战歌声、军马嘶鸣声，一下子激起了李福瑞这个老兵的战斗热情。他恳切地向我请求，把他留在前方。我从内心是舍不得他的。但考虑到他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上前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象他这样一块好料，一定能在革命战争的考验中，成长为我党优秀的干部，因此我们随一野总部回到洛川后，就答应了他。他见我同意放他走，高兴得眉开眼笑，可是过了一会儿又收敛了笑容，问我：“金部长（当时我是西北联防司令部政治部联络部长）。我走了，你怎么办呢？还是我先送你回去吧。”我笑着说：“不用啦，你就留下吧。将来把你的立功喜报寄我啊。”我们就这样在前线

分手了。

也许是因为战斗频繁、无暇写信吧，我始终没有收到李福瑞的信。

一九五〇年我在北京中央统战部工作。一天，忽然收到一个包裹，落款写的是西北野战军某部的番号。拆开来一看，竟是李福瑞同志的遗物！部队的来信说：李福瑞同志屡立战功，当了班长，不幸在解放大西北的河西战役中英勇牺牲。他生前从未向别人讲起过自己的家世，我们只知道他曾是您的警卫员，因此特将他的遗物寄给您，请您转交他的亲属。

我手抚烈士的遗物——一双鞋子、几块肥皂，热泪夺眶而出，他那朴实的微笑、敦厚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曾多次通过山东省民政部门查询李福瑞同志的亲属，至今未找到。不知烈士的父母还健在否？烈士的未婚妻还怀念着他吗？

（5）金耐同志。

金耐同志，安徽巢县人，中共党员。他的哥哥金子美同志，曾任晋冀鲁豫解放区文联主任，是革命烈士。金耐初中毕业后来到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一九三八年夏在陕公毕业，来到交际处，任招待科长。

金耐同志的特点是忠诚老实、任劳任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比较敏锐，有政治头脑。

所以，交际处党支部大会选他为党支部干事，负责保卫工作。开始，我们没有秘书，甚至没有专职的文书，因为他是党支部干事，又做保卫工作，所以让他兼做文书工作。很多直接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映客人情况的机密报告，都是他写的。

一九四三年夏，康生为了破坏整风运动，搞了一个“抢救失

足者”运动。金耐同志因为在中学时期，在一次集训中集体参加过三青团，也被当成了“抢救”对象。其实他的这个很一般的历史问题，早在他参加革命时就向组织说清楚了，组织上也早有了清楚的结论。但旨在把水搅浑的“抢救运动”，还是把他冲击了。他被调到行政学院去“学习”——实际上是去交待问题。

幸好，当时的行政学院院长王子宜同志，曾在边区政府工作过，对金耐很了解。金耐到行政学院不久。王子宜同志就把他解脱出来，让他当干部。一九四四年夏，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安，我急需得力的干部，就指名要金耐回交际处当招待科长，行政学院就让他回交际处了。

抗战胜利后，金耐上了前方。解放后，他长期在铁路公安学校任党委书记。

“文革”运动中，康生把延安“抢救运动”的一套，重新搬出来，而且扩大了千倍万倍！金耐，这个当年延安“抢救运动”的受害者，在残酷疯狂地迫害干部的“文革”运动中，更被整得死去活来，十分悲惨。

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大地震，他罹难于唐山。

（6）华龙毅同志。

一九四〇年春，中央办公厅从山西动员几十个有点文化的小青年来延安干勤杂工作。我们交际处分到了六七个人，其中就有华龙毅，那时他叫阎德荣。

我们经过短期的观察，发现华龙毅、冯寿椿、王荣棠三个人比较聪明伶俐，就分配冯寿椿当会计，王荣棠去招待国民党联络参谋。华龙毅呢，被分配到客灶小伙房当炊事员，学做酒席的大师傅，是要有点才华的。

华龙毅这个小机灵鬼很善于学习，烹饪技术一点就透，改善

伙食也挺有办法。就是有一条——“不安心工作”。当然，哪个小青年愿意一天到晚围着锅台转，同锅碗瓢盆打交道呢？况且又是他那样顽皮、灵活的小鬼。不过，“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条革命纪律他还是懂得的，所以他一直工作得不错。

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浪潮中，有一个同华龙毅一起到延安的小青年，在中央医院当勤务员，受到了冲击。在一些人的威逼下，这小青年吓傻了，信口开河，乱编起供词来。他说他是特务，阎锡山的“革命同志会”的骨干，与他接头的另一个特务在交际处工作，不知叫什么名字，脸白白的、圆圆的，常穿黄衣服，他们曾在飞机场接过头。

中央医院将材料转到交际处，我们根据材料上说的一对，恰是华龙毅。但我感到这材料缺少真凭实据，有点神乎其神，因而不大相信，仍然让他在伙房工作。不过，我也有错误，在当时的气氛下，在“抢救”的风头上，我们也曾让华龙毅“交待问题”，并把那份揭发材料放进他的档案。

毛主席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后，华龙毅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以后几年，华龙毅当过股长。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党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华龙毅响应党的号召，到最需要干部的东北去，从此离开了交际处。

华龙毅离开交际处时，我们虽然为他作了“政治历史查不出问题”的结论，但由于当时没有类似今天“撤销档案中一切诬蔑不实的整人材料”的规定，所以没有将他档案中的那份揭发材料抽出销毁。一九四九年春我刚进北京，他曾为此事专程来找过我，我才正式向他道了歉。

从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九年春，我们别离仅三年半，可是

我们再次见面时，华龙毅这个小鬼由于用脑过多，竟已前脑秃顶。这时我才知道，一九四六年，他在东北通化县考入航空学校，一九四七年毕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航空员。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华龙毅是志愿军空一师大队长。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他的飞行大队与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飞机在朝鲜秦川江上空展开激战。华龙毅以其勇猛机智，首先击落敌机F-80两架，其他战友击落一架，打了个三比〇，获胜而归。开创我军空战胜利的记录。

同年十月十六日，敌我展开大规模空战。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华龙毅的单机与敌十四架飞机拼杀格斗，击落击伤敌F-86新式喷气战斗机各一架，以少胜多，成为孤胆作战的范例。

在又一次空战中，华龙毅为援救战友，不顾自己的飞机五次中弹，三次冲入敌机群，重创敌机，牵制了敌人，掩护战友脱险。他自己身负重伤，飞机亦被打坏，在无法继续操纵的情况下，被迫跳伞，安全返回部队。

由于他战功卓著，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授予他特等功臣的称号，并授予他的大队“大功大队”称号。我空军司令部授予他特等功奖状和“孤胆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政府还曾授予他国旗勋章、自由独立勋章、军功章各一枚。

他的事迹，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空军报》上，以及《志愿军英雄传》中，都曾被突出地报道和介绍。

一九五九年以后，他在中国民航地区管理局工作。二十多年来，他指挥过几十万架次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没有出过一次责任事故。

如今，我们的英雄已经退居二线，但他壮心不已，仍在为祖国的航空事业散发着余热。

(6)杜维同志。

我们交际处分为三个科——联络科、招待科、总务科。

联络科和招待科干的都是出头露面的工作，直接与客人接触，有机会陪同客人会见党政军负责同志，参观游览、参加群众大会、文艺晚会和宴会；而总务科干的是后勤，总是默默无闻地为别人做好工作创造条件。这就要求干总务科工作的人，必须有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牺牲精神。我们的总务科长杜维同志就是这样一种人。

杜维同志参加革命很早。她原是四川的中学生，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她和同学一起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献身革命事业。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她被调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爆发后，她来到延安，先后在陕公和抗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交际处当总务科长。

杜维在交际处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家，不仅有行政工作的组织才能，而且有生产理财的本领。

记得一九三九年以后，国民党当局不但不发军饷给我们，反而派兵对我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日本侵略军在华北的残酷扫荡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我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当时毛主席指出，出路有三条：一是饿死；二是解散；三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首先搞起了大生产运动。

我们交际处机关小，生产也没底子。我们就利用我们的优势——有好厨子，来发展经济、克服困难。我们在南门外开了一个小饭馆，先取名“延安酒家”。后改称“足食园”，卖馄饨、包子、

烙饼、八宝饭，也卖炒菜，包办酒席。当交际处接待外来宾客时，“足食园”可开宴会；没有特别接待任务时，“足食园”即对外开放。这样，“足食园”既可招待外来宾客，又可赚些薄利，补充和改善交际处工作人员的生活。而这一切经济活动，主要是杜维筹划的，她很有心计。记得这里还有段插曲，“足食园”刚开办时，她把“足食园”炼猪油剩下的油渣拿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食堂，放在菜里或用盐拌拌给大家吃。当时很少吃到油荤的我们，一吃这油渣，好香啊，都称赞杜维有办法。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老板娘万岁，希望以后不断供应。”可是时间一长，天天吃油渣、顿顿吃油渣，大家不免吃厌了，很香的油渣，变成有猪毛气味了，又向杜维半开玩笑地提了意见：“你办个‘足食园’，好东西不给我们吃，都让别人吃了，天天老让我们吃油渣。实在不是个好当家！”

有一年快过春节了，我到机关食堂一看，只喂着一头猪、几只鸡，就问杜维同志：“这么一点东西，这个年怎么过得好呢？”杜维说：“放心吧，我们过得决不会比其它机关差。”我当时很纳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她杜维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才知道，她是这样干的：把自养的一头猪杀掉，得二百来斤肉，卖掉一半，买回一头老牛，杀了老牛，牛肉留下，卖掉牛皮、牛油，牛骨髓，买回一只羊、十来只鸡。这样，猪、牛、羊、鸡肉样样都有了。全机关过的春节吃了十几天，顿顿有肉，大家十分满意。

一九四三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大见成效，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我们的“足食园”也大为改观。这时的“足食园”不但能制作烧饼、油条、馄饨等大路货，还能制作糖果、面包、果酱、奶油、果脯、糕点等。为了招待来自欧美国家的盟友，我们还学会了作西餐，象炸猪排、牛排、沙拉、纸包鸡、苹果排、鸡蛋糕、奶油

鸡汤等，不待多言，这些发展包含了杜维同志的很多心血。

也就在总务科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走上顺利发展的大道时，我们的总务科长杜维同志却离开了她多年苦心经营的单位，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到妇女合作社当经理去了。她虽然离开了交际处，但她的好思想好作风却永远留下来了。

直到今天，杜维同志仍象一条默默吐丝的春蚕，为了把温暖带给人们而倾注自己全部的力量……

我所回忆的这几位交际处战友，在英雄辈出的革命队伍中，可谓普通的一员。但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无数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普通一兵，用鲜血、生命、汗水换来的。在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他们的革命精神仍值得今人和后人学习、发扬。

后 记

一九三七年底至一九四七年春，我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工作了十年，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尽了微薄的力量。延安交际处的工作既平凡又繁重，仅根据一九四二年的总结报告，交际处接待过的中外来宾就有二千余人之多。而本书所涉及的团体和个人，仅二十余例，只能展示交际处工作全貌之一斑。

我在延安交际处十年的工作，做得并不出色，正如毛主席对我的评价所说：“忠实有余，守面不宽。”我并未达到党的要求。然而可庆幸的是，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可以得到毛主席、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负责同志的直接教诲。他们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对我以后数十年从事统战工作的生涯，产生很深远的影响，至今记忆犹深。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了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统战思想、实践活动记载下来，我决心写一部延安交际处的回忆录。从最初构想，到整理成二十余万字的书稿，足足花费三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我总怕自己的记忆不可靠，每写一个重要情节，都尽可能在有关档案或旧报刊资料中，找到原始记载作为依据。我还邀请过有关老同志一起座谈，请大家对往事互相提示、对证，还走访过一些知情的老同志。每个专题写出后，都打印出来，寄给有关老同志征求意见。这样反复修改，数次易稿，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材料基本上是可靠的。但由于当年交际处的全

部档案，在解放战争中被管理档案的同志不慎失落，因此难免会有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因精力所限，还有许多应该写的人和事尚未写出，只好留待他日了。

在写作过程中，胡安、陈复君、林延军、高京等同志参加了搜集、整理材料、写作等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新华社，以及许多老同志都给予热情帮助；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尽了很大努力，在此一并致谢！

金 城

1984年8月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A5NzY4NDhf5bu25a6J5Lqk6ZmF5aSE5Zue5b+G5b2VX3AzMTguemlw",
  "filename_decoded": "10976840_\u5ef6\u5b89\u4ea4\u9645\u5904\u56de\u5fc6\u5f55_p318.zip",
  "filesize": 23488181,
  "md5": "49d735b0df31842e1236c4c3d37e14b4",
  "header_md5": "8909ff9bb608e5b4a5f0a0e709be5aab",
  "sha1": "3e8d63f1e62c806c8607b150d087483413253d50",
  "sha256": "2bdd2123f2b01be4cce63918131f3c1c332a96d80a7a465e5d2bae51f9adc70e",
  "crc32": 3624872249,
  "zip_password": "6622Ee",
  "uncompressed_size": 23377025,
  "pdg_dir_name":
    "10976840_\u2564\u2559\u2591\u2593\u255c\u2557\u255d\u2569\u2524\u00aa\u2557\u256a\u2565\u03a3\u252c\u255d_p318",
  "pdg_main_pages_found": 318,
  "pdg_main_pages_max": 318,
  "total_pages": 328,
  "total_pixels": 1282651201,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